

前 言

当我刚跨进新闻界大门的时候——一九二七年冬，我国的一些所谓大报，已经象当时国际知名的报纸一样，每天必有一篇社论（或称社评），紧紧扣住前一天国内外发生的重大新闻，加以分析、评议；并代表报社，对是非曲直，作出判断，表示态度。不再以“时评”、“专论”的形式，刊登些不痛不痒或时间性不强的政论性文章了。

两年以后，我正式担任报纸的编辑工作，总编辑是当时最闻名的新闻评论家张季鸾先生。他写的每一篇社论，读者争阅，真可说是万人传诵的。但我曾听他说过，而且是很诚恳地说的：“报纸的社论，都是极短促时间里赶出来的急就章，未经细细推敲，生命力是极短的，没有保存的价值。如果写作者力求精进，看了若干年前的旧作，会脸红的。”所以，他生前从来没有出版过什么集子，逝世后才由别人代集一本“文存”。

十几年后，我也混在“后浪”里，开始作文了。先是为人代庖，偶然“客串”，以后正式主持“笔政”，从一九三八年初起，直至一九五七年被迫搁笔为止，历时二十年。所写的社论和时事性文章，总不下两千篇吧，短评小言，更难以约计。但我牢记那位前辈的话，也从不留底或剪存，因为我有自知之明，无论在功力上，在文采上，都比那位前辈差得很远，如何敢敝帚自珍呢！

学生贺越明君，潜力研究我国近现代报刊评论和评论家，曾在京、沪等各地较大的图书馆广泛收集资料，也把从“孤岛”时期的《文汇报》起，凡我主持“笔政”时期的报纸，包括香港、桂林、上海《大公报》和上海、香港《文汇报》的社论、短评基本搜齐了。为了辨认（因为各时期都有别人执笔的），要我翻阅了一遍。我汗流浹背地从头看这些旧作，认识到有些观察太肤

浅、观点太幼稚，至于结构的不够严密、文辞的稍欠通畅隽永，犹其余事。这些东西，正如那位前辈说的，事过境迁，只宜覆瓮了。

一些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多年的同志，了解这些情况，认为加以编次，可以作为学生的补充读物，也可为关心近代历史的同志，提供一些研究的素材。武汉大学新闻系的同志，也极力鼓励我加以整理，愿由该校付梓。贺越明同学对此很热心，独立完成了搜集、整理和编次的工作。

在旧社会，我是一个职业的新闻记者，觉悟不高，所追求的，只是国家独立、富强，人民摆脱贫困和欺压。为此，曾以秉笔直言自许，报馆虽屡遭查闭，个人曾长期受歧视、恫吓，而未尝动摇。今天重翻旧作，虽自觉幼稚可笑，而并不“悔其少作”。因为，作为一个报人，无心的失误是难免的，有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即使在高压之下，也是不可原谅，要受人民和自己良心的谴责的。

我国自有近代报纸的一百多年中，优秀报人辈出。他们接受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争取光明，揭斥黑暗，为此而受恐吓、监禁甚至牺牲性命的，不知凡几。象我这样的平凡报人，能留存到解放以后，还能为人民的新闻工作贡献力量，尤其在经过二十年坎坷后出现的历史上少见的美好时期以来，还有机会发散“余热”，真正由衷的感激而倍感幸福。

我开始试写社论，在一九三三年左右。那时，我当天津《大公报》的驻汉口特派记者，工作并不繁重，年轻，且精神旺盛、如饥似渴地想多读书，多练笔。那年，一位姓李的同业创办《大申报》，延万枚子兄任总编。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每周为他们“客串”一两篇社论。这张报，大约只维持一年多就停刊了。一九四二年初访重庆，听说李已在乱机大轰炸中罹难了。枚子兄则年逾八旬，现在北京欢度晚年，精神还很矍铄。

一九三四年，《大光报》在汉创刊。主持人赵惜梦“九·一

八”前在哈尔滨《国际协报》任职时，兼国闻通讯社记者。因为这个关系，故政之先生函嘱我尽力给以协助。创刊之初，我曾参加要闻版的编辑，也写过几篇社论。等到一切上了轨道，销路打开，因为他们的编辑部力量相当强，我就不再插手了。

一九三六年《大公报》创刊上海版，调我任要闻编辑，兼为《国闻周报》编“一周大事记”，并写“一周大事述评”。周报的主编杨历樵兄，还经常怂恿我写些时事性的专论。这是我经常写作政论的开端。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沦为“孤岛”。十二月，《大公报》上海版及《申报》、《立报》等自动停刊。因为租界当局在日军高压下，通知各华商报纸，一律要将稿件事前送日方检查。

翌年一月初，《文汇报》以英商名义创刊，我“承包”了全部社论。二月，正式参加，任主笔，实际负责全部编辑、言论工作。从此以后，我二十年如一日，每天绞心血，担风险，熬夜到天明，在一个报里“挑大梁”、“唱主角”了。

办报是一桩危险的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尤其如此。

中国从来没有言论自由的传统。从清末革新运动激化以后，以言论获罪坐牢、鞭死、瘐死、投海的，就有邹容、章太炎、沈荇、陈天华等。辛亥以后，禁锢更密。北京的报馆，动辄被封；沪、津、汉各地租界的报纸，勉可存立；而其驻京的记者，一旦报道真实消息，揭露其黑幕，军警督察处（袁世凯时代的特务机关）之类的军警黑手，立即出动，轻则关押，重则枪决，邵飘萍、林白水等都是因而牺牲的。但北洋军阀，毕竟是粗人，对付舆论的手段比较简单，一手金钱，一手刀枪，如此而已。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登场以后，因为帮闲群中有一些曾舞弄笔墨的“秀才”，有的还曾是搞报的行家，出谋献计，文网日密。钳制的方法，也层出不穷，办官报，办统一的通讯社；对一般报

纸，或强加官股，或强派编辑、记者就近监督；对租界报纸，则利用流氓及党部势力，贿通洋人，实行越来越严密的报刊检查制度，凡他们认为违禁的新闻或评论，或全文禁刊，或部分删节，起先还可以“开天窗”——被禁刊的字句填以“□□”，以后，一律要把天窗堵塞，把连不上的删剩的句子，设法连结起来。

一九三六年我初到上海当要闻编辑时，每晚一定要等新闻检查处“检迄”的稿子发回来，赶快动修补手术，才通知机器房开印。

一九三八年我开始主持笔政时，所受的压制就更加复杂而严酷了。《文汇报》是挂英商招牌的，稿子可免于敌人的检查，但他们也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经常有爱国者被绑架和杀害，租界里也一片刀光剑影，暗杀成风。《文汇报》因坚持抗日救亡，揭斥敌伪阴谋，不断受到恫吓、威胁，先后被投掷炸弹三次，送死人手臂、毒汁水果等以死相胁也有几度。

那个时候，我曾在宁绍保险公司保了二千元人寿险。可见，我也不是全无精神准备的。

比敌人的威胁更难对付的，是租界当局不断的警告和所雇“保镖”的捣乱，动不动就指我们为违反英国的中立立场，危害租界的安全地位；而那位以每月一千几百元雇来的“保镖”——英人克明，则一直想伺机夺取编辑控制权，每加掣肘和吹毛求疵。最后，还企图把报纸出卖给汪伪。这阴谋，被我们及时觉察和粉碎了。

谈到这里，可以补叙一个插曲。我曾写过回忆当时斗争的史料，有人不仅为自己辩护，还为克明翻案，说克明并不曾同我斗争，也没有被迫辞去董事长这回事，他写的“更正”，是征求过邵伯南（红叶）同志同意的。

红叶同志是《文汇报》创刊初期的主要记者，受克明的迫害，去武汉采访，不久即去西北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后，曾任《天津日报》总编辑。一九五七年，我们曾一起去苏联访问。

在十年“文革”中，他也备受折磨。去年夏天，来沪重叙契阔。他说，根本没有人向他征询关于《文汇报》史实的事，反而在“文革”中无意得知一段珍贵史料。原来，在造反派批斗他的“罪行”时，说《文汇报》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报纸，他参加过《文汇报》，自然是历史“罪证”。造反派还特地派人来上海“外调”，经上海“市革会”批准，翻阅公共租界档案，有克明的职务卡片，注明是“工部局密探”。那个造反派对历史一无所知，查抄了回去给红叶看，想加重、证实他的“罪状”。

这一下，不仅让红叶同志了解到当年压迫他的是怎样险恶的敌人，也使我恍然大悟，原来与我对阵的，是这样一个暗藏的好细。

《文汇报》创刊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初。那时，国民党军已“弃守”上海两个多月，敌军一面在租界四周企图巩固其占领，建立“新秩序”；一面在租界里制造恐怖，诱胁地痞、败类拼凑“大道市政府”、“维持会”等汉奸组织，原上海公商会会长傅筱庵、天主教败类陆伯鸿以及流氓商人尤菊生等纷纷“落水”。租界百万居民，抗日的情绪极高，而粮食紧张，物价飞涨，生活日益困难。敌人出版的报纸，除日文《日日新闻》外，还有《新申报》，公开宣布“大东亚新秩序”，面目极明显。另外，由“落水”报人余大雄、钱芥尘以及红帮头子徐某等，先后改组出版了《神州日报》、《生活日报》以及《晶报》等；加上面目模糊的《时报》等，则以“悲天悯人”的口吻，鼓吹“和平”，唱出反对“战争”的调子，欺骗性相当大。英文《字林西报》和《大美晚报》则维持其本国的“中立”立场，只对日军的暴行，有所揭露和抨击。《大美晚报》的中文版，已由宋子文收买，但也只能在美方许可的范围内，以“中立”口吻，同情中国抗战。此外，还有以洋商名义出版的《华美晚报》，则态度时冷时热，不为读者重视。《每日译报》态度最坚决，但那时还只能以译载外文报刊上同情中国抗战的消息和文章为主要内容。

《文汇报》应运而生，以坚决的态度，宣传抗战到底，揭斥敌伪的阴谋，鼓励孤岛人民发扬爱国大义，保持民族气节，爱憎鲜明，立场坚定。因此，得到广大爱国同胞的热烈支持。出版不到半年，发行即突破六万份，成为孤岛销数最大的报纸（《新闻报》历来是上海最畅销的报纸，那时因接受日方新闻检查，为读者所鄙弃，发行跌至五万份以下）。不久，态度进步的《导报》，也以英商名义出版；《译报》则改出大张，内容不再限于译文；又出版了《大英夜报》，态度也较坚定。以这四家报为核心，形成了宣传抗战爱国的阵地，占了压倒优势。

我就在这时，结识了恽逸群同志，相濡以沫，在斗争艰险时，相互鼓励，交换消息。他那时已是新闻界的奇才，博闻强识，下笔成篇。他除主持《导报》外，听说还不时为《译报》撰写社论。

危险和困难，最能磨炼人的思维。要千方百计排除困难，战胜敌人，就得用心倾听广大读者的声音，开动脑筋，提高自己的写作、编辑艺术。天天空喊“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老调，是不行的。必须随时注意形势的变化，针对敌人的动态，理解读者的心情，以多种多样的手法，以饱满的战斗热情，去感染读者，使敌人颤抖，使动摇者悬崖勒马，从“水”边回头。比如，当敌人拼凑南京的傀儡组织时，我们及时揭露他们的阴谋。以汉奸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登场那天，我们写了一篇《无题》的社论，反复指出它象僵尸一样，企图借用“中国”的名义“还魂”，欺骗人民，是不会有好下场、也不会逃避历史的惩罚的。我们把南京傀儡登场的消息，拼在社论的旁边。恰巧，老牌汉奸郑孝胥——已被敌抛弃的伪满大臣死讯传来，我们把它加了一个框，“讣”在中间，暗示这是一切为虎作伥者必然的下场。为什么“无题”呢？因为租界当局不容许过分刺激的标题，只能“此处无题胜有题”了。

在此前后，国民党“下野”将领周凤岐在其寓所被爱国者枪

杀。他原是浙江的土军阀之一，北伐军到上海前倒戈，而且曾被充当“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工具。以后，“秋扇见捐”，所部也被改编、吞并了。怀着对蒋的忿恨，加上敌人诱劝，许以“军政部长”的名义，他也准备“上任”了。不料，一弹飞来毙了命。对这样的民族败类，本来可以痛痛快快骂一顿。但我想，让读者痛快一阵，意义并不大，而且，毕竟他还未“落水”。借这题目，细细分析汉奸心理，分析他们权欲与良心的斗争，指出他们必将蒙受人民和历史的审判以及家属子孙将受的影响，这样苦口婆心的立论，也许可以挽救一批正在“水”边徘徊却顾的人。于是，我写了《周凤歧之死》。

在“孤岛”《文汇报》出版时期，国民党抗战还比较积极，公开反共的事件，还没有发生过。不论从哪方面传来的抗战胜利新闻，我们都大事宣传，突出刊载。尤其如平型关大捷，我们标出是“七七”以来中国的首次大捷，和台儿庄胜利一样用大字标题，刊之显著地位。

副刊上，更不断刊出描述西北高原活跃气氛的“来鸿”，也刊登过史沫特莱的连载。在《文汇报》创刊后不久，我就写过一篇社论，展望西北战场，认为那里不仅自古是决定战局的重要地区，而且那里已有训练有素、身经百战的军队，正在横戈跃马，与敌人周旋。这是鼓励沦陷区人民，不要因东南战场步步失败而丧失信心，而且暗示胜利的曙光已在西北闪耀，暗示中国的希望在西北。应当说，那时就看到这点，并清楚地写出来，作为一个无党无派的新闻记者是要有些远见和胆识的。

应该指出，“孤岛”上当时有不少进步和革命人士，默默在做艰苦的文化宣传工作。复社编印了《鲁迅全集》，我是首批预订者之一，初版本迄今还排列在我书橱的上层。斯诺的《西行漫记》，不久就在“孤岛”翻译出版。还有美国记者根室写的《亚洲内幕》，也于此时翻译出版。这些书，都是我珍视的精神食粮。

在戏剧界，也有不少前趋者在踏实地以这种暗示或以古喻今的手法，鼓励“孤岛”的正气。周信芳先生先后公演的《正气歌》等，轰动了“孤岛”。我在寸步荆棘——时刻可能遭到伏击的情况下，曾化装去今复兴西路某偏僻会场，看苦干剧团演出的话剧。《文汇报》被迫停刊后不久，我携妻挈子，回到当时的浦东大楼，看于伶编写的话剧《葛嫩娘》。散戏时，因暴雨积水，我们冒雨涉水回家——当时我家在今复兴中路，过巨鹿路一带，水深没膝，到家时，上下都湿透了。

《文汇报》停刊后，胡政之先生“函电交驰”，促我速回《大公报》，主持香港版的编辑工作。我理清《文汇报》后事后，七月底始成行。从此以后，直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由于太平洋大战爆发而休刊，我主持港版笔政达两年半。

《大公报》自一九二六年九月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先生接办复刊后，社评一向由他们三位亲自轮流执笔，归张统一润色，从不让别人插手，因为读者也承认社评是《大公报》最大的特色。他们力求精益求精，不让它降低质量。若干年后，才由杨历樵兄参加，写些纯国际问题的社评。一九三六年上海版创刊，吴鼎昌早到南京做官，名义上辞去社长职务，胡、张则都迁居上海，以上海版为经营重心，留王芸生兄在津任编辑主任，开始在津版写些时间性较强的社评，其余重要社评，仍由张、胡执笔，以电报打至天津，与沪版同时见报。

杨历樵兄也来上海，仍主持翻译、编辑《国闻周报》，仍继续写国际问题的社评，每月大约二、三篇。一九三七年初起，他们也偶然出个题目，口授大意，叫我试写，经修改刊出，还额外给以稿酬二十元——当时白米才四元一石，更重要的是我得到了精神鼓励。

我初到香港时，张季鸾先生也适由渝来港勾留。他起先还要审阅、润色我的社评稿，不久，就完全放手不问。不仅我自己的稿子写好即付排，别的同事写的稿子，也归我一手润色了。当时

撰写社评稿的，除厉樵兄外，还有袁道冲老先生和李纯青兄。

去年八月，我和贺越明同学为了补齐这本书的旧稿，曾几次赴北京图书馆查看当年香港、桂林《大公报》的胶卷放大图象，我才吃惊地回忆起当时香港当局对华文报禁网之严！

自然，行动是不象“孤岛”那样成天关在铁笼里，时刻有挨冷枪、被炸死的危险，而是可以放心工作，也可以在工余时间，约朋友去咖啡馆或酒楼任意谈天了。但报纸所受的删检、压制，则比上海租界更加严厉。这次我们翻看旧报，不仅在社评中看到成串成串的“天窗”，而且发现有好几天的社评地位，全部空白，注明“全文被扣”。可见，资本主义国家鼓吹的言论自由，至少在殖民地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现在香港报纸的禁网，自然大非昔比了。这是国家独立、开始强盛和当地居民多年奋斗的结果，不是社会制度先天产生的。

当时的报纸，不准出现“抗日”字样，自然，更不许“抗敌”。因为多年的英日同盟虽不复存在，英国的在华“利益”虽遭到损害，但香火旧情仍在，对旧侣还要保持“中立”。当然也不能批评英国的政策，连“帝国主义”字样也不许出现。否则，就是“指着和尚骂贼秃”了。

它们标榜法治，事事有法规。但这些法令、法规，也象松紧带一样，随时有松弛余地的。

从一九四〇年开始，国内已开始发生几次反共高潮。《大公报》香港版的社评，凡关国内问题的，向例由渝版打小样航寄（当时，渝港间每天有夜航），港版转载。我抱定一个原则：“家庭”纠纷不宜纷扬。所以，有些争论性的文章，不予转载。

记得太平洋大战爆发后，日军攻入九龙，如入无人之境。九龙十一日即陷落，隔海炮击香港，《大公报》港刊于十三日宣布休刊。我曾写了《暂别读者》的社评，勉励海外同胞保持民族气节，发扬我侨胞的爱国传统，使将来重见时，彼此都不赧然内疚。去年，我在北京图书馆翻阅港版旧报时，胶卷到十二月四、

五日就停止了。显然，从此以后，敌舰、敌军已包围港九，报纸寄不出来了。那几天，我天天写一篇社评，自然永远——除非在香港某些图书馆，都无法查到了。

桂林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以“文化城”闻名。因为广西一向是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的“封邑”，在抗战中，还保持它独特的统治体系，蒋的特务势力，不能为所欲为；加上当时名义上是西南最高军事首脑的李济深——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倾向开明，暗中保护了一批进步人士。从京、沪、平、津逃到后方的文化人士和进步文化企业，受不了重庆的窒息、纷纷迁到桂林。

据传说，在抗战初期，到桂林的“外江人”还屈指可数，邮差每收到一些从外省寄来而无法投递的信件，只要站在市中心的十字路口，看到有衣冠楚楚的外江人经过，拉住他们查问，往往会查得收信人。

一九四二年二月我从香港逃到桂林时，市区已大大扩展，到处搭起简易的房屋，市中心有不少饮食店、书店、拍卖行、旅馆及其它行业，已相当繁庶，人口大约有三四十万了。

早在一九三三年前后，胡政之曾由津游历广西近半月，写了好几篇通讯。当时，李、白正处在蒋桂战争失败，退守“老巢”，吹出“自治、自卫”等“三自”政策之后，胡对此颇有好评。加上桂系的客卿邱昌渭（时任厅长）等又是他的旧识，因此彼此都留有较好的印象。

一九四〇年初，他看到香港“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把港馆的大权“下放”给了金诚夫兄和我，亲自去桂林联系、踏查，在七星岩侧背圈租了一片荒地——大都是无主坟堆，平整后修盖了一批竹木结构的房屋，并运用港馆积余的资金，购了六、七架平版印刷机及铅铎、铸字机、铜模等，陆续运桂，连他的家眷也迁去了。一切加紧筹备完毕，于一九四一年初创办了《大公

报》的桂林版，预为香港版留作后路。

所以，我到桂林工作时，一切已是现成的了。开始，我只负责言论工作，版面编辑，由编辑主任蒋荫恩兄主持。大约半年以后，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与胡政之商洽，聘请蒋兄去任新闻系主任。从此以后，我就不再那么悠闲，可以到处游览“甲天下”的桂林山水了。

为了适应桂林特点，创造与重庆版有所不同的风格，决定桂林版的社评，少谈国内大事，多谈文化、教育、经济及广西的庶政。自然，抗战局势以及日益紧张的太平洋战局和欧洲战局，是经常要评议的。

和香港不同，桂林设有公开的新闻检查处，各报的稿件，都要打小样送检，全部打了“检迄”的印章，才能拼版付印。

我几乎天天亲自和新检处打交道。白天预发的稿件，如副刊稿及通讯等，检查的尺度比较宽一些，听说是由一位副处长主检的。他姓朱，思想看来比较开明些。晚上送去的稿子，则由处长亲自严格审查。听说，前此已换了几个处长。我在桂林的两年半（一九四二年二月至一九四四年九月桂林沦陷前夕），一直是姓谭的处长，胖胖的，脸色红润，总带着一脸笑容，经常对人诉苦，说上面责问得多么严厉，他自己是愿意多交新闻界的朋友，检查时尽可能“马虎”的。他还诉说，他的血压经常在二百度以上，但每次酬应，三花酒饮得并不少。而检扣稿子，则十分苛细，每篇社论几乎都要被他用红笔勾去几行或一整段。我有时看他检得实在太苛细，太吹毛求疵，太可气了，索性不理它，第二天照原稿刊出。

他是“中宣部”派来的，但要运用行政或军事压力，在桂林还不太容易，而动不动就对《大公报》提出警告，他不能不有所顾忌。但他也有一套功夫，给你软“磨”。经常是一个电话，唠唠不休：

“徐公，今天贵报的社评，您大概没有注意吧？没有删改。”

“我早细细看了，我认为你们删节得没有道理，所以没有照改。”

“您是误会了。其实，我们对贵报的稿子特别注意，尺度尽量放宽。您这么一来，别的报要责问我们。上面知道了，也不好办，一定要查我们的失责。千万请特别照顾！”

有时，他还亲自跑来，满头大汗，还要装出笑容，寒暄一阵后，渐入主题：

“稿子那么多，我们可能看得粗心些。以后有删节不妥当的地方，请随时打电话，总好商量的，最好不要违犯检查制度。”

我指出那些不该删的地方，说：“我这次是违反了你们的检查，该给什么处分，你就下命令罢。”

“您这就言重了。希望以后多多商量，千万照顾我们的困难。”

其实，谁都知道，象他这样的角色，都是CC的得力爪牙，和重庆经常通气，和广西省党部里CC派来的委员也有密切联系。

所以，这样的“违扣”事件，也只能偶一为之。在一般情况下，还是要尊重“检查条例”，而尽量开动脑筋，同这些检查老爷斗智、斗法，或利用他们的无知、无能，挑不出“毛病”，蒙混过关，或钻条例的空子，写些大题小做、小题大做、指东说西、指桑骂槐的文章，使他们无从捉摸，抓不住把柄，而相信读者能够心领神会。比如，我到桂林住了稍久，越来越清楚新桂系所自炫的“自治、自卫……”的那一套，不过是保甲法的变种。因为其目的在于压制人民，当然要受到人民的抵制，用以维持地方治安，基础也薄弱得很。曾长期任北京法政大学校长的白擎天（鹏飞）先生，那时归隐桂林，我常去请教。他曾透彻地分析李、白、黄（旭初）的做法，是防匪不足、害民有余，而且基础十分脆弱，一有风吹草动，一定会土崩瓦解。有一天，记者写了一条消息，说当局发现邕到祝胜里一带的东江桥弯了，急需修理，禁

止卡车、板车通行。我就以《重建新桥》为题，写了一篇社评，泛论桥基与桥梁的关系，指出桥之所以出毛病，根本原因是基础打得不牢，对东江水流的力量也估计不足。所以，该从基础上好好测算，加以巩固，把烂木头彻底换掉，重新打桩，只加几根支柱，是无济于事的，不久还会再弯，甚至发生危险。大意是如此，具体的词句记不清了。为了这么一座小桥——不过二、三十步长，写这么一篇社评，当时的读者都清楚我的意思，但检查老爷即使能看出，却没有根据加以禁扣。

还有一种对付的办法，即把那些又长、字又难辨，并不想采用的稿子，尽量送往检查，使他们疲于应付。其中那些夹进去的有内容、准备刊登或摘刊的稿子，往往成了“漏网之鱼”。社评稿写得迟，催得急，一般是午夜一时后打小样送去，二时前必需索回拼版、截稿，使他们细细推敲的时间不太充裕。

而且，那时桂林的电力严重不足。不论是路灯还是用户照明的灯，即使是40支的灯泡，也昏暗得象点几炷香一样，伸手仅辨五指。一般机关用户，大都故意把路“丝”拍断一部分——自然要有“技术”，使它坏而不废，这样，寿命虽短，却可以发出较强的光。但即使如此，也不能辨认蝇头小字，而且经常要停电。所以，夜间看稿、写稿，主要靠油灯，而光度也极有限，点了不久，灯罩就被薰黑了。检查老爷要细细工作，也是很难为他们的。

到一九四四年日军发动深入湘桂的战争，衡阳守将方先觉投降后，敌军很快就渡过黄沙河。桂林郊区的美军大飞机场修好不久，曾派机在 frontline 扫射、轰炸，但也阻止不了“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溃军。当时，李济深将军和在桂的进步文化人士，曾号召国旗献金，组织人民，武装起来，保卫桂林。在这期间，我曾应田汉同志之邀，在他组织的动员会上，作过一次时事讲话。我目击国民党统治如此腐恶，曾一连写了几篇充满愤慨的文章，全力支持军民自己组织起来，保卫桂林。这种充满激情，毫无掩饰的口气，是很违反《大公报》传统的文风的。

为时甚短，蒋、白旋即严厉制止。不久，日军逼临桂林郊外。同时，蒋派的“援军”汤恩伯部开到，于分段“包干”洗劫之后，到处放火，桂林就化成一片焦土了。

去年我去北京图书馆查看旧报，桂林《大公报》最后半月的报纸一张也没有。这些违禁的社评，可能永远失传了。有机会想去桂林当地再搜寻搜寻。

只身离开浓烟滚滚、烽火烛天的危城——桂林，踏上逃难的征途。一路上所见，可以用两句话概括：前方是抢，后方是乱。心中窝了一肚子火，这在我的思想上，也经历了一场洗礼。如果以前对国民党政权还存有一分幻想，在事实的教育下，从此象肥皂泡一样完全破灭了！

大约在十月中，辗转到了重庆。重庆那时是陪都——战时首都，也和历来有朝野之分一样，重庆好比以前的北京，桂林好比战时的上海，同样是《大公报》，重庆版属于京派，桂林版则“海”气重一些。此其一。

自从“八·一三”抗战以后，先后创刊的汉口版、重庆版，都是张季鸾先生一手主持的。香港版和桂林版，则由胡政之先生主持。在张季鸾先生生前，无形中存在着彼此，一块招牌，两个字号。一九四一年张先生逝世后，胡不久即由桂迁居重庆，被补为国民参政员，逐步深入地进入政治舞台，但对重庆馆的具体业务，很少插手。我和金诚夫兄到渝的次日，他就一再叮嘱，要善于“以小事大”；桂林馆好比是二房，现在破家荡产，要来依靠长房，什么事都要忍让，有时还要忍气吞声。

为了安置“二房”职工的工作，特地增出了《大公晚报》，由我主编，也只是主“编”而已，规定不写评论，连短评也不要。就这样，为了标题尖锐些，有时为了副刊上登了一些讽刺小品，很引起了当局的不满。

上午忙碌了两三小时，看完大样，一天的事就完了。富裕的

时间很多，长日无事，尽有时间在“小楼”——特为桂馆职员租赁的“三江村”集体宿舍的一角，埋头读书，难得进城去看朋友，以免招惹是非，遭人议论。

规定每星期要我为日报写一篇社评。当时，民主势力提出结束独裁统治，组织联合政府，抗战到底。而在敌军一度逼近都匀、贵阳震动之际，重庆当局也声言要迁至峨嵋山，抵抗下去。有些官方人士，则半公开表示，难已经逃够了，宁可死在这里，也不再走了。幸而为时不长，敌军意在打通南下越南的大陆走廊，不久就由都匀、独山后撤了。于是，官场的空气如故，人民的生活更加贫困、窒息，而贪污、舞弊之风，更加肆无忌惮。我初到重庆时，曾写了几篇评论战局的社评，主要是桂林逃难中的感受，略舒愤懑。以后，写过些什么，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只记得写过一篇题为《为国家求饶》，揭露一些文恬武嬉的现象，每一段的结句，是“你们这些权力在手的人，饶饶国家吧。”总之，基调还不离“小骂”的范畴。所以，这一时期所奉命写的，事后自己也不再重读，只宜覆瓮的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我看完晚报——《大公晚报》大样后，回宿舍休息。少顷，一位同乡朋友来访，正在闲谈，电台的同事来报告，说从外国广播中收听到，日本天皇已宣布接受同盟国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了。编辑部正在准备出号外。过了没有十分钟，外面的爆竹声已轰成一片，也隐约听到上清寺——“国府”所在地区传来的鞭炮声，象闷在釜中的炒豆声一样，连续不断。有人跑回来说：市区的庆祝队伍，已纷纷上街了。

对日抗战，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是过去了。老百姓苦熬了八年，该算熬出了头；因抗战而加于人民身上的桎梏该解除了。我天真地想，以后办报，总不会有那么多限制了。

接着，国、共双方及各党派酝酿政治协商。蒋“主席”也发表了有名的所谓“两项诺言”，允许言论、出版、人身等各项自

由，并允诺释放政治犯。天真的人民，也天真地以为政治清明有望了。

想不到“口蜜腹剑”，就在那时，内战的阴谋，正在开始准备。对于言论，也在搞一套新的箝制办法。国民党中宣部于刚听到胜利的消息后，就宣布了一个所谓收复区报纸登记条例。主要内容是，收复区各大城市，凡未曾在该地出版过的报刊，一律“暂不”登记。很显然，其主要目的，是不准中共及其它民主势力，在上海、北平及其它城市办报。

《大公报》、《文汇报》等报，是原在上海出版过的，当然不在限制之列。而国民党的党报及所能控制的报纸，如《东南日报》、《前线日报》、《中央日报》等，则虽也从未在上海出版过，却如雨后春笋，纷纷发刊，而且拨给了房子、机器及白报纸——基本是从敌伪手中接收来的，企图因而造成舆论一律的声势。

胡政之那时还滞留美国，带着夫人到处漫游。这里，还有一段轶事。在我国出席联合国创始大会的代表中，有董必武同志。董老要求带一名熟谙外交和外语的助手，国民党政府坚决不允，说团里有翻译和随员，所有代表都不能自带人员。胡政之是作为“社会贤达”的代表，他的年轻的夫人一定要随行观光，胡就去力争，蒋只能同意。开了这个例，董老也“沾光”带了章汉夫同志去美参加。

大概胡事先或来电“指示”罢，《大公报》董监事会决定派我和李子宽兄去沪筹备复刊上海版，并任我为总编辑，李为经理。这样，我也算结束了近一年的半“冻结”生活，又可以挥笔写文章了。

我在“受命”以后，就私下决定，过去是以“抗战第一、胜利第一”为框框，右袒些，还可以为读者所曲谅。今后，作为民间报，至少应以“民主第一”为言论中心。我应该在上海版贯彻这个主张，冲破以前的樊篱。如不获谅解，宁可辞职他就。

靠参加受降典礼的机会，我于是年九月五日飞到南京。因受

降典礼延期，当晚乘车于翌晨到了上海。李子宽已先一日由柳州飞到上海。

我到上海时，象南京路等各热闹地区，都搭起“还我河山”的彩牌楼，大商店、公司门前，也悬旗结彩，高挂“蒋主席”的大幅“玉照”，冠以“劳苦功高”等字样。这是奇怪的，陷敌八年，收复区人民满怀胜利的喜悦，对胜利如何得来以及所谓大后方的情况，自然是不能了然的。

恰好在我到沪的第三天，汤恩伯以军事接收大员的身分自芷江飞沪，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队伍经过时，我看到他和随从人员，都是一脸胜利者的得意，睥睨群众。我看后很生气，当天写了一篇文章，作为社论，刊在刚复刊的《文汇报》上。大意说，自三八年十一月沦陷后，上海人民在敌人的蹂躏下，受尽艰苦，绝大多数都能恪守民族大义，坚贞不屈。我希望，受欢迎者及参加欢迎者，抚躬自省，都能问心无愧。

大后方的人都知道，汤是常败将军，军队纪律也极坏。不过一年多以前，敌军向河南未沦陷区进攻，汤部一触即溃。以后，敌军继续发动湘桂战争，汤又奉派去桂林一带救援。他的部队一到桂林，不忙于布置工事，而忙于分段洗劫人民，最后全城放火，名之曰“扫清视野”。这些“战绩”，都是我目睹亲历的。一年以后，看到他们如此得意忘形，怎不气忿？！

《大公报》上海版于是年八月初复刊。我按照离渝前的想法，编辑方针力求符合真正民间报应守的立场，反映人民意见，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反对外国插手。

为了装点门面，公开的新闻检查是宣布取消了，而用其他方法——如特务威胁、党部干涉、造谣、围攻等，更严厉和恶毒地控制舆论。《大公报》复刊不久，南京《救国日报》以“大炮”闻名的龚德柏，就两次指名道姓，公开对我人身攻击，并说他已经查清，我不仅“为共党张目”，而且曾是中共的中央委员。真是白昼见鬼，信口开河！举此一例，可见一斑。

在昆明发生惨案以及随后的沧白堂事件中，根据渝版记者徐盈、子冈等同志（昆明惨案真相得自一《扫荡报》记者，经过已详述在《一位隐名的来访者》，刊于《时代的报告》，收入拙著《新闻丛谈》）的电讯，明白披载，并一再撰文揭斥。

另外，也要使用一些别的手法，如小题大做、大题小做、皮里阳秋、指桑骂槐的战术，同反动势力作斗争。

举例来说，一九四五年秋冬之际，反动论客大肆宣传解放区的土地革命如何残酷，说国民党政府也要实行土地改革，同样可以“耕者有其田”，但不用阶级斗争的暴力手段。他们称之为“以右手行左策”。予他们正面批驳，他们会说是“为共党张目”，而且，并无事实作反证，不易为一般读者所理解。正在这时，南京政府宣布改变交通规则。原来，车辆、行人一向是靠左行，是仿照英、法的秩序的；从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起，改仿美国办法，一律右行。我写了一篇社评，题为《车辆靠右》。大意说，从元旦起，车辆一律要靠马路右边行驶了。如果开车的人，心里还不忘靠左，则轮盘就难把稳，思想和行动不一致，轻则会造成交通混乱，重则会车毁人伤，后果更不堪设想。读者心里很清楚，指的是“右手行左策”的行不通，只能喊喊而已。

由于我的编辑方针和言论态度，实际已是“大骂”，引起了蒋的震怒和报馆当局的不满，我决定辞职。从一九四六年三月底起，离开了工作过十八年的“老家”，重回曾参加开辟草莱的《文汇报》，主持编辑部。

经过人事的调整和充实，与宦乡、陈虞孙、柯灵等同志密切筹商，《文汇报》于是年五月一日起，以崭新的面貌，改组出版。

我们在改版宣言中，严正申明今后的言论方针，是坚守独立的民间报立场，决不伪装中立，依违两可；一切以人民意旨为意旨，明辨是非，决不颠倒黑白，屈于权势。

我们创造性地开辟“读者的话”专版，以整版篇幅，每日刊

载读者来信。同时，除社论外，在要闻版辟“编者的话”专栏，对当天发生的主要问题，及时作短小而一针见血的评议。这些，都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嘉许和支持。

正在这时，斗争日益尖锐。旧政协刚闭幕，反动当局的假和谈、真备战的面目日益暴露，公然撕毁协议，调兵遣将，并加强其独裁统治，镇压民主力量，不断发生较场口事件、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血案以及在其它地方的镇压工人、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惨案。在上海，则以推行警管区制为开端，逐步推行其黑暗统治，制造白色恐怖。

对这些，《文汇报》态度明朗，坚决进行针锋相对的揭露和斗争。在反对警管区制中，我们被警备司令部强迫停刊三天，但绝不气馁。接着，在上海各界人民推派代表赴宁请愿和平遭到血腥镇压的下关惨案中，我们尽情披露真相，发表广大人民对统治者的愤怒。正如当时惨遭毒打的雷洁琼同志前年发表的《血溅金陵忆当年》一文中所指出：“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公正舆论，都支持我们，站在我们一边。在国统区的报纸中，重庆《新华日报》和上海《文汇报》的态度最为鲜明。”事实上，我们在上海乃至广大国统区，起了与《新华日报》类似的作用，而读者面似乎更广阔，与《联合晚报》配合，成为上海最鲜明的进步旗帜。

这一时期的《文汇报》，出版不过一年零二十五天——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改版至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被封闭。可以说，每天时时刻刻都在紧张、激烈的斗争中，经历了摊贩事件、李洋事件（新新公司职工反对汉奸老板）、李闻追悼会、劝工大楼血案、沈崇事件，以及不断的学潮、工潮被镇压等风，我们一直站在广大进步人民一边，绝不退让和畏缩。在内战逐步扩大中，我们不断呼吁和平，披露反动派的阴谋和失败真相，披露美方假调处的阴谋，曾不断遭到造谣中伤、威胁利诱（详见拙著《旧闻杂记》编篇中的《一次鸿门宴》），而从不动摇和妥协。

我们得到了进步力量和广大读者的支持。当然，在立场坚定

中，也要讲究斗争艺术。比如，在各个事件中，除发表社评和“编者的话”外，还广泛发表有代表性、权威性的民主人士的文章，并每周组织“星期座谈”，邀请进步人士或有进步倾向的人士参加发言，针对当时最有影响的问题，及时予以披露。

在社评和“编者的话”中，或在标题中，有时要借古喻今，有时要指桑骂槐，有时要大题小做或小题大做，一切为了揭露黑暗，透露光明。读者在这一时期的文章中，可以找到各种例证，不待一一“索隐”。

报纸被封后，编辑部同事麦少媚被捕（我们多方营救，最后由中央社记者陈香梅保出），马季良、孟秋江等逃亡香港，程光锐、李梦莲等潜赴华北解放区。反动政府不敢对我和宦乡、陈虞孙等下手，怕引起国际反响，暗中密加监视。他们曾警告我：“你只要在上海不动，我们不会难为你。”显然，他们害怕我去香港办报。

被变相软禁了半年以上，在此期间，手“痒”难禁，偶为一些较进步的期刊写点文章，也曾为《正言报》写些社论。这些，都是信手之作，不值得存录。

一九四八年四月，禁锢稍疏，由友人掩护，冒险飞往香港，筹备在那里创刊《文汇报》。

那时，人民解放军已全面反攻，三大战役尚未开始，美、英诸国对国民党统治尚存幻想，对中共及我进步力量，则依然不改仇视态度。上海及平、津等地，白色恐怖日浓，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络绎流亡到香港。

《华商报》早已复刊，其它民主书刊也续有出版。港英当局连同背后的英美政府，知道一律禁止是不可能的。他们对香港出版的进步书刊，视为洪水猛兽，一律不准向香港以外的地方如菲律宾及东南亚其它各地和日本发行，也在四周划了一条查禁线，名曰“防疫线”。而在港九、澳门这个“疫区”内，也多方压制，对人员监视，对书报则施行检查和刁难。

《文汇报》申请登记，经过了近半年，才领到许可证，于是年九月三日创刊。

事先，潘汉年、夏衍等同志对我劝告说：《华商报》随时有遭封闭的可能，《文汇报》态度不宜太“红”，留作第二线。否则，将同归于尽。

所以，《文汇报》创刊初期，完全保持中间偏左的民间报态度。我写的创刊辞《敬告读者》，重申了沪报时的“独立”立场，明辨是非，发扬民主，决不颠倒黑白，依违两可。

出版后不久，三大战役先后开始，南京政府发行“金圆券”，军事、政治、经济都急转直下，呈崩溃状态。我们注意根据事实分析，指出国民党统治已无可救药。比如，“金圆券”发行时，我们就给它算命，指出它的寿命维持不了三个月。

《文汇报》创刊不到一月，发行即超过两万份，远远超出《大公报》（它于是年底已转变立场）及《华商报》。我翌年二月底应邀北上时，已逾二万五千份。

我在港期间，因原定的总经理严宝礼同志滞沪未到，就一直兼顾编辑、经理两部。白天筹措经费，张罗日常开支和白报纸等，晚上主持编务，写作、审阅社评。先后为《文汇报》写作社评稿的，有陈此生、梅龚彬、千家驹、吴茂荪、胡绳、金仲华、狄超白等。一般时间性较强的社评，都由我自己赶写，每周至少有三篇，每天还要赶写三、四段“编者的话”。半年之内，每天平均只能睡四、五小时。可以说，这段时间，是我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年中最辛苦的时期。

徐铸成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日写毕

目 录

前言..... (1)

第 一 辑

上海并非孤岛.....	(3)
日本之门户开放政策.....	(4)
告若干上海人.....	(5)
教科书问题.....	(7)
敬告上海青年.....	(8)
难民工作问题.....	(10)
周凤歧之死.....	(11)
中山先生逝世纪念.....	(13)
西北大战之展望.....	(15)
历史的重演.....	(17)
近卫之言.....	(18)
无题.....	(20)
可怜的孩子們.....	(22)
胜利不会动摇.....	(23)
何来和平空气.....	(25)
“五九”杂感.....	(27)
良心的麻醉.....	(29)
勿逃避责任.....	(30)
喝采与帮忙.....	(32)
做“人”的代价.....	(34)
教育者的责任.....	(36)
献金与做人.....	(38)
吊日本灾民.....	(41)

寻找自己的岗位	(43)
张伯伦在深渊旁	(45)
勉沦陷区民众	(48)
英法又一失着	(50)
出卖民族的汪兆铭	(52)
票友尤菊荪	(54)
一唱两和	(55)
以牙还牙	(55)
小丑口吻	(56)
孤军绝食	(56)
火与过火	(57)
平沼之当头棒	(57)
汪与吴佩孚	(58)
失足恨	(58)
多此一问	(59)
喜神方?	(59)
新艳秋不朽!	(60)

第二辑

慰勉文化前线的战士	(63)
三国同盟与中国	(65)
文化食粮亟待调整救济	(68)
美国人今天怎样抉择	(71)
战争与和平	(74)
春寒料峭	(76)
维希当局严重的试验	(79)
囤积与居奇	(81)
希斯之出奔	(83)
邱吉尔之声明	(86)

从近卫到近卫·····	(88)
培养中国之新血液·····	(90)
不与侵略者谈和平·····	(93)
光荣的苏联战绩·····	(95)
勿自轻、勿自满·····	(97)
如何提倡国防科学·····	(99)
藕断丝连之美日谈话·····	(102)
英美的对日禁运·····	(104)
意大利做什么梦!·····	(105)
华北是我们的·····	(105)
日荷新协定·····	(106)
日本的“双簧”·····	(106)
汪□赴日·····	(107)
畑俊六之言·····	(108)
后门开不得!·····	(108)
祝中苏文协港分会成立·····	(109)
幽默的一问·····	(109)

第三辑

让我们出击·····	(113)
忠告美国朋友·····	(113)
各算各的帐·····	(114)
废铁的旅行·····	(116)
辉煌的战绩·····	(117)
佐藤使苏·····	(118)
英军袭法·····	(118)
佐藤与来栖·····	(119)
希特勒出马了·····	(121)
论贪污案·····	(121)

救灾！救灾！	（ 123 ）
中秋杂感	（ 125 ）
退到哪里为止	（ 128 ）
太行山之战	（ 130 ）
发扬忠烈精神	（ 132 ）
重建新桥	（ 135 ）
墨索里尼的悲剧	（ 137 ）
东条的会议	（ 139 ）
希特勒病了	（ 140 ）
要审慎考量	（ 140 ）
还不足深责	（ 141 ）
非离间即挑拨	（ 141 ）
好戏将上台	（ 142 ）
查出囤积	（ 142 ）
论养廉	（ 143 ）
行动要迅捷	（ 145 ）
丹麦反德潮	（ 145 ）
论利用外资	（ 146 ）
“九·一八”十二周年	（ 149 ）
不忘耻辱	（ 151 ）
展开节约献金运动	（ 153 ）
寄语前线将士	（ 155 ）
怒吼吧，中国！	（ 156 ）
悼戴安澜师长	（ 158 ）
“天时”与“人事”	（ 159 ）
安人心 稳战局	（ 160 ）
敬告读者	（ 162 ）

第四辑

重来上海·····	(167)
放眼看世界·····	(171)
范旭东的精神·····	(173)
车辆靠右·····	(174)

第五辑

我们的自勉·····	(179)
一个讣告·····	(180)
反对所谓“警员警管区制”·····	(181)
告马歇尔将军·····	(183)
何谓教育第一?·····	(185)
禁止吃饭!·····	(188)
请勿断送航权!·····	(188)
论当前的民主运动·····	(191)
对南京暴行的抗议·····	(193)
追随不是政策·····	(195)
召开国大的前提·····	(197)
为学费发愁·····	(199)
关于香河事件·····	(202)
闻案感言·····	(204)
历史的交代·····	(206)
战局剖析·····	(208)
为美国设想·····	(211)
战略·····	(214)
真能和平解决么?·····	(214)
周佛海受审·····	(216)
倾听人民的意见·····	(217)

勛第三方面	(219)
怎样纪念陶行知	(219)
这是一个信号	(222)
民社党的决定	(224)
饥饿的教师	(224)
烟雨太平洋	(225)
张学良问题	(227)
两个声明	(228)
悼梁仁达君	(230)
人民不应该问政治吗?	(230)
台湾大惨案的教训	(232)
由延安易手说起	(235)
袭人出嫁	(237)
论政治道德	(237)
一个笑话	(239)
怕伤感情	(240)
汤也没有换	(240)
悲哀	(241)
调皮	(241)
碰僵	(242)
善处当前的学潮	(242)

第 六 辑

敬告读者	(247)
小雨点	(249)
释毫门	(249)
换位	(250)
日俘	(250)
人质	(251)

残棋一局·····	(252)
论“右手行左策”·····	(252)
一篇绝望的演词·····	(254)
精神不死·····	(257)
人心与大势·····	(257)
抗议杀害学生·····	(259)
迁都闲话·····	(261)
哀金圆券·····	(263)
老生常谈·····	(265)
和谣又起·····	(266)
廖耀湘被俘·····	(266)
陈布雷之死·····	(267)
不搬家 不逃难·····	(269)
实际考虑·····	(272)
孙科之病·····	(272)
神来之笔·····	(273)
关于日战犯的复审·····	(273)
呼之欲出·····	(275)
卒子变将·····	(286)
无命内阁·····	(277)
金陵末日·····	(277)
华府双簧·····	(278)
帮闲之路·····	(278)
论“以战求和”·····	(279)
爱惜技术人材·····	(281)
斗智不斗力·····	(283)
请照照镜子·····	(284)
反对国际干涉·····	(284)
天津光复了·····	(286)

快放下屠刀.....	(287)
蒋介石走了!	(287)
李宗仁该觉悟了.....	(289)
新春杂感.....	(291)
编后絮语.....	贺越明 (293)

第一辑

上海并非孤岛

从华军撤退后，上海又成了一切堕落颓废者的乐园。租界上表面的繁荣，又恢复了原状；歌场舞榭，满坑满谷，其他消费的场所，也多忙于接应；这两天正值春节，一片熙攘往来的街景，使人不相信这里曾有过战事，更不会相信数百里外还有成千成万的人，在那里拚性命流热血，为大家的生存而苦斗。“上海是一个孤岛”，这一句话，成了三百万市民的口头语，仿佛一切罪恶，一切良心的谴责，多因此赦免了！

上海究竟是不是一个孤岛？请大家平心静气的想一想。

战事的确已暂时离开了上海，但战神的魔手是否已放弃了上海呢？我们且慢看租界以外的一片断墙残壁和租界以内五十万冻饿失所的难民，单就租界内暂可苟安的一般民众来说，你们那一件事能不为上海以外的环境所影响？你们的祖宗坟墓在那里？你们的亲戚故旧现在又成了什么景象？上海的生命，本来全寄托在内地的农民身上，现在环境已成了一片焦土，上海的繁荣究竟能维持到什么时候？你们的职业、生活，究竟能不能长此不生问题？不错，你们目前是安全的，但这两个月来，哪一天没有人在那里苦心孤诣，制造事实，制造恐怖，想把你们的安全加以危害呢？

现在的环境，已不是鲁滨逊神话时代的环境了！地球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孤岛，上海尤其不能和内地脱离关系；四周的巨浪，随时可以把你们吞没；天空的铁鸟，随时会震伤你们的心弦；你们应该时时刻刻紧紧把握住你们的灵魂，应该时时刻刻记住你们所处的地位；为了你们自己，不应该再这样苟安逸乐；为了你们的子孙，更应该时时有所警惕。

一个人的奢靡，足以丧失了多少人的生活。古人说：“安不忘危”。在苟安的环境里，千万不要忘了离此不远的地方，有成千成万的人在那里受苦受难。

上海并非孤岛，大家应该紧紧把握住自己的灵魂！

（原载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上海《文汇报》）

日本之门户开放政策

日本外交家惯于创造新名词，曲解旧术语；无论什么事，他们都能解释得头头是道。近年来祸越闯越大，话也愈说愈多，可是听的人的确早已厌倦了！

最近他们又发表一个皇皇宣言，说“对华无领土野心，至维持中国门户开放之原则，当然不变。”他们对华有没有领土野心，这几个月来的事实，已很够说明，用不着再加深论，现在我们且看他们的“门户”究竟怎样“开放的”。

我们要研究日本的外交辞令，先要懂得他们有两个特殊解释的新名词，一是“既成事实”，一是“特殊权益”。

当他们初占东四省时，曾一再向英美各国声明尊重第三国权利，不变中国的门户开放；但不久以后，“满洲国”成了“既成事实”，和“满洲国”订立的一切条款，便成了“特殊权益”了。

在华北，他们深入的步骤还是那样，可是方法却更进步了！在“既成事实”未培养完成以前，他们有一个巧妙的方法去独占那个广大的市场，那就是走私。（他们自己说是“密输”。）他们利用种种环境，以强硬的或秘密的办法，把大批货物，漏税向华北各地倾销；表面上华北的门户依然是开放的，但结果，各国的货物，自然会被摒弃于门外。现在，北平的“临时政府”又成立

了，第一个“政绩”便是接收海关，修改税则，把日本的大宗输入品，减税至百分之八十以上。从此以后，华北半开着的门户，又在慢慢的关闭了！

上海的市场上前几个月曾一时充斥着私糖，近来，其他私货亦陆续上市。据江浙各地逃难来沪的人说，内地私货也在大量倾销。这事实是说明“半开门政策”已在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区域开展起来了。

在这一开一闭之间，为什么要有一个过渡的“半开门”期间呢？这理由很简单：其一，缓和国际间的紧张空气。其二，诱致各国之投资，以解除其经济困难。

戏法虽然巧妙，事实究竟是最优之雄辩。各国加紧军备，是对日本最有力的答复：新加坡之空前大演习和美国派舰参加，可以证明英美联合维护其远东利益之决心。英财相西门爵士一日在下院声明：“英财案现仍严厉管理资金之流动，不欲鼓励贷款于从事积极侵略之各国。”这可以证明英国政治家的洞烛奸隐，和日本的戏法变得早已使人厌倦了！

（原载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上海《文汇报》）

告若干上海人

自陆伯鸿被刺后，上海若干“组织”热者，一时多销声匿迹；这几天，似乎又有死灰复燃之势。现在我们想单对这几个人说几句话：

最好你们先问问自己，你们整天忙来忙去，奔走钻营，究竟为的什么？所为何来？也许你们的理由很多：第一，你们的工厂产业被战争毁坏了，想找一个机会收拾残局，以为补救。第二，你

们过去有许多不平和冤屈，想借此发泄报复。第三，你们的家乡成了一片焦土，亲友丧亡，家室离散，在无可如何之中，不得已干此万人唾骂之事。你们也是圆顶方踵的人，决不会生来便有这种癖好，或者会有比这些更不堪的动机。你们大概多很聪明，明知是被人利用，也许你们想不妨也借此利用人家一下。

但是你们没有想到，在目前的世界里，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分不开的；一个工厂，一种事业，脱离了国家的保护，决不会容你自由存在；你们打了许多聪明的算盘，结果只做了人家的爪牙。这次的战事，关系全国的生死存亡，决不仅是一个人或一个政治团体的事；过去的恩怨，早应一笔勾消，否则你们的报复行动，一定会引起四万万人的愤怒。为你们自己，为了你们的子孙，在目前的时代里，大家应该咬着牙，忍受委曲，吃些痛苦；你们应该把头抬起来，光明就在不远的前面！

历史上没有一个甘心卖国的人，大概多是在最初一时不忍，一时失察，走入歧途；到后来，愈走愈远，不能自拔；箭在弦上，不能自己；鼻子上已经抹了一块白，到那时再想回头，早已变成小丑了！曹汝霖何尝是一个甘心卖国的人，但因一步走错，终身便见不得人；不仅他自己，他的子女们，在学校里没有人愿意和他们同桌同行，走在路上，前前后后便有许多人指指点点的冷嘲热骂。再如郑孝胥、殷汝耕辈，最初何尝不想借人家的力量，报复旧恩怨，组织小朝廷；结果不仅一切成了梦想，连祖宗的坟墓多被人发掘了。你们现在还没有到欲罢不能的地步，何必自己先抹白了鼻子，去当小丑？

在沙漠中旅行的人，常常会看见许多空中楼阁，引人入胜；但你们要小心，这是幻觉，那里究竟还是沙漠。你们要继续循着正路向前走，切勿恋着昙花一现的幻境，被漫天的风沙葬送了自己！

（原载一九三八年二月八日上海《文汇报》）

教科书问题

日方嘴上说对华无领土野心，事实上却天天在加速度制造“政权”，筹设国策公司、电气组合等，谋统制中国的富源。最近又在北平成立检查局，以修改中国各级学校的教科书，目的自然在所谓“根绝排日教育”。这个方法，看来好象很聪明，其实很笨拙。

思想之发生，大都由于环境之感受，决非人力所能改造，“根绝”。日本近年在严密的警察制度下，努力扑灭赤化思想，但最近还不断有大批“思想犯”发现。中国古代也曾有过几次改造思想的举动，规模最大的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但儒家思想，后来却更发扬光大了。有清一代，不断发生文字狱，扑灭民族思想，提倡奴隶教育，但民族复兴的火焰，仍蔓延在每一个角落里；革命军揭竿一呼，满清的统治力量便如摧枯拉朽了。我们再看，东北四省失陷已六年了，日人着手于改造思想，修改教科书，也已有整整六年的历史；现在“满洲国”十岁以下的儿童，应该多没有受过“排日教育”；但我们也曾看到他们出版的“学生文艺选集”之类的书，虽表面上写的都是“王道乐土”“共存共荣”之类，而字里行间，常常浮出蠕动的心，苦笑的脸。

中国有四千多年的文化历史。民族思想，蕴藏在每一个人的血液里。中国的祖先，曾屡次征服异族，也曾几次被异族征服，但他们一贯的文化生活，始终未被异族思想所吞没；他们富于弹性，可以含容同化一切异族思想。

日本的政治家，常常说对中国问题要“拔木塞源”，不要把现在的困难再遗留到下一代去，但事实上却天天在埋育下一代的祸根。

现在中国的青年们，民族情绪比他们上一代的更强烈万倍，这是十几年来环境不断刺激感受的结果；今后一二十年的民族旧帐，将由他们出来清算。这一二年来，中国孩子们所感受到的刺激，应该比青年们更多更早了。在那些天真的心灵上，早已深深地射上一支毒箭。现在纵使叫他们天天高唱着“亲善”的调子，而浮在他们眼前的，却是一片荒芜，恐怖，战慄，悲哀的景象，他们纵使没有看到父兄创痛的心，难道连倒流的热泪都会看不见么！

其实，中日间过去的旧账，方在开始清算，将来如何，还未可逆料，何必劳心打这样久远的算盘？

（原载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一日上海《文汇报》）

敬告上海青年

上海战事结束后，有不少中国青年，冒锋镝，历寒苦，深入内地，分头去干庄严伟大的工作，但至少还有四五十万热血的青年们，到现在还被遗弃在这个荒岛上，委曲忍耐，在稀薄的空气里喘息着。他们内心的痛苦，决不是中年以上的人所能想象的。我们愿以最真挚的同情，向这些敬爱的青年们说几句话。

这一次的战事，关系中国之存亡绝续，决不是一月两月的事，也决不会在一年半载内结束；在人力上，尤需要有多量的准备，不断的补充。你们流落在抗战圈外，诚然是不幸的，但报国之道不一，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工作留待你们去干。现代战争，取决于国力之强弱。所谓国力，便是一切人力物力之总和；中国的物力是无限的，但人力则未能尽利其用；你们现在应赶快加紧准备，充实自己，为国家补充新血。中国的民族火焰永远不

熄，任何鬼魅终有销声匿迹的一天。

上海是一个堕落的社会，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着黑暗；过去曾有许多青年，被这些黑暗所吞没了。现在，你们都是大时代前卫的青年，有高远的抱负，坚定的意志，这些劝告警戒的话，对于你们，自然是多余的。但仅仅消极的束身自爱，还是不够的；你们应时时振作奋发，强调你们的精神生活，以支配一切。上海虽披着一件五色斑斓的外衣，实际只是一个荒岛，你们要学坚持汉节的苏武，一天不见光明，即一天不改吞冰嚼雪的生活。你们要把崇高的精神，寄托在荒岛以外；在不远的地方，有成千成万的人在那里受苦受难，你们应时时警惕，做一个对得起他们的人。

你们都是未来新中国的中坚，为了国家，你们不应轻作无意义的牺牲。在这个荒岛上，你们暂时还可安居，同时还有许多你们愿意读的书，你们要宝贵这些精神的食粮。要好好利用你们的时间，去吸收新知识，为将来致用。从御侮到建国，是一条辽远的路程，需要各种人才，去做开辟草莱的工作。你们此时应利用这个机会。增加智力体力，去负荷这个神圣任务。

最后，我们愿对许多青年的保育者提出一个要求。最近，上海凭空创造出不少大学中学，这可以反映出上海失业者之多，和青年求知欲的热烈。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不敢希望这些学校会有比较完全的设备，但至少你们应该使这些青年真正能读一点书；你们千万不可一面剥削青年，同时又在精神上给他们一个恶劣的印象，否则你们的过失，将造成一种不可恕的罪恶。

（原载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上海《文汇报》）

难民工作问题

在这个荒岛上，现在还有三四十万难民。他们都是战争的直接牺牲者，他们的家室田庐，都荒芜毁圮了，父母离散，妻子丧亡，才托身于收容所，苟全性命。说到这里，我们首先得感谢两租界当局的努力和各慈善家的热心；几个月来，他们苦心筹划，救活了不少灾黎，使社会维持平和的秩序。

现在，战局还毫无澄清的希望，租界以外常态的恢复，更遥遥无期；将这些难民遣散归乡，无异置之死地；长期收养，则来日方长，经济上将不免拮据；且难民群居终日，相对唏嘘，精神上的痛苦，亦令人难于忍受。为免除这许多困难烦恼，今后的救济工作，应兼及灾童的教育和难民的劳作问题。

为难民找工作，自然是一个难题。第一，没有劳作的设备；第二，缺少开办的资金。要解决这些困难，不能不吁请各界有力者出而合作。现在租界区域内，尽有不少停业的大小工厂，应该还有不少的生产工具，日前要恢复开工，事实上无法办到，此时很可以废物利用，将这些现成的厂址和工具，略加改造，视市场之需要，制造日常必需的半手工艺品，如肥皂、洋烛、毛巾、牙刷之类，一面给难民以一个自食其力的机会，一面使工厂的本身，不致日渐荒废，至将来无法恢复。开办之初，经济上当然不免困难，搬运机器，手续亦一定很麻烦，但果有严密公正的规划，租界当局一定会给予有力的协助，各界有钱的人，亦决不会袖手旁观的。

关于灾童的教育问题，师资应不虞缺少。目下有许多高中以上的毕业生在失业中，有一个工作食宿的地方，便可请他们担任管理主持的责任；其他教育人员，各大中学学生，应该出来尽些

义务。这种工作，直接惠及灾民，间接造福国家，青年们一定愿意担当这种富有意义的任务的。地址和教材，现有各公私立小学不应吝惜这个助力，在星期日星期六及其他各日课余时间，应该把校址义务出借，学生读过的书，何妨多捐出来给这些灾童读读，规模不妨草率，只要真能给这些可怜的儿童一些必需的知识。

收容所以外的上海人们！大家不应躲避这个责任，你们托身在这个荒岛上，还能苟全衣食，在消极方面讲，你们应该说是幸运的；你们不能为时代尽点力，对于这些时代的牺牲者，至少不可再袖手旁观，大家应该尽所有的余钱余力，帮助这许多可怜人，以求自己良心上的慰安。

（原载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上海《文汇报》）

周凤岐之死

一时“人”望的周凤岐，忽于前日被刺身死。这个消息，将使若干人为之悲凉悽惻；对于一般上海人，无疑的亦将浮起一些震动。

近一二月来，上海的气压日低，窒息令人不耐。恐怖的暗影，在空中交织着；刀光剑影，正反乘除；手枪，炸弹，人头，人手，层出不穷，由不同的来源，加于不同的对象；使人亦疑，亦惧，亦喜，亦悲。周凤岐之被杀，在这一大串恐怖案中，只是平淡的一幕；但当此密云四布，山雨欲来的时候，这一件事，的确更容易刺激每一个人。

严格的讲来，在目前的处境下，所有中国人，都是很可怜的。时代的狂潮，打在每个人的背脊上；有的忍痛挣扎住了，有

的却被打迷了眼，随着滚滚的洪涛，上下浮动，但有时亦不免于沉没；从人道的眼光来看，这些沉没者和挣扎而死的，同是时代的牺牲者；对于这些可怜人，我们只有怜悯，不暇深恨。他们也是中国人，在心的深处，不会没有先天的爱国心，可惜目光短视，知识薄弱，不能忍受外来的压迫和引诱，一时失足，终至无法自拔；当他们清夜扣心，或子女相对的时候，未尝不热泪盈眶，呜咽流涕；生死之际，更必回头恨晚，迷途难返，忆祖宗之墟墓，念子女之前途，内心的痛苦，决不是别人所能想象的。

过去多年的内乱，使中国许多旧式的军人和官僚，失了把握自己的力量，环境使他们动摇腐败；高度的私生活，使他们不能安于沉寂；他们不能不在翻云覆雨中一变再变，以觅取个人的安富尊荣。近年来，中国逐渐上了轨道，一切多循着现代化的建国途中迈进；他们显然落伍了，但他们多年养成的小环境，不许他们就此洗手，不得不饮鸩止渴，死里求生。我们此时不应以过分苛刻的理由去衡量他们，他们也许只是单纯的想求得一点高官厚禄，他们也许没有想到因他们失足，会加于国家如何的不利；他们也许更不会想到，就是未来的一点利禄，也仅是不可捉摸的一片幻境。我们对于这些可怜人，只有怜悯，不暇深恨。

中国这一次抗战建国，必然需经长期的痛苦挣扎，也必然需经许多次的改造手术，割去腐肉，灌输新血。大家要忍受手术的痛苦，同时更要随时培养新血。中国经多年的外感内伤，久病之余，周身腐肉，是必然的现象，决没有因此悲观的理由。我们的心脏是强的，元气且日益充沛；这些腐肉败血，因受不住消毒的痛苦，脱然而去，这毋宁说是一个好现象。把腐肉当食料的人，只会增加病痛，决不会增加营养，这是很明显的事。

现在，中国正在施行手术的过程中，强度的 x 光，射入体内，纤毫毕露；每一个细胞，多无法隐藏他的本质，是强壮的或是脆弱的，是健康的或是腐败的。大家要自强不息，努力更生，成一个健康强壮的细胞，为全体增加生力，否则终有被排除抛弃

的一天。

（原载一九三八年三月九日上海《文汇报》）

中山先生逝世纪念

十三年前的今日，中山先生永别了他手创的中华民国，但他的反抗异族割宰的民族思想，挣扎独立自由的革命精神，却永留在人间，为中国儿女宝贵的遗产。就在他逝世不久以后，中国发动第二次大革命，推倒军阀，肃清残余的封建势力，向独立解放的建国途中迈进；十三年以来，洒了多少民族的鲜血，以扫荡种种内在的外来的障碍和压迫；到现在，还在和他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对象相搏斗。这事实，证明中山先生始终未离开中国，中国的儿女们，也始终未离开中山先生。

自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各地，每年今日，都举行盛大悲壮的纪念，但在今年此日，能参加这个纪念的，已成为最幸福的人了！有许多区域，已不能展开灿烂的青天白日旗，数千万中国人，脱离了国家的保护；他们只能饮泣吞声，在心的深处，做着默念。想着这些人可怜的遭遇，在荒岛上的上海人们，应该算是比较幸福的了！今天，你们看到满街的青天白日旗，应该怀念着那些看不见国旗的同胞，为他们祝福；更应该记住，有许多人已经为你们流血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在继续为争求你们的自由解放而流血奋斗！从今天起，你们更应该把自己严肃起来，不忘中山先生不苟且不屈服的精神。

中国民族，曾两度被异族统治，受尽欺凌压迫，赖有民族伟人，揭竿而起，驱逐胡虏，重见光明。在这伟大的工作上，中山先生的奋斗，显然比朱元璋更艰苦，更壮烈。因为历史是进化的，压迫者统治的方法也一天比一天严密聪明。中山先生为解放

他的祖国，曾奋斗了二十多年，失败了十几次，出生入死，前仆后继，方才把满清推翻了。现在，因科学的发达，军火的进步，统治异族的方法，比以前更严密了，压迫者的野心，也远比满清为大，假使中国民族再被灭亡，那将来一定不会再有翻身的一天。目前牺牲之重大，诚然是触目惊心的，但以之换取子孙万世的自由解放，这个代价，毕竟是值得的。乘着手足还能伸展的时候，大家应竭力挣扎，一经戴上了桎梏，那就悔之不及了！

中山先生奋斗了四十年，推翻了满清，不断与军阀搏战，但没有及身见新中国之出现，这是他毕生遗憾的事，所以他遗嘱国人，说革命尚未成功，要大家继续努力。在他逝世的时候，中国的处境，方在黎明之前夜，民众大部还未觉醒，苟安逸乐；国际上仅有一个与国，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势力还仅及于中国南部之一角；依他多年奋斗的经验，确认要救中国，非唤醒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不可。现在，他的指示，已为全国所遵照实现了！全国民众，多已奋起参加卫国的工作；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国家，也日渐增多；中国抗战力的强大，也远非十三年前可同日而语，中山先生生而有知，对于他祖国的前途，一定更乐观，对于他伟大理想的实现，一定认为更容易了。

现在，中山先生在他的陵寝里，还不及见他手制的青天白日旗；他的故乡，还在日舰的封锁包围中；碧云寺的衣冠塚，更凄风苦雨，沦于异族之手。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耻辱，大家都应该惭愧警惕，痛感无以对中山先生在天之灵。从今以后，大家更应以未死之身，坚强努力，继中山先生未竟之志，献身于创建新中国之前途。

（原载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上海《文汇报》）

西北大战之展望

中日战争的重心，最近已移至晋陕绥边区之西北大陆，这可以证明数月来日军战略的失败；从战局全面来看，日方已显然失其控制力了！

从济南失陷后，日军以全力两面夹攻徐州，企图打通津浦线，使南北贯成一气；但这个幻想，经华军两月的苦斗，终被粉碎了。由济宁侧击陇海路的计划，亦无法实现，乃不得不改变战略，由平汉路疾趋南下，一面利用晋南之优势地位，以重兵沿同蒲路南侵，两路进兵，中间突破，以为一举可以横渡黄河，阻塞潼关，使华首尾不能兼顾。不想战事触及黄河后，遭受坚强阻抗，后方交通运输，且随时有被切断之虞。大抵日方进兵，利在速战速决，以优越之兵器，一举攻下要隘，占领一省一地之神经中枢，然后以全力保持若干必要之交通要道；如一旦旷日持久，师老无功，则军火消耗多而获效微，前线后方，皆不免困难丛生矣。这几个月来，日军一再改变其战略，但始终未能击败陇海路之任何一点，华方国防工事，坚如铁带，无法突破；而游击队之活跃，尤为其腹心之患。现在，日方又不得不改变战略，将重兵移集晋北，想从晋陕边境，觅一渡河出路；中国方面，亦已变更其守势地位，各路挺进，实行其大规模之包围歼灭计划矣。

外人批评日本侵华，等于插足泥淖。这个比喻，用来说明现阶段战局的战局，可谓十分恰当。日军主力日渐内移，正如泥淖愈陷愈深；今后战事在西北展开，更将深陷泥坑，无法自拔了！

陕北现为八路军之中心，人民经两年余之严格训练，抗日思想，最为浓厚；武装民众，遍地皆是；彼等皆已厉兵秣马，准备

保卫故土，献身祖国。八路军主力，现集中于陕晋边境者，无虑二十万；经多年之苦斗，万里之长征，耐劳苦，守纪律，有浓厚之政治意识，高尚之政治理想，每一个士兵，均能成一个作战单位。日兵如一旦深入，必遭最严重之挫败，此其一。西北各省，土地贫瘠，人口稀少，军队给养，大都赖骡马等交通工具以为运输；而晋北山岭重叠，交通最为困难；日军愈深入，则军需必愈感困难；因华军如坚壁清野，真可做到不留一人一粟的程度，非如沿海诸省之事实上有所难能也，此其二。日军日下所侵占之省区，均为交通上比较便利之地，可以利用以平津为中心之铁路网，左右策应，随时调集援兵。日方在华北的部队，本已不敷分配于广大之区域，赖运输之灵便，充分保持其流动性，得以于必要时集中一点，猛烈进攻。而陕晋边境，并无现代式之交通设备，山高河宽，不利于机械化部队之行进；人民皆穴居，空袭亦失其威胁作用；日军向该处深入，决难得预期之结果，重兵集中一地，欲进不得，欲退不能，而其他各线，力量单薄，华军一经反攻，日方即将感呼应困难，顾此失彼，终不免于全线崩溃。

西北为中华民族之发祥地，数千年来，屡摧强敌，驱逐胡虏，保卫中原。今此中国男儿，又跃马执戈于西北之疆场矣！念前人创业之艰难，循祖先光荣之遗迹，当必热血沸腾，奋勇当先，而不负历史之庄严任务也。

（原载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上海《文汇报》）

历史的重演

历史常常是重演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古老的国家里，更不乏实例来证明这原则。中华民族，立国东亚，时逾万年，这万年的历史，尽是可歌可泣，用他们祖宗的泪和血来写成的。他们时时有外患，他们的祖宗刻刻要和四夷异族斗争，纵有暂时挫败，常获最后胜利。目前中日两军，正对峙于晋陕和晋豫边境，黄河沿岸，再度变成中华民族拚死生决命运的大战场。同时另有若干方面所产生的新丑剧，又不禁使我们回忆起两件历史的旧事来。

公历第十世纪中叶，正当唐末大乱之后，山西有一个军阀石敬瑭，野心甚大，觊觎帝位，他因利欲熏心，竟不惜勾结北方异族契丹，联兵作乱，入据中原。他们之间订了一个条约，是这样的：（一）契丹立敬瑭为大晋皇帝；（二）敬瑭割献今冀晋两省北部之地，即所谓燕六十六州者，以酬契丹；（三）敬瑭岁输契丹帛三十万匹；（四）敬瑭尊契丹主为父皇帝，自称子臣。条约屈辱惨酷如此，契丹尚不满足。等到敬瑭死后，太子重贵嗣位，他想摆脱羁绊，恢复独立，奉表契丹，称孙而不称臣，契丹大怒，举兵入寇，卒灭后晋，徙重贵于辽宁。石敬瑭一念之差，引狼入室。白白做了一场汉奸，到底得到什么好处呢？

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历一一二八年），另一北方异族金人进犯山东，这时刘豫任济南知府，贪财怕死，受了金人贿赂，遂杀勇将关胜，而降金人。金人一口是吞不下中国的，正想利用这批汉奸，所以到了建炎四年，就册立刘豫为大齐皇帝，世修子礼，奉金正朔。这一来，刘豫真的感激涕零，忘却身为傀儡，引导金兵，大举侵宋；结果败于宋将岳飞、牛皋，证明这个傀儡失去

效用。他称帝后的第八年，金人遂废刘豫，囚之热河。刘豫涕泣求哀，金将挾懶对他说：“昔赵氏少帝出京，百姓号泣，今汝废，无一人怜者，汝何不自责也？”刘豫语塞。汉奸末路，乃至于此，人民既痛恨他，豢养他的主子，到头也有唾弃他的一天。

石敬瑭和刘豫，未尝不是聪明人。倘能善用这点聪明，未尝不能对国家民族有所贡献。可惜他们欲心太重，意识不清，恰好又生在一个异族入侵的混乱时代中，他们本意原想利用外力，来做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结果反被外力利用，做了时代的牺牲者。生既未能长享欢乐，死则永远受人唾骂，真是何苦来呢？荣华富贵，人人所爱，但是追求必以其道，总须不背人情，勿违理法，尤勿应以子孙万世之人格，亿万同胞之自由，为换取个人一时利禄之代价；否则贪夫殉财，夸者死权，必定会有身败名裂的一天。“历史常常是重演的”，历史的价值也在于此，它是一个大指南针，它告诉你应该走哪条正确的道路。

（原载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六日上海《文汇报》）

近卫之言

日首相近卫二十二日在众院表示：“日军今所占据之中国土地，决不退让一寸。”日外务省发言人二十三日对此加以解释，谓渠所能预料者，华北所已设之新政权与华中所将设之新政权，将来皆将如“满洲国”独立。并暗示日货之输入华中各地者，其税率不日将大加减低。在这一唱一和之中，把日本对华野心，毫无掩饰的暴露出来了！

这篇谈话，包含着两种严重的意义：（一）日兵将长期侵占

中国的土地，并关闭中国之门户。这证明以前日外务省宣言所谓“对华无领土野心，至维持中国门户开放之初心，当然不变”，只是一片欺人的谎语。（二）日本在它的侵占区域内，并无意制造一个整个的傀儡组织，只想把这些区域割裂成若干块，以便于他的“统治”。

日本能不能长期侵占中国的土地？这个问题，最好让数百万中国战士和四亿五千万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以事实来答复，中国的门户能否关上，这也得问问各国有没有根本退出远东的决心。这些并不简单的疑问，过去已有很多事实，可以说明，此时无须再加检讨了；值得我们现在提出探索的，倒是这篇谈话所包含的第二点意义。

日本的最后企图，是并吞全中国。但以中国之大，国际关系之复杂，事实上一口吞不下，不能不分割成若干块，慢慢消化。他不顾中国有一个统一的政府，不管是“抗日”的，或是“亲日”的，因为以中国土地之大，人口之多，在统一的局面下，不管政府如何“亲日”，蓬勃的民族情绪，决难压制。日本最好的幻想，是把中国分割、破碎，在每一个小块里，装扮若干傀儡，以为爪牙；然后再观望国际形势，尽可能的消化力，分别蚕食。这个企图，实际上早被采用了，所以当他们的侵入冀察后，并没有把溥仪推进关来，在察北另外制造一个“内蒙政府”。他们不愿把现成的北平组织伸展到华中，同时，当然更不会使扶植中的南京组织去管辖平津。这是他们几年来一贯的策略。外务省宣言所谓“今后将扶植中国新政权，以为交涉对象”，其实亦是一句谎言，不想这一句谎语，竟麻醉了若干笨拙的热中者，大吹大擂，真的想乘机干一番“事业”似的。

南京组织的搁浅，症结不在和北平有什么龃龉，而在后台根本并无建立整个局面的意思，东京的谈话，不是解释得很清楚么？

在目前的若干活动人物中，至少有一部分并非全为“利禄”

而奔走。他们也许有一种幻想，以为不妨利用外力，来抵抗以前的政敌，报复过去政治上的仇恨。我们此时且不谈诛心之论，亦不必深究其加于国家民族之恶果，即就其企图本身言，事实上亦决难有所成就。“满洲国”虽先天脆弱，但多少还有一点“王道乐土”的外貌，因为那时狰狞的面目，还未全揭，必得在国际上多作恣态，同时向关内的动摇者引诱。“北平临时政府”的面目，显然比“满洲国”更模糊了！因为事实上只需要这样一个躯壳。南京组织即使能揭幕，恐怕连这样一个躯壳都不会给与的。迷途不远，归去来兮！

（原载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上海《文汇报》）

无 题

在这化日光天之下，科学昌明之时，实在不应再来讲那些怪诞不经的故事，但这几天耳闻目睹的，尽是一些鬼魅怪行之事，长日多暇，姑妄言之。

也许因为上海人太苦闷，需要刺激，许多电影商，正加工制造神怪影片，十字街头，更布起鬼影幢幢的广告，一片蓬蒿，僵尸杂陈；胆小的人看了，真有些触目惊心。关于僵尸的传说，大家一定都很熟悉，但恐怕谁亦没有真真见过；现在既赫然呈露在目前，倒不妨乘机一加鉴赏。据笔记小说所载，僵尸大概是一种介于鬼怪之间的东西，凭借已死的尸体，向人间作祟。它比鬼更可怕，因为它有固定的形质；它比妖怪更阴恶，因为它虽明明是个吃人的怪物，却还装成一个人的样子，大摇大摆，行于通衢，去诱杀一般认识不清的人。

我们相信人性本善之说，生前无论如何为非作歹，但既经死了，灵魂早失去了，头脑早凝固了，如何还能出卖尸体，去干那种丧天害理，杀人不见血的勾当？但是鬼魅之害人，是无孔不入的，一个人既已死了，就应该早早入土为安，一经鬼魅附身，便无法掩其凶恶残酷的面目了！

要扑灭僵尸，最好的方法，是多多培养人间之正气；因为它们无论如何凶恶，究竟只能横行于阴森森的鬼域；在青天白日之下，或人气充塞的地方，它们决不能混迹其间，乘机作怪的。大家把心志坚定了，胆气放大了，时时留心，刻刻戒备，万一它们竟敢闯入人间，那只有发动群力，毫不客气地把它扑杀了。大家知道，扑杀的不是这可怜的尸体，而是附在尸体上的杀人的魔鬼。其次，大家的精神要健全，千万不可为魅影所迷惑，以为鬼影幢幢，而与人间何世之感。现在，正当黎明之前夜，黑暗虽充塞在若干角落里，但光明将来临，灿烂的阳光，将普照大地，一切鬼怪妖魔，将无所遁形。这些失去灵魂出卖尸体的僵尸，自然更无所逃夫天地之间了。

那些装扮僵尸的广告商人，看来很聪明，实在非常笨拙。在这华灯四照人声鼎沸的闹市上，谁都不会相信有鬼魅出现的。布景无论怎样象真，究竟掩不住幕后的许多真事物；“人物”无论怎样生动，究竟是以许多布草扎成的，以各种颜色涂成的；三岁的小孩，亦能看出它只是一个毫无灵魂不能动作的废物，天上的清风明月，人间的浩然正气，告诉你们这些作伪的人，一切勾心斗角，只是心劳日绌罢了！

一切自暴自弃的废物，让它们去暴尸露体，供人玩弄，受人唾弃罢！所有有灵魂的人，都应脚踏实地，发奋自雄，为未来的光明世界，增加一些光辉。

（原载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上海《文汇报》）

可怜的孩子們

昨天是儿童节，许多贤明的父母，学校的师长，都为孩子们安排下一天快乐的课程；各娱乐场所和公园商店，也都为增加儿童福利，尽了一天义务；甚至收容所的火童，也得了若干赠品，在上海的孩子们，毕竟比战区内的儿童幸福多了！

在离上海不远的许多区域内，至少有几千万儿童看不见天日，遭受饥寒凌辱，这几个月内，冻死饿死乃至被屠杀死的，不知已有多少万；幸而还苟全性命的，也免不了孤苦飘流的生活，小嘴内不敢唱爱好的歌，小手内有时还被迫摇着异族的国旗，亡国的惨痛，渗入这些天真的心灵里。就是上海的孩子们，虽还能自由的跳跃，精神上何尝没有许多创伤。想起这些孩子们可怜的遭遇，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有些忏悔。

中国目前遭受到这样空前浩劫，孩子们是一点没有责任可言的。远的且不说，从华府会议到“九·一八”的十多年间，中国有许多充裕的机会，可以发奋自强；但那时社会的中坚，亦即现在正做着孩子们父亲或祖父的人，苟安逸乐，甚至贪污误国，才把国家沦陷到目前的境地。就是一般民众，并未在政治上社会上负重大责任的，在过去十多年间，敷衍颓废，因循苟且，细细想来，谁亦不能说没有一点误国的责任，过去种下恶因，现在才食其恶果。可怜的是这些孩子们，不幸生在这个暴风雨的时代，平白蒙受重重的惨痛。

每一个成年人，今后应以赎罪的心理，把自己振作起来，严肃起来，积极的做些有益国家的事，尽可能的力量，贡献于争求自由解放的前途，为孩子们未来的命运，增加一些光明。消极的应把自己的足步站稳了，切勿再加重孩子们的桎梏。上海现在正

被毒气所包围着；在这个荒岛上，遍地埋设着陷阱，大家都要有老僧入定的功夫，寡妇守节的勇气，任何诱惑，都要视若无睹。无论生活如何困苦压迫，都要甘于忍受；凡心一动，会使你的孩子们堕入深渊，永久见不得人。现在，正是大家奋斗挣扎的时候，大家能为未来的光明尽一分力，即使冒受危险困顿，至少对于自己的孩子们是对得起的，自己良心上亦会感到无限的愉快。假使做了一点失足堕落的事，怎么有脸回去见你们的孩子；孩子们要问起你，一天奔走，忙的什么？你又以什么话回答他们？

“哀莫大于心死”，自己的心死了，也许有时会换取一些刀口上的金钱，图一时的逸乐，可怜这些孩子们，一生都被你们葬送了！

今年的儿童节，是给成人一个机会，把自己彻底检点一下。大家不必侈谈如何为儿童增加福利，最切要的，是救救你们可怜的孩子！

（原载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上海《文汇报》）

胜利不会动摇

这几天，鲁南又转紧张；大家对于临沂附近的战事，尤为关心。从形势上观察，右翼的得失，当然是以牵动津浦全面战局，但迄目前止，战事方在初步演化中，根本还谈不到谁胜谁负；我们此时可以指出的，无论从士气战略或其他哪一方面推测，中国方面胜利的可能，的确比较大得多。

自台儿庄大捷后，大家把阵地战估价抬高了。对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感觉特别灵敏，因此乐观或悲观的程度，也不免有些过量。中国的军事当局，却始终把握住胜利的真意义，不仅“闻胜

不骄”，并且格外战战兢兢，沉着应付；左翼部队，不令过分深入，突击济南泰安各地后，仍退居侧面威胁的地位，以保持随时冲出的姿态。正面则集中主力于围攻峄县，使日方残部失去和后方的联络。张自忠等劲旅，于协助台儿庄歼灭战完成后，早已奉令调返右翼，布置严密防务，其他新到劲旅之开往临沂附近者尤多，足见日军这次大举反攻，早在中国军事当局意料之中。以目前临沂附近的形势，和台儿庄鏖战前比较，中国控制战局的力量，无疑的强多了！

决定中日战局的因素，一在消耗，二在时间，若干阵地的得失，实无足轻重。这不是故作乐观，更不是歪曲事实。单就津浦战局而言，中国没有海军，不能控制塘沽青岛两海口，此时即使一鼓冲入平津，仍不能决定整个战局，因为日兵仍能由海口源源运来，孤军深入，反授人以柄。中国方面最有利的战略，是以重兵占住几个必要的要隘，同时在四周布好游击网，以逸待劳，以静制动。凡有捕鼠经验的，一定会明了这个战略的巧妙。台儿庄是第一次成功，现在，临沂又成为第二个鼠笼了！

台儿庄一战，歼灭了近两个师团，日军的后备兵当然还很多，但因各方形势的牵制，不能大举抽调；这次开到鲁南增援的，大部由察绥晋豫驻军拚凑而成，由关外和国内开来的并不多，证明这次大会战，已是他们在津浦线上最后的尝试，如再失败，势必另谋出路。这几天，日方已有封锁华南全部海口的风声，近卫销假后第一次谈话，对英国有强硬的暗示，可见他们在一筹莫展之中，正图另鼓勇气，闯一大祸，以缓和国内因失利而起的不安；但在欧局日见绥靖之国际空气下，这个企图，或者正足以加速其崩溃。

以徐州为中心的战局，支持已将五月，经这长时期的消耗，把日军征服中国的企图全粉碎了！在这五月内，中国后方之准备，兵器之补充，战斗员之训练，已有惊人的进步，中国能自力克服强敌的把握，已为全世界所公认。即以徐州地位而论，在五月以

前，布防尚欠周密，而屡败之余，指挥困难，士气尤难期振作，当时的确岌岌可危。但在五阅月后的今日，则情形完全不同，每一个战士，都已明了对方的真正实力，所谓机械化的威力，亦已司空见惯，种种克敌制胜的方法，已训练得很纯熟；胜利的光辉，后方的期待，以及民族复兴的曙光，都在鼓励他们前进！前进！台儿庄一捷，燃起国际反侵略民众的狂热，使中国的战士们，更深切明了他们所负人类庄严责任的重大。他们必以最大的英勇，鲜红的热血，去争求第二次的空前胜利。反观日军方面，足以鼓励侵略的种种引诱，多渐渐消失，抛妻子，离故土，走上一片渺茫的征途，脑筋一经冷静，便不再会鼓起勇气；最近几次失利，更有风声鹤唳之感。这次在鲁南大举反攻，无异对萎缩的士气，打了一针吗啡，但麻醉力究能支持多久，亦就不难想象了。

爬山既到了山巅，就不必有能不能过山的顾虑了！下山之路，虽不免有荆棘，比之一步一蹶的上山路，究竟平坦得多，康庄大道，已在不远的山下，大家更不必旁瞬，静随着先锋勇士，披荆斩棘，向前迈进。我们相信这一股伟力，是任何魔手所不能挡住的！

（原载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上海《文汇报》）

何来和平空气

这几天，和平空气，又象游丝般的在空中飘荡着，粘着人们的眼睛，使人迷惘。

千古无不解之冤仇，历史上没有不停的战争，远东烽火虽然迟早亦会熄灭，但在这个时候来侈谈和平，不是痴人说梦，便是别有用心。我们并非鼓励人类残杀，亦非对于满目疮痍漠不

关心；但我们决不能抹杀客观的事实，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确还不能发现一些可以谈商和平的影子。

在中国方面讲，对于和战的态度，本来十分显明。中国之目的，为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求民族之自由解放，决不想侵略别国，亦不吝与世界任何国家发生和平商业关系。同时，任何一国，要来灭亡中国，自必以全力排除之。战争是排除外来侵略最后的方法，中国忍受了六年，终于被迫走上了这个最后关头。十阅月来，牺牲了几十百万的生命，摧毁了多少田园企业，但大家仍忍痛奋斗，毫不反悔，为的什么？因为大家多深深明了，只要稍一回头旁瞬，不仅自己马上被割宰，万世子孙，亦将永无翻身之日！芦沟桥事件发动后，蒋委员长即声明四点中国之最后立场，这是当时可能解决的唯一基础；现在，中国已付了如许的血债，更非将多年的宿恨，一加清算不可；否则政府何以解于人民，人民亦何以对其次代之子孙？再就力量言，中国现亦无须亟亟于言和。事实证明，中国抗战力量，近方日见增强，各种准备，亦愈为充实，支持长期抗战，毫无问题。自临时代表大会举行后，全国团结局面，益见巩固，不仅国共间毫无芥蒂可言，即从未与国民党发生关系之国家社会党及青年党，亦郑重声明，服膺三民主义，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在政府指导下，共同奋斗，这是中国二十七年来所未尝见的现象。国内各民族之密切团结，一致御侮，尤为历史上所仅见。中国只有继续奋斗下去，才能觅得生路，才能对得起已经牺牲或正在遭难的人民！

目前和战的关键，仍在日本之能否悔祸。战局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当然非日本军阀始料所及；人民之困顿，财政之支绌，国内之不安，军队之补充困难，以及各种事业之千疮百孔，已成为无可掩饰的事实。但遽谓日本军阀已翻然悔悟，放下屠刀，则未免言之过早。日本各报，早在军部之严密统制下，非经默许或别受策动，不能对国策有所主张。日本目前的处境，正如骑虎难下，明知前途一片漆黑，但不能不忍痛支撑下去，因为此时如洗

手不干，国内的许多问题，一定更为复杂，许多矛盾，亦必更趋于尖锐。近卫的再度出场，杉山之来华视察，是他们将蛮干到底的明证。

和平的游丝在空中飘忽，它的来源和作用是很明显的。日本目前最大的烦恼，是外交上之更陷于孤立。英意协定已签字，法意、英法谈话正在进行，欧局的安定，使日本失了侵略的凭藉；同时，苏联的态度，比前已略见明朗，英美对远东的注意力更集中了；墨索里尼于英义协定签字后，没有对远东说一句保留的话；希特勒对中日问题，亦更为沉默，这是使日本最感伤心彷徨的。日本深知欲打开其外交僵局，必赖有英国之谅解；它更深知，惟有和平的秋波，才能打动老谋深算的英国政治家的心；因为英国需要和平，也许在远东还不曾例外；它以为这种飘忽的游丝，或竟能挡住英国在远东的积极态度。其次，中国之团结，正在格外加强中，大规模的战事准备和战时机构，正在加速改造充实。它没有忘掉分化中国的老把戏，以为这种空气，可以松弛中国的向心力，而影响血战中的鲁南前线士气。

游丝究竟是游丝，狂风一起，便吹得无影无踪了。中国的怒吼，人类的不平，是扫荡这些游丝的最大力量！

（原载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上海《文汇报》）

“五九”杂感

“五九”，是中国许多国耻纪念中最沉痛的一天。日本想灭亡中国，在提出二十一条时，已下了决心；二十余年来，变尽了种种方法，玩了多少外交上的把戏，其万变不离其宗的目的，只是要吞并中国，独霸远东。“五九”是日本第一次揭开狰狞的面目，因

为那时中国政府甘于屈辱，才种下了二十多年来无穷的祸根；袁世凯在签字以后，也曾发表通电，勉全国埋头自强，但他却第一个忘了这个耻辱，帝制自为，使国事益发不可收拾。纪念“五九”的第一要义，在大家要立定足跟，坚持到底，不能有丝毫的含糊。

江海关全体华员，一致怠工，誓抗暴力，是今年“五九”纪念中最有声有色的一幕；它表示新中国国民不畏不屈的精神，为孤岛上增加许多活气。他们一致争执的要点，一是反对税款移存正金银行，二是严拒伪组织派员攫取。关于第一项，中国政府已正式向英方提出异议，反对这个破坏海关制度完整之分赃办法。据伦敦来电，英政府已在缜密考虑中。希望海关当局，能接受全体华员的意见，电英力争。关于第二项，英日所商定的所谓暂定办法，并未涉及有移转管理问题。海关全体职员，自总税务司以下，均为国民政府所委之官吏，当然应与华员抱同一之态度，不仅应以全力护关，对于伪组织人员之任何应酬拜会，亦应该严加拒绝，以免外间有所误会，野心者有所藉口。

辞职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大家要认清，怠工的目的，只在促起英当局对这问题的注意，决不是对暴力的退让；现在谈不到合作不合作的问题，而要大家坚强起精神，把握住多年心血灌输培养成的机关，为国家多保留一分力量，为世间稍存正气。

所有孤岛上的中国人，此时多要有一种觉悟。大家要抱定孤臣孽子之心，处处小心谨慎，免踏陷阱；同时，更要随时留心四周的许多新花样；有许多吃人的魔鬼，会披上美丽的外衣，向人引诱；并有不少无耻的禽兽，还学会一套动听的人话，向人间散播毒菌；这些可恶的东西，嘴上也一样说得激昂慷慨，而实际上，则随时假造许多消息，说中国内部如何恐慌，政党间如何磨擦分裂，战争的如何可怕，以及战事将延长得如何长久之类，以动摇人们的信心，迷惑当前的光明。在这个时候，大家要立定坚贞不拔的信念，同时，要格外把自己的眼睛擦亮了，把观察力

磨练敏锐了，对于一切妖魔鬼怪，多要加以透视，使其无所遁形，目不旁瞬，耳不旁听，把目光集中在光明的前途，耐苦耐劳，以保持清白之身。

“五九”的唯一教训，是与一切恶势力，不妥协，不屈服，集中所有的力量，争取最后之胜利！

（原载一九三八年五月九日上海《文汇报》）

良心的麻醉

今天是中国禁烟纪念日。禁烟两个字，在中国本身，实在已不成问题。国民政府于二十四年起，实行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雷厉风行，绝不因顾念财源，略呈动摇。上海租界当局，近年亦以全力协助，在界内肃清毒氛。中日战争发动前，除东北四省及天津一角冀东若干县外，全国已天朗气清，一扫百年来的乌烟瘴气。现在，所有被侵占的区域内，鸦片、海洛英、红丸等毒物，又在机械化军器的保护下，向这些可怜的民众，全力反攻了！

日本想灭亡中国，其武器一为兵力，二是经济，三为毒品。在这三位一体中，毒品的侵略尤为狠毒；前年国际禁毒会议中，曾明白指出流泛华北各地的毒品，多来自东北及天津日租界；去春太原破获贩毒巨案中，证明天津有大规模的运毒机关；最近汉口曾枪决一“贩毒大王”，平时其一切制造供吸的地方，多在日租界。这几个例子，已足够说明毒化中国之用心深远，规划周密了。北平自失陷后，烟馆遍设市内，天津毒氛的弥漫，更不用说；风传上海最近亦将鸦片公卖，如所传非虚，则凡不见天日的地方，再找不出一片比较干净的地方了！

这种违反人类道德，蔑视国际约束的举动，自有全世界正义的谴责，我们现在愿单就利害一点，唤起日本当局的反省。第一，日本这种毒化政策，不仅不能打击中国的抗战人力，反更激起普遍的抗日情绪。中国的生命力，现在已握在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手里，他们对于前一代的腐化，早深恶痛绝，决非任何恶势力所能威胁引诱，使其堕落腐化；毒化政策的结果，只加速中国的新陈代谢，使许多腐肉，早早脱离新中国的寄生地位；这与勾结失去灵魂的人去当汉奸，扶植傀儡，同一足以严密中国的抗战阵营；同时，狰狞面目愈揭露，所激起当地的反感亦一定愈甚，其潜伏之危机益将无可挽救。第二，毒品戕贼了若干中国人的身体，同时也戕贼许多日本人的良心。这许多浪人鲜民，受奖励保护，惟利是图。他们长久做这种杀人不见血的勾当，良知久已泯灭，今后再无什么忠君爱国的思想可以鼓励他们；这种败类，一旦返国，其足以扰乱国家法纪、社会治安者，实不难想象。近年台鲜人之吸烟者，日见增多，日本国内，近年亦常破获供人吸食的毒窟，长此已往，此种隐患，恐将日渐深刻，害人者必自食其报，这是一种自然的因果。

同时，我们愿若干抹杀良心供人驱使的中国人，早早把自己清醒起来，切勿再做这种杀人的刽子手，使你们的子孙永久见不得人！

（原载一九三八年六月三日上海《文汇报》）

勿逃避责任

战局已逐渐步入另一新阶段，目下开封附近的战事，只是鲁南会战的尾声，于全局并无重大的意义；未来大战的序幕，现在

方轻轻揭开一角，谁胜谁负，根本还谈不到；不过我们相信，这一战，时间一定比徐州会战更长，日军所遭遇的困难，一定更将增加几十百倍。中国军队的整理，后方民众的训练，以及新军器的补充添置，实力已远非四五月前可比，而日本早已使出全力。今后增兵既感困难，战线内移，运输线更难维持，由整个形势观察，中国的确站在优势的地位。中日两国的长距离竞赛，已跑了十个多月，日本虽一开始便冲在前面，但现在已渐显露步伐凌乱，体力促迫的样子；今后离终点日近，最后数圈的冲刺，将决定全局的胜负。

在这紧要关头，不仅前方将士应加强抗战，所有中国人，都应更咬紧牙关，克尽一己的责任，为国家增厚实力，减除困难。大家知道，这次战事，为中国生死主奴的关键，其间没有一点含糊，十阅月的血战，已把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大道，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为自己的生存，为万世子孙的自由，此时更不应略有犹疑旁瞬的态度。过去十阅月中，中国不知牺牲了多少战士，民众之被侮辱填沟壑的，尤不可数计；这些人的鲜血，已凝成中国灿烂的前途。此时还没有成仁殉难的人，多应有自愧偷生之感。大家在安睡饱饭之余，应时时想到前线后方正在为民族流血的人，中原前线，东西战场，广州市区，以及各地沦陷的区域内，无时无刻，没有成仁受难的人。想到他们，自己应坚定决心，为已死者报仇雪恨，为未死者减轻痛苦。

上海失陷，已半年多了！在此期间内，腥风血雨，惊雷闪电，时时有人欲吞噬而甘心，幸赖大家协力奋斗，得保全一角干净土，这是大家可引以自慰的。但除此以外，对国家没有再多的贡献，而前途茫茫，如没有进一步的觉悟，随时仍有为狂潮击碎的可能。我们以前曾一再敬告孤岛上的中国人，大家决心吃苦，节约私生活，以所有财力，多购国防公债；对于青年学生，更希望切勿因循苟且，利用目前的环境，充实知识，储备国家未来之用。这些话，现在再说，似乎又成了老生常谈了，但大家要认清，

目前的苟安环境，基础始终是飘浮的，覆巢之下，到那里去找出完卵？脱离国家保护的人，其命运仿佛空中之游丝，随时有被狂风扫荡的危险，非群策群力，无法保障生存。此时急切的要图，首在充分发挥自治力，聚各别的力量，结成坚固不可侵犯的伟力，一面与恶势力奋斗，一面在可能限度内，为大时代尽应尽的职责。在过去半年中，邮检问题，海关问题，统制广播问题，法院问题，先后向孤岛冲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近又有检查书籍问题的发动，种种磨难的层出不穷，证明过去一鳞一爪的应付，头痛医头的办法，绝难收效。今后必须大家有更坚强的团结，各行各业，分别组织起来，在同一目标下，发挥自治能力，为租界当局的后援，树立不能各个击破的基石，把自己地位站稳，并进一步为时代尽力。其次，大家要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竭力把个人生活简单化，服用国货，节减现金的外流。上海市场上，现已充塞各种毒质的物品，大家要仔细审察，不要使自己荷包里的钱，转眼变成屠杀你们的利器。战事推进至目前的阶段，一点一滴，多成为宝贵的武器，小的积累，能形成庞大的力量，最后五分钟的支持力，可以决定胜负，促对方崩溃求和。

在困苦的环境中，最能显出坚韧的特性。时代是一个大洪炉，一切不能吃苦耐劳，逃避闪烁的人，势必被沉淀到炉底里去！

（原载一九三八年六月九日上海《文汇报》）

喝采与帮忙

远东外交空气，最近的确很机微。英下院时时讨论对华借款问题，日本天天散播中法苏密约的谣言，引起法国一致的愤慨；

法大使一度匆匆赴汉，苏联大使又于前日飞返莫斯科，美国近来对日的外交辞令，显然比以前强硬。这许多事实，很容易使人发生联想。今后外交情势如何推移，事涉机密，自非吾人所知，兹愿就常识上作原则之推断。

中国政府的外交方针，看来很模糊，实际始终在明朗的途中迈进，其方式是多边的，但决不是盲目的。从抗战发动到现在，精神始终一贯。芦沟桥事件爆发之初，国际上并无一拔刀相助之与国，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仅有消极的意义。比之日本和德意的防共协定，拘束力薄弱得多。那时只有送花篮花圈的人，绝难望有切实的援助。中国当局，始终忍耐沉着，埋头于自力奋斗；对于英美法苏诸国，深知其对中国之同情义愤，同时亦深谅其环境所限之苦衷，未尝为浅见之奢望或失望。于德意两国，亦始终保持正常关系，力避激越之刺戟，盖中国当局深信得道者终必多助，力抗强暴以维护世界和平秩序的艰巨工作，终必能激起普遍之热情与反省。明知国联荏弱，但相信它仍不失为获得各国共同援助之唯一桥梁。这一年来，中国一面加强抗战力，以事实给各国可靠的保证，使他们减少顾虑；一面小心翼翼走这条外交的狭径，而决不附和一般偏激的主张，以减少许多摩擦。这种一贯的政策，似迂缓而实稳健，现在不能不说已获得相当的成就。

国联大会去年所通过个别援助中国的决议案，措词诚不免过于空泛，但仍不失为一重要之收获，因为它给予中国许多运用的方便，同时使各国得有集体的凭藉，以逐渐进行援助中国的工作。远东烽火，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其得失利害，决不限于中日两国。这种关系，各国当然看得很清楚。日本在远东的独霸势力万一造成，列强的国运势必需要重加估计，这尤为英美法苏等在远东有深切关系各国所不能坐视。所以在原则上，各国多应协助中国，中国亦应一体认他们为最好的朋友，初不必有程度之差等。一年来，各国在可能范围内，的确曾给中国不少便利，这是不可否认的；各国的民众，对中国的苦斗，尤一致同情，如

伦敦屡屡举行大会，抵制日货，吁请当局切实援助中国，而拒绝以原料供给日本；其他诸国，亦多在有形无形中进行制裁侵略者的运动。各国舆论，尤激昂坦白。每一次中国的胜利，必能博得全世界热烈的喝采；相反的，日本的许多夸大宣传，反响只是一阵阵的讥笑。

中国民众，对于世界上这许多朋友的热情好意，决不会片刻遗忘；各国过去的助力，虽份量各有不同，但为中国所永久感谢，初无二致。中国经一年的抗战，已为未来的光明前途，奠定坚固的基础；同时为世界和平秩序，维持最后之堤防。日本的许多弱点，一年来已暴露无遗，纸老虎已插穿，许多顾虑应可消失；在此功亏一篑的时候，各爱好和平国家，应可于喝采之余，考虑进一步切实援助的办法。目前欧局日见宁静，美国态度更为明朗，这正是一个不可放松的机会，在此时援助中国，当然比一年前事半功倍，各国贤明的政治家，当然比我们看得更清楚。

（原载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日上海《文汇报》）

做“人”的代价

土耳其民族英雄基末尔将军，在幼年学生时代，有人问他将来的抱负，他爽快地答道：“我预备做一个人！”当时土耳其还是著名的“近东病夫”，国内分崩离析，土地日削，不平等条约重重高压，近邻的希腊，时时觊视着，想吞并这块肥土。那时土耳其人想做一个清白自由的“人”，的确已不可能；但基末尔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经十几年埋头奋斗，终将希腊击败，建立新国，现在所有土耳其人，多已享受独立自由的幸福了！

做“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并非活着的都是“人”，在全球上，尽有许多“万物之灵”，过着非人的奴隶生活，受着强者的指挥、剥削、压迫，他们的生活，实在比原野中自由生活的禽兽都不如。中国民族，曾两度过着长期的非人生活，辛亥革命，才把大家解放了一半，但外来的压迫，仍有加无已；尤其是近邻的日本，二十多年来，几乎天天想一口把中国吞下，使四亿五千万中国人，驯服地受它武力的蹂躏，做它高度工业化的农奴。远的且不说，单以“九·一八”到“七七”的六年间来说，中国人所受的压迫，侮辱，已罄竹难书；东北四省，先后蚕食，冀察平津，铁骑密布；全国各地，密探横行，稍稍受一点挫折，马上便“膺惩”之声四起，整千整万的中国人被屠杀，不准你哼一声，一个日本人失了踪，则抗议，牒文如雪片飞来；民众要说几句话，便说是抗日，政府对他们的非法要求，假使稍一犹豫，马上便说是“双重政策”，强迫“表明态度”；刀架上你的头上，还不准你战慄，还要你装出笑脸，表示“合作”，表示感谢，这种痛苦，哪里是一个“人”所能忍受的！芦沟桥的烽火，燃起中国民族的怒焰，蕴埋在心里多年的愤恨，终如黄河堤防似的溃决了！

这一年来，全国各地，都直接间接蒙受可惊的牺牲，战士之葬身沙场，民众之流于沟壑者，不知数十百万！但他们的灵魂，多已有了正当的归宿，中国独立解放的基础，已逐渐树立起来了！大家虽受许多痛苦，而精神上已得了解放，不仅解放，并且得着全世界人类的尊视。这一年的血债，便是中国四亿五千万民众做“人”的代价。大家要珍惜过去所放的血债，同时更要忍痛继续偿付这种代价，以完成时代所赋予的庄严任务。我们相信，中国的政府当局，各党各派的领袖，没有一个不抱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在抗战发动前，大家对于救国的方法，也许有先后缓急的不同，自战幕揭开后，大家多一心一德，精诚团结，在领袖指导下，一致努力于抗战救国的大业。全国民众，除极少数没有灵魂的“万物之灵”外，没有一个“人”不振作努力，甘受

牺牲痛苦，为国家的解放而奋斗，这是很清楚的事实。我们更相信，除非日本人悔祸，退出全中国，彻底放弃侵略的态度，中国政府以及所有中国人，决不会停止“代价”的偿付；他们不会忘了不久以前所受的种种侮辱压迫，他们更不愿他们的万世子孙再受这种无期凌辱。他们要讨血债，要清算多年所流的眼泪！

光明已在他们眼前闪耀，任何暴力或引诱，决不会再把他们赶回黑暗里去！他们唯一的目的是，是要使自己及万世子孙做一个清清白白、独立自主的“人”！

（原载一九三八年六月三十日上海《文汇报》）

教育者的责任

今年上海的学校，数量比战前更多，大街小巷，几乎到处可看到学校的招牌；从各报的招生广告中测度，暑假后又将有許多新学校出现。这种现象，用单纯的观点来看，也可以解释为上海教育的发达。失学和失业者众多，登记手续的简便，是畸形发达的主要原因。

在原则上，我们对于这许多热心办学的先生们，当然应表示十分的同情。上海目下至少有六七十万学龄以上的儿童和青年，他们大部分无法离开孤岛，事实上内地也没有这许多学校可以容纳；其次，还有许多从失陷区内逃出来的学生，他们最迫切的需要，是能自由呼吸一点知识空气。开办学校，以满足儿童和青年的求知欲，当然是值得称道的。上海失陷已入九月，在种种威胁利诱下，教育界还能保持清白的面目，这种艰苦支撑的精神，尤其值得我们钦敬。

办学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目前的环境下尤难。房价飞

涨，各物昂贵，既没有公家经费的补助，社会一般凋敝，学费亦不能收得过高，这种经济上的困难，支持已极不易；而最痛苦的，是学校与国家脱了线，精神上得不着正确的指示，一切必须办学者自己在暗中摸索奋斗。这种痛苦，易地皆同，我们早有深切的体味，所以对于许多初创的学校，设备不免简陋，课程不免单调，管理不免疏忽，但从来不愿加以过分的苛责。现在，下学期行将开始筹备，我们愿提出几点意见，贡献给孤岛上的教育者。

第一，在此特殊时期，在上海办教育的人，首应感觉本身责任之重大。国家把数十万活泼的儿童和青年，整个交给上海的教育者，希望他们负起教养保育的全责，培养这许多可爱的新血液，去灌溉国家的新基础。这种艰难的工作，比之在内地办教育的重要得多，也困难得多。因为这里没有南针，无人指示，必需自己能握住前进的舵，在逆流中挣扎前进。此时如专以营利为目的，敷衍塞责，以欺骗学生，则不仅对不起学生的家长，实将成为时代的罪人，将来决不能为国家所轻恕。

第二，上海环境虽特殊，但还能在可能范围内安心教读，办教育的人，应坚定决心，以传教士的精神，不畏任何强暴，同时亦决不可因顾虑环境，而动摇基础的信念，尽力求其在我，照着预定的方针，按步迈进，务求教育的实质，能和内地发生联系。

第三，学校的设备，此时固不能求其过分完美，但至少不应离题太远，初步的必需的图书仪器，应该求其无缺，否则宁可少开班数，少立科系；就力之所及，以决定学校之性质和等类。现在有若干新设的学校，租了几间很小的房子，从大学办到幼稚园，从文科办到理科工科。办这种学校的人，不是存心欺骗，便是不自量力，都是急应纠正的。

我们的意见，办教育固为救济失学的儿童青年，同时亦应顾到未来大时代的需要，此时如无力办大学，宁可多办专科；力量

如不够办一个完善的中学，宁可多设简单的职业训练班。在上海的环境下，正可大量培养专门的技术家，和将来建设的下层干部。如专在学期学分上打算，以为把学生一批批渡过学级，为学生制造文凭，则不仅教育整个失败，学生将来的前途，一定很渺茫无际。由社会言，不过多造成许多高级游民而已。

其次，我们希望各校负训育责任的人，应随时彼此保持联络，交换意见，使各校于管理上能完全一致，不致过分脱线。同时，各校的图书仪器，应设法能相互利用，以彼此有限的经费，能拼凑购置足敷最低限度的需要。此外如专门以上学校之学科分系，最好能避免冲突，各就其原有之优点，分途发展，以收分工合作之效。这些问题，我们是外行，只能贡献一点原则，至于如何为实际之推动，还望热心教育的专家们，多多发表高见。

（原载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上海《文汇报》）

献金与做人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不是穷，也不是死，而是麻木或残废的不治之症。患这种病的人，既不能速死，又了无生趣；眼看着别人活泼跳动，自由放纵，自己却束手束脚，终年萎顿于床褥，与猫犬蚊蝇为伍；说是活着，其实比死还难过。

中日战事，正象一个对抗的运动会，双方的选手，大家流汗咬牙，在每一个节目里，尽可能的力量，以争取更多的分数。在这种火炽白热的场面中，忽然有一个选手负伤退出了队伍，周身裹起绷带，僵卧在冷静的角落里，听着同伴们胜利的欢呼，失败的鼓励，一阵阵掌声狂呼，打进落伍者的耳鼓里来，时时刺痛受创伤的心。这种痛苦，每一个上海人，现在一定能深深地体味

着。

但是，受伤的人们！大家千万不必灰心！这一次竞赛，离着总分结算之期还远，从现在到获得锦标时，还有一个很长的期间，让大家去奋斗。你们现在虽一时受了伤，但确信你们的心没有死，热血还在跳动，火焰还在周身燃烧着；你们要挣扎起来，竭力睁开你们的眼睛，注视着伟大场面的一切；你们纵使不能马上再跑入竞赛场，一展自己的身手，至少应重振起精神，尽可能的力量，供献于自己的队伍，切勿放弃选手的权利，更不应忘了自己是一个人！

在目前的环境下，节约献金，是疗治创伤，保持选手权的最好的方法，也可以说是做一个中国人的起码条件。战事愈持久，经济的强弱，愈足以决定最后的胜负，这是一点最浅近的常识。中国地大而资源富，在经济上已显然比日本强固得多。这种优点，不仅应保持，而且要进一步充分发挥其伟力。政府当局，近对内地各省已推行普遍的社会节约运动，节约一切不必要的消耗，集中所有财力于抗战。在这个时候，每一个钱，都成了一滴宝贵的鲜血。大家要把仅有的鲜血，去滋长自己的身体，千万勿于无意中流到恶魔的身上去！此时四周被人织在天罗地网里，任何消费，都不能从魔手中脱漏。唯一的方法，只有竭力节约，绝不浪费，把这些钱供献给奋斗中之伴侣。

前线的战事，一天比一天紧张，全国的战士，都在浴血苦斗；保卫大武汉，抢救受难中的一切国民；以血肉去洗滌民族的耻辱，脱开国家的桎梏。我们在五色迷离的上海，披读壮烈火炽的战报，字里行间，不知夹着多少血腥；在此时此地安逸度过一分一秒钟时间，在前线正不知有多少壮士，光荣的殉难了！被无情炮火炸伤了！被可诅咒的毒瓦斯窒息而流血了！想到这些，大家应时时卧薪尝胆，不甘味，不安枕，更何能昧着良心去浪费，去跳舞游泳，去过一切糜烂的生活呢？你们要认清，自己虽束手束脚，但究竟还是个中国人，在此千钧一发、为主为奴的紧要关头，

应该怎样，才配做一个人？这个问题，应该时时悬在心头，警惕自励。献金，是一个最起码的办法，假使连这一点多不能尽力去做，那根本便是自己逃出了时代，从中国人中脱籍逃伍了！

在此非常时期，大家的生活当然格外困难，谋生不易，得业尤难；大家对于一人一家的生活，不能不可有个打算。但这个打算，应有一限度，至少不应把自己完全置身局外，更不应为打自己的算盘，而阻滞时代的前进。献金，大家应把它列入必要的预算，至少应看作象一项必纳的租税一样，按月抽存，随时纳献。经济力充足的人，当然应抛开一切铢积生利置产的念头，除必要的生活费外，应全部献之国家；因为在此时机，个人与国家完全同其命运，覆巢之下无完卵，国家如得不着光荣的出路，茫茫大地，何处去找亡国富翁的安乐窝？所以此时积存或收买黄金的人，其心理最不可恕，自己以为聪明，实在是最糊涂的人。这类现金，为国家最可宝贵的新血液，而在私人，则为最无用的东西，应赶快全部献纳出来。

我们知道，上海人最近献金的很踊跃，而本报读者，亦已逾一万元；但以之和武汉港粤各地献金的数目比较，相差还甚远，假使拿上海每日进口的奢侈消费品的数字来比较，那更使上海人惭愧无地自容了！希望大家能踊跃兴起，为国家尽最低限度的职责，为自己疗治心底的创痛。

一切受伤的人们！不要尽躲在时代圈外，自甘沉落！要竭力挣扎起来，保持自己的选手权，振作刻苦，做一个无愧无作的中国人！

（原载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上海《文汇报》）

吊日本灾民

正当日本大地震十五周年纪念日，关东一带又遭受严重的风灾；东京横滨一带，都受到飓风大雨的侵袭，形成十余年未有的灾患。早已在物价狂涨消费统制当中挣扎着的日本人民，更横遭住宅淹没农作物全毁的天灾，正不知更增加几许痛苦！在前线的日军，如果闻知家乡惨遭浩劫，怕也不能无动于衷吧？对于这种不幸的天灾，自然不应存有幸灾乐祸的心理，尤其不应以因果成见去解释，因为站在人道的立场上，即使遭受意外惨祸的是敌人，也应寄予同情的吊慰，何况受难者大都是无辜的平民；但是我们却不可忽略日阀侵华与此次灾患间的联系。飓风固属天灾，人力还无从抗御；然而如果把侵华的巨大军费用于气象研究与防灾设备上，总可减少灾患的范围与影响。我们更可以想象到，正以全力从事战争的日政府，对于灾患的救济与善后的进行，一定不会十分得力，两月前的关西水灾就是明证。被灾的日民，在流离颠沛之余，应该不要忽略；在此次灾患中所受痛苦，至少有一部分是受军部侵华战争之赐。同时更应该省记：中国几千百万的无辜人民，正在日本军阀铁蹄践踏之下，遭受着更甚于你们的惨遇。

日本人民，真是世界上最服从最可怜的国民。农民卖掉女儿偿债，兵士丢下生活毫无保障的妻子出征，这都是他国人民不易做到的事，在日本则正是稀松平常。对中国仅仅打了一年，已然竭泽而渔，窘态毕露，足见日本根本没有可以对外一战的国力，而军部竟敢对内对外肆无忌惮的放手做去者，正因为有这许多善良的人民盲目予以支持。现在除却一般的生活困苦而外，一年中已然遭遇两次严重的天灾。善良的日本国民：你们不要再一味勒紧肚皮，徒自怨艾，应该勇敢的认清目前的事实，从奋斗中去找出

自己的生路。

据板垣七月三十日的谈话，下届预算，将向日本人民作较前尤高的要求。这笔只有在天文学上才碰得到的庞大数字，随便怎样高，自然都是要用于战争上面，被灾的人民是不得沾润的。然而这一负担，无论日政府财政当局是实行加税，是增发公债，是采取恶性通货膨胀，到最后总是转嫁到贫苦民众身上。日本国民应该自问：在许多人民生活惨苦流离失所的时候，为何偏要支付如许金钱于无目的的战争？而且以自己最后的一点血汗，去买四万五千万人民的仇恨，替子孙欠下永远尝还不清的血债，是不是一件值得的事？

我们深知日阀统制思想钳制人民自由的严厉，我们也知道日本革命运动的机运尚未成熟，但无论如何，日本人民也不应驯顺到是非不明利害不辨的地步，一味随着军阀去横冲直撞，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一起葬入无底的深渊。你们应该怀念宪政黄金时代的幸福，你们应该清算七年以来军部许给人民的无数空头支票。不错，从沈阳事变以来，军人确是打了无数次的胜仗，然而收获何在？试以目前生活状况和十年前比较一下，你们是幸福还是痛苦？是快乐还是穷愁？何况这战事还要持久打下去。军部说“要打到中国屈膝为止”，那是一句谎话，中国永远不会向任何人屈膝，正和日本不肯向人屈膝一样。那句话应该修正为“直到日本军阀崩溃或中华民族牺牲到最后一个人为止”。在战事持续期间，你们的苦难正不知更将伊于胡底。

军部口口声声说：“不与中国人民为敌”，其实是专和中国人民为敌。日本人民大概无从知晓在日军占领区内华人遭受如何残暴的淫掠屠戮，但军部所发表的空袭报告中，也往往承认所袭击的地方毫无防空设备。你们可以想象在那些次的轰炸中，中国平民遭受何等深而且巨的创痛。而五月十七日中国空军远征三岛之役，只散传单而不掷弹，倒证明中国的确不与日本人民为敌。中国所反对的所要打倒的只是日本的侵略者，每一个善良的日本人

民，仍旧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你们之甘受军部蒙蔽与驱策是非常可惋惜的一件事，结果是你们替军阀做了赎罪的羔羊！

因为中日两国正在畸形的战争状态中，中国政府与人民大概不能再象大震灾时那样拨款捐款去赈济你们，但都深为系念你们的惨遇，同情你们的疾苦。其所深切属望你们的，就是不要再受军阀的欺骗，盲目的与中国为敌。你们应该认清自身痛苦的真实来源，与中日两国人民间休戚相关的连锁：中国抗战的胜利，可使日本人民从军部高压之下解放出来；日本人民反军部运动成功，也必然帮助了中国独立自由的完成。现在中国人民正在为了生存从事浴血抗战。最近你们国内到处流露着不安，出征将士也屡有厌战的表示，这正是日本人民要逐渐走向光明的朕兆。善良的日本国民，你们应该更加理智，更加勇敢，努力把国家和自身从泥淖中拯救出来！

（原载一九三八年九月四日上海《文汇报》）

寻找自己的岗位

这几天，我们接到许多读者来函，讨论关于撤退上海的壮丁问题。有几封信，已先后在“读者意见”内披露。从这许多信里，我们看到孤岛青年一般的苦闷。他们不需要这种死寂的安逸，他们要把一切献给奋斗中的祖国，他们悲愤这堕落的环境，他们愿意冒一切艰险困苦去战斗。这许多可爱的青年，正是新中国最可珍贵的鲜血。他们的意见，虽有许多地方不免近于理想，但他们高贵的志趣，是值得敬佩的。我们愿就这个问题，提供一点意见。

中国正当生死主奴的严重关头，抗战建国，是每一个国民的

共同责任，任何人不应逃避，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内地的许多壮丁，正争先恐后，踊跃参加训练，分批开赴疆场效命；留居在后方的人，也都各尽其所长，去推动时代之前进。现在还留在上海的人，正象一群落伍的选手，离群索居，日坐愁城，抚髀心惊，听鼓落泪。时代的悲哀，充塞在每一个青年的心头。大家渴望着要去把握机会，去参加前进的队伍，这当然是最正当的要求。但第一我们先得顾到事实，在目前的环境下，是否能做到整批撤退的地步？第二，自己应先反省一下，即使到了内地，有什么力量可以贡献给国家？第三，政府对于上海青年最大的希望是什么？上海目前的环境，大家应该已有深切的体会，谁来领导，谁来训练，这多是无从谈起的问题。各人有各人的家庭牵制，经济困难，要求步调齐一，事实上亦不容易办到。从抗战开始到建国完成，是一条不短的途程，只要大家不放松，决不会没有献身的机会。中国目前正如一列前进的火车，开足马力向光明驶去；不管是修理轨道扫除障碍的勇士，或烧火开车的机师，其贡献虽有大小，其职责之神圣初无二致；就是火头上的一块煤，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乃至所有凑成火车的铁头木块，也一样值得珍贵。大家要决心不做弃材，当然更不应做轨道上的障碍者，但大家也不必因不能做烧火或清道的工作而灰心。战事需要不断的补充，不断的培养。从抗战以来，日方最大的目标，是要摧毁中国的文化教育机关，想从根本上把中国民族毁灭；中国政府，在这种艰苦的处境下，始终以最大的努力，去改善教育，培植青年；政府对于青年的热望，比一切人多浓厚；希望他们滋长充实，去增强抗战力，凝成新中国的深厚基础。上海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政府对于上海青年的苦闷，了解得最深切，对于他们的热望，也许比任何地方为浓厚。在政府想来，以为沦陷区域内的青年，倍尝种种失却保护的痛苦，亲历种种魔手的压迫，目击心伤，他们的骨头一定更硬，他们的奋斗力一定更强！

我们主张，目前有一技之长的人，应赶快到内地去，因为国

家正需要这类成熟的专家。如前线伤兵，到现在还得不到满意的看护，迅速的疗治，最近前线疟疾且很流行，凡是出身医校或曾在医院服务的人，应抛弃一切，赶去为他们尽力，减少他们的伤亡痛苦。再如工程人才，熟练的工人，多为内地所急需，此时多不应顾惜一己的困难，而流落在这孤岛上。此外如歌咏，戏剧，文艺等等专门人才，力足以振奋人心，发扬抗战情绪的人，假使在这里找不着适当的岗位，当然亦应设法深入到内地的民间去。除此之外，所有知识能力尚未成熟的人，应赶快把自己充实起来，埋头苦干，加速自己的进程，紧紧的赶上时代去。

这次战争，是全面的民族抗战，每一个角落，要把岗位布满，切勿让一个暗影投射进来。上前线，打游击，其战绩是一样的。大家要立定一个岗位，去咬牙奋斗；没有找着岗位的人，应赶快去寻觅，不管在任何一个角落里，多一样可以发挥力量。只要能推动火车的前进，就是做一个螺丝钉，也一样值得高贵的。

彷徨苦闷，是弱者的呼声，可爱的青年们，应该赶快振作起来！

（原载一九三八年九月十日上海《文汇报》）

张伯伦在深渊旁

张伯伦首相，现在已成举世最瞩目的人物，他目下正在主撰着现代的一页新历史；这一页历史，当然还没有到做结论的时候，但他究竟将怎样写下去，全世界的人都密切的注视着。

慕尼黑会议以后，欧局一时苟安下来，大家得喘着一口气，张伯伦首相委曲求全的努力，曾博得许多人的喝采，尤其是伦敦柏林的妇孺们，几乎感奋到流泪。第一次大战的恐怖，至今还深

印在欧洲人的脑海里，使人有谈虎色变之惧。张伯伦挡住了战神的魔掌，这种勇气当然是值得钦佩的，但一旦将理智清醒，细检四国协定的内容，不能不承认有许多地方令人失望而气沮。希特勒的铁蹄已踏进了苏台德区，趾高气扬，在高呼“胜利万岁”。波兰、匈牙利也帮着操割捷克的领土；愁云惨雾，罩满了捷克的全境，此情此景，令人生人间何世之慨。四国会议后，张伯伦复与希特勒签订英德宣言，声明两国今后永不以兵戎相见，更增高了侵略国的气焰，使和平阵线益见凌乱松懈；我们不敢相信张伯伦在帮同制造反苏联的工作，但权衡轻重，以这样大的代价去换取一时的苟安，总觉不甚合算的。

这几天，英下院正为这个问题作热烈的诘辩，并酝酿提出不信任内阁案；海相古柏氏为反对张伯伦首相之外交政策，辞职引去，全世界的舆论，也多集中指责；诚以掀起危机者虽为希特勒，而张伯伦之犹豫踌躇，不能无纵容之嫌；且此例一开，和平势力益见式微，维系欧洲和平之樊篱尽撤，这是大家集矢于张伯伦的最大原因。在目前英国的空气中，我们相信张伯伦一定能渡过难关，但问题在如何能自拔于群疑众谤之深渊，以表白其最后之抱负。所谓现实主义，应该只是一种方法，决不是极终的目的。英国在张伯伦操舵之下，究竟将向什么地方去？与侵略势力沉湎一气还是仍将投身于和平阵线？这是每一个人所急待解答的。大家等着看张伯伦首相怎样写这一页历史的结论，我们愿乘机向张伯伦贡献几点意见：

第一，现在已不是梅特涅克的时代，任何外交上的纵横妙用，凡足以阻滞时代之进化者，不仅劳而无功，终必为世人所唾弃。因为时代巨轮的推进，决不是任何力量所能推住，或迫它后退。英国所以能见重于当世，握有一切国际问题的决定权，固然因为有实力，同时也因为近年所推行的开明政策，多少代表人类的一点正义。假使连这点多抛弃了，无疑的将招致不可挽救的后果，这是张伯伦在决定基本信念时最应注意的。

第二，和平固非不可强求，但所求的至少不应是饮鸩止渴的苟安。美副国务卿威尔斯氏前日广播演说：“时至今日，各国倘欲根据正义公理，而为世界树立新秩序，则二十年来当以目下机会为最佳。和平之为物，并非属于消极性质，决非暂时间避不举行战事所可获效。兹欲树立持久之和平，端须实施下列各项原则：一、遵守诺言，二、避不干涉他国内政，三、各项争端，用和平方式予以解决……”这一番话，可视为对张伯伦首相最真挚的忠告，希望能虚怀容纳。

第三，世界和平秩序的破坏，侵略野火的蔓延，完全因为和平阵线各国过去的同床各梦。远东问题日渐恶化，由于英美步骤始终未能一致；当意国侵阿及莱茵问题严重的时候，英法两国显然各有千秋；法国既误于法意协定，未能与英坚强对意制裁，英国又误于对德订约，使罗加诺会议失其拘束力，坐视两侵略国各得其所，为所欲为。现在三个侵略国正彼此利用，互为犄角，今后要维系世界的秩序，惟有痛改过去犹疑畏缩的态度，加强集中安全的力量，各民主国开诚布公，为火药味充满的世界，作彻底的消防工作；否则，徒施小惠，以图满足野心者之贪欲，结果必延误时机，而终因欲壑难填，致和平全部破裂，愈一发不可收拾。

张伯伦现在虽然立在群疑众谤的深渊旁，但未必遂无自白其襟胸的机会；放在他面前的，就有两条大路可走。其一，响应罗斯福总统的主张，召集世界会议，包含苏联及各小国代表在内，彻底商讨解决世界各地之纠纷办法，而以过去订立之各项国际和平条约为基础。其二，应以全力维护国联之生存，对于国联最近之决议案，尤应首倡力行，使举世咸知英国为尊重诺言信奉正义之国家。此外对于捷克，无论在条约上道义上，张伯伦首相均负有重大的责任；捷克的忍痛牺牲，决不是示弱，它正是以最大的勇气，为人类尽其贡献；它也许过分信任了张伯伦，而甘于一时受屈；张伯伦对于捷克，不应仅以借款解除其经济困难而自慰，至少应以更大的力量，保护其安全更生，尤应防止一切外来侵

略，协助其树立新的坚强基础。

我们相信，英国人富于忍耐，但决不会屈膝。张伯伦现正在群疑众谤的深渊旁，希望他能赶快转向光明的大道，完成这一页历史的创作！

（原载一九三八年十月五日上海《文汇报》）

勉沦陷区民众

愈是离乱时代，尤其是国族危难的时代，一个人的立足点，为主为奴，万万错误不得。偶然走错了一步，就不自知地做了历史上的罪人，误了自己，也误了国家。秦桧是一个文人，史可法也是一个文人，同样有学问上的修养，要是同样生在承平的时代中，或许都是历史上的太平宰相，也未可知。可是不巧，两个人的处境，都是最难得而又最不易应付的时代，一个因了意志的不坚强，终于随洪流而沉落下去；一个则拚了性命跟环境搏斗，经过千辛万苦，终至于成仁。虽然没有成功，可是千载以下，读到遗文，正气是永远存在的。政治家固然如此，就是一个普通的学者文人，赵孟頫的旧国王孙，钱牧斋的两朝元老，虽然都保全了首领，优游一世，终不免于清议有亏。危难的时代，正是磨励骨气的时代，进一步就是英雄，退一步就是禽兽，其间丝毫含糊不得。

中华民族立国五千年来，历史上的朝代更易，大都是民族姓氏间的互为传受，至于对外的全体的民族战争，还是空前第一次。这一次战争，是全民族的生死关头，也是中华民族从来未有的危难关头。可是在战争十九个月来，确实已证明，在长期抵抗中，必能得到光明的生路，而抗战的环境，也确乎在一天天好转

中，主要的条件，就在全国的一致的团结，全国的互信共信。在抗战中，每一个国民的责任轻重相同，绝对不允许每个人的自乱步伐，自绝于国族。这与历史上的“一治一乱”，客观的环境显有不同。

在正确的政治领导下，一个人的信仰是不会动摇的，但是在战区中，正确的指标暂时迷失了，到处又充满着外物的利诱，与暴力的威吓。加以环境上生活的颠沛流离，就极容易迫着意识不定的人，不知不觉地走上自灭的道路。固然，在恶浊的环境下，众醉独醒，不是怎样容易做到的事，但是平昔于修养之不是与抗战信仰之不坚，尤为其主要的原由。

这一次国民参政会中，除了通电慰劳前方浴血的将士以外，同时通电慰劳战区中的同胞，其中结句说“今日之痛苦，即国家民族永远福利之所由生”，这真是战区中民众值得再三回诵的一句话。

目前战区中的人民，已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同流合污地去鬼混，毁灭自己的生命；一种人是摒绝外物之引诱，极尽一己的力量，以争取自己前途。前者已成历史上之罪人，后者则必能创造时代。天下的幸福断不是凭空收获的，抗战已到了第二期，就说明离开胜利路程也一天迫近一天。战区中的民众，应该勉力策励自己，忍辱忍苦，以挣扎最后的光明。“不是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每一个人要把目光放得远，意志抓得牢，等待着最后光明的来到。

（原载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上海《文汇报》）

英法又一失着

当希特勒的吞并工作如火如荼进行之下，伦敦的外交发展，却迟回却顾，如牛行蜗步，全世界万目睽睽，莫不为之着急，至少大家都有“急伤风遇着慢郎中”之感。现在这两位“老成持重”的医生，忽然当众宣布，说病还不紧，用不着医治，过去所拟定的两个药方，将一概不用，大不了再吃一服汤头，出一身汗就够了。这一来，更使人莫名其妙了！

欧洲的现状，正象一个千疮百孔的病人，哪一天多有百病齐发不可收拾的危险，赶快着手治标治本，还恐怕来不及，伦敦方面，一忽儿主张召开会议，一忽儿又准备发表宣言，已经叫人看得气闷，现在连这些起码医药都准备放弃了，难道葫芦里真有什么妙药？假使还是“慕尼黑”一张旧丹方，那真不如干脆准备后事了。

医生是那样的多愁善感，一步九回头，这两个病魔，却气焰万丈，左右逢源；希特勒今天跑捷克京城，明天又到米美尔，充分显示胜利者的高视阔步；而墨索里尼也静极思动，搁置多日的法意殖民地问题又将提出，据说这一次要求，将比以前更严峻。另一方面，波兰的态度又开始动摇，斯洛伐克与德订约，承认归德保护，同时罗马尼亚也与德国签订了商务补充协定；中东欧一片屈服呻吟的空气，侵略者又完成了一次投机的把戏，使多病欧洲，越发沉重起来。

我们不能怪立陶宛的屈服和罗马尼亚的朝三暮四，在此生死关头，赌国运不是一件儿戏的事。这些小国，未始不知疆圉自固，严防毒菌的侵入，但自顾实力，决非希特勒的对手，而国防上可望的助力，又如此渺茫，捷克便是前车之鉴。当慕尼黑会议

前，贝奈司所领导的捷克政府，未始无欧战时比利时的雄心，愿意牺牲一己，作反抗侵略者的前锋，但结果同盟的与国先后背弃了，国际的压力，使它不能不接受屈辱的和平，不到半年，希特勒又撕毁了信誓旦旦的诺言，铁蹄踏遍了全境。英法外交家是那样不慌不忙，侵略者的压迫却急不择待，所以在伦敦玷坛聚讼盈庭的时候，立陶宛等不得不忍痛接受丧权的条件，明知道这是饮鸩止渴，希特勒决不会就此放手，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路可走呢？这些事实，证明目前中东欧普遍的“恐德病”完全是慕尼黑会议的产物，而今后英法诸国如再不另觅新药，一味抄用这个老丹方，以为这是四平八稳的十全大补药，那不仅未来危机不堪设想，就是当前的难关，也休想平安度过。我们不知英法的外交家有什么神机妙算，竟认为“欧局可暂保和平”？

处此非常局面，我们不否认英法诸国应付的困难，一旦和平放弃，前途诚然不可设想；但在此千钧一发的关头，千万不可再讳疾忌医。我们不怀疑张伯伦首相所称“英国对德希图控制欧洲任何计划之抵抗决心”，不过对于其不愿组成集团与德对抗一点，殊未敢同意。侵略者彼此勾结，得寸进尺，这一点显明的事实，大概张伯伦首相到今日还不愿正视。要知道，挽救狂澜，决不是躲闪现实所能济事，未来的危机，只有各民治国推诚相见，紧密合作，以集体的力量，来击破侵略者此唱彼和的野心，才能逢凶化吉，才能使正义、和平得着真正的保障。目前唯一的救急治标方法，是如何隔离病菌的散播，使德意再不能利用民治国苟安怕事的心理，来进一步表演其投机的杰作；在此隔离工作中，目光单注意在西线的比、法、荷、瑞是错误的，对于中东欧水深火热的情势，决不可充耳不闻，放弃消防的职责，应赶快以有效的方法予以支撑。在治本方面，民治国的集体安全行动，必需早日着手恢复，使德意有所警惕；英、法、苏的积极合作，彻底谅解，至少可以鼓励巴尔干诸国的信心，不致再一味屈服，任人割宰。其次，在远东方面，正是民治国回复信誉、伸张权威最好的

场合，这里有最勇敢反抗侵略的斗士，事实已证明日本前途的必败；英、法诸国，果能立下决心，与美、苏合作，进一步援助中国的抗战，则此侵略国最弱之一环必能早日击碎，而其狼狈为恶的人，亦必能乘此收篷，知所敛迹了。

世界局势的中心，当然仍系于英国，张伯伦首相最近对德的坚决表示，马上得着很好的反响，华盛顿引起一致的好评，慕尼黑以来的流言澄清了。政治家固不必斤斤于一时的毁誉，但明明前面有光明的大道可走，何必焦头烂额，向明知走不通的羊肠小径兜圈子？欧局的病虽沉重，及今救治，还有希望，不过千万不能再讳疾忌医、饮鸩止渴了！

（原载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上海《文汇报》）

出卖民族的汪兆铭

汪兆铭派高宗武等赴日，与平沼订立密约的消息，上月三十一日本报重庆电即已揭露，现续得各方报告，完全证实。本月一日同盟社曾发表汪之声明全文，满纸遁词，荒谬绝伦，其唯一作用，即在为日方所幻想之“和平”作辩护；再证以日方最近之军事动向，益信汪与东京方面确已有进一步之勾结。

凡是一个有血气的人，是一个黄帝的子孙，看到这密约的内容，一定没有一个不怒发冲冠，切齿痛恨。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卖国求荣的丑类，引狼入室的汉奸，但用心之毒，为敌设想之周，还没有这种前例。

当汪发表其“艳电”以后，大家于痛恨之余，多少还存一点怜悯之意，认为这个人革命了多年，因一时认识不清，意志不坚，可惜竟叛离了抗战的营阵，但象他那种经中山先生一手熏陶

的人，又在政府与领袖一向共负艰巨，即使堕落，也有一个限度，不致象王克敏之流一味受人摆布，作积极的卖国行动。就是当局对于他的处置，也极事宽大，仅限于开除党籍为止，并未象处置汉奸那样惩治。现在看来，他那一套出卖民族的阴谋，不仅张邦昌、吴三桂等为之失色，就是王克敏、梁鸿志看了，恐怕也有自愧不逮之感。

日方所高唱的“东亚新秩序”，谁都知道是大陆政策的代名词；而近卫声明所列的几点，完全是招降的条件。日阀灭华的野心，只有一天比一天加甚，看板垣等最近所发永久驻兵的谈话，以及“长期建设”的口号，足见它绝无悔祸的决心。这一点，三岁的中国人都清楚。中国抗战力日见增强，这是铁的事实；中国只有抗战到底才有出路，而胜利前途日见光明，这也是任何人所能觉察的；汪兆铭不是一个笨人，他会一无所知么？何以甘心自杀，为虎作伥？难道他真有一套“中日共荣百年之大计”？不，他的一切胡言乱语，全是发源于利欲熏心的一点。他是在党国游泳了数十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真诚的话，今天激昂慷慨说了一套，明天的话便马上会彻头彻尾改变；今天的朋友，明天便成仇敌，翻云覆雨，东歪西侧，其万变不离其宗的目的，便是要发展他的领袖欲，取得高位厚禄的便利。这次抗战发动后，他本也是一个最激昂的人，但后来看到政府威信日益树立，各党各派密切团结，领袖的意志始终坚强，他既再无出卖风云的机会，又自感落伍，于是便一怒而去；当时也许是一时“撒娇”，后来看到全国一致痛加指斥，老羞成怒，索性完全投到日阀的怀抱里去了。我们细细分析他由动摇而堕落乃至自杀的过程，其实前后并不矛盾，不过他的花言巧语，把忠恕的领袖和国人矇住了。

日方因为战事的前途渺茫灰暗，外交经济的困恼日见深刻，很久便想扶植一个大傀儡，作为变相灭华的工具。费了多少气力，花了数百万金钱，终究动摇不了流落孤城的吴佩孚的心，任凭怎样包围胁迫，这位坚贞自守的老将，总是屹然不动，恰巧一旁有

人在那里做眉弄眼，自然使你贪我爱起来。

这种可鄙的勾当，在汪个人，不过是更彻底的露出他的尾巴，在日方也不过更显明其万般无奈的心情罢了。老实说，象这样一个为万众所不齿的败类，会在大时代中发生什么作用，岂不是笑话！

不过在此民族大争斗中，赏罚必须严明，前此汪兆铭不过是一个背叛国策的人，现在则已成出卖民族的汉奸，政府假使再宽大为怀，恐怕连王克敏等辈都要叫屈了！

（原载一九三九年四月六日上海《文汇报》）

票友尤菊荪

尤菊荪被刺，是一件使人激动的事。尤菊荪是一个著名的票友，平时惯于“粉墨登场”。此次出台，是否有意下海，或仅为“玩票”的性质，虽非别人所知，但至少他抹白了鼻子是事实。

这个时候，一点含糊不得，凡心一动，就有人叫你玩票，拖你下海，结果亮相不成，反碰了全场的倒采，戏台一倒，普天下将找不出一处容身的地方。

尤菊荪仅仅受伤，比起陆伯鸿来，似乎已算幸运的了。

（原载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一日上海《文汇报》）

一唱两和

两伪组织忽然同时发表了一篇所谓宣言，居然也讲了一套政策与方针，真是一件滑稽的事。

宇垣前天发表谈话，谓将来或考虑根本态度，现在马上便有两个传声筒来响应。我们在这一唱两和中，可以看出日方内心的虚弱。

（原载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日上海《文汇报》）

以牙还牙

最近一月来，西班牙不设防城市，不断地惨遭叛军飞机滥炸，燃烧起全民愤怒的野火。西政府为报复计，乃预备派遣飞机去轰炸意国的各城市，使做着侵略迷梦的人们，尝一尝轰炸的滋味。

西政府果然实行此举，虽只以为欧洲和平之刺激，但是“以牙还牙”的办法，无疑的，定能博得广大的同情与喝采。

（原载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上海《文汇报》）

小丑口吻

“最后手段”、“武力对付”一类字样，是日本外交家所惯用的词令，这次重光葵又照样向李维诺夫如此表示，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

照例，苏联既不允撤兵，态度又如此强硬，日本“对付”的“手段”应该拿出来了，但事实竟不然，东京还是忙着开会，军人和报纸的嚣张空气，反低下去了！

很庄重的外交术，显然已变成小丑的口吻。

（原载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上海《文汇报》）

孤军绝食

四行孤军绝食事，不仅上海人个个关心，全中国没有一处不密切注视着。我们姑不论孤军过去之光荣历史，即就人道立场言，此事亦应早日使其圆满解决。

过去若干月间，工部局始终能保持第三者的公正立场；全上海的中国人，亦没有一个不谅解工部局的地位。这种圆滑的关系，应永久维持，切勿在无事中生许多波折。

上海市民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中国人，中国人的同情，是租界秩序与繁荣最可靠的保障。这一点，是工部局最应认识的。

（原载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四日上海《文汇报》）

火 与 过 火

对于长沙大火，汪精卫先生又发了一大篇谈话，说得的确有情有理，但看了还有些莫名其妙。

记得在芦沟桥事件后，汪先生也曾发表过一大篇谈话，竭力主张焦土抗战，其中“必使敌人竟无所获”等警句，到现在还深深使人感动。

长沙大火的错误，在时机未至最后，而所焚者又非完全为抗战所必需，中央大员如汪先生出而纠正，当然是应该的，但如仅凭意气，根本否认焦土政策的重要性，那不仅死了的鄧悌不会心服，就是一年半以前的汪先生自己，也不会相信这是持平之论。

长沙放火与汪先生的谈话，同样是犯了“过火”的毛病。

（原载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海《文汇报》）

平沼之当头棒

日军部将削减五相会议职务，代以“兴亚院”处理一切“事变”，这是军部对平沼内阁的第一下闷棍。

所谓“兴亚院”，本是军部借对华事件之名，以攫取外务省权力的一个变相组织，宇垣就因此拂袖下台的。“兴亚院”的总裁就是板垣。

这一改变，日内阁真个是成为个傀儡了。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二日上海《文汇报》）

汪与吴佩孚

汪兆铭过去是所谓党国前进，吴佩孚却不过是一个旧式军人，足迹未出国门一步，更谈不到有什么新认识，但其不屈不挠，抱定匹夫不可以夺志的精神，实在值得人们钦佩。

曾记得石友三说过：“忘八蛋再做汉奸！”可见汉奸不是人做的，吴佩孚要做人，并且要做一个中国人，任你利诱威胁，决不愿做万世唾骂的傀儡，近且备棺身旁，宁死不屈，以视汪之中途自毁，倡议屈膝，其人格之高下，真不可以道里计了。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上海《文汇报》）

失足恨

上海若干电影从业员，摄了一部“茶花女”，想不到大家看错了题目，做了“失足恨”的主角。

看了东京方面的肉麻捧场，不知李祖莱等将起什么感想？假使良心不减，一定会觉得有些酸溜溜热辣辣。

在此时代，大家要把眼睛睁开些，满地陷阱，一不小心便堕落下去，永世受人唾骂，翻不了身。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八日上海《文汇报》）

多此一问

据法方指陈，安南所以禁中国军火通过，是因为日本答应不侵占海南岛。这样说来，法国今后对于日本“诺言”值几个钱，应该很清楚了。

现在法国忽又向日本询问：究竟侵占海南岛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这个问题，问得很滑稽，假使日本又来一次“诺言”，说保证此次侵占是暂时的，法国就可以深信不疑了么？

时至今日，只有决心应付，再不可空言发问坐失时机了。

（原载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三日上海《文汇报》）

喜神方？

往年此日，有些人都要看看历本，朝着哪一方向走动走动，说是迎接财神喜神。

今年此日呢，上海四周是铁丝网，无论往那一方面走，最后所遇着的，一定是魔鬼！

（原载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九日上海《文汇报》）

新艳秋不朽！

新艳秋女士图刺汉奸缪斌，虽功败垂成，终以身殉，事实上已写了最有声有色的一幕了。

在旧剧中所看到女英雄，如“刺虎”之贞娥，“刺汤”之雪艳，已流芳千古了，但新艳秋却比她们更伟大，前者只是殉主，后者则为全民族雪耻除奸，同一牺牲，意义显然更庄严了。

新艳秋之死，不仅为一切艺人增了许多光彩，同时在百鬼昼行的北平，也添了一股浩然正气。

（原载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上海《文汇报》）

第二輯

慰勉文化前线的战士

日方于军事进攻失败后，幻想对我作“政治的进攻”，散播“和平”毒素，制造投降理论，企图松懈我们的抗战情绪，麻醉我们的沦陷区民众，以实现其“以战养战”甚或“不战而屈”的迷梦。它选定了上海作为“政治进攻”的大本营，谣言，恐怖，威胁，利诱，一切阴谋，都以上海为出发点。汪逆兆铭，正是它最驯服最卖力的一个助手。自从他由东京回上海后，仰承×方特务机关的意旨，利用大量的老头票和新式的手枪、炸弹，向上海文化界进攻，一面收买，一面恐吓，种种卑鄙无耻的举动，无所不用其极。在这手枪与老头票的交织下，把孤岛文化界陷入了重围。也正惟如此，愈显出我们文化战士的英姿。

上海现有五百万同胞，她虽变成孤岛，依然不失为东南的中枢，在××昼行的江南沦陷区内，她又是唯一的灯塔。二十阅月来，×人千方百计，要攫取这片干净土，消灭所有的正气，终因我五百万同胞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沉着苦斗，冲破了一层层的难关，把营阵始终扎得齐整巩固，使×无隙可乘。讲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感佩上海文化界认识的正确，领导的得宜。先就我们同业来说，在京沪失陷之初，几个有力报纸，已因义不受辱而迁往内地服务；继续出版的，有的装聋做哑，有的竟投身×人的怀抱，此外汉奸报纸，风起云涌，妖云惨雾使孤岛同胞，一时陷于迷惘彷徨之境；所幸有几家同业，马上以英勇的姿态，挺身而出，填补了过去的岗位，领导前进。手枪，炸弹，手臂，毒水果，种种威胁，终动摇不了他们的奋斗精神。他们供给民众以丰富的精神食粮，宣导政府的抗战意旨，尽了他们应尽的责任。教育界也是一样的苦斗，×人汉奸，时时想插足租界，操纵收买各学校，以

传播他们的奴隶思想，推广其“王道”教育，但我们的战士们，绝不畏缩，绝不退让，始终维持一贯的指导方针，不仅上海青年得所归宿，江南沦陷区内数十万学生，也因此得有成长充实的机会。除此之外，歌咏界，话剧界，乃至一切出版界文字及思想劳动者，过去都能把握灵魂，埋头苦干，在×人的铁蹄下，在茫茫的黑暗中，散播民族复兴的种子。我们这一次统战，是全民族向侵略者争取独立自由的战争，“条条路通罗马”，每一个国民，只要守住岗位，向正确的路线前进，都一样是为大时代尽力，最后大家必能在胜利的终点携手凯旋。上海文化界虽在×人后方，实际等于在最前线与×人汉奸短兵相接，过去肉搏的战绩，已在抗战史上写下光荣的一页；今后应该格外努力，沉着奋斗，把这一页光荣史写得更有声有色。

近来上海的空气，显然比以前更郁闷，环境一天比一天困难，×人的手枪、炸弹失败了，“大道”、“维新”等汉奸的金钱收买失败了，现在，却出现了一个丧心病狂的汪逆，他以最恶毒的手段，广布爪牙，多方进攻，先收买各报发行人，从釜底抽薪，消灭几家最前进的报纸；消灭不了的，便恐吓，××，甚至大规模的袭击。对于教育界，则从收买败类入手，想把这些学校团体渐渐变质。同时对于各前进青年，及有力出版物，更多方分化攻击，恫吓危害，想把上海文化界一网打尽。他那种手段，可以说狠毒到极点了，但看看我们的文化营阵怎么样？他们虽然失了几个营头，但整个阵容，依然坚实，稳扎稳打，绝不丝毫动摇。

这种斗争，当然是艰苦的。环境的束缚，汪逆的进攻，必然一天比一天厉害，但我们相信，我们这一支孤军，决不会因此气馁退缩，因为上海五百万热情的同胞，全是他们有力的后盾，国族前途的光明，在他们眼前闪耀，他们必然会奋起更大的勇气，不仅坚守，同时还要向××积极反攻。对于这许多英勇的前线斗士，我们衷心表示感佩，同时愿供献下列几点意见：第一，目前上海文化界的现状，正是我全国抗战局面的缩影。不可否认，

有少数动摇者已堕落了，但这些败类，本来是时代的渣滓，正如汪逆等汉奸的叛离一样，不仅不能减少抗战的实力，反而因为赘瘤割除，使全体更健康了。从今以后，大家应该把力量更集中，团结互助，随时警戒汉奸的破坏离间，对于动摇分子，应无情的加以检举排除。第二，过去战略的失败，是各自为战，是缺少机动的战术，往往因逞一时之毫气，而浪费了许多不必要的消耗，招致环境的磨擦。今后要认清我们只有一个×人，我们只有一个方向，绝不可再拉长战线，自增困恼。第三，上海过去是全国经济中心，同时又为各党各派争逐之地，文化界也不免染有商业气和门户之见；抗战以后，面目一新，但过去的暗影，还时常反射到文化界的浮面。我们要认清这一战关系的重要，坚定“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信念，尤其在×人汉奸的×××，应该放弃一切自私和成见，否则不仅动摇整个阵线，对本身尤为自杀与毁灭。

我们谨向前线斗士致敬，我们也是总动员下的一员，所有全国文化战士，大家都在分头创造各种殊途同归的战绩，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必然能在最后胜利的终点，欣然握手了！

（原载一九三九年八月九日香港《大公报》）

三国同盟与中国

德义日三国同盟成立后，我们曾就国际一般大势，发为评论，略述大体的轮廓。兹再以中国的立场，从客观的眼光，试为论列如次。

一、德意日三国同盟协定，自表面上看来，虽然日本好似得到一些德意援助的声势，实际上它依然两手空空，并无所获。而且到了今日，已完全证明三国协定的订立，德国是主动，日本是

被动的。日本虽然属于被动，但从此以后，却增强了对英美敌对性，同时逼成英美在太平洋联合的事态，此在日本方面并没有得到什么，日本显然不很合算。而日本在协定所交换得来的，不过是协定的第二条规定：“德意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之领导地位。”这样的规定，不过是一句空话。德意在今日对英屡战不利的时候，它有什么余力，管到远东的问题。要知道德意在远东，并无利益关系，在中日战事之前，德国对华贸易会曾到过第三位，商务上有相当的关系，但此项关系，自“七七”以后，而逐渐减少，自欧战发生，而完全消灭，意大利除了平时有几条商船往来外，在远东经济市场上，根本没有它的地位，日本纵然得了这两位无赖朋友，在建设所谓“大东亚新秩序”上，究能得到些什么？在我们看来，真是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即。

二、近卫在三国协定签字后，广播演说称：“中国事变，已历三秋，迺来性质益复杂，解决益困难。中日纷事，乃世界旧体制下东亚之‘内乱’，解决之道，必对世界旧体制之矛盾，予以解除。”这一段话里面，近卫已然明白承认解决“中国事变”益臻困难，因而借重德意建设“欧洲新秩序”的机会，妄想以德意之力来帮助她解决“中国事变”，其实说穿了是渺茫得很。因为日本对中国，这三年来侵略的手段，是军事政治经济的三个方向，这三个方向，过去三年，均一一尽情尝试，但莫不遭遇强大的阻力，而终归失败。我们相信，此种胶着难进的情况，在三国协定成立以前如此，在三国协定以后，亦不会变，换句话说：便是所谓三国协定，并不能增强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力量，同时亦不能削弱中国抵抗侵略的力量。而反之，中国全体人民，因为德意日构成了侵略集团，无理的向素无恩怨冲突的中国，横加不尊敬的侮辱行为，唯有一致奋发，咬紧牙跟，对目前国境内的侵略者，搏斗到底，直接的打击日本，间接的打击德意。

三、我国对于侵略集团之德意日三国，漠视中国地位，希图

加以摧毀的行动，凡属真正有民族意识的人民，自然会感到愤怒与痛恨，我们虽然很明白三国协定，于抗战军事，没有什么影响，但对于此种横加的侮辱，断然不能承认，不特不能承认，还要准备雪耻。关于政府的态度，前日外交部王外长发表的谈话，极为明朗坚定，王氏谓：“中国政府素来之目的，在维护合法之国际秩序，使世界各国，均能以平等地位，友好相处，对于一切以‘新秩序’为藉口而实行侵略破坏世界合法秩序之行动，中国政府必按照过去一贯之政策，予以坚强之反对。中国政府与人民，决定继续为世界合法之秩序努力奋斗。中国政府决不承认所谓‘大东亚新秩序’，尤不能承认日本在所谓‘大东亚’之‘领导地位’。他国彼此间所签订之约章，不但不能影响中国的法律上之地位或权益，亦决不能丝毫影响中国政府之态度与政策也。”这项措词，强硬坚决，极为得体，足以代表国人的意思。因为中国的一贯方针，是正义与合法，对于假借“新秩序”之名，而肆行侵略之实的国家，我们当不计利害，不惜牺牲，为自己，为世界，奋斗不懈，以获得合法秩序之存在，为最后胜利之目标。

四、中国与侵略者苦战三年余，直打到三年二月有余，始把中国对日战事范围，延长至于第三国越南的一角，现在因三国协定的订立，又硬把中国逼到与英美共利害，今后英美对华关系，只有更加亲密，所以从此点言，三国协定的缔结，于中国抗战只有利而无害。但是我们趁此时机，愿贡献两点意见：

（一）中国今后对于军事，更应积极准备，布置总反攻，因为日阀正注意南进，又与英美磨擦加紧，顾虑至多，此时断无向我取攻势的可能，我们应利用此时机，作总反攻的规划，就需要的人力物力，以及军需用品，加紧设法准备。

（二）在战争时，外交是相辅而行的一个重要决胜点，试看欧洲战事发生以来一年余中，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外交战的事实。我国外交，过去三年中极少活动，即有之，亦是过于呆滞，不够活泼流利，及随机运用，这样，显然没有能够适合时代的需

求。今后外交当局，应痛切反省，力盖前愆。

我们认为在目前的阶段中，形势绝对于我有利，德意日三国同盟的成立，并没有发见足以削弱我国抗战的力量，于我抗战政策及信念，亦未能丝毫动摇，而同时英美对远东的态度，却渐形积极，迥异往昔。中国打到今日，方被三国逼到与英美共利害，这是抗战的一个重要阶段。深盼政府当局能抓住时机，善为运用，加紧从军事外交两方，努力前进，以期求到达胜利之途，勿泄沓，勿因循，勿自满，勿松懈，相信成功基石必愈坚稳，可断言也。

（原载一九四〇年十月三日香港《大公报》）

文化食粮亟须调整救济

现代战争是有全体性的，就是要综合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及各种力量而尽量利用之，方才可以和敌人周旋求胜。自从第二次欧战发生，交战国双方都在努力发挥全力战的能率，作生死的搏斗，其中主要的枢纽，尤在于科学之竞赛，工业之争雄，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最值得发我们的深省。

试看以英国文化之高，科学之发达，到了今天还要计划设立“科学局”调整及鼓励各方面科学之研究与发明，而将研究成果，提交首相实用，这可见科学的重要性。再者中国与日本打了三年仗，我们凭着广土众民的先天优越力，重以上有伟大绝伦的领袖，下有斗志火炽的民众，方能撑持至今。然而，显然的我们的科学落后，实为战争上最大的弱点，而以日本数十年提倡科学之成效，至今仍感缺陷，因此近卫内阁最近尚要设一综合科学院将以二万万至三万万元的建设费和五千万元经常年费的巨资；

从事科学研究之充实设备，这一点愈益可以促起我们的警悟。

反观我国，不但科学研究，够不上说有宏大的规模，即普通的文化食料的恐慌，到今日已是与日俱进的进展，而一般人似乎还不甚重视，这是非常可虑的一件大事，我们现在姑且不谈科学研究，惟愿提出最紧急的文化食粮普遍恐慌的问题，唤起国人的注意。

查我国自来出版力量，即非常微弱，在抗战中逐渐受着汇兑与物资的影响，更形衰萎不堪。在出版物的生产量上，自然是极度的低减，而质上尤为十分的单调。就出版业的自身言，自不能不顾到成本与销场，于是文化食料就这样的由紧缩而极度的消沉下去了。我们不能推诿为战争中应有的景象，建国工作，千头万绪，无不需专门知识与正确精详的参考资料，这差不多是不能责之于出版业的自身，应当是由政府去提倡和资助的。这事并不十分艰巨，所需的资金也并不是高额，只须发现了它的必要性，便很容易奏功的。

出版业的原料是仰给于著作人，但是现在的编译著作方面，也是十分的萎顿，纯粹靠写作谋生的，在现在如果不真正的流为文丐，继续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版权脱售的价格每千字与战前无异，而售出且远较为困难，版税虽可以随书价增进，但书价的增涨显然较物价的增涨为低，而销场又不旺盛，愈专门而质量愈高的书愈是滞销，而版税结算之期又远不济急，所以现在事实上除了兴趣的和副业的以外，文化食粮的生产可以说是极度的恐慌。我们也知道在这样的经济物价情形之下，根本的改善是不容易做到的，但长此推演下去，民族文化建设便根本成了问题。

国民的教育和一般知识的增进，并不能单靠学校，而学校中的师生，亦不能只靠教材，便能达到自修的理想阶段。所以适应的读物，对于他们以及一般大众都是十分需要的，并且有日新月异的读物，也可以无改革社会许多的不良风尚而使读者的口味兴趣日趋高尚，以代替其一部分低级兴趣的娱乐。至于在被占领区域以内的文化大众，与前线士兵及工作人员，对于一般的文化食

粮的需要，尤为殷切，这在质与量上都差得很远，并且又缺乏有系统的组织，这都是目前从文化立场与抗战立场上看不可轻视的问题。

我们以为在此时，政府对此问题当密切加以考虑，以大规模切实而易行的方法，来大量的充实文化食料的生产与出版，在这里似乎可以与经济建设相同，来一个文化建设的公债，吸收游资以从事于各种文化事业，一方面既可救济失掉生气的文化著作出版界，他方面亦可以轻减无归宿的一部分游资在社会经济上的作祟，即以这等资财来补救及发展文化事业，既可使从事出版的人，可以放手迈进，而从事于文化工作的人，亦可以激增其工作的兴趣，以免其逃避于追逐工商暴利的园地中，这不啻从事业上保障了不少已经成熟的可宝贵的文化人，而同时文化食料的恐慌问题，亦可以迎刃而解决了。

现在虽是海外交通困难，但无论从哪一方面，这外国书报的输进，事实上并未成为问题，不过受着汇价与销路的阻碍，所以流进不旺，而国人对于外国语素养的缺乏也是其原因之一，欧美各先进国文化食粮已是席半履厚，尚且对于新出版之国外著作的翻译，非常活跃。而我国对比事自来即缺乏有系统有魄力的努力，在抗战期中尤为黯淡，我们以为国立的编译机关，对于此事应当高瞻远瞩的加以分外的努力，不当只囿于目前教材和参考书的问题中，或只是被动的以销路为标准而工作，应当采选有价值而为一般读者所不易购得的作品迅速从事移译，这种人弃我取的根本工作，实在只有由国立的机关去从事，方能针对需要，以补出版业的不足。

总之，我们许多有形的财货问题，固然亟待调整，而这种调整事实上是不困难，且易收功，而对于文化建设的前途关系，又是非常之大，所以盼望政府不再漠视，立即着手！

（原载一九四〇年十月五日香港《大公报》）

美国人今天怎样抉择

今天是美国大选日。全世界的人们，无论在远东，在欧洲或在苏联与南美，都把目光注视着这次美国选战的结果。侵略同盟的国家，对于这次选举的关切与彷徨，恐怕尤将较任何国家为甚。我们从这次选战的本身来观察，觉得它的意义重大，既不是一九二八年胡佛对史密斯的竞选所可同日而语，就是一九三二年罗斯福与胡佛二人在金融大危机当中的竞选，也不是相喻于什一。惟其如此，所以直到选战举行的前夕，民主与共和两大党仍维持着均势的巅峰状态，任何权威观察者，均不敢轻率作胜负的推测。这慎重的理由，是很容易明了的。第一，国际间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严重的转折点；第二，三任联选，将开创美国政治史上一百五十年来的新鲜纪录；第三，美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动向，现在已临到一个重大的歧途。所以一般的态度，对此不得不格外慎重。从美国外交政策的角度去观察，美国今后四年中的白宫主人，无论是罗斯福或威尔基，或许不会有重大的分别，但从内政上观察，罗、威二氏的孰胜孰负，却具有重大的影响。因为这次的竞选，归根结蒂，是一个集权制与分权制的斗争，同时又是资本巨头与“新政”的斗争。这次选战的结果，将要支配美国今后几世代的命运。关于这一点，关系重大，特别需要美国人民常识的抉择；换一句话说，这也未尝不可以看作美国人民的常识测验。

关于美国大选问题的检讨，我们的态度完全是客观的。我们具有一张白纸的心情，我们更具有旁观者清的优点。这四五个月来，我们综观美国的竞选运动的过程，觉得罗斯福总统的形势，是相当不利的。第一，美国的竞选运动，拆穿了说，带着很浓厚的宣传和表演式的气氛，它完全诉诸群众的心理。在这广播事业

发达的今天，演说更成为竞选的必需技巧。这次威尔基竞选，在三四个月间，作三万里的游行，亲历三四十州，演讲五百次，听众达一千三百万人。在雄辩所留的印象下，影响自必可观。而罗斯福则羁于职责，除最后数周，在东部重要城市，发表若干次演说外，未能充分利用机会。两人相形之下，罗氏于竞选上，自不能不受相当影响。

其次，从政党方面比较，在本年六月以前，共和党虽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下，但自共和党费城大会以来，该党本人才主义，推选出一个原隶民主党籍的威尔基氏，出任候选总统，全党态度，已趋一致。加以共和党在野八年，对于此次选战，实操有必胜的决心。反观民主党的阵容，则嘉纳与法莱对罗斯福氏，先后难贰；代表农业利益的华莱斯氏之被推为副总统候选人，完全出自罗斯福个人的决定，曾引起党中资本界巨头的失望。加以“新政”与“第三任竞选”问题的争论，使得党中的若干首领，甚至站到反政府的地位。因此种种，民主党竞选的实力，颇为发生问题。鉴于一九三八年民主党选举结果的挫折，这种颓势，实有挽回之必要。

第三，最近美国工运领袖约翰·李维斯氏的拥护共和党，不无令人兴奇异之感。按美国的劳工运动，现分两大壁垒。李氏所领导的工业组织委员会CIO，是五年前一个新兴的劳工团体，拥有会员四百万人，其势力已赳赳超出原有的美国劳工联盟A.F. of L.以上。工组委会本来拥护罗斯福政府，这次李氏态度的转向，在竞选运动上是件可注意的事实，尤其因为这次选战的胜负，将取决于工业各大州的态度。

第四，舆论界的态度，对于竞选影响的重大，是无可否认的。一九三二年胡佛竞选的惨败，曾受到舆论界的影响。当时“华盛顿现形记”Washington Merry-go-round一文的连载发表，使胡佛蒙受了致命的打击。这次威尔基竞选，有霍华德报系的拥护于前，更有“纽约时报”的影响于后。而威氏竞选参谋

本部中的智囊人物，更有前任“幸福”杂志的主编台文波氏Russel W. Davenport和美国外交协会的国际问题专家蒲尔氏Raymond Leslie Buell，赞筹帷幄。这对于罗斯福，显然是一种威胁。

最后，罗斯福的主要敌人，还是反对“新政”的美国资本界的巨头。他们和罗氏统制经济的主张，立于不共戴天的地位。共和党的主张，是他们的主张。共和党的候选人威尔基氏，倘令膺选，虽不一定会完全受资本巨头的发纵指使，但在原则上，威氏却是他们的代言人。罗、威二氏竞选的精义和症结，完全在此。罗氏挟着“新政”的主张，和势力雄厚的资本界斗争，这不能不视作艰巨的工作。况且从心理一方面观察，美国人的国民性，厌故喜新，习于自由民主的传统，在此非常的国际情势中，能否熟权利害，以严肃沉着的态度，作一个划期的决定，还有待事实的证明。

上述几点，与其谓为揭发罗斯福的弱点，毋宁应看作阐扬罗氏人格的伟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是我们习知的事理。树大招风，才大遭忌，又是社会上普遍的现象。倘使罗氏是个平庸的人物，他也许不会引起这许多的反对力量。我们不否认威尔基的才具和人格，但威尔基在世人的心目中，充其量只是一个“未知数”。他除掉是一位相当成功的律师、银行家和公用事业的巨擘之外，他在政治上，是缺乏经验的。更看他的竞选政纲，除掉承袭民主党的外交政策，以及“新政”受普遍欢迎的部分外，究竟有什么独特的主张，世人到现在还未发现。反观罗斯福氏，我们虽不讳言他在财政或其他方面的失败，但罗斯福无疑的是一位饱有政治经验和眼光远大的巨人。他在外交上的措施，尤其是近几月来对于欧亚时局的种种建树，已足令他厕身于历史上不朽人物之列。老实说，在极权威胁高涨的今天，最需要的是动作，现在已不是空谈自由民主的时候了。法兰西因为委靡逸豫，政府无主宰，国家无领袖，以致结果陷于万劫不复的地位。这个事实，实

足资美国的烟戒。倘使有人要把“独裁”的帽子，硬戴在罗斯福的头上，我们以为罗斯福“独裁”的程度，是和邱吉尔没有两样的。倘使英国人民，今天可以竭诚拥戴邱吉尔，做抗战的领袖，我们实在不明了美国有什么必须更换罗斯福的理由。纽约市长拉加第亚讲：“我们毋宁赞助过失为人所知的罗斯福，而不赞助德行未为人知的威尔基。”这真是一语破的之言。今天美国选战的结果，究竟如何，我们仍不能不停观美国人民常识的抉择。

（原载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五日香港《大公报》）

战争与和平

今天又是和平纪念日——纪念上次欧战的和平。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国全权代表在冈比恩联军总司令福煦将军的办公车内签署休战和约。这二十二年来，千万人的无名英雄墓前，年年此日，有人献花。去年今日，英法两国虽在战争中亦互致电文纪念。法国总统勒伯伦，更在无名英雄墓前发表演说，谓自加拿大以至澳洲，自南非以至纽西兰印度，自北非以至中非，及自马达加斯卡尔以至越南，人力与原料，均已准备竭其富源运往前线作战。比利时的国王及太子，去年今日亦往无名英雄墓前致敬，并在墓上覆以协约国（美国与波兰均在内）国旗。

今年，有资格纪念这个纪念日的，只剩英美两国了。今日法比荷波的旧的无名英雄，寂寞长卧，并已在身边添了许多新坟，然而应该不能看到一朵鲜花了。这是多么悲哀的日子！

我们承认战争不是人类的“血的嗜好”，而人人皆酷爱和平。所以遇到任何和平纪念日，除去胜利的标志而外，莫不舒臂欢迎。

然而自有文明以来，战乱之事，史不绝书。记得有某学者统计，要四年战争，才能享受一年的和平。历史的进化，不能缺少暴力。一个国家民族或一个集团要求和平，在今日还需要以暴力否定暴力。世界各种民族的存在，都是饱经血的战斗换来的。战斗不力的例如某族，已经有了四五十次亡国的惨痛。所以人类虽然爱好和平，但不能信奉绝对和平主义。

战争的动机虽然复杂，然而我们可以选择。有的战争应该反对，有的战争应该赞成。对应该赞成的战争而妄希和平，不是庸懦即必是叛逆；参加应该反对的战争，则不但无谓牺牲，而且是极端的罪恶。我们在战争中碰到和平纪念日，首先要把战争的性质分别清楚。

大家知道，战争是一种政治手段，克虏塞维兹名之为“政治的延长”。为了达到一种政治目的，不得已而诉诸战争，如这种政治目的未曾达到，则战争不继续亦必将再来。所以历史有报复，有百年战争。

以农立国的中国是最爱好和平的，我们的哲学是止戈为武。支配中国思想的三大源流，孔孟的仁义，老庄的无为不争，墨子的兼爱非攻，都不主张战争。然而中华民族，却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我们很早就有渊深的兵法，我们晓得：“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

为了“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就要起来执干戈以卫社稷。为了“生死”“存亡”的问题，绝对无和平妥协可言。

现在有一班无耻之徒，在抗战时候，倡“和平”谰言，把和平解释为投降。其实，如果没有胜利的保障，即政治目的不能达到，根本便没有和平。

我们的政治目的，是中国的独立自由与解放，这种政治目的，是历史的要求，是全体人民的要求，又是国家的要求，为这要求，我们人人应该缴纳血税，在这目的达到以前，我们只有战争，没有和平。

一年战争可以决定十年的历史。每次战争，都是历史转扭的关键。因此，无论任何国家，对于战争必须谨慎将事。为求战争的胜利，需要忍耐，拿破仑说：战争的胜利，在于最后五分钟。在这最后五分钟未到之前，侈言和平，则为出卖民族，罪在不赦。

当然，血的俭约是要考虑的。因为战争最后的目的，还是在和平。

今天是和平的纪念日，然除英美而外，这和平的纪念日，已被历史报复了；现在德国的和平纪念日是六月二十二日了。六月二十二日法国的全权代表，亦在冈比恩希特勒的车内签署了停战协定了！

我们的和平纪念日在哪里呢？甲午之战，李鸿章在日本的下关签字，我们希望这次的中日战争，要近卫到我们的下关签字。

（原载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一日香港《大公报》）

春寒料峭

香港的所谓年景，跟着爆竹声的沉寂，也逐渐冷落了，但酒楼舞榭，还是那么人山人海。太平洋的寒浪，这几天正向这歌舞喧天的小岛袭击，有钱有闲的人们，当酒醉兴阑之余，从高楼大厦中踏上街头，即使多加一件外衣，也要打一个寒噤。那时，他们也许会涌上一些诗意，说是“春寒料峭”，或者竟直觉到“春寒袭骨”了。

在这岛国上久居的人，对于寒冷，本来就很难认识，就是从北方来的侨胞，经过这里几度暖冬的拥抱，也渐渐把冰雪朔风等严肃的面目淡忘了。不是么？这里冬天可以开电扇；可以喝冰

酒，就是这几天，虽说是“春寒料峭”，在屋里还是一样温暖，绝不会感到缩手冻足；不要说长白山、大青山一带零下几十度严寒的程度，无法想象，就是长江流域一带的高原寒浪，也决非这里四五十度的春寒所能比拟的。这里偶然有些“春寒料峭”，人们的感觉上便有些异样，祖国几百万战士，却又在冰天雪地中，度过一严冬，而现在还正和袭骨的春寒相搏战呢！

自抗战开始以来，我们的英勇战士，一面时时与侵略者作战，一面还刻刻要抵抗严寒。因为我们还没有充足的重兵器，飞机、大炮还不能作主要的作战工具，所以主要的战线，迄今仍以崇山峻岭为背景，而南北数千万游击战士，更多以丛山为出没根据；如东四省及热、察、绥一带的塞外高寒，山巅有终年不化的白雪，真是滴水成冰，堕指裂肤，而我们的战士，始终在这些区域活跃战斗，使侵略者不遑宁处。再如晋北之五台山、晋南之中条、太行、吕梁诸山，豫鄂皖一带之大别、桐柏、大洪诸山，以及赣湘一带之九岭、幕阜诸山，那一处不是经过侵略者不断的围攻，而经我战士的不断歼灭，终于成了保卫我复兴根据的铜墙铁壁！

处身海外热带的人们，哪里能想象到前线将士的苦痛！在这“世外桃源”托足的人，有时看到报上的战讯少了，便会说战局“冻结”了，并发生疑问：“我们为什么不总反攻？”其实，我们前线的战士，哪一地、哪一人曾停止过战斗！绥西最近经一月余的奋战，才把进犯黄河西岸的日军打退；苏浙边境的合浦、宜兴、长兴一带，最近曾歼灭日军数千，恢复了原有的阵地；豫南、鄂北、皖北一带，日军最近又发动大包围战，在大别、桐柏、大洪三山脉间分股进犯，企图围攻我野战部队，肃清平汉路南段的威胁；经我军英勇迎战，将其逐股包围消灭，战事才又转入于我有利的阶段。这些捷报，一笔一字，都是我们的战士以鲜血写成的；其他各战场，也无时不出击奋战，积垒小胜。他们在袭骨的春寒中，何尝有一刻的休息！我们在海外的侨民，听到日

本正抽调军队，准备大规模南进，以为它真要“冻结”在华战事；其实，它何尝一日放弃进攻的企图？而且在我军的各方袭击下，也不容许它停止消耗，停止伤亡。至于我军的总反攻，当然不是象说一句话那么简单，我们在后方加紧训练战士，充实武器，没有一天不加紧作总反攻之准备，目前各战的出击，尽量削除日军侵占点线的枝叶，也就是进行总反攻的初步工作。我们固不应因战局稳定而松弛奋斗的情绪，也不能因内外局势刚转入有利阶段，便忘了最后胜利必经的过程，更不应忘了战场现实的情况，而高喊漫无边际的口号。我们的统帅部，始终遵照预定的步骤，培养实力，争取主动，向总反攻之途程迈进；我们前线的战士，虽在严寒积雪下，也从未一日停止出击；我们无日不在胜利中，我们每一天都向最后胜利走前一步。凡是留心战报，留心国内抗战实况的人，决不会相信战事会“冻结”，或有“冻结”可能的。

天寒思战士。在海外的人，这几天也感到春寒料峭了。我们要想到，前线的战士，无时不在十百倍这样寒冷的环境下冲锋陷阵，争取胜利，争取我们民族的生存自由。我们要知道，我们后方能安如磐石，胜利基础能日益巩固，固赖前线战士四十余月之不断苦斗；就是西南太平洋所以能迄今密云不雨，我们侨居海外的同胞，迄今还能苟安生活。而且因为国际地位的增高，不仅能抬头见人，且受国际之尊敬，这些一饮一啄，哪一样不是前线战士所赐？

在这春寒料峭中，我们要想到前线将士的痛苦，因而要反省：我们自己对国家尽过什么力？对神圣抗战有过什么贡献？□□□□□，□□□□□？战士的春礼，送过没有？战士的家属和荣誉军人，是否已尽力安慰□□□？假使没有，我们便应该□□□□□□□，以弥补良心的惭疚了！

（原载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香港《大公报》）

维希当局严重的试验

法德谈判，自从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停顿后，因法海长达兰三日在巴黎和拉伐尔及德代表亚培兹的会谈，又重新展开。综合这几天外电的报道，会谈的结果，维希内阁闻将彻底改组；前副总理拉伐尔将重新入阁，执行所谓“法德协定”；据传德方的要求，是想违背休战条文，使用法国的舰队和北非的法国海军根据地，来打击英国；并传德方这次的要求，具有最后通牒的性质。维希内阁，已于五日开会，听取达兰的报告，以便作最后的决定。在这德方鼓吹采取春季攻势的声中，维希当局又受到了严重的试验，这对于欧局的前途，当然有很重大的影响。

从这次德国的要求来观察，我们对于希特勒手腕的毒辣，真不能不表示惊叹。希特勒在他著的《我的奋斗》一书里，曾经说过：“一个聪明的征服者，向被征服者提出要求，最好分次进行。因为一个自动投降的国家，他的国格是已经丧失了，对于一个丧失国格的国家，你可以断定，再进一步的压迫，也不会重新引起他的武力抵抗”。希特勒去夏在刚比恩与法方签订休战协定的时候，先用貌似宽大的条款，迎合法方苟且偷安的心理，骗令贝当，吞服他用糖衣包裹着的毒药。然后再慢慢的宰割法国的膏腴，掠取法国的资源，剥夺法国的民食，驱逐罗兰的居民，逐步压榨，愈迫愈紧。他明知在签订停战协定的时候，法国对于呈献海军和殖民地的条件，一定不能接受，所以宁可置而不谈，甚至给法方以毫无信用的担保。直等到屈降半年后的今日，时移境迁，再利用甘心做鹰犬的拉伐尔，来逞其一击。这种毒辣的手腕，真不愧为绝作。

在德方严重的威胁下，最可注意的是维希的反响。贝当去夏

不恤一切的牺牲，签订辱国的条款，在他藉以解嘲的，只有一句话：“法国虽然丧失了五分之三的领土，还是能够保全国家的统一。”但是我们知道，这句话是自欺欺人的。法国有形的丧失，是五分之三的领土，无形的损失，是国家整个的精神破产。希特勒加诸法国的条件，蓄意在永久控制法国，叫它没有翻身的可能，它比法国从来在历史上所签订的和约，全来得刻毒。到了今天，贝当对于希特勒的要求，倘使拒绝，立时就有领土全部被占的危险；倘使勉强接受，那末希氏得寸进尺，要求将无止境，经过一摘再摘之后，法国的命运，也非覆亡不可。但是在这左支右绌之中，法国果然是无一线的生机了吗？环顾欧洲的现局，德国对于巴尔干和英伦，都有相当的戒心，不敢冒昧。而希特勒的轴心伙伴墨索里尼，近来更到处碰壁，已濒于崩溃的边缘，弱小如南斯拉夫、土耳其等国，现在的态度，也比较以前坚定。在战前厕身于一等强国的法兰西，到了今天，反要向希特勒再度屈膝，这真有些说不过去。法国强大的陆军，在今天虽然已形同消灭，但是它所拥有的海军和殖民地，迄今还受到希特勒的重视，倘使它再把这两件法宝，轻易的呈献给了希特勒，那末希氏现时对于法国所表示的表面尊敬，也必将一笔勾销。所以再度的屈服，对于法国是最不利的。法国的海军，迄今尚无严重的损失。法国在北非的殖民地，在魏刚将军的统治下，也具有雄厚的力量。所以在目前替维希当局打算，最好是下毒蛇噬指、壮夫断臂的决心，在希特勒的威逼下，索性率领现有的舰只，迁都北非，以表示坚决的立场。这样一来，法国的领土，纵被全部占领，法国的民气，必然重见刷新，法国海外的殖民地，也必将一致拥护。这样一来，纵使法国不帮助英方作战，也不难获得其他民主国家的同情。法国当局应该根本的明了，法国将来的命运，是系在民主国家最后胜利的上面的。惟有轴心国家失败，它方有翻身之日。在目前欧局千钧一发的时机，它倘使用舰队和根据地去帮助希特勒制胜，这正无异于法兰西的自掘坟墓。维希当局倘使要这样做，

真可谓其笨无比。

最后，假定维希当局对德屈服了，结果又怎么样？第一可以预料的，地中海的局势，必然有相当的转变。我们说相当的转变，是因为其中有许多因素，现在还无法肯定，例如：希特勒是否能将法国的舰队，完全劫持？魏刚是否不反对德军的插足北非？弗朗哥的西班牙愿否和纳粹真心合作？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能否不发生动摇？这一类的因素，如果有和纳粹不利的地方，法国屈服的效用，仍然不能显著。即使它们完全于纳粹有利，结果纳粹也只能在地中海方面，给予英国以打击，还不足以解决侵英的根本问题。反过来讲，希特勒对法要求，如果胜利，他的精神，一定要侧重在西地中海，在这一个时期中，难保巴尔干不发生事故，尤可注意的，是苏联的态度。其次，纳粹的势力，如果达到西非，那末它对于新大陆的威胁，又将接近一步，使得美国可以真实的感到直接的压迫。结果美国援英的程度，必将骤然增加，海空军的援助，也必将愈形积极。在这乘除之间，希特勒对法的要求，纵使胜利，也未可以视作完全得计。总之，目前欧局转变的机括，正把握在维希当局的手中。他们的态度，不仅将关系到自身的安危，在欧局发展的过程中，也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原载一九四一年二月七日香港《大公报》）

囤积与居奇

国府前日明令公布“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二十六条，乃是处理物价问题的最新立法。该办法第二条将日用重要物品区分为五类，粮食、纱布、燃料、盐酸及其他。何谓囤积？该办法第三条指出下列各款：一、非经营商业之人或非

经营本业之商人，大量购存前条所指定之物品者；二、经营本业之商人，购存前条所指定之物品，而有居奇行为者；三、代理介绍买卖，并无真实买卖货主，而化名购存前条所指定之物品者。何谓居奇？该办法第四条规定：储存物品不应市销售或应市销售而抬价超过合法利润者，为居奇行为。该办法将以上几点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对于取缔囤积居奇是很有意义的。

物价的涨，原因有多种：侵略者的封锁，运转的艰难，生产的不足，人为的操纵，以及金融机构的欠健全灵活，均是。要治物价的病，对这些病因都须用适量的药。最要紧的一点，是先要有物；所以奖励生产与购运，应该是最主要的目标。根据这个观点，我们认为应该给“囤积居奇”这四个字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物资的分配欠均衡，是毛病，而若无物，更成了绝症，所以第一要有物。能“囤积”，证明是有物，这毋宁是可喜的现象，而“居奇”才是一种不良行为。因此，我们以为“囤积”与“居奇”应分开来看：假使生产者或购运者在使物品达到市场过程中的囤积，不能算罪；而勒索与抬价等居奇手段，必须取缔，囤积而无居奇行为者，应不被罪罚。一般所指的囤积居奇，乃是四字相连的一个名词，囤积而又居奇，乃成为一种罪行。

这一点分析，很重要。处理物价问题，第一着眼点应先使其有物，并使其源源不断不绝的有物；而不可专着眼于现所仅有的物之分配，而塞其后继的来源。在物价高涨期中，一般奸商故意居奇，甚至还有些官商以更狠毒手腕推波助澜。这群人，应受同胞的唾弃及国家的刑罚，是毫无疑问的。但必须慎防因恨恶奸商居奇之故，而对正当商人在生产或购运到市场过程中的物品，一律指为囤积而罪之。否则，势之所趋，一般商人必急急将现存物品抛售，而停止继续营运，以免货在手中而蒙囤积之罪。现在内地的情形，已多少不免有此现象。最近曾传内地农村存谷滞销，而城市缺米，就因为做中间媒介的商人一部分息了职。后方都市的粮食情形如此，则需要于日人遥远的封锁线外运进来的货

物，恐怕更没有商人去营运了。这情形，不可不防。否则，目前固然因囤积者畏罪抛售而收物价稳定之效，而营运者若因畏罪而不运不积，则几个月后，恐将有无物之虞。

国府公布的“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规定详明，一般正当商人均应拥护；惟望政府于实际运用此项办法之时，务要辨明囤积的限界，于取缔居奇之中，还要特别注重奖励正当商人的营运，以使物资来源不绝。

（原载一九四一年二月八日香港《大公报》）

希斯之出奔

纳粹副领袖希斯，忽于十日晚“神秘”飞抵英国。这是欧战发生以来，最动人而富于戏剧意味的一幕。

关于这事的经过，柏林和伦敦的报告虽有出入，但有一点很明了，即希斯之出亡，为有计划之行动，而其动机，则为反对希特勒及纳粹其他领袖之政见。我们固不必强调此事对欧洲全局的影响，但观于柏林之张皇失措，事后发表之消息，矛盾百出，足见德国精神上所受的打击，的确很大。

希斯是纳粹党的元老，一九二三年即充任希特勒的秘书，自纳粹执政后，他虽未在政治上握过大权，但实际是党的灵魂；在许多纳粹领袖中，他又是最得人望的一人。当欧战爆发时，希特勒曾公开声明，指定希斯为其第二承继者。以这样一个核心的人物，突然冒险出走，假使没有其他的政治内幕，至少可以证明德国内部的分裂，而且以德国组织的严密，秘密警察嗅觉的灵敏，以一个并无军职的人，能获得飞机，从容逃出国境，从这一点，也可见同情协助者，不只一人。假使果如柏林之宣传，希斯是患

有神经错乱者，那更不能解释他从容逃亡的一幕了！

我们上面已说过，不必强调这事对于欧洲全局的影响，因为有两个假定不能成立：第一，希特勒本人有和平的愿望，故意叫他的心腹来这一幕剧的扮演，以试探英国？或者说是希特勒的苦肉计，叫希斯来做特种工作的？这在目前的形势下，都非常识所能想象。第二，希斯的出走，将激起德国内部的反战高潮？这就希斯所居的地位来观察，也不可能发生这样严重的影响。但是，至低限度，这一幕无疑揭开了德国内部的一角，使我们知道，德国并不象纳粹自己宣传的那么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对于欧战前途，也不象一般所想象的那么乐观，那么有绝对的把握。希特勒天天说，他的意志就是全德国人的意志，为什么连追随二十年的心腹肱股，都会中道仳离？假使德国对战事有绝对把握，而内部又并无困难，则希斯纵使政见与其他领袖有所不同，亦何必冒险作此最后之尝试？德国最近曾宣传希斯一度赴西访问，而本月初希斯在明兴会接见西班牙海军部长及法西斯工团领袖米里诺等，出走当日，且曾与希特勒同时参加国会，足见他此次出奔，也并非为本身安全的必要。

这一幕的真相，也许以后将逐渐明了，也许将终成一神秘之谜。我们要作推测，应先就当前欧洲一般的幕景，作一客观的检讨。现在欧战前途，虽尚未至决定阶段，但对于德国，无论在内部或外交上，都是一重要的关头。德国进行侵略战争，已将二十个月，究竟是民众痛苦到什么程度，是否能支持扩大而长期的战争，外间不能详知；但说是毫无困难，民众毫无怨尤，这是谁也不能相信的。其次，纳粹过去对国内政治经济的一套统制办法，自然有其特点，但目前欧洲大陆，几已尽被其控占，在这样民族恩仇历史渊源复杂的大陆上，是否能绝对适用这一套方法来统制，实在很有疑问。历史告诉我们，过去许多帝国的覆灭，往往不在艰危奋斗之时，而在极度膨胀之后。德国目前的情形，正届临这样的关头。我们认为，假使希斯之出亡，是因为政见的不同

同，也许对于这些问题与纳粹其他当局发现了歧见。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外交方面的动向。我们知道，希斯是轴心的最初促成者，而苏德协定的订定，则为里宾特罗甫之拿手杰作。一年半来，希特勒一手拉住苏联，一手牵着轴心的喽啰们，虽运用有左右逢源之妙，但根本的矛盾，则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日见深刻。尤其在欧局重心由巴尔干转至近东中东的今日，德国对于苏联，一面极事敷衍，一面加紧戒备，这种情形，当然不能维持长久。结果，德国要迈开其次期的侵略步骤，对苏非有实际的让步，便要准备万一的决裂。日本军部机关报《国民新闻》，前日忽著论抨击德苏关系，谓“苏德如缔结协定，德方允许苏联在亚洲自由行动，以易取苏联较大量之供给品时，则日本必不能拱手坐视”；又说：“日本必须谨防，在‘世界新秩序’基本条件实现前，有任何外国，以片面的或投机的方式，转移领土的统治权”。日本军部，向来崇拜德国，对于苏联，近年亦力主拉拢，当此德军声势日盛，苏日甫订“中立协定”之时，忽高调防苏防德之论，至少不能说是无的放矢。日本以前曾一再鼓励苏联向中东活动，假使德国仅愿以此为妥协苏联的酬报，也不致激起日本如此严重的反应。我们虽然不能肯定说，日本此种反应，与希斯出走有何连带关系，但相互参照，至少可以看出，德国的外交策略，正在酝酿一重要变化中；而意大利的无用，日本的一再向美逆送秋波，以及德法谈话的进行，都可能是促成这新酝酿的重要因素。

国际形势的变化，本来是戏剧式的，而希斯出亡的一幕，尤富于剧的意味，它本身虽未必有重要的影响，但多少足以反映德国内部的情绪，并且使我们对于欧局的展望，得一可贵的启示。

（原载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香港《大公报》）

邱吉尔之声明

英首相邱吉尔氏，在下院作长篇报告，对欧战全局作一般之论述；尤可注意的，他对叙利亚战事，严正声明：“英国对叙利亚及其他法国属土，决无领土野心，英国之希望，为恢复法国之自由、独立与权益。”这一声明，自足以粉碎纳粹及维希之一切挑拨中伤。

自去年六月法国屈降以后，一般人均认为它此后复兴的希望，惟有寄托在英国的最后胜利上，而她的不助德参战和不以舰队资德，也正是为了维持这一线的希望；现在既和英国翻了脸，则维希今后唯一的路，就是完全倒入轴心的怀抱。维希这种做法，不啻为法国掘下了灭亡的坟墓，不但爱护祖国的法国人要痛心，就是我们第三者，也替它可惜。但是法国堕落到今天的地步，也自有其历史的背景。自从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以来，法国在政治的幕后，一向有左右两种势力的对峙。自拿破仑三世的帝政倾覆以后，皇党式微，而民主势力，日见兴起。就反映在外交方面的结果说，法国的右党，一向反英，而左党则否。一八九八年的法越大事件，是右党所引起，但幸而左党得势，不久便有英法协调之成立。至于德莱佛斯的事件，更是右党作的祟，但胜利终属左党。迄第一次欧战时，英法关系方才水乳。但在近二十年来，法国左右两派的竞争，又愈演愈烈，迨莱诺秉政，听信嬖倖，引进了贝当登台，这实在是七十年来法国右派势力抬头的第一次，益以右派首领达兰，充任副揆，于是乃演成今日维希的局面。维希当局拿“工作、家庭、和信仰”的口号，来代替“自由、平等、与博爱”，嘴里高喊着革命和复兴，而担任所谓革命和复兴工作的，却都是些思想落伍的腐败官僚，以贝当的老迈

昏庸，达兰的薰心利欲，维希的命运，今天已经注定，而法兰西前途的光明，断不会系在这班人身上。

维希的内幕如此，而和英国反目的直接因素，却是为了粮食问题。法国在屈降以前，本是个食粮丰盈的国家，但是经侵略者的剥削榨取后，人民感到了普遍的饥荒，官方不能不颁行食物证的制度。据法官方的规定，现时每人每日仅能得面包七盎斯（平时每日消费约二磅），每月得牛油十五盎斯，奶酪七又四分之三盎斯。据官方的估计，倘使没有外方的接济，到今年六月，法国非沦陷区即将有一千万人成为饿殍。美国对这种情形最关切，所以与英方商讨弛缓对法封锁，以救济法国非占领区的民食。英国对于此事的试行，前此已有首肯之意，原定在四月中旬，即有美国面粉一万三千五百吨，可以运法。但在这期间，巴黎方面突又宣布维希已与德方成立物物交换协定，德方愿以小麦、食糖、番薯易取维希的牛、羊、盐、酒、蔬菜、食油等等，因此激怒了英方，英首相邱吉尔于四月十日发表对维希封锁的激烈言词，因此双方的关系，愈见逆转，而造成了维希投入轴心的机运。

英国对于维希，自始即不愿决裂，这原因，一半是为了不愿过于激起法方的反感，另一半则是避免中德国的渔利毒计。自从达卡尔一役以来，维希的海军，仍然是不能轻视。维希现在尚有新式主力舰两艘，另有一艘亦将近完成。此外尚有巡洋舰与驱逐舰约五十余艘与潜水艇几十艘。同时魏刚统率下的北非陆军，亦有五六十万人，力量也相当可观。德国对法的策略，是一方面以利诱使其脱离英美的经济关系，一方面以威胁使其牵入战争漩涡；而英国对法政策，只要法国不被轴心利用而妨害英国的安全，对于英法关系，还愿意维持，但维希则一意想出卖自己，损害过去盟国的安全，以市好于纳粹，因此乃有叙利亚战事的发生。

从这次邱吉尔的声明，足见英国虽不得已进攻叙利亚，以免纳粹之侵入，但其心境是悲痛的，而对法国，不仅不仇视，并希

望法国能恢复其光荣命运。邱吉尔这一声明，不啻是对纳粹及维希的政治总反攻。我们相信，英国对于中东问题的处理，必将因此更见顺利，因为它已证明，英国无野心，目的只在消解本身作战的困难。

（原载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二日香港《大公报》）

从近卫到近卫

日本二次近卫内阁，于去年七月十七日成立，至前日恰值周年而夭折。日皇于昨日由叶山返抵东京后，即由内大臣木户召开重臣会议，商继任人选，旋大命即再降于近卫，令其组织新阁，如无突发变化，第三次近卫内阁日内便将成立了！

我们于苏德战事爆发之初，即判断日阁将因此而倒塌；其所以摇摇数周而不坠，唯一的原因，是找不到适当的承继人。但毕竟因为外交上所受的打击太大，内阁非加改组，无法应付面对之危局，于是乃有内阁总辞及近卫再拜命的一幕。这一幕的意义，主要的是近卫把一年来外交失败的责任，整个推在松冈身上，牺牲了松冈及其他若干不重要的阁员，然后更依赖军部革新派的力量，重创新阁，以便维持其地位。新阁的阵容，虽至今晨尚未见发表，但可以预料，法西斯的色彩，一定比前阁更为浓厚。

这次日阁改组的最大动机，是要撕毁苏日中立协定，而以松冈为这一纸协定的殉葬品。松冈于最近一周来，便已称病不出，足见他已知道迟早必被牺牲。记得松冈在莫斯科时，曾与斯大林“赌头”，以表示这张协定的必被尊重；现在，却以他的位置代替了头颅了！本来，日本多年外交政策的基本骨干，是反共协定，它所以和苏联签订这滑稽的条约，完全是因为苏德已互约

“不侵”，而又幻想苏联终将加入轴心同盟；苏德一开战，这前提便完全消失，日本的对苏关系，便完全回复到欧战爆发前的状态；日本军人，多年受反苏训练，根深蒂固；三周余来，所以徬徨苦闷，完全是因为侵华战事的无法打开僵局。正如一恋爱狂热者，多年来眼巴巴望恋人的来到，现在，安琪儿已由天而降，而自己却身陷囹圄，无法自拔；但毕竟因为早患了色情狂，同时，他的疯狂的伙伴，又不断从远处向他招手鼓励；所以，明知越狱是一条死路，也想冒险以求一逞的。最近日本统治阶级的心理状态，便完全是这样。它明知侵苏未必能占便宜，而且最后可能陷入三面乃至多面的作战，但为了多年反苏意识的驱策，而又惶惑于“黄金机会”之稍纵即逝；苏德战事愈激变，它的心理愈怔忡不安。这次内阁的改组，显然完全是为外交关系，特别是为对苏，否则，如专为充实阵容，则不必作全部改造的姿态。我们仅可断定，近卫新阁成立后，纵使不立刻北进攻苏，但必然将进一步作北进之积极准备，与纳粹加紧勾结，而割断苏日协定成立后的变态关系。

其次，日本今后对英美的关系，是否将因内阁改造而有所变更呢？这次的政潮暴发，重光葵方在由美返日途中，因此一般忖测重光将继任外相，又因重光素被称为“英美派”，遂以为日本对英美政策，或将有所改变。现在，新阁人选尚未发表，重光是否入选，尚不可知；但无论谁继任外相，日本对英美关系之不能根本改善，那是铁一般的事实。就世界大势看，侵略与反侵略之壁垒已划然分明，所有反侵略的国家，决不会再对任何侵略者作安抚或绥靖之行动，而且英苏已结成同盟，英美态度绝对一致，日本此时假使想与英美妥协，目的无非为加紧侵华或遂行北进，而这两项步骤，最后都间接危害英美的地位。我们可以说，假使在三国同盟订立以前，甚至这次苏德开战以前，日本如改组内阁，作亲英美的姿态，英美一部分人士，或者会上当；现在，形势已绝对不同，英美外交，正头头是道，绝对无饮鸩止渴之必

要。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次日阁改组，即使重光上台，也不过想做些烟幕的工作，以松弛反侵略国在远东的密切联系。而在大局的逻辑发展下，实际上不会有什么结果。相反的，就是白鸟一类的人继任外相，也未必能说明日本马上将作大规模南进。总之，日本今后的对外侵略动向，必然是加紧准备北进，而一面在越泰巩固其控制力量，以牵制英美，并隔离民主势力在远东之彻底合作。这是日本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任何人上台都是一样的。

至于日本的对华政策，当然不会因内阁改造而有所改变，日本从侵华以来，已换了六次内阁，局部的改组还不算，但其对华政策，则始终如一。这因为征服中国是它不变的国策，同时，中国的坚持到底，愈战愈强，也使它无法拔出泥足。所以，单就中日问题言，我们对近卫之下台又上台，实根本不予注意。因为我们不怕打硬仗，不受任何诱胁，任何敌人站在台前，我们一样是打，打，打，直到最后胜利的来临。我们四年的抗战，已把日本打成强弩之末，今后它无论北进或南进，而其根本的命脉，依然操在我们手里。

《纽约时报》在我国抗战四周年日撰文纪念，说将来民主各国代表，必将齐集芦沟桥上，奠立“民主新生地”之纪念碑。近卫是侵华的祸首，是破坏世界正义秩序的罪魁，我们也希望他翻上翻下，始终恋栈下去，以便芦沟桥的纪念碑揭幕大典举行时，叫他来“观光”一下！

（原载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八日香港《大公报》）

培养中国之新血液

罗斯福总统最近致函我驻美胡大使，对我国十万青年之签名

寄函，表示感谢，并谓：“此等青年，深知所有以正义拥护国际和平主义之国家所遭遇之问题，余对此不胜兴奋；此种爱国精神，感余至深；余信此等青年，虽在平时与困苦艰难之际，必常爱护并高擎彼等理想之火炬。”这几句话，也真使我们有所深感。

第一，对于罗氏的赞扬，我国的青年的确可以当之无愧。中国的革命运动，青年们一向是前驱，二十余年来，在任何环境下，他们从来没有低垂这理想的火炬。自神圣抗战发动后，有无数青年，抛弃了家庭，离别了城市，有的跑上前线，有的深入后方每一个乡村细胞，组织民众，激扬后方的抗战情绪；他们的岗位虽有不同，而直接或间接对国族作宝贵之贡献，则初无二致。至于一般尚在求学时代之青年，则当抗战之初，流离颠沛，转入大后方，继续求学，四年来，虽生活严重威胁，学校设备未周，精神食粮贫乏，但孜孜矻矻前进深造之精神，则较前有过而无不及。大体讲来，抗战以来学生的一般风气，较前有显著的进步：（一）求知欲比前更旺盛；（二）观察事物的态度，比前更客观；大部分青年，都能审察国族前途之光明而艰苦，而以国士自期，埋头奋斗，不为浅薄之宣传所动摇，不为新奇之理论所眩惑；（三）表现于学校的，则一般学风愈见朴质淳厚。抗战以来，中国是进步了，而中国的青年们，在艰苦之环境下磨炼振奋，进步尤一日千里。这正象多灾多难的贫寒家庭中，产生出刻苦前进的子弟；“多难兴邦”，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凭籍。我们抗建的前途，任重道远。中国能否渡过当前的难关，是这一代中年人的责任，而能否将国族基础置于磐石之安，实际建成灿烂的现代化国家，一切超迈世界第一流的强国的水准，则现在的青年，无疑要肩起这庄严的任务。我们看到民族新血液的纯洁强健，实不胜欣慰。

第二，政府当局及教育负责者，近来对青年奖掖爱护，其努力诚不容抹煞。对战区流亡青年，尽力救助，并予以适当之工作，而对于各级学校，不仅尽一切力量，使之弦歌不绝，且以种

种借贷资助之方法，减轻学生之负担，使之得以安心求学，继续上进。我们遭遇空前之国难，全国精华大半被侵略者践踏殆尽，而政府当局，能在经济万分困难中，保全并培养文教之基础。这个努力，当然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第三，中国青年之进步，以及当局对青年之爱护，既如上述，那末，我们对于中国的青年问题，还有什么应该商榷的地方没有呢？有的，那便是如何指导青年。我们希望青年们能作未来新中国的中坚，自必须在此时养成他们远大的眼光，让他们能探求广博的知识，培植雄迈的勇气。要达到这一目的，至少不应拘束他们的视线和损害他们应有的自尊心。抗战以来，民族情绪高涨，三民主义为救国之唯一主义，已有铁一般事实之证明；而近两年来国际之惊涛骇浪，国家兴亡决于俄顷，也充分证明“国家至上”“民主至上”为天经地义。我们相信，今日中国青年之思想中心，必已以此为范畴。除此之外，则自应充分保养学术研究之自由之空气，使青年能多所吸收，而凝固其所信。其次，我们赞成对青年应善加指导，但反对任何所谓“特务制度”蔓延入纯洁的学校，因为这不仅会激起善良学生的反感，而且根本戕贼了青年的自尊心。为民族的前途着想，我们不应把青年斫伤成全无骨气的工具；实际讲来，真正优秀有为的青年，也决非任何诱胁所能就范，结果只有为渊驱鱼，激之步入歧途。这样的结果，决非爱护国家爱护青年的人所期望的。

这些话，只是原则的意见，决非针对事实。我们看到罗斯福总统对于我国青年的赞扬，深感欣慰；因此，略述所感如上。

（原载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一日香港《大公报》）

不与侵略者谈和平

——读罗斯福总统之广播演词

美国劳工节日，罗斯福总统发表广播演词。这篇演词中，他虽没有如一般所期待，释明美日谈话之真相，但他却间接答复了这个问题。他说：美国决心打倒希特勒，决心不与纳粹谈和平，并当加紧军需品生产，以增强各民主国争取胜利之力量。

罗斯福总统近一年来的演说，都以击败纳粹打倒希特勒为目标，其深恶痛绝的程度，一次比一次厉害；此次的广播，更明白申述美国的最后决心，不与希特勒共戴一天，并表示美国有击溃纳粹主义的绝对自信。这已无异是一篇对德宣战的誓言，虽然所用的作战方法，并不限于直接的军事行动。世界人士，对于美国反抗纳粹的决心，本已无所怀疑，经此说明后，当然更深切信赖，而决不会再想象美德之间尚存在有任何妥协的可能。

我们读了美总统的演词，第一个问题，便是要问：罗斯福氏所申述的几点根本信念，是否也适用于对日？假使是的，那末，正在进行中的美日非正式谈话，是否与此信念发生严重的矛盾？

罗斯福总统所指责纳粹的许多罪恶，假使把“纳粹”二字换上日本，可说无一点不完全恰当，而且日本的摧残劳工生活，压迫自由思想，比德国更残酷，更彻底；至于它在征服区种种黑暗的手段，更非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徒所能梦想。我们相信，罗斯福总统纵非“借鸡骂狗”，但当他发表这严正的演词的时候，一定也曾注意到远东的事实。华盛顿人士论罗氏演说，谓其重申军火运往全世界战争前线一点，足以表示美国始终援英援华之决意，同时并表示美国当局决无意“安抚”日本。这种观察，我们也深有同感。

美国的对外政策，既以铲除侵略保卫自由为口号，当然便不应有例外。和平不可分割，正义也绝无地域的限制；罗斯福总统既对纳粹侵略者如此不共戴天，当然不能对远东侵略者存任何安抚的幻想；何况任何安抚的方法，已证明侵略者绝对无用，不论在西方或东方。有些人以为，美国在纳粹被困日本孤立的今日，诱致日本脱离轴心，可以隔离侵略，而集中力量于对德；其实，这是彻头彻尾的迷梦。日本侵略者，固然无信义，无诚意，它对于德国，本意存利用，并无生死患难的交情，但它此时全盘的幻想，还是寄托在德国的胜利，非至德国已势成必败，日本决不会轻于回头。再说，美国此时要把日本从轴心拖出来，日本当然要代价。日本这几天竭力强调“东亚共荣圈”，要美国承认；这就是要美国承认它十年来的侵略事实，并承认它今后在远东有绝对控制权。这不仅违反美国一贯的根本政策，而权衡轻重，将来的祸患更十百倍于纳粹今日的威胁，试问美国能答应得下么？

其次，日本近来故意做出一种姿态，强调其内阁与军人的对立，以为美国如不与日妥协，近卫内阁便将倒塌，继之便将出现纯军人内阁，而彻底进行其南进的冒险。连日东京上海的消息，都如此渲染。日陆军报道部长马渊一一日的演讲，更强调说：

“倘外交的和平绝望，日本应与英美一决雌雄，虽战至最后一人，亦当为国策死守。”美国过去为了要维持日本“温和主义者”的地位，曾上了许多次当；日本现在还唱这种双簧来诱胁美国，我们不信美当局迄今尚无洞察鬼魅伎俩的巨眼。老实说，日本如有与英美“一决雌雄”的能力，日本早动了，何待今日？日本军人的眼中，从来没有“外交的和平”，假使他们真有自信，何至到今日还冷眼旁观近卫的戏法？近卫无拳，无勇，无肩膀，无卓识，凭什么还能压得住军人的戾气？要知道：这全是日本的一套翻戏，利用美国不愿挑战的心理，引美国上钩。它明知美国不会抛弃根本的立场和它妥协；它自己也并无和美国根本妥协的诚意；日本的真正目的，是要美国松弛对日的经济压力，以便它争

取时间，等待德国给它的“黄金机会”。

我们拥护罗斯福总统的誓言：不与侵略者谈和平！

（原载一九四一年九月三日香港《大公报》）

光荣的苏联战绩

此次红军在中路斯摩伦斯克区，击败德军九个师团，克复耶尔尼亚城，获得胜利，虽不足为决定的胜负，而由此一战，苏联士气，益复振奋。红军之英勇战绩，历两个月又二十一日，乃愈呈灿烂，愈臻坚强。洵足令世人惊叹敬佩，光荣无伦。我们愿乘此机会，一论其重要的意义。

第一，德军自上月底进行第三次闪电攻势以来，初时虽曾略有所逞，如攻占戈默尔、尼科莱夫，及猛攻列宁格勒，及包围俄底沙，但既未夺得重要军事据点，抑且未能击败红军之主力。德军在发动第三次进攻时，曾在国内及占领区抽调生力军三十四师团，加入作战，而两星期以来，所得并未如预期的成就。它所以如此拼命搏斗，原因不外为冬季将届，以后进攻益难，不特进难，即退亦不易。而且师久无攻，国内必感不安，故此一举，乃有类于孤注，以求其必逞。不料仍遭遇红军英勇的抵抗，以及三路统帅的调度得宜，使纳粹第三次的闪电战，重归粉碎。列宁格勒及俄底沙，各被围攻二十余日，而仍皆屹然未动，列宁格勒且并未合围，此两城将士英勇、人民强毅的精神，尤为可佩。由此一战，已动摇了纳粹的信心，而增强了联军必胜的意志。

第二，由于红军的坚强抵抗，联军同时亦增强了他们的力量与作战的信心，前天英挪联军占领北冰洋的斯俾兹伯根岛，自然是一桩堪以重视的主动，美国方面，甚至指出，该岛或将被

用为进攻挪威之跳板。现在虽暂时撤退，我们相信，联军迟早必在欧洲大陆开一新战场，而或者挪威是一个比较可能与容易的地点。我们由此可以相信，今后联军主动的措施，必然日多，军事上必更加活跃，将来终有一日使德军陷于两线作战的厄运，联军的动作，行将与红军的英勇抵抗配合，以粉碎纳粹侵略者。

第三，因为红军力量强大，所以它尽有余力照顾到别方面，不论在中东在远东，它都支配得井然有序。前次伊朗事件，因能与英军联合行动，奠定了中东大局，不但如此，而且从今以后英苏联军，合作愈密切，团结愈紧凑，亦可说是已经奠下民主国家胜利的基础。

第四，此次作战，因为逼近或已到达苏联西境的工业区，或者不无损失，但因英美援苏的积极，尽足补偿而有余。现在红军作战的力量，恰能与英美的援助相配合，故此种力量，乃庞大无比，不可方物。就是以美国油船日来陆续运抵海参崴一事而论，虽然说有美国力量的成份，但假使红军不争气的话，日本军阀便不会轻轻放过。因此，我们相信，自己的实力与人家的援助，必需能够配合，方足使之愈趋顺利。

第五，红军在西方的坚强，间接稳定了远东这一端的局势。日本的投机者，原意是想等待德军在欧洲得势，红军有不支的情势时，便在远东发动，再作一次投机买卖。但是倘若德国未具有必胜的把握，它断不敢妄动。过去日方调兵遣将，以及高呼北进的军人，到今日乃噤若寒蝉，所以致此，乃是为了红军的英勇作战，无形中打碎了日阀的妄想。

最后，我们对侵略者，英勇作战，已历时四年有余，虽然我军的装配，不及红军，但以作战精神论，并无逊色。我们在此国际大势绝对有利于民主国家之时，更应积极准备反攻，驱逐侵略者出境。我们相信，我英勇的将士，必能加重对侵略的打击，如此次东战场的出击，不久即克复福州，重创苏浙境的敌军，预料短时期内，如援华物品能陆续到齐，当有一新序幕的展

并，行将与在欧作战的红军，同样放射光耀的战绩。

大家应该记得，拿破仑侵俄军是十月十九日退出莫斯科的，目下冬季将临，红军行将凭其优越的天时地利，予纳粹以致命的打击，我们在此，预祝红军光荣的胜利！

（原载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一日香港《大公报》）

勿自轻、勿自满

抗战四年后的中国，以所受牺牲之重，所付代价之高，老实说，我们已有不可动摇的世界地位。今日的中国，我们不可自轻，同时也不可自满，因为我们现在已有了在世界大局中做一个主角的资格，而最后胜利必待以自力来争取。根据这种见地，我们觉得目前有两种错误心理应该加以纠正。

第一，莫把自己看轻了。例如目前的美日谈话，我们应该关切，对友邦也应该根据我们的苦痛经验，劝诫它莫上暴日的当；但万万不可因此连自己在太平洋全局上所占的主动地位都忘记了，而皇皇然以被牺牲为惧。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自信。经过四年血战，强敌不能征服我们，甚且使它陷入烦恼之渊，则任何力量也不能撼动我们。老实说，现在的中国，已是世界全局中的一个主角，和战大局的最后决定权完全操在我们的手上，没有中国的参加与同意，试问谁能解决远东问题？中国既不是波兰之可以武力征服，自然就不会象捷克之被阴谋出卖。老实说，我们眼看着美国对暴日所采取的姑息买好政策，实在感觉不满；而同时也心中雪亮，美国在今天所以对暴日尚有发言的权威，就是食中国抗战之赐！试思在目前的时局中，假使没有中国的抗战，或中国竟被其敌人打倒，美国还能与三国同盟之一的日

本从容议论吗？恐怕荷印与菲律宾群岛早就挂上太阳旗了。目前的美日谈判，最彻底说，是因为日本被中国打弱了，而自忖已无再与美英翻脸的力量，才想借外交方式来鬼混以待时的；不然的话，日本早就动手了，它何惧于美英？更何所爱于英美？日本现在本来已毫无足畏，且择定轴心最脆弱的这一环下手，极易收功。而美国偏偏要畏首畏尾的滥姑息，已很可惜；但我们却有充分的自信，有中国在这里挺着，美国的迷途必不远，旁人也绝无力量来牺牲我们，出卖我们。我们能自己做主人，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谁能奈何我们？在上次欧战中，中国只是一个配角，但因山东条款的有失公道，我们拒签凡尔赛和约，一代大政治家的威尔逊总统就因此失败了。今日何时？罗斯福何人？而能再演那样的失败剧吗？假使演之，其失败必不旋踵！中国数百万战士四万万人民继续为保卫祖国而战，乃是远东大局的主流；中国之志不伸，中国之耻不雪，谁也解决不了远东问题。我们切莫看轻了自己，只有我们自己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要我们坚决奋斗下去，远东大局一定要由我们的主动来解决。

第二，不能坐待胜利之到来。一般人还有一种心理，坚信我们一定胜利，但并不努力，以为胜利可以坐待而至。这种心理，也同样错误，或且更严重。不错，我们业已有了胜利的基础。但要知道这基础是几百万民族战士拚性命洒血汗挣来的，我们在后方的亿万同胞若不与之做配合的努力，做相应的奋斗，虽胜利的基础已具，还是可以失败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全国上下必须透彻觉悟，严重警戒，而万万不可稍存自满自惰的心理，暴敌的确已被我们打弱，凭它的力量，绝对不能征服我们；但相对的我们的国力也已大量的损耗，精神也已相当的疲惫，若任现状麻痹下去，我们是否能够充分做到愈战愈强的境界，实是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大战四年之后，实已到了精神支配一切的阶段，不可稍懈奋斗的情绪，要明了敌人虽已再衰三竭，而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它还可能拚命作最后的挣扎，最近湘北之战，便是显明的

例子，它还能抽调十万人作相当规模的攻势，足见它距最后崩溃，至少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应该更加奋发，更加勤勉，来克服一切战时带来的困难，创造新力量。这时的大问题，再没有比保存民力增强国力更要紧的了。政府一定要清明有为，以清明之政保存民力，以有为之政增强国力。人民一定要勤奋忠勇，以勤奋之力努力工作，以忠勇之忧效忠抗战。政府与人民，一丝一毫都懈怠不得，自满不得。战争是全体性的，要持续战争，已非运用全国之力不可；至争取胜利，更非善用全国之力不可。在战争中增强国力，乃是国家的生死问题，必须集中全力以赴之。为此，我们不特要求国人革除自满自弛的心理，更要求政府振刷精神，革新庶政；不使战时之政断丧民力，而多方努力以增强国力。我们一定要运用自己的国力，对敌人反攻，争取胜利；对国家建设，达到成功。这绝非不可能，但必须精神大振奋，政治大有为！

（原载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五日香港《大公报》）

如何提倡国防科学

提倡国防科学这个口号，不自今日始，而至今日还是口号，还待宣传，未免令人兴无限感慨。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还是中国的文化经济殖民地，虽明末有出兵朝鲜及倭寇之乱，然终属骚扰性质，尚不敢公然侵略；日本之侵略中国，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而两国国运的升降，也不过六十年的光阴。为什么日本维新了就日渐富强，而我们的维新，始终是依然故我，没一点长进？这其间的关键，最重要的是两国对于接受西方文化的态度不同，日本一下手就彻底走上了现代化的路，专心学习“夷之长技”，

力谋富国强兵之道，而我们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含含糊糊地过了几十年，尤其“西学古微”，一切以为“古已有之”，而不去深研潜习，结果贻害最大。今天我们于对日大战四年多之余，重行提倡国防科学运动，则过去失败覆辙，万不可再蹈，尤其要讲究方法，才能行之有效，收获成果。关于提倡国防科学的方法，我们愿本过去经验，贡献两点意见如左：

第一，要从根本着手。科学最讲实际，一切抄捷径，求速成的方法，都无异自杀。国际科学虽为实用的，但仍须以纯科学为根基。而培养此种根基，更须由中学做起。我国中等学校，数理化方面设备向欠完备，师资水准亦不齐全，致不能诱发学生研究科学之兴趣。抗战以后，学校被毁者被毁，内迁者内迁；而在内地之中学甚至大学，因物力艰难及交通不便，对科学仪器，无法大量添置，亦难充分利用，而只能抱残守缺，对付了事，这在科学的园地里，是一件最大的损失，读自然科学的学生，仅能念死书而无从做实验，当然提不起兴趣。中学生对科学冷淡了，这是国防科学运动的最大隐忧。今天提倡国防科学的人，因为抗战建国这样伟大的事业，千头万绪，需才孔殷，因而对于人才的造就，以速成为主，对于科学的传授，以实用是尚；而学校学生，因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亦往往不愿埋首于纯科学的研究，而唯思学得一点技能，俾以谋生，从个人言，固未可厚非，但从国家言，则是大损失，大隐忧。科学本以致用，然必须先立下好根基，方能有大成就，若只图依样葫芦，做一点简易工业，则与国防何补？国家何益？所以言提倡国防科学，必须从根本着手，自中学起，即养成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引导他们走上研究科学的正道；基础打好了，他们进大学入研究院，甚至服务社会后的个人研究，对科学都会有正确的观念与坚定的信仰，而不致再流于浅薄。所以要提倡国防科学，目前中学轻视科学的风习，非痛予纠正不可，第一师资要好，第二课程要严，第三设备要齐，必须先充实自己，然后才能迎头赶上他人。

第二，要从普及做起。提倡科学，固须造成专才，尤应求其普及。所谓普及，并不是人人都成为科学家，而是养成一般国民的科学知识，换句话说，就是使每个人都有“科学头脑”。我国提倡科学，已有数十年历史，到今天，并不能说没有成绩，例如在科学的若干部门中，我们的专家学者，甚且在世界科学界中也占有地位，但是他们关在试验室里，与民众与社会完全隔绝，他们的研究心得，民众一点不了解，他们所要推行的科学建设，当然得不到民众的赞助，结果科学成了科学家的私产，而科学家也成了科学的点缀品，科学与民众，完全没有关系。在这种情形下而想提倡科学，真如缘木求鱼。况且科学既称国防，尤含有必须普及的意义在内，因为现代的国防，是全民的，总力的，绝没有几个科学家与军事家，就能完成一国的国防。所以提倡国防科学，必须先使民众认识科学，有“科学头脑”，知道科学与国防的关系，然后才能获得民众的合作，而收事半功倍之效。尤其在今天，我们认为提倡国防科学的最好时机。为什么？因为抗战四年余来，无论军民，大家都知道我们与敌人相比，样样都不输给它，而吃亏的只是武器不如人；更知道武器之所以不如人，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发达，如果我们自己能造飞机大炮，敌人早就被我们赶出去了。所以现在全国人民，已经知道科学的需要，更要知道科学的重要，如果趁此时机，将科学通俗化，使人人都能在国防科学这个大圈子里贡献他们的力量，这样才能实际有益于国家，而国防科学运动，至此也才可以说是成功。

以上两点意见，只论原则，未列详目。希望政府当局从今以后，依照“根本着手”与“普及做起”两点，切实提倡科学，则十载以后，中国国防，庶几可以奠下相当的根基了。

（原载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五日香港《大公报》）

藕断丝连之美日谈话

美日谈话，在近卫登台前，本已奄奄一息；东条登台后，忽又呈藕断丝连之态，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日本对美妥协，果有一丝一毫的诚意么？这在过去五十日的断续谈话中，已证明其必无；而且就美日两国的关系观察，也绝对不能发现调协的可能。过去五十日的谈话内容如何，双方虽迄未发表，但我们不难窥见其失败之症结。第一，根本上美国要维护九国公约之立场，而日本则坚持不放松所谓“东亚共荣圈”，南辕北辙，绝对无法调和。第二，美国也许希望日本疏远德意，退出轴心关系；但日本迄今尚迷恋于其轴心盟主之武力，认为在茫茫大海中之唯一凭藉。第三，日本主要的企图，要美国松弛经济压力，解冻资金，继续供油，并停止对华援助。而这些步骤，单就美国本身利害讲，也决不能放松，因为这是最有力的武器，决不会轻易自解武装。这些难题，近卫不能解答，也并无解答的诚意；现在换上了东条，矛盾依然，诚意更谈不上。东条内阁虽不是一战争内阁，但其准备扩大战争的意味，却十分浓厚；关东军系及侵华巨头是新阁的主脑，东条及东乡等就职的谈话，竭力强调要“解决中国事变”，要完成“东亚共荣圈”，并一再说明日本外交以三国同盟为基础，完成“历史上之任务”，予“国际和平以极大之贡献”。日本的“历史任务”是什么？它所理想的“世界和平”又是什么？谁都知道，就是所谓“八纮一宇”，就是所谓新秩序。我政府发言人蒋廷黻氏说得好：“日本内阁之改组，绝非政策之改变；日本有其既定之国策，其根源发自日本之历史与文化，日本历史具有贯彻侵略远征与霸道思想之巨流”。有人批评日本这次内阁更替为“换汤不换药”；其实，它的祸害世界

文明的毒药是永久不会换的，除非根本把它的药罐推倒；从中日战事爆发到现在，日本换了七次内阁，它的侵略药味，何尝有丝毫改换？这次的东条内阁，其狡猾投机的作风，完全蹈袭近卫前内阁，而更显明的充满着火药味，充满着准备扩大放火的意味。

那末，东条登台后，为什么还要表示愿与美国继续谋妥协的姿态呢？这是很容易明白的，日本当前最大的苦闷，便是被民主国所包围；这所谓包围，并不是日本有被侵略的可能，而是客观的形势，将限止日本的侵略行动，将使它无法再为所欲为。在四个月以前，日本可以在北进南进这两条路，任意选择一条去冒险，即使不实际去冒险，也尽可在这两条路间摇曳作态，以诱胁苏联或美国；因为那时日本如侵苏，英美决不会动，日本如南进，苏联至少也必旁观；但自苏德战事爆发后，形势即截然不同，反侵略与侵略之壁垒分明，所有反侵略国间，都已有不可分的共同利害，而欧亚战局之乘除得失，也已打成一片；英国当然要援助苏联，美国也一定要尽可能维持苏联；对于中国，也同样更显著了彼此不可分的共同利害。这四个月来的发展，如“大西洋宪章”之发表，三国会议之举行，马尼拉英美军事谈话，美国军事代表团之来华，一切都是向这逻辑的道路前进。时至今日，日本无法单独选定一冒险的对手，北进侵苏，美国决不会坐视，扩大南进，中美各国也必将共起反击。换句话说，日本今后再无投机取巧之路，无论向任何一处冒险，必需准备对抗太平洋上所有反侵略国家，而必须以最后的国命作孤注。近卫向罗斯福总统投书，发动美日谈话的外交骗局，主要的企图就是要拆散各反侵略国的携手合作，冲破这个日益强固的包围圈；近卫失败下台后，换上东条，依然利用这个姿态，所以一面声明要以全力“解决中国事变”，要阻止美国之援华，这是想隔离中日战事与太平洋大局的联系；一面要阻碍美国之援苏，以松弛美苏之关系。今后美日谈话万一重开，日本必然以这两点向美讨价还价。另一方面，苏德战事如继续紧张，日本在实行武力北进前，必然先发动

对苏之外交攻势，威胁苏联保证不以远东之根据地供给美国利用，进而以之为侵犯之口实。

我们相信，太平洋反侵略各国之团结合作，已如水到渠成，绝非任何阴谋所能离间破坏。这次东条登台后，虽一再散放烟幕，多方试探，而美英当局之态度始终沉着坚定，舆论犹为明朗，实可欣慰。现在太平洋安危的关键在美国，我们希望美国应进一步表示，如日本悍然侵苏，美国决起而援苏；尤其对于必无结果的美日谈话，应毅然一刀两断，表示决不愿再重开。这样，才能消灭日本的阴谋，才能使太平洋大局更趋于光明。

（原载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

英美的对日禁运

英国《约克夏邮报》主张对日禁运，包含加拿大、澳洲、新西兰等各属地在内。

美国亦将扩大禁运，并且有人主张禁绝日本生丝入口。

这两件事，显得英美到了今日方完全认识日本，方明白对付日本有这样的必要。虽然就时间上论，迟了一些，但倘能够认真做去，依然是有力的制裁。

尤其美国方面，倘能不买进日本生丝，那末，日本就得不到外汇，军需品便无法购入。

总之，英美倘能先从经济上着手制日，还是日本的致命伤。

（原载一九四〇年十月二日香港《大公报》）

意大利做什么梦！

意大利报纸，在所谓三国协定签字后，期望日本海军的助力。这真是做梦。

意大利始终是希特勒的一个摇旗呐喊者，实力实在有限，它的海军迄蛰伏不敢出来，因为一出来，就会被英海军消灭的。现在穷极无聊，又期待日本海军去帮助。

日本海军肯替意大利牺牲么？日本海军能开入地中海么？假使都是办不到，那末，意大利不是在那里说梦话？

（原载一九四〇年十月二日香港《大公报》）

华北是我们的

上海消息，《字林西报》北平通信记载华北游击队活跃情形，活动区域，自冀东以迄黄河，正太路自八月二十日被截断后，迄在游击军控制下，交通未能恢复。

这样中立第三者的记载，自然饶有价值，亦是最足令人兴奋的事态。由此我们可以相信，华北沦陷，虽将及三年，但是日军占领的，只是几个城市，城市以外的地方，还是我们所有，日人势力，休想深入，换言之，日人并没有能够真正控制。

从前常常说日军能控制的是点与线，现在看正太路被截断一月余，迄在我军控制之下，可见日军连交通线亦无法控制了。

我们因此更深深相信，日人断然打不坍中国，中国具有如

此无穷尽的无名英雄，日人倘使还想“征服”中国，推行“新秩序”，真是做梦！

（原载一九四〇年十月七日香港《大公报》）

日荷新协定

荷印与日本又订一新协定，规定在今后六个月内，以九十三万余吨之油供给日本。就大体讲，这一协定并未使日本得到新的收获，而仅为去年十月所订协定之延长。这与四月前芳泽赴荷印所抱的企图，自然不能算完全符合。

日本如此“迁就”，也许可以表明日本并无急速大举南进之意。但我们必须指出，这仅是日本的一种姿态。它是暂时观望，并非就此止步，而且这一姿态，也是因为美英荷积极准备联防之故。所以美国绝对不可松懈，而更应加紧其预定的步骤。

（原载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一日香港《大公报》）

日本的“双簧”

日本最近又发动一种双簧式的谣言攻势，一面由东京各报发表将“放弃对华战争”的消息，一面由本多等表示反对与国府讲和，而以全力支持汪□组织。这是想给人一种印象，以为日政府已有觉悟，而在华军人则仍一意孤行。

其实，这全是烟幕。我们中国，绝对不想象日本会觉悟，我

们早就决定长期作战，日本如尚有余力，尽管进攻，我们决不含糊，至于汪组织，本来是日本的一机关，要怎样支持，悉听“尊便”。日本说这话，等于诳费，而且日本不早就“承认”，早就高唱“全力支持”了么？

至于本多说：中国除非由美调解，将拒绝和平。那更是信口胡言，我们根本不希望任何友邦调解，也相信美国决不做此笨事。

由本多的话，可见日本这次的“双簧”，目的只在于松弛美国对华之援助。

（原载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一日香港《大公报》）

汪 口 赴 日

汪口兆铭赴日朝见，几个得力的配角一体随行，南京的戏本越唱越立，这一来，更门可罗雀了。

据说，这次汪的赴日，是为乞求日本的加强支持，而它的导演者本多，上月返国之际，也说要加强汪组织，究竟是否另有企图，固不得而知，但从反面看，也正可见这个组织，绝对是敌方的一个工具，一切生机完全寄托于日本的支持；汪登台后，日方一再注射强心针，到现在，还只听说要“加强”、“加强”，可是本身既成“坐以待毙”，再打多少强心针，也不过勉强支持一个形骸罢了！

（原载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五日香港《大公报》）

畑俊六之言

我们对敌抗战之初，即坚信这一战是长期的，而决心以自力求胜；同时，相信我们这次抗战，不仅将清算中日之旧账，并将决定西太平洋之命运。四年的抗战过程，以及近两年来的国际变化，证明我们的国策绝对正确。

日本呢？最初以为三个月可以“击溃中国，使之屈膝”；后来泥足愈陷愈深，而征服中国之梦，则愈久愈幻灭。所谓“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昨日在宁发表的“宣言”，也强调说要“自力解决中国事变”，而憬悟对华战事是世界问题之一环，将决定整个亚洲的命运。他不敢再开“解决事变”的定期支票，这也许可说是日本军阀的进步罢？

（原载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香港《大公报》）

后门开不得！

华盛顿方面，似乎还没有完全停止对日“安抚”的政策，有些人士，甚至迄今还以为经济攻势的结果，可以把日本骇得缩手，转回头来与美国“合作”。实际上，因冻结办法所产生的良好影响，这几天又因领证制，取消日轮限制等步骤，而逐渐消减。这些现象，真使人感到人类短视的悲哀。

罗斯福总统、邱吉尔首相以次的英美首领，是否也象这些人那么短视，或者成竹在胸，另有妙算，我们不敢断言；但当此太平

洋局势毫厘千里的今日，民主国家实不应再养痍为患，坐失时机假使以为关上大门而后门不妨通融，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原载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香港《大公报》）

祝中苏文协港分会成立

中苏文化协会香港分会，昨已成立，情绪之热烈，为本港所仅见。

中苏文协，成立已五年。这五年中，中苏两国的友谊，日益增进，尤其因我们进行了四年余的神圣抗战，在艰苦奋斗中，益深感患难朋友的赤诚。中苏文协，历年致力于沟通两国文化，促进两大民族之感情，其善尽国民外交之贡献，固不待烦述。

自从苏联被侵，而奋起作英勇抗战后，两国立场已完全一致。在中苏两国再接再厉分别向残暴侵略者搏斗之今日，中苏文协在香港成立分会，益足以象征中苏英美四大国之步调一致，象征反侵略集团之团结合作。

我们愿乘此机会，对祖国及友邦苏联苦战将士，遥寄由衷之敬意，并愿因中苏文协之努力，早日促成中英苏反侵略同盟之实现！

（原载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一日香港《大公报》）

幽默的一问

日政府发言人说，湖北之战可以影响美日谈话，这已不啻承

认日本的大败了；假使果如日本在华军方所宣布，是“目的已达，自动撤退”，那有什么影响可言呢？

东京的外报记者，倒很幽默，日发言人已经承认有影响，他们还要追问一句：“所谓影响是否不良”？这明明是当面挖苦了。

（原载一九四一年十月四日香港《大公报》）

第三辑

1. 2. 3.

让我们出击

缅甸南部状况，不能令人乐观。毛淡棉撤守后，隔江之玛打万又有难以久守之讯。玛打万如失，则仰光所受威胁，必然增大。

缅甸战局，我们应该关切，因为这与滇缅路的交通有关。仰光如失，滇缅路没有出海口，当然要大受影响。英国既同意中英共同保卫滇缅路，就应该在局势未恶化前，让中国军队有出击的机会。中国军队在国内已打了近五年的仗，相信必能善尽其责。希望英国当局重视我们这个恳切的呼吁。

（原载一九四二年二月七日桂林《大公报》）

忠告美国朋友

罗斯福总统对记者称，敌人随时有进攻美国的危险，这话虽含警告之意，而实际却并非绝对无此可能。

我们愿意提醒美国朋友一句话，就是要认识日本这个国家，其野心是绝无止境，愈有便宜可讨，就愈刺激它的胃口。即使它拿到整个南洋，也决不会以此自满，停足不前。所以为美国计，即令一时不能大举反攻，亦必须以攻代守，如果依照少数人的主张，将舰队调回，保护本土，其结果不但不易苟安，而且还足以招至暴日进一步侵略的野心，这一点美国不可不予注意。

（原载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九日桂林《大公报》）

各算各的账

自从暴日掀起了太平洋大战，英国弃香港如彼之速，失星洲若是之易，使得一般人感觉到很大的疑虑，以为日本的实力，意外之强，中国的抗战，势必要受到严重的打击。其实英国在远东的挫折，自有它的原因，日本的力量，并没有特别的强，中国的前途，也更有其独立的坚韧因素，丝毫也用不着忧虑与不安。易言之，中英日三国都各有各的账，须要各别清算。

先说英国：英国向来夸称，太阳照临之处，即有英国的国旗，这自然可以表示英国殖民地之无远弗届，但正惟如此，也就各多力分，一旦有事，免不了要顾此失彼；更何况二十余年来，根本对于军备没有充分准备，以致事变猝发，仓卒应付，当然愈见得捉襟见肘；而且大凡殖民地的政治，总有特殊色彩的，任何文明国家的国民，在本土和在殖民地，思想行动都会截然有别。记得第一次欧战后，法国霞飞元帅夫妇到远东游历，看见了上海的法国侨民，便大为叹息，深怪温文有礼的法国人，一到东方，竟会变成粗犷放纵的野人。法国如此，他国何独不然？所以法国在越南之对日屈服与英国在远东之初步败绩，甚至推而至于其他国家在殖民地之防卫战，不能如防卫本土之坚韧而有力，皆都决非意外。尤其现代战争的特质，是全体战，必须配合着民众的动员，方可发挥作战的能率。本此观点，我们对于香港与星洲等处之过去与现在情况，实在不必诧异；同时我们也就不能根据这些结果，判断将来的英国战局，因为过去的账是将要清算完了，今后又入于英国国民创造历史的阶段了，他们只要有睿智澄清内部的暗云，有决心打倒他们的敌人，相信胜利终是可以属于他们的。

次说日本：日本与德国一样，国民能够刻苦努力，信仰科学。我们相信，它这次发动大战，在科学上工业上，必然得着德国不少的帮助，但是日本军人放纵卑劣的积习，日本国民褊狭骄浅的性格，却一点也没有能够改进。就笔者在香港沦陷后亲身接触所得而言，日本军队纪律之恶，道德之坏，不特去彼邦传统的武士道精神甚远，即视我们国民革命军的精神标准，亦复不及，观其搜掠之细大不捐，作恶之悍然不顾，我国北方过去军阀张宗昌、褚玉璞的部下，庶几近之。以此武力，而要与希特勒平分世界，支配东方，除非历史推翻，古今断无是理。我们敢说：日军越进展得远，其崩溃也愈近，这是二加二等于四的一笔清账，绝对毋庸置疑。

后说中国：我们的对日抗战，是有崇高的道德性的，我们不是功利主义者，决不计较成败利钝，只是义所当为，便即拼命奋斗。现在全世界舆论推崇我们，正以见他们认识了我们的抗战精神，亦即是要根据我们的这种道德性来制裁强权，维护正义。易言之：我们的基本精神，是要打倒强横霸道，实现正义和平，我们决无意于维持不公道的旧世界，而是要打倒这一班侵略横暴的新帝国主义者。我们希望本着忠厚仁爱信义和平的东方精神，来解放自己，拯救人类。我们应以殉道者的精神，来坚持抗战，打击强权，务期达到改造世界的宏愿。我们上有深思远见的伟大领袖，下有坚韧不拔的无数民众，只要我们认清了目标，不断努力，相信不特日本必败，全世界的未来命运，且可为我们所左右。国民记着：现在是创造历史的时代到了，各算各的账，我们应当不问收获，但问耕耘，团结前进，勿负这历史的使命！

（原载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桂林《大公报》）

废铁的旅游

据惠灵顿二十三日路透电，目前新西兰防务设备之铁丝网上，有显明之“日本造”字样。新西兰人士对此殊感意外，认为英美输日之废铁，日本至少已退还其一部，助成英自治领之防务云。

这一些英美的废铁，在太平洋中旅行了两次，又回到英属自治领，也可说是备历沧桑了！假使废铁有知，当它回忆过去这一段经历时，大概也会有不堪回首之感罢？不是么，当它们大批被运载赴日本的时候，何尝想到太平洋今日已变了火海？它们微幸又在太平洋旅行了一次，被树立在反侵略的最前线，而它们大部分的伴侣，则已被制成了炸弹，造成了飞机舰艇，作为侵略的利器，向英美及其盟邦肆虐，同样被烙上“日本造”的字样，而命运毕竟不同了！

我们看了这一段废铁的旅游史，却并无意外之感，而反有更多的感触。我们在过去数年间，曾不断向友邦呼吁，勿再以汽油钢铁及一切军需原料供给暴日。因为我们知道，暴日是一个资源饥馑的国家，它用以侵略中国的武器，用以轰炸我陪都及全国及大小城市，残杀我民众的，大部分是靠英美的原料；我们也早知道，一旦把这贪欲无厌的侵略者喂饱了，它必然会把从英美取得的利器，转向英美攻击。当时我们的呼吁，也许曾被视为危言耸听，现在，这一切的预料，都不幸被言中了！日寇转战南洋各地的飞机大炮，以及机械化部队所需的汽油弹药，哪一样不是经过了太平洋的两度旅行呢？就是最近袭击美国大陆的潜艇，也必然是被英美原料所喂饱了的。在新西兰的前线，会出现“日本造”的铁丝网，这证明在太平洋大战爆发前，日本的废铁早已喂饱，

且有余力可以“反哺”了！

数十年来，日本侵略者利用外交的形势，受了英美的武装，获得英美的喂养，现在已攫取英美一向视为原料的宝库（南洋），与英美搏最后的命运了！

我们作这样沉痛的叙述，并非故意勾起盟邦这一页痛心史，“往者不谏”，只是希望英美各国，要赶快迎头准备，大举反攻，切勿以为时间始终有利于反侵略国，要知道日本这个毒兽，在被英美的原料喂养时，它还能蓄意作大举侵略的准备，现在，它已跳入了原料的宝库，假使让其有从容开发恢复的余裕，那时要消灭这个罪魁祸首，必将更感困难。

这一些话，在太平洋上曾经两度旅行的英美废铁，也许会比我们说得更透彻，因为它们身经目历，感触太多了。

（原载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桂林《大公报》）

辉煌的战绩

前这两天，我空军美志愿队在缅甸连创敌机，造成前所未有的辉煌战绩，这是令人闻而兴奋的一件事。

太平洋战事爆发以来，敌机到处横行，所向无阻，唯有缅甸天空，却始终没有它活动的机会，来一次，打一次，来一架，打一架，使敌机视为畏途，这就不得不归功于那些勇敢侠义的美国朋友，他们拿生命来保障我们西南大动脉的畅通无阻，这种行为，是人类道德的最高表现，应获得任何人的崇敬。

我们谨以至诚的心，祝福这班美国朋友们的健康！

（原载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桂林《大公报》）

佐藤使苏

日本驻苏大使建川美次辞职，改由佐藤尚武继任。佐藤在日本外交界服务三十余年，历任驻比法意大使，并曾于林銑十郎内阁一度任外相，资格不算坏，但人却很平庸，缺乏魄力，是一个唯唯否否的人物。

自从苏联参加二十六国宣言以后，苏日关系的前途，谁也看得透。所以无论日本派什么人使苏，在未来的苏日关系上，都不会发生一点作用。

（原载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桂林《大公报》）

英军袭法

英国伞兵在法沦陷区着陆消息，使人颇感兴趣。虽然是偷袭性质，但并非全无作用。

英国人民曾组有志愿敢死队，专门突袭法国沿海德占领区，因为事先有周密调查与准备，故每次均能有相当收获。这是“神经战”，叫德国守兵夜难安枕。这种游击战术，海陆军都试过，使用伞兵还是第一次，这证明英国对于现代战争的准备，确已有了进步。

（原载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桂林《大公报》）

佐藤与来栖

东京发表佐藤尚武为驻苏大使，以代建川美次。这又是日本外交姿态值得注意的一幕。

建川之使苏，是在前年冬季，那时正当日本外交陷于绝对孤立的时候；松冈一面派野村赴美，一面派建川赴苏，图缓和国际的包围，以便日本有从容准备争取主动之余裕。野村在华盛顿的成绩，是促成了美日谈判，把美国外交界引入五里雾中，松弛了美国的戒备；直至日本对美“先战后宣”，向珍珠港作无耻的袭击，美国才明了野村是一个大骗子，是一个享受外交特权的特等间谍；而在美日开战前最后五分钟，日本还派来栖三郎为“特使”，兼程赴美，作最后的欺骗。日本这次在太平洋初期的获逞，在珍珠港偷袭的成功，功劳簿上，野村和来栖应列第一，这是毫无疑问的。

建川呢，他赴苏的任务，主要也是为欺骗苏联，一年余来，他唯一的“成就”，就是经松冈亲自出马促成的“苏日中立协定”。这一纸协定，当苏德开战后，实际上便废弃了一半，等到太平洋大战爆发，二十六国发表联合宣言，更完全成了废纸。一月二十一日东条对议会致词，开头就说：“北方之防卫，固若磐石。”那是他心中怀有鬼胎，才不觉冲口而出。太平洋战事已甚扩大，暴日很少把驻在伪满的军队调出来，并且最近还对绥西进攻，这都说明暴日之未忘情于北方。二月十一日东条又对产业工人演说，谓“全面战的最高峰尚未到达”，更是言中有物。敌寇的心目中，无时不想侵略苏联，但一则因为苏联最近对德抗战的日渐好转，再则因为它自己方以全力在西南太平洋攻略，所以不得不暂时忍耐，以待时机，那时候，便是希特勒发动春季攻势的

时候。现在，它派佐藤赴苏，企图掩护对苏进攻的准备，那正和美日开战前夕派来栖赴美一样，是一种外交的烟幕，根本谈不到它对苏有丝毫的诚意。

我们知道苏联当局最富于警觉性，而过去八个月的英勇抗战中，也确实证明了它的伟力，它始终未曾失掉制空权，而坦克的数量也不少于纳粹。至于苏军作战的英勇与不怕牺牲，更已为世界所共见。在德军攻势猛锐之时，苏军节节抵抗，至万不得已时则使战地化为焦土，不以物资资敌，这如同乌克兰的情形。也有大勢已非，但苏军效死勿去，卒使敌军无可如何，这如同列宁格勒的始终坚守。苏军有这样强健的作战能力，有这样坚决的牺牲精神，在节节奋战之下，以血肉争取时间，所以中路敌军虽已迫近莫斯科城郊，卒使希特勒蹈了拿破仑的覆辙，在冰天雪地中遭受到败绩。苏军现在正四面八方的向敌军反攻，德军也正在冰窖里处处饱尝铁拳。纳粹兴兵两年来，叱咤暗哑，风云变色，何等威风，却不料在苏联大栽筋斗。这证明了苏军的战斗力，也证明苏联当局过去虽曾与希特勒虚与委蛇，而实际准备则始终不懈。

现在，纳粹虽失败，但决不甘心，暴日的蓄志侵苏，亦已有年；现当其在南太平洋微幸获逞之时，自然更想巩固北太平洋及大陆上的地位。轴心的四月攻势，苏联最该警戒，一要警戒纳粹寻仇，二要警戒暴日妄动。苏联有坚强的大军在，自然无所恐惧，但也应早为之备。把大军配备好，是一种准备，同与国建立患难关系，也是一种准备，总之，我们希望友邦苏联现在都应该赶快准备。要认清佐藤的使命，是和四月前的来栖一样，是想在发动进攻前作最后的外交骗局，千万不可上他的当！

（原载一九四二年三月二日桂林《大公报》）

希特勒出马了

传希特勒到了基辅，成立司令部，准备以五百万人，发动春季攻势。

这话如果确实，可见希特勒是下了一笔最大的赌注，而他的目光则在高加索；高加索不但有油，还可入中东，取印度，和他的小伙伴拉手。

轴心这个攻势发动了，英美如果还是袖手旁观，那不但误人，也是误己。

（原载一九四二年三月十日桂林《大公报》）

论贪污案

最近陪都方面，轰传一件规模相当巨大的贪污案，据本报渝版载称：“震动西南金融界之中央信托局职员林某大贪污案，主持当局在缜密调查中。林某现留渝看押。其在缅主管运输，牵涉方面甚广。经长时间之调查，认为似尚有主犯在内。且贪污款项不止三千万余元。”该案轮廓，大致如此。由此可见其范围之广，款目之巨，更就其机关性质言，则为国家所办的事业，尤其军兴以来，代理公家经营买卖甚巨，凡此皆是造成世人瞩目的原因。现在该案尚在“缜密”调查中，当局自将依法办理，此刻似宜保留批评，而仅就一般原则，简论贪污案层出不穷的原因。

中国数千年来传统的旧道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教人廉

介，所谓“临财毋苟得”，“一介不苟取”。以及戒“贪”戒“得”，均是其义，曩昔官员，恒以“两袖清风”、“死无遗产”来表现一生的廉介，博得举世的赞美。民国以远，竟尚功利，几目廉介为迂阔，终之，好财之念战胜好名之心，堤防既决，人欲横流，几如洪水泛滥，不可遏止。国府成立以后，三令五申，严禁贪婪，“七七”之前，朝野引贪污为戒，除极少数特殊人物外，几于无人敢冒不韪。及抗战军兴，政府各级官员，能守法奉公者，固然甚多，而凭借职位权势，经营非法买卖，大发国难财者，亦所在皆是，尤其是办理统制运输税收检查等部门的人员，在贪婪环境中，耳染目濡，苟非洁身自爱，廉介自持，即易流于贪婪的一途。迄于今日，已有积重难返，举世滔滔之感，我们盱衡全局，认为此种恶习，倘不能集全国上下之力，从事扑灭，势将影响及于抗建大业，我们如骨哽在喉，必须大声疾呼，以警戒国人。

我们相信，过去一部分政界贪污的养成，不外以下三种原因：（一）掩饰蒙蔽之风盛行于若干机关之内，属员对于上级长官，都有一套掩饰事实，蒙蔽真相的本事，上级长官平时专喜听顺耳之言，观谄媚之色，属员则当面尽阿谀之能事，背后肆作弊之手法，辗转相欺，各自效尤，久而久之，长官聪明尽塞，作恶者得为所欲为。（二）机构不健全，组织欠严密，政府年来举办新兴事业，或者图加强效率，每每添设机关，而新机关既立，旧者并不取消，迭床加屋，权限欠明，效率不彰，狡黠之徒，得以窥覓罅漏，为作弊之门。另一方面，人民因一事两辖，既须求于甲机关，又须乞灵于乙机关，费力费时，受累受气，令人民感觉到扰而不安，下情益难上达。（三）监察机关，虽遍设于中央及各省，但监察权的行使，显然不够，譬如国家机关人员的包庇囤积，各地税收机关人员，对过往商民旅客的留离浮收，若干运输统制机关人员的假公济私，妨碍疏运，民众均怨声载道，呼吁无路，然而未闻监察机关检举一人，弹劾一案，充其量不过是弹劾邹秉文等一事，其实较邹秉文案，情节重大者，不知更有若

干。

我们以为欲根绝贪污，必须从上述三事，努力改革，尤其政界掩饰蒙蔽之风，为养成众恶之源泉，若干长官，宜惕然戒怕，多注意一般民情，勿受下属蒙蔽，更要多听谏谏之声，勿再喜诺诺之音。政府对于今日最不理人口的运输税收统制事业等，必须随时派员密查，对于人民的告发，必须虚衷接纳，彻底严查。我们虽不敢即望做到弊绝风清的程度，但至少亦望当局要做到尽其在我，使国法有灵，纲纪得伸，此中所以培养元气，增厚民力，用助抗建大业的完成，影响至大且深，不宜漠视。

抑近年中央及地方当局，求治甚切。举一新政，立一机关，动机无一不是求好，而既办之后，每不能贯彻初意，甚或徒资不法者的作弊阶梯，其原因即由于上级主管机关监督不力，指导无方。故今后对于人才的登庸，机关的组织，尤要加意审察，不得粗制滥造，以贻国家人民无穷之患。当此胜利在望，曙光将现之际，我们深愿国家政治愈趋清明，俾兴军事各方配合，立下百年不拔的基础。

（原载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日桂林《大公报》）

救灾！救灾！

自当局发表关于桂省各县灾情以来，社会人士莫不予以最大的同情与注视。据本报上月二十七日揭载的报告，本年上半年受水灾者，有阳朔、平乐、恭城、贺县、昭平、苍梧等三十二县。受旱灾者，有灵川、永福、岑溪、平南、柳江，雒容等三十二县。受虫灾者，有灌阳、昭平、蒙山、荔浦、恭城等十四县。受风雹灾者，有昭平、宜山、武鸣、乐业等六县。因此农作物损失

颇多，经估计：水稻减收约874,867担，陆稻833,073担，玉米644,294担，其它约114,585担。灾民达三十余万。此外尚有数县续报旱灾。各区灾情轻重不一，但以灾区范围之广，灾民为数之众，不能不谓为严重。

目前的问题，无非如何抢救。截至目前止，我们知道仅有桂省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提出二十五万元，作为灌阳、邕宁、博白、玉林等受水灾较重之十三个县份急振之用；至于阳朔、东兰等受水灾较轻之六个县份，则由各该县提用县救灾准备金，从事救济。未曾受到救济的地方尚多，例如怀集一县在八月间已有饥民六万二千零二十八人，内中能食米及杂粮的仅一万八千人，食杂粮和草根者共约两万人，其余均以芭蕉根、土茯苓等物充饥。又如苍梧一县，灾民达十余万，省救灾准备金委员会仅拨发五千元，当然无济于事。据本报昨天消息，桂省府前请中央拨款三百四十万元，业经行政院批复，交由中央振济委员会核办。本月十二日振委会电知桂省府，该项振款及振济办法，已呈请行政院核办中。救灾如救火，我们希望行政院马上即可批准拨发。

正如某长官所说：“救济，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德意，实际上，杯水车薪，是于事无补的”。但是，几十万灾民正在水深火热中，只要让他们暂时松一口气，也是值得火速去做的。我们希望当局：在中央振款拨到后，立即斟酌各地灾情，妥为分配。

（一）现在炎暑已过，入夜金风迫人，灾民必须有茅屋栖身，粗衣蔽体，才可以免于疾病死亡。对于无家可归之灾民，望各地当局设法挪用庙宇祠堂或建盖茅屋，尽量收容。各县仓库存米，可能时先行拨借救济饥民，并设法采购平价布匹及向社会人士征募故衣，分发应用。（二）动员灾区乡镇村街甲长，督促农户，扩大冬作。当局应与有关金融机关商办农贷，并大量采购种子分发播种。桂省现在耕地逾四百八十万亩，倘能努力增产，冬作收获良好，灾民今后生活，尚可望其好转。（三）各灾区灾情，应派员视察，酌量实在情形豁免或减少征收本年田赋。闻省当局对此

已有新决定，此举实行后，当可减削灾区民众不少负担。

然以上所说，不过是消极的步骤。我们以为今后仍须有更积极的手段，去防止天灾再度发生。水、旱、虫灾一类天灾，并非不可避免，在这二十世纪科学的时代，与其说这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这是靠天吃饭者应得的祸果。如果明年夏天天公不作美，再落下那么多的雨水，很可能再制造出几十万灾民，那时我们除了再发几百万元救济之外，是否别无更好的办法？我们真要设法战胜天然，科学是最可靠的援军。这次水灾系由于抚河、西江、郁江同时泛滥。为什么要泛滥？怎样才可以免于泛滥？我们希望当局找一些水利工程专家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工程也许需要很大的经费，但会收到很大的结果，就值得我们设法去筹措。现在各地因为燃料涨价，斩伐林木的事情，在所难免，这也是促成大水灾的一个间接原因。当局不可不责成各地行政人员，切实奖励植树和禁止采伐。至于害虫为灾，我们也要有大批农业和昆虫方面的专家，给我们找一个解决方案。鉴于本省当局对建设的努力，经过这次天灾之后，我们相信一定会更积极地从事这一类防灾的工作。我们愿拭目俟之。

（原载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四日桂林《大公报》）

中秋杂感

今天中秋，是一年中月亮最圆最皎洁的一天。这几天天气特别晴朗，入夜即成一片琉璃世界。但这皎洁的朗月，却也照彻了人世间的一切不平相。

今年的桂林，似乎特别景气，大街中颇有熙攘往来之象，几家月饼店户限为穿，橱窗里竟有高标千元一枚的月饼，而千数百元

一瓶的白兰地，三数百元一听的香烟，据说也颇有人购为礼品。大家说，桂林变成“小上海”或“小香港”了！但我们细看这社会的底层，有多少家庭为这佳节而焦愁？高物价平常便把人压得喘不了气，这几天肉类蔬菜无一不涨价，债主临门，子女啼泣；在他们看来，月亮也是那么愁眉苦脸！但这些人，毕竟还有一个愁苦的家，至于那些在抗战中破碎了的家庭，则“团圆节”更成为讽刺了。“几家欢乐几家愁”，自古已然，于今为烈。

同一月亮，照着桂林及后方许多都市，也照临所有前方及沦陷区，而景色便大不相同。今年中秋的劳军运动，似乎特别沉寂。我们在后方安居的人，难道竟忘了前线六百万战士为国族而流血拼命！长期的抗战，也许使若干人麻痹了，但浙赣前线传来血腥的事实，敌人的烧杀，千里成墟，在四个月前，大家也曾惶虑到后方的安全么？今天我们依然那么安适地过节，这是靠谁的赐与？

今年因为物价飞跃腾涨，许多公务员及薪水阶级的生活更苦，而前方战士的生活尤苦。抗战本是艰苦的工作，为了争取胜利，争取民族万世的自由独立，吃些苦，自然是千该万该的，何况我们中国因为物产丰富，最低限度，吃的问题，还没有欧洲各国那么严重。问题是苦乐太不公平。尤其是那些发国难财的，挥金如土，气概万千，他们不仅造成了物价的上涨，而且也扰乱了后方的秩序，冲淡了社会紧张的情绪。王船山曾谓：“贾人者，污吏所亟进而宠之者也；污吏非贾人，无以供其不急之求，假之以颜色而听其辉煌，复何忌哉。贾人之富也，贫人以自富者也。牟利易，则用财也轻，志小而不知裁，智昏则不恤其安，欺贫懦以矜夸，而国安得不贫。”这正是今日抗战后方的写照。

汉高祖定天下，第一道命令，便严禁贾人衣锦绮，操兵乘马。因为他对于楚汉战争时那些“发国难财”的商人实在深恶痛绝到极点了，所以严定这精神制裁的办法。现在我们国家对于这些投机商人，自然不能用这种严厉的办法来制裁，而且抗战以来，

许多坚苦思贞的商人，出钱出力，尽了本位的职责，他们和投机商人间，很难有显明辨别的办法；假使一休制裁，那决非事理之平。但在积极方面，我们对于为抗战特别尽力牺牲的人，尊重表扬，使他们精神上获得相当安慰，却也千该万该。大家知道抗战军人是最神圣的，公务人员及教育人员都是最清高的，但究竟社会对于他们表示了多少尊敬？“只认衣衫不认人”的陋习，依然很普遍。不久以前，某处便曾发生过银行女职员侮辱军人的事；而一般说来，今日在社会上高视阔步的，还是那些投机发国难财的商人。这种不平现象，实在应该痛加改革。我们希望政府尽可能提高国军及公务人员的待遇，同时，我们认为，社会对于这些人，也应有显明的区别办法。譬如说，明定某一二种颜色的衣服，非军人及尽力抗战工作的人，不得服用；这种衣服，尽管是土布，却表示崇高和名誉。所有公开集会乃至娱乐场所，都应把他们列于最优越的地位；他们的子弟，有尽先投考公立学校的权利；公路铁道交通，应尽先让他们买票，而特别予以优待。总之，所有公私的场合，都应特别优待这些荣誉的人。这也许是我们的一种幻想，但国家社会，对于这许多为抗战特别尽力的人，崇功报德，应该早定实际优待的办法，而间接予那些不义之徒以裁抑。否则何以平民愤，励斗志？

我们希望有一天，抗战的后方，也象中秋月那么皎洁，那么毫无缺陷。

（原载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桂林《大公报》）

退到哪里为止？

新加坡失陷后，邱吉尔首相又发表一篇滔滔的大演说，修辞

是如此的美丽，分析全局是如此的清楚，尤其态度之坦白诚挚，使人得一明朗之印象，此一身肩空前危局之政治家，虽在疾风骤雨之中，而面不改色，从容应付。这确是一般人所不能想象的。

这篇演词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说明英国过去在远东确无充足之准备；而日本则处心积虑已久，即使英国早作准备，也不能避免今日之惨剧。最后则认为英国必能发挥其传统之美德，突破难关，莫立最后之胜利。

从太平洋大战爆发后，敌寇每一次获逞，英美领袖每一次都发表谈话，重申最后胜利之信心。我们对于民主国最后的必胜，当然绝无怀疑，但有一点不能不问，即英美诸盟邦，究竟准备以何处为后退之最后止境？以何处为策动反攻的根据地？

这一问，我们认为很有必要。我们从邱吉尔氏演词中，可以体会英国处境的困难；更从过去两个月的战事过程观察，英国之主要力量，始终未对新加坡作有效援助，而仅赖少量空军，协助守军作“争取时间”之战斗。在英国的算盘上，自以保卫英伦三岛为第一义，所以邱氏在此次演词中，既坦白说：“本人所述前途困难之所在，其发生之地点，距英伦尚极辽远，较诸过去野蛮人一度蹂躏英伦各地，致使全英人民悉处身于战场中者，情形迥然不同”。又说：“危机发生之地点，既较辽远，欲求英伦人士负此艰巨，自更不易。”以邱吉尔首相之目光如炬，还不免有此短视的言论，其他也可以推见了。我们姑不论国际危局之急待群策群力奠定，即就英国本身言，其远东利益如一旦全部瓦解，对于其根本生存之打击，何尝小于英伦之受威胁？英国是一个海军国，海上霸权一倒，则根本无法苟延残喘。有人说：英国的根本政策，是以全力保卫三岛，同时，加紧完成护军计划，以争取有利之时机。不错，时间是与民主国有利的，美国罗斯福总统也曾一再强调未来胜利之把握。但这种政策，也必须有一最后限度。譬如我们中国在抗战初期，也曾运用“空间换时间”的战略，但到武汉失陷后，蒋委员长便宣布第一期抗战已结束，今后将以

平汉粤汉两路西侧为反攻之根据。三年余来，我们无论如何艰苦牺牲，始终守住这一线，乃得以逐渐奠立反攻争胜之基础。那么，英国最后准备反攻的地方又在哪儿呢？再就时间的因素来说，德国过去是一个无的国家，所以不愿把战事拖长，但到它全部囊括欧陆后，它也可以“以战养战”了。同样，日本过去是怕经济封锁；现在，它占了许多宝库，要高唱“反封锁”了；这些宝库纵使已破坏，却未必不能恢复，诚如邱吉尔首相所言，我们不可太低估日本的实力，它在过去四年半这样困难的泥淖战争中，还能积极充实军力，提高其作战水准，今后它凭藉南洋之财力、富源，又何尝不可与英美作扩军之竞赛？何况世变方亟，万一敌寇竟通过马六甲海峡，进窥印度，而同时纳粹又在北非发动大规模之春季攻势，东西配合呼应，英国又将何以应付？总之，我们谅解盟邦英国的困难，但不能不期望其能坚定信念，放开目光，早作全盘之布置，以临日渐难险之危局。邱吉尔氏说：“英美海权之被推翻，有如坚固之海堤之决口，汇集之海水汹涌而至，洪流所至，庐舍为墟，波及甚远。”这个譬喻，非常恰当。当十年前，甚至三年前这海堤刚裂缝时，补救本来轻而易举。而即使在现在，洪流虽已滚滚，假使能发动最大的力量，予以堵塞，至少还比坐待时机为得计。

邱吉尔首相对中苏两国的英勇抗战，赞扬备至；其论中国，则谓：“吾人今日对中国人民奇异之实力，已可加以估计；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下，独立与可怖之侵略者作战达四年半之久，使侵略者仍徘徊于战场之上”。我们对于这赞美，唯有感慰。中国的成就，也许并不如邱氏之所称道，但我们有一点可奉告盟邦当局，即中国自抗战以来，即抱定不惜牺牲不计成败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我们在抗战初期所以能冲破难关，重挫暴敌，主要就是靠这种精神。

（原载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八日桂林《大公报》）

太行山之战

最近敌人到处蠢动。湘西华容外围据点展开争夺战，敌人增援反噬；湖北龙泉铺敌两路北陷天宝山，徐真庙；钟祥敌北犯长寿店，宋河敌犯刘家港；河南长台关敌犯三宅庙，修武、焦作敌分股北犯山门口；绥远、包头敌犯营盘召；浙江兰溪敌分路犯厚仁市及毛山；广东增城敌犯正果墟，福和敌犯潭墟，神冈敌犯双凤山；新会敌犯大泽，江门敌犯井根；此外，山东滕县、鱼台，江苏徐州、沛县，山西，滇边等地之敌亦均有所举动。目前战事最激烈的是太行山的周围。豫北安阳、汤阴、淇县、修武、焦作、博爱及晋东南晋城、高平、长治、壶关等地之敌，近由徐州、石家庄、太原方面增来敌军约四万余人分股向太行山脉地区围犯，陵川、林县等地区均在血战中。

统观上述的战况，敌人蠢动的范围不为不广，其目的所在，亦甚明显，总不外企图（一）打击我野战军实力，（二）“扫荡”我游击队，及（三）控制物资输送路线及从事夺掠。目前滇边、鲁东以至鄂、绥、浙、粤各地的敌人多已受创退去，即湘西华容及太行山一带的残敌，从其来犯的实力与我军杀敌的经验以观，料亦不能轻易获逞，其原来的企图，实可预断其失败。

敌人久已宣传先以全力解决中国，尤其在罗斯福邱吉尔两氏把进攻日寇的时间与地点暗示出来后，敌人之到处蠢动，几令人怀疑敌人果欲发动此种狂妄的尝试。现在前线的事实，已证明敌人这种尝试，尚未敢发动。再看敌方军务长佐藤最近向敌议会报告，要普遍运用外交、思想与经济的方法，去配合战争；也许又有人认为日寇今后仍将尽量利用傀儡，榨取物资，制造谣言，以遂其阴谋，不敢把太多残余力量使用于中国战场。这些推测，不是

无所依据，不过我们为了戒慎恐惧，确保今后的胜利，总以不低估敌人的企图为宜。最近英美的生产及军备突飞猛进，已令日寇坐卧不安，日寇此时势不能不以全力向南洋及中国侵占区加紧榨取，以冀苟延残喘，日前东条之访问长春、南京，其作用总不外如此。至于军事方面，日寇知道中国是进攻日本最好的基地，他们决不会轻轻放松，而以小规模之骚扰了事。三月中曾传说一部分关东军由满洲里撤退，又传敌军在华北设防，再揣度一下敌议会通过庞大的预算用途，我们安能断定日寇不会采取更大的举动？现在北非战事尚未结束，欧陆新战场仍未出现，纵以最顺利的算盘打算，此时距英美移师东来解决日寇的日子，至少有一年以上，在这悠长的岁月中，谁敢保日寇不会倒行逆施，冒险图逞？

所以，对于当前的战局，我们仍须审慎应付。（一）粤北一线现在虽已沉寂，但敌人每次进犯湘北，总以该线为呼应。目今湘西容华一带激战未已，固应加紧重创残敌，维持我们在该方面的要点，即对于粤北之敌，亦勿恃敌之不来侵，而应更加戒备。（二）滇边之战，因缅甸雨季将届，料将有若干时期的静寂。但日寇为保卫缅甸的外围，防我反攻，以后仍会以攻代守，随时企图骚扰，我军无论何时，均应整阵以待。（三）太行山一带我军是华北敌人最大的威胁。敌人迭次企图“扫荡”都不获逞。这种威胁一天不解除，敌在华北一天不能安枕。如果敌人准备在中国战场与盟军周旋，他们向这一带尽量施以压力，自系意料中事。以太行接近山西晋城，连亘河北诸州，蜿蜒数千里，羊肠险道纵横，纵敌人有重武器，亦不易轻进，我军务须再接再厉，使这一个据着南北咽喉的山脉区域，固若金汤。

最后，我们针对敌人的企图，更要随时充实我野战军的实力，发动更大规模的游击战，不但避免物资的损失，且进而破坏敌方在侵占各区的榨取手段。这不独是我们本身的责任，同时也是各盟军的责任。

（原载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林桂《大公报》）

发扬忠烈精神

最近报上登了许多死难军民的忠烈事，迹在神圣抗战中，前线的将士，战区及敌后的人民，或固守阵地，壮烈牺牲；或被俘不屈，从容就义；或裹伤再战，弹尽援绝，与敌同归于尽；或以伸着倡率乡里，杀敌建功；其事皆悲壮绝伦，读之感愤。我们愿回溯抗战以来的忠烈事迹，并进而一申其义。

我们的抗战将近六年，六年来的抗战史，实在是无数忠烈军民的碧血写成的。从战事开头说起，淞沪之役，姚营扼守宝山，全部殉职。大场江湾撤守后，谢晋元率部退入四行仓库，孤军奋斗，至于最后。晋北忻口之役，军长郝梦麟战死。第二年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我军寸土必争，前仆后继，其间不知多少可歌可泣之事。二十九年襄河之役，张自忠将军以集团军总司令的地位，躬亲冲锋陷阵，卒因众寡悬殊而遇难。噩音传出，领袖为之挥泪。去年国军援緬，戴安澜师长死之。我中国军人精神更远扬于国外。以上仅就大家习闻者叙述，还有每一战役中如所谓“活炸弹”之类的烈士，以及在敌后苦撑的我正规军及游击队，我们相信正有无数的忠烈事迹尚埋没而未闻于世。至于我们的空军，在年龄上还是幼年，在数目上更居少数，然而六年以来，以少敌众，以弱抗强，其勇敢牺牲的精神尤其可敬。上海之役时，空军阎海文不幸落于敌军，被敌包围，乃举枪毙敌数人，最后饮弹自尽。武汉保卫战时，我空军轰炸长江敌舰，有因机身重伤而撞敌舰同归于尽者。即就我们近年在重庆所目睹的空战来说，我空军往往单机冲入炽盛的敌机火网，而将它冲散。这都是中国的军人魂，也就是中国的国魂。

这些忠烈事迹且不限于军人。战区及敌后的老百姓。有的协

助国军杀敌，有的从事对敌破坏工作，有的因不肯附敌，而壮烈捐躯。上海胡阿毛不愿为敌人驾驶军车，毅然将敌人的军火一车连同自己开到黄浦江里去。在敌后，许多耆老因拒任伪职，而死于非命。从事新闻工作人员，如朱恠公、张似旭，冒万难，与敌伪奋斗，而惨遭毒手。长沙会战时，湘北的民众拿着扁担，锄头，菜刀，与敌搏斗。在各地敌寇暴行中，常有稚龄儿童因不肯为敌人带路而牺牲。不愿被辱的妇女，或投河跳井，或设计与敌偕亡。这些忠烈事迹，恐怕每一天都在发生。六年来，我英勇军民，已不知有多少万人轰轰烈烈的死去，或悄然无语的死去。其事之悲惨，其情之壮烈，都足以垂照史册，为中华民族留下不朽之荣。

这种壮烈牺牲的精神，实为我民族精神的表现。我们是被侵略者，我们是哀兵哀民，我们的抗战是拼全民族的生命，以争取国家的生存。我中华民族笃爱和平，素以穷兵黩武为戒；但对于外来的侵略，我们先哲的垂训是御侮，是执干戈以卫社稷，且教人临难毋苟免，教人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几千年来，我民族熏陶涵沐于此种文化之中，因此历代遭逢外患之时，忠臣义士，史不绝书。这一次的外患是空前的，而我民族精神也空前发扬，故其所表现是全民抗战。六年以来，将士哀兵迎战，视死如归，村老稚子，匹夫匹妇，都能取义成仁，守民族的大节。他们未必受过高深教育，未必经过政治训练，而能积极的体认“我死则国生”，消极的保持个人清白，流血千里，忠烈相映者，实我民族精神为之。若问我们何能以劣势的武器，幼稚的工业，与强敌周旋，亘六年而不敝？曰：恃有这种民族精神。有这种民族胜精神在，我们的国家必不会亡，我们的抗战必可获得最后的利。

中枢对于死难的忠烈军民，均优予抚恤，或赐题墓碑，并将其事迹编入忠勇军民题名录，以资表扬。崇德报功，国之大事，自应敬谨将事。不过抗战以来忠烈军民事迹，或偶见诸报载，或

由战区军事机关辑录成册，而未统一的正式公布。我们认为凡忠烈军民死难事迹，应由军委会及内政部按期正式公布，刊印专册，并一体入祀各地的忠烈祠，以示隆重表扬。对于死难军民的遗族，应由国家维持其生计，并使其子女有受完全教育的权利。

我们要报答死难的同胞，最积极的途径还在发扬其忠烈精神，完成死者未竟之志。凭了忠烈军民的鲜血，国家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机，现在已看到胜利的曙光；然而大仇未复，失土未归，寇焰未戢，后死者任重而道远，一步也松懈不得。而环顾后方一般气象，实在还不够蓬勃奋发；国家前途虽然一片光明，但也还残存着不应当有的缺点。读死难军民的事迹，我们应当感触重重，而积极发扬其忠烈精神，以孤臣孽子的心情，扶持这国难坎坷的国运，击溃大敌，争取胜利，则死者才可瞑目，而生者始告无愧！

（原载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桂林《大公报》）

重建新桥

昨天两次警报，城内近十万市民，均出东江赴七星岩躲避。因为连接两岸交通的桥梁，只余一花桥及一小浮桥，其拥挤轧砾，摩肩接踵之状，为向所未有，烈日酷热，挥汗如雨，行者叫苦，见者叹息。盖自上次大水，新桥及龙隐岩小木桥被冲断以后，将届两月，此两月中，东郊一带人士，饱受交通艰阻之苦，车辆往来艰难，日用物品运费损失不资，然犹幸平靖无警，虽觉通而不畅，但稍事隐忍，尚勉能因应。独至猝遇警报，则非东郊之居民，亦必匆迫出城，争赴七星岩洞，于是人众桥少，动辄遇

到艰阻，人人不愿走此拥挤杂沓之路，而人人不能不忍受热汗，在人丛中往返，是故新桥之不早修复，由昨日的两次警报，而弊害毕现。料知凡是奔赴七星岩躲避之市民，将无一人不埋怨修桥工作之停滞，将无一人不渴望官厅计划修复新桥。

东郊一带，年来呈意外迅速的发达，居民日多，新建筑日增，气象蓬勃，方兴未艾。回忆抗战以前的一片荒凉，固有霄壤之别，即与两年以前相较，亦已不胜枚举。现在这一角落里，拥有两广监察使署宪五团等重要机关；有卫生重镇的省立医学院；有高等学府的桂林师范学院及实验中学；有三家日报两家晚报及中央通信社；其他有名的军政界高级人员，工商界闻人，更不知凡几。所以东郊这一地域，在桂林市不能不承认它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一切公私事业，都不能离开适宜畅达的交通，殆又为世人所公认，所以新桥的重建，乃属势有必至，理有固然。夫自新桥被毁以后，东郊交通，只靠一花桥，而所经之路，在桥东一段，则有迂回曲折，崎岖难行之概，而且桥属石级，车辆甚不方便，兼之管理无人，桥面本已窄狭，两旁复有小摊，及卧地之乞丐，甚至若干板车，每喜在桥上逗留，于是行人拥挤，秩序零乱，其污秽，其恶臭，试与相去里许之中正大桥相比，其原始意味，至少要浓厚十倍。至于新桥旧址，左近虽搭有浮桥，而车辆不能通过，行人亦并不方便，一阵大雨，河水稍涨，即可使浮桥失踪，其不可靠如此。

或有人以为市府财政困难，现在工料太贵，恐非能咄嗟立办。其实不然，官厅平日所司，本属办理众人之事，反过来说，众人当为官厅之助，官厅应该居于倡导的地位，或未雨而绸缪，或发踪而指示，定计划，决方针，负荷责任，勇往迈进，其必受到一般人之赞助与合作，乃断然无可怀疑。设若以修建新桥论，果使工料贵，费用巨，官厅财力，有所不及，则市民方面，尤其在东郊一带者，当不乏有急公好义之人，起而募捐集资，一呼百应，相信百万巨款，何难立致。这几天，有许多朋友谈天，都集

中于重建新桥问题，甚至愿意由人民自行捐款，以促成修桥工作的开始，可见一般人对于东郊交通的渴望。归根结底，这样一种建设，由政府与人民密切携手合作，乃天经地义之事。但是，如何发动，如何策划，官厅责无旁贷，宜首先忧人之忧，急人之急，善察人民之愿望，因势利导，则必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抑又有进者，过去新桥建筑，因陋就简，全用木柱，大水一至，辄遭冲毁，每年随冲随建，消耗颇为不资。今后为一劳永逸计，必延请工程专家，设计建立石墩，俾以后纵遇大水，亦不足为患，虽然需款较多，然不可不有此决心，为百年大计打算。远者不论，以近在咫尺之花桥言，该桥建于明景泰年，前清道光甲辰年间，桥曾倾圮，乙卯刚岸曾倾圮过半，经修复后，迄今又百余年，当时无所谓工程专家，无所谓科学测量，而至今巍然无损，可证当时建筑之坚固，工程之精到，虽列于今日科学昌明之时，亦决无逊色。我们相信，以今日科学的力量，凭工程上的进步，将新桥修建成为一座近代式的桥梁，决非难事。

总之，重修新桥，为东郊十万市民所瞩目，论事论势，断不可再缓，爰郑重唤起当局之注意，务要迅速定计，及时倡导，当能获得市民的热烈拥护，为市政发展计，为行政效率计，愿当局负起责任，勿再瞻顾。

（原载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桂林《大公报》）

墨索里尼的悲剧

墨索里尼前天悄然去职，把军政大权奉还意王，这消息的突然宣布，似意外，亦在意中，其原因何在，试作一简单的推论。

第一，墨氏的下台，反映出法西斯的失败。据路透社记者的

观察，最近意大利的政情，显示着法西斯党已不能控制意大利，而墨索里尼本人也控制不了法西斯党。这一句话已足以说明一切。法西斯主义的构成，原来和其他的主义有一点根本不同，因为它是一种没有体系的主张，亦即所谓“无思想的思想”。墨氏的成功，完全是乘意大利第一次大战后的凋敝，社会动摇，政治破产，所以能登高一呼，徒从麀集，究其实际，则法西斯主义完全是机会主义。墨氏的政权，所以能够维持这样的长久，与其谓为得力于政治的清明和富强的努力，毋宁是由于他们使用宣传的麻醉和恐怖的手段，挟持人民。此外更企图以扩张领土的虚荣，来平抑人民的怨毒。在墨氏柄政的期间，意大利的社会，并没有一天宁息。这种的统治，当然不能不令民众发生厌倦。一九四〇年意大利的参战，更令法西斯党面对一个严重的试验。结果人民备尝了战时一切的苦痛，丧失了一切的殖民领土，尤不可忍的是替希特勒火中检栗，把军队派到国外参战，牺牲惨重，所以到现在众叛亲离，党纪涣散，事势所迫，使一个叱咤风云的墨索里尼，不得不挂冠而去。

第二，墨氏的下台，指示了轴心的解体。德意两国的勾结，溯源于一九三五年——三六年意阿战争时期。当时国联对意的经济封锁，形势严重，意国的地位，陷于孤立，惟有希特勒的德国，对意大利特表好感，此为德意姻缘的发轫。德奥合并问题发生，德意之间，利害冲突，但墨氏终屈服于希特勒的意志之下，个人威望，扫地以尽。意方参战后，屡战屡败，更令德国对意，有累赘的感觉，而意方对德，亦深憾其压迫与利用。两国在表面上，虽为轴心的伙伴，但实际则同床异梦，猜忌甚深。突尼亚之战，希特勒因助意作战，蒙受了重大的牺牲；意军在苏联前线，亦有惊人的损失，双方的肚皮里，俱有说不出的苦处。现在西西里岛告急，德军对意，并无巨额增援，最近的希、墨会晤，希特勒对墨氏，态度亦形冷落，因此种种，促成了墨氏下台的决心。总之，轴心的结合，完全建立在利害关系上面，利尽交疏，乃属

常态。不过盟军现已占领西岛的大部，美国本部的登陆，为期亦在旦夕，希氏在此共通利害之时，对意竟弃置不顾，预料其非具有他种心肠，即系势支力绌，自顾不遑所致。由前言之，鹬蚌相争，渔翁所利，由后观察，则盟国胜利的展望，尤属光昌。事实昭示我们，墨氏的下台，是轴心的解体。政权递嬗后的意大利，万难顽强负隅，而断臂折翼的希特勒，亦惟有终趋毁灭。

现在横亘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墨氏下台，对大战全局将发生何种的影响？（一）自轴心方面言，现在希特勒如不趁意大利发生政潮的危机，攫取浑水摸鱼之利，那么对巴多格里奥的新政权，即仍须全面支持。前一途径，惟有惹火烧身，加重德国的负担，意大利厌战的军民，对德已毫无好感，更不能出力相助；如出于后者，则意大利的新政权，是否能与希特勒沆瀣一气，犹有疑问，矧支持巴多格里奥与支持墨索里尼，究有何别？如柏林方面，对意暂采观望，见溺不救，则意大利终将向盟方作无条件的投降，使德国全陷孤立。所以意局的新发展，无论如何，于希特勒均属不利。（二）自盟方观察，这次法西斯的崩溃，当然较预期为早。意大利对盟方未来关系的一大障碍，因此廓清，这是可欣幸的第一点。其次，意大利新政府已声明将继续负隅，并不脱离对德的关系，这声明为意大利新政府应有的文章，不论其真意如何，盟方如能趁多格里奥徬徨不定之际，对意加紧压迫，必能收美满的效果。再进一步讲，意大利对德是一个赘疣，对于盟方，至多亦只是一个鸡肋，意大利的单独媾和，现前并非盟方的急需，而媾和后的影响，亦惟有徒增盟方救济的负担。不过意大利及早的解决，无疑的对直接打击希特勒，又可更进一步，这是值得欣幸的又一点。（三）意大利问题的解决，对太平洋当然将发生重大影响。日本法西斯的势力，第一个将感受到精神的打击。墨索里尼的下台，对于黠武的侵略主义者未来的命运，已给予一个清醒的启示。其次，因意大利威胁的扫除，地中海的航运，今后将可畅通，盟国在地中海的舰队，也有抽调的更多可能，这一

点对于英国在印度洋的制海权的恢复，将有裨益，而间接对于今冬缅甸的攻势，亦必能产生良好影响。最后的一点，意大利势力的消除，必可缩短欧战的时间，这目的达到后，盟方将能早日集中力量，对付日寇，这一事亚洲战场影响的重大，更不待言。

（原载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桂林《大公报》）

东条的会议

东条召开所谓特别作战会议，前任首相七人及重要阁员均出席，这一会议，必是有所为。

整个欧洲战局，轴心处于不利，以后更将不利。东条英机自然不能不着急，把前任各首相均拉来开会，正见其忐忑不宁，也正见其将有所举动。

日寇不会甘于坐以待毙，下一次的冒险行动是什么？还是一个谜。这一谜的揭晓期，大约已不在远。

（原载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桂林《大公报》）

希特勒病了

希特勒病了，而且颓唐沮丧，为势甚恶。

他为什么颓唐？为什么沮丧？还不是为了前线打败仗，小伙伴塌台。

轴心三角同盟，已去其一，其余两角，也摇摇欲坠，继希特

勒而病的，一定是东条英机！

（原载一九四三年八月五日桂林《大公报》）

要审慎考量

桂林市糙米限价，每百斤改至七百五十元，较原来的三百六十元加了一倍而有余。

这样一来，与实际白米的黑市，变为很接近，倒不得不替白米市价担忧。

现在新谷渐次登场，要说不是缺粮的季节。在事实上，或许有其困难，但民食问题也得兼顾。望粮政主管机关，审慎考量。

（原载一九四三年八月五日桂林《大公报》）

还不足深责

土耳其对盟国勿容战争罪魁的照会，将予拒绝，据说是因为与国际法原则不合。

土耳其自然有它的苦衷，大概（一）是要保持中立面目，（二）是怕德国打它，因之，不得不加倍小心。

我们同情于土耳其的地位，它能守住中立，不很容易，而且在过去，确有利于盟军。即使此刻胆子小一点，也还不足深责。

（原载一九四三年八月五日桂林《大公报》）

非离间即挑拨

《纽约时报》军事评论员鲍尔汶，发表文字，轻视中国军队，实在令人遗憾！

这种于盟国有害无益的宣传，非离间，即挑拨，徒供敌人谈资，其实甚蠢。然而我们应该明白，鲍尔汶的话，在美国，恐怕有一部分人，不免也作此想。而这类言论，足以离间中美感情，结果必甚不幸。

颜鲁尔上将斥为不公平，至少有一部分话，是中国人要说的。我们深喜美国尚有明白中国情况的人，但是此种类似中伤的浮言，若不予以廓清，则今后必将继续发生。

望大家多认识国际情势，多加意警惕！

（原载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三日桂林《大公报》）

好戏将上台

罗斯福总统与赫尔国务卿，艾登外长先后抵奎贝克。显示着罗邱谈话，已至密锣紧鼓，压轴好戏，将次登场。

这一会议，中央社记者说它“性质空前重要”，当然有所根据，至少也可以看出奎贝克空气的热烈紧凑。我们看英美参谋人员云集其间，各战场有关人员，也都赶到参加，则其为讨论欧洲战争，以及太平洋上战局，乃属无可怀疑之事。

更看赫尔、艾登之赶去，则知将来奎贝克会议结果，除军事而

外，还有重要的外交问题，现在盟国想对哪一方而应用压力，却是富有兴味的问题，待将来事实证明罢。

（原载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九日桂林《大公报》）

查出囤积

滇省政府封存银行仓库，查出布匹达十四万匹，值十四万万元，棉纱四万包，值二十万万元。活现囤积居奇的罪恶。

滇省府此举，洵足大快人心。不过依常人所知，做囤积居奇者，均背后有大力，而且也不一定就用银行的名义或仓库。

全国除滇省外，其余各省，也不会没有同样的情形，愿大家注意。

（原载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九日桂林《大公报》）

论养廉

昨天本报载，湘省府薛主席鉴于公务人员生活清苦，为鼓励守法奉公之风尚起见，特设法抽提各项盈余二千万元，拨作全省公务员养廉奖励金。此项设施未来的成效，虽犹难逆料，而其挽回颓风，整肃官常的用心，洵堪寄予同情。我们愿乘此机会，一抒对于清廉政治的感想。

中国数千年来，以廉洁为尚，《礼记》载“临财毋苟得”，《论语》称“子罕言利”，都是古时圣贤，嫉恶财利，提倡清廉的意思。

孟子既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立刻就发脾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当时大家以言利为耻，梁惠王一提到利字，他就勃然变色，教训了梁惠王一顿，所以我国传统的道德，历代圣贤相戒，都重清廉，视财利有如洪水猛兽，后来功利主义渐生，贪欲斯盛，然而还是暮夜怀金之类，不敢公然授受，所以有“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的话。

中国历代圣贤，不特对个人方面，提倡清廉，对于统治阶级也以聚俭克为掎大戒，《论语》载，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盖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此一段话，意在戒统治阶级的贪念，而另一方面，就是培养人民元气，所谓“财散民聚，财聚民散”，都是同样的古训。近几年来，一般人竞尚功利，举世滔滔，狡黠者不择手段，不计利害，惟以达成个人贪欲是务，忠实者犹知畏法避嫌，洁身自守，而生活清苦，贫富悬殊。故设若政府对此二者，无奖惩，无是非，则人人将群趋于贪官，以解决其个人生活问题，中国虽大，官员虽众，亦将无人甘为廉吏。

我们所感欣幸的就是中央及地方高级长官，莫不秉承领袖意旨，兢兢业业，克尽厥职，他们在政治上负有重责，对整饬纪纲，转移颓风，更多所献替，建树不少。现在为世垢病的是各地方的税务官吏，以及若干行政机关的员司，需索商旅，肆行榨取，尝听见某省某税务机关负责人，半年内获资千余万元，又有某偏僻地方税务机关，如何勒索等情事。本来此类事例，非中国所独有，但我们不敢相信，今世税务机关，竟无一奉公守法，廉洁自持的人员，但也不敢说税务机关以外人员，即悉为清廉不污的官吏，因为其间尽有国法所未及，监察所未周之处。而修养有素，一介不苟的人，以中国之大，断乎不是没有。

湘省府以奖励金办法，来移转政治风尚，改革官场习气，用意甚正大，在事实上也需要做一番。惟执行此办法，有一个原则，就是既称有奖则必有惩，而且罚得更要严厉一点，才能增加提倡廉洁的效力。因立法本意，在于鼓励公务员清廉，杜绝贪污。其实此乃走上政治清明的最起码条件，假使严肃一点说，凡是公务员都有守法不贪的义务，故一个公务员做到清廉，并不是一桩特别值得赞扬的事，因为依照国家法令，本来应该如此。而现在需要筹拨巨款，以为奖励之资，一方面可见清廉者之少，另一方面也可见当局求治之亟，我们衷心期待此项办法，能有圆满的收获。

还有奖励的决定，不外平时的监察与年终的考绩，此中斟酌损益，纵有一部分系凭诸成绩，但甚易涉及私人的爱憎，万一有之，则办法纵好，即不免有徒成具文之虞。因此，推行之始，不可不立定基础，执行奖惩者，必须超越个人情感，而惟一秉至公至正精神，做到受者心悦诚服，被拥者也无异议。但是并非简单易行，主管者不可独察，而要兼察不可偏听，而要兼听，简言之，“综核名实，信赏必罚”，要切实切实做到，才能无枉无纵，才能收挽救颓风之效，我们盼望湘省当局认真办理，彻底执行。

抑近年各地机关人员，贪污案件，所以层出不穷，其中也不免夹有经济问题的因素在内。或者待遇低，生活高，不足以仰事俯畜，或者经费过少，上级机关不予增加，以至不能维持，迫得自求生路。凡此种种，均足为易受利诱的主因，人非圣贤，孰能无惑。然而颓风日张，要非国家之福，甚愿关系各方，憬然省悟，痛改前非，大家一致回到清廉之途，不胜厚幸。

（原载一九四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桂林《大公报》）

行动要迅捷

罗斯福总统将于盟军进攻日本本土时，率参谋首长前赴澳洲。这是奎贝克会议后，盟国重视远东战场的又一证明。

从各种迹象观之，盟军将加紧对日进攻，毫无疑义。盟军何日进攻日本本土，虽未能逆料，但最能实现此项希望的，还是空军轰炸。

我们盼望盟军以迅捷的行动，来表示奎贝克的决议。

（原载一九四三年八月三十日桂林《大公报》）

丹麦反德潮

丹麦发生猛烈反德风潮，国王被拘，政府辞职，工人罢工，海员凿沉军舰。

这一串事实，都是十分壮烈，十分强韧，表现丹麦人民优秀自尊的风格。然而在另一方面，也是纳粹虐政，激之使然。

纳粹在欧，军事上虽未达完全失败之境，精神上则已遭受彻底的打击，象丹麦的反德，便是它瓦解的信号！

（原载一九四三年八月三十日桂林《大公报》）

论利用外资

此次中全会修正通过战后工业建设纲领，其第十六条明白规定：“为加速工业建设计划之完成，应欢迎外国资本与技术之合作。”同时又通过确定战后奖励外资发展实业方针，声明“今后中外合办实业，外国方面投资数额之比例，应不加固定拘束，公司组织除董事长外，其总经理人选，亦不限定为本国人。……至于将来国营事业，何者可由外国投资，何者可向外国借款，应由政府早日妥为分别决定。”而在全会闭幕宣言中，复宣布将“实行实业计划，以改进人民之生活……尤愿与一切友邦推诚合作，借助其技术人力与机器，以收突飞猛进之功。吾人深信欲建立永久和平之世界，国际间之政治合作，必建基于经济合作之上。”这一重大方针的决定，已将中国拟于战后加速工业化的愿望，以及欢迎外国资本技术协助的诚意，披沥无遗。

本来利用外资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包括技术上许多微妙的节目，并非三言两语所能遽论。我们现在所要指出的是：对于利用外资，中国当局已采取了新的决策。这一决策，将来能否实现，或实现到如何成功的程度，第一要友邦高瞻远瞩，对中国工业化的努力，有充分谅解与同情；第二要本身认识环境，善择途径，勿浪掷时间与经济。

先就第一点说，友邦须首先明白，中国的工业化，是战后世界建设的第一环，在未来的世界和平与繁荣中，具有绝大的重要性。现在联合国战争的胜利，已清楚在望；但和平的胜利，谁也没有把握。为使中国担负其防止侵略的使命，促进中国工业发展，至属必要。无论在暂时的抑永久的和平中，中国都是不容缺少的安定力。再就世界繁荣而言，中国经济的复兴，也有待于世

界经济的扶掖；而世界经济的繁荣，更有待于中国经济的调泄。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力，充裕的资源，开发以后，对世界经济，必有重大的贡献。所以，友邦想向中国投资，宜先抱具这种认识，把眼光放远，着重于较长远的利益。

在这战争期间，英美人士不断倡导自由贸易，取消关税壁垒及汇兑统制，并对世界资源，要求合理平均的分配，以冀促进世界经济合作。大西洋宪章亦揭示“一切国家应获得原料的供应，共谋人类的幸福”。这些崇高的理想，原为我们所赞同，但这些理想，显非可一蹴而几。至少在这些理想未完全实现之前，各国仍应各就其实在环境，站在平等的地位，以求世界经济的合作。中国是一个未经工业化的农业国，以往只有原料输出，做了外国工业制成品的销场。在中国工业化的初期，如果实行自由贸易，毫无抵抗地任由外货涌入，中国本身的工业无法与外国抗衡，实难建立起来。在中国抗战前，外国在华投资，正如雷玛教授于一九三一年调查所得，十九带有政治性质，与十九世纪以来列强对任何殖民地所采取的投资方式无异，其实是一种经济的侵略。在中国抗战时期，外国对华贷款以及租借法案下的援助，虽仍带有政治性质，然已由侵略变为协助。战后友邦对华投资，基于平等新约，再无侵略之虞，只有发扬现有协助的精神，使中国居于平等地位上，从事合作，走上互助互利的一条路径。

回到我们本身来说，我们要明白中国必须工业化才可以在未来的和平中负起义务，或在战争中减少痛苦。战后的世界既不容我们关起大门来苦干，就必须面对外来的竞争，或谋取外来的助力，以加速我们的努力。现今我们政府虽然订定国策，欢迎投资，但外人是否愿意投资，仍看我们的努力如何而定。（一）投资的条件太优，固可使一部分人不欢迎；条件太受限制，人家又未必愿意，这中间就要我们在外交上出力，谋取友邦的谅解与合作。（二）外人投资最重视安全与保障。新约成立后，外人在华的特权取消，以后一切都仰仗法律的保障。我们的法规固要斟酌

情形，修正增订；司法制度尤要力求健全，并培养人民尊重法治的精神。在政治上，时时振刷，以求进步，巩固安定的局面，更无待言。（三）中国开发的具体计划，必须及时拟定。开发事业中轻重缓急，应由各门专家多作一番努力，绝非闭门造车式的方案，或科员政治式的统计报告所能为功。此外，投资的方式，发展的方向，以至种种技术问题，莫不需要考察实在情形，以科学家的头脑及外交家的手段，始能求得效果。（四）我们获得外资，不能忽略本身担负债务的能力。外债借来的条件不优，数目不会大，期限不会长，反之则我们的负担太重，不一定上算。现在我们只有以我们所有的人力，求国外贸易的发展，以抵偿外国给我们的工具、材料、技术等等接济，否则本国贸易过度入超，战后民生凋敝之际，负担将不胜其苦。因之，我们的人力应充分利用，充分集中，利用新式工具，把原来农业的力量加强起来。在迅速奠定国防重工业基础的过程中，仍设法发展民生日用品的工业，以收工农调协之效，并使资金不致经过国民之手再流回国外去。总之，利用外资一问题，真是千头万绪，关系重大。中枢方针决定之后，一切进行，还有待于全国上下聚精会神，集中力量，为未来百年，打下基础，勿走错路径，勿浪费金钱，勿虚耗人力，勿消失时间，机会难得，稍纵即逝，愿朝野上下多加研讨而熟虑之！

（原载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五日桂林《大公报》）

“九·一八”十二周年

东北沦陷于敌，到今天整整十二周年。此十二年中，有数千万东北同胞在敌人枪刺之下，受尽欺凌，挨尽荼毒，宛转呻吟，

企盼国军早日北上，重见天日。更有四万万的国内同胞延颈跂踵，望着东北平原，想着苦难同胞，发愿早日收回国土，解放正被压迫的同胞。此种民族的自然情感，暗地交萦，益障敌人侵略的罪恶，益增世人对日寇残暴的痛恨。

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在中国，在世界，俱已获得无限的教训。第一个就是世界和平不可分，当事变既起，中国曾向世界警告，日人有征服世界的野心，征服满蒙而后，必继之而图征服中国，征服世界，促各国政府注意日寇的侵略。不幸国联会的制裁完全失败，日寇竟不顾国际条约与正义，悍然退出国联。是时世界各国咸持隔岸观火的态度，美国曾有干涉之意，而被拒于西门外长，致令日寇气焰愈张，反史汀生之不承认主义，犹为世界留下一线正义。自是而后，集体安全制度，被摧毁无遗，意大利起而效尤，侵略阿比西尼亚，德国继之并吞奥地利、捷克，最后侵略波兰，乃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故“九·一八”事变乃此次大战的最早祸根，设若当时列强能协力干涉，制止侵略行动，则阿比西尼亚之战，可以不发，吞奥并捷之举，犹有顾忌，世界和平，未必即归烟消云散，此种世界和平不可分割的教训，今日各国虽已多领悟，而劫运已无可挽回，其堪痛悔，又何待论。

中国对日抗战，是“九·一八”的延长。何以言之？自“九·一八”事变以后，而中日国交隳，情感坏，东亚大局，整个恶化，天天向最恶劣之途迈进，其最后归宿必是战争，无可避免。我们敢断言，苟无“九·一八”事变，则“一·二八”之役，长城之战，以及塘沽协定，俱可以不发生；“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及“八·一三”之战，也可以不发生。是故，我们可以说，中日战事，虽只六年余，而东亚大局自“九·一八”之后，早就陷入战争状态。中国为保领土主权的完整，为争国族的独立自由，不能不奋起斗争，牺牲所不惜，困难所不辞。我们的抱负，自然不仅以保持关内的领土人民为目标，对于已经沦陷的东北四省，如何收复？已被奴役的同胞，如何解救？同是重要的目标。六年来为达此目

标，全国军民在领袖领导之下，勇往直前，奋斗不懈，所以对日抗战的最后目标，应该是收复东北四省，重归中国版图。

中国在事实上，是首先抵抗侵略，不屈服于强权的国家，世人苟不健忘，必能坦率承认。我们因为见得最早，所以首有最割切的呼吁；因为抗战最先，所以身受的损害亦最大。我们为世界正义，反对侵略，不惜牺牲，不顾艰苦，六年余来，已奠立无限的光荣，而现在更证明我们的抗战，已为世界树定反侵略的基础。因此，我们有权要求，盟国也有此义务，各盟友必须助我收复东北，倘使东北一日不归还中国，则此次世界反侵略战争，便不能算成功。不过，此项工作，前程漫长而艰巨，非经长时期的奋斗，断不能达成任务。我们是亚洲大陆战场的主角，所负的责任，更要加倍艰辛，万端困苦。全国军民必须牢记，收复东北四省的责任，必由我负之，盟国虽可以援助，而驱逐日寇出东北国境，收拾我旧山河，全国军民义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们必如此，才能巩固边境的基础，才能算是真正的胜利。

政府对于东北四省，早经注意到政治上的措施，曾正式任命四省府主席，三十年二月四省府在渝宣告成立，所惜敌后政治工作，未见展开，与政府原意似有未符，闻最近各该省首脑，拟将四省府推向战区，准备配合战事，收复失土。此议甚有必要，盼望勿畏难，勿规避，勇往迈进，多做敌后政治工作，期与军事配合，俾协助国军，收复失土！

现在胜利将临，但前途艰困，必愈加甚。我们尚须刻苦自励，奋斗到底，促使最后胜利早日到来。我们在纪念“九·一八”之顷，愿郑重提醒国人：即胜利必降临，东北必收复，而过程必甚艰苦，在此努力目标之下，我们应格外戒惧，格外警惕，以完成抗战的使命。

（原载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八日桂林《大公报》）

不忘耻辱

今天“五三”，十六年前，敌军在济南残杀我军民，企图破坏我北伐之完成，我山东交通员蔡公时等被害。

抗战以来，许多国耻纪念都已不再纪念，因为我们已在拼民族的鲜血，来演涤新仇旧恨，总帐要一笔勾销，自然不必再单独清算了。但虽然如此，这种奇耻大辱，我们还应牢牢记着！

我们受日寇的侵略，已历五十年，土地被蚕食，主权被损害，尤其精神上的侮辱，罄竹难书。它要侵夺我们的资源命脉，说是“精神提携”；要在我们国内驻兵，说是“共同防共”；要屠杀我们，不准我们还手，甚至不许哼一口气，否则便是“抗日”，便要“膺惩”。象十六年前的“五三”事件，明明是日寇要干涉我内政，破坏我统一，而竟假保侨之名，非法出兵山东，向我国民革命军挑衅，造成流血的惨剧。在“九·一八”以后，这种侵略侮辱，越来越凶，强奸民意，制造伪国，制造“自治”，甚至强迫我撤退华北驻兵，撤退华北党部，而所谓“藏本事件”、“宫崎事件”等等，更花样翻新，不一而足。简单说，在“七七”以前，日本帝国主义没有一天不蓄意制造口实，来宰割我们，侮辱我们。“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类的话，还绝不能形容战前敌我的处境。我们同情印度的地位，怜悯朝鲜的灭亡；但在那时的中国，实在连印度朝鲜都不如。因为他们是一刀两断，我们是寸寸被割。可以说，中外数千年的历史，没有再比日寇狠毒的侵略者，也没有再比抗战前的中国更可怜可悲的了！

在胜利在望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说这些丧气话？是希望全体同胞，大家要知耻明耻，要宝贵我们的抗战成果，因而更奋发努力，加紧完成这历史使命。我们看举世各国，哪一个不为

自己的生存自由而奋斗，有些国家，因为人力不够，国土狭小，不能作有效的抵抗，因而被吞灭了，但他们还是千方百计在挣扎苦斗，象丹麦、希腊以及捷克波兰等国，都在死里求生，尤其南斯拉夫的游击战斗，有声有色。亡国的惨痛，不是好受的，亡了国再想独立，谈何容易！我们中国，幸有独厚的天赋，幸有英明的领袖和数百万忠勇的战士，苦斗七年，才逃过亡国的难关，展露复兴的曙光。但迄目前为止，我们能说抗建能有绝对把握，毫无危机，而可以坐待胜利了么？实在说，我们的危险还大得很。客观的形势，虽一天比一天有利，但我们要认清，问题的根本，还在我们本身，假使我们的仗打不好，不能把敌人赶出去，真正的胜利固遥遥无期，而政治上的弱点，经济上的困难，如不能以自力一一克服，则前途更不堪设想。抗战七年，一般的生活当然已艰苦，但想想七年以前，我们是过的怎样悲惨的生活！在反侵略各国中，我们所受的苦痛最深，牺牲最大，遭遇的敌人也最残酷，但我们今日苦斗的空气，反日见淡薄，贪污案层出不穷，国难商到处活跃，后方都市，依然纸醉金迷，狂吃滥用，恬不知耻，而一般人民，因高物价之压迫，颓丧消沉，抗战初期那种紧张的情绪，仿佛已烟消云散。这种现象，真要令人痛哭流涕。我们看英国今日，几已全国动员，妇女老幼，都欣然参加战时工作，工厂加紧生产，物资严格控制，这样的作战情绪，英人还自谦只及苏联的一半，我们听了，真要惭愧到无地自容。

造成这种现象，当然有许多政治的和经济的原因，我们要希望政府努力改善。但同时，我全国同胞，千万要控制住自己的精神不要再低落下去。哀莫大于心死。我们过去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刻刻想反抗，要雪耻。现在已打出了光明的路，耻辱眼看可以洗涤了，在这为山九仞的关头，反而大家腐败的腐败，叹气的叹气，这样的国家，还想自强自奋！还配称“四强”！

知耻近乎勇，希望大家把过去的耻辱，一一记在心头，我们今日还应该卧薪尝胆，警惕自励。耻辱要用自己的血汗来洗净，

胜利要凭自己的力量来争取，而不是可以坐待的。

（原载一九四四年五月三日桂林《大公报》）

展开节约献金运动

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总会会长冯玉祥将军，于去年十一月由重庆出发赴川南川西，亲自推动献金运动，历经自贡、荣县、五通桥、嘉定、夹江、眉山、彭山、新津、双流、成都等地，共募得二千五百万元，此外尚有个人团体长期每月认募二万三万，直到抗战胜利为止者。冯将军于今年一月回到陪都，三月又出发江津、合江，继续推动献金，江津以一千三百五十万元赛过成都的一千二百万元，合江又以一千四百五十万元超出江津。最近泸县的成绩又数倍于合江，达五千三百万元。以后想更有超过泸县的。截至目前为止，川省各地献金总额已达一万零六百万元。这是一个辉煌的数字！倡导节约献金运动的冯将军，高龄硕德，数月来舟车劳顿，各地奔驰，以他的人望与热情感召广大的民众，拿他们的余财或竟拿他们的血泪贡献给国家。

在这次蓬蓬勃勃的献金运动中，我们先后听到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冯将军足迹所至，大县小镇，每次献金会中无不争先恐后，或罄其所有以献，其中有清苦的公教人员，身无长物的战区学生，脸上带着伤痕的荣誉军人，白发苍苍的征人父母，衣裳破烂的小工人，还有妓女、僧尼、乞丐，以及看守所的犯人；他们不但献现钞、表、手镯、钢笔，献结婚戒指，且有脱毛衣，脱皮鞋，甚至还有要把棉被捐献的。有时逼得主持人赶紧闭会，以免大家脱光卖尽。白沙献金会上，为了商界出钱太少，一万以上的男女学生跪下来，冯将军及台上的人都感动得哭了。最近泸县献

金，有许多机关的工役，商店的茶房及私人住宅的女仆，在偶然的
机会中听了冯将军的演讲，纷纷自动献纳工资。我们的老百姓
太可爱了。这些人尽有目不识丁不闻外事者，但是都能了然于爱
国救国的大义。现经中枢大员重镇如冯将军者的精诚号召，人民
无不报以丹心与热情。他们的献金是自动的，无条件的，拿出钱
来，而不要任何报偿，不似纳税之出于义务，购债之多少带有投
资意味。他们在纯然出钱或变卖衣物之后，精神上引为无限安慰，
深感直接献金报国的光荣。所以献金运动在精神上就是一种爱国
运动，深入社会里层，以发扬人民的爱国心。民心的可爱，民气
的可用，在这次献金运动中充分表现出来，他们潜伏深藏的爱国
心，只待政府的发掘与导引。

节约献金运动，除了精神的意义外，还有更实际的意义与功
效。抗战到此阶段，军事无虞，胜利定局，惟有经济困难则随战
事延长而日益加深。年来朝野劳心焦思，多方设法解决的，也就
是这种经济问题，其间因素甚多，不全在物资的缺乏，政府收支
的不平衡也是一个主因。国家在打着大仗，支出自然剧增，而收
入却相对的减少，增税举债皆非短期所能见效，于是以增加发行
来弥补。结果通货不免膨胀，物价继续高涨，压苦了中下层社
会，而使少数人特受战争之赐，臃肿庞大，造成社会的财富编
在。如何纠正这种现象，尤为大家议论的中心。政府本可用高额的
直接税或大量的派债来吸收这种暴利，但因社会各种条件未备，
增税则他们逃税，销债则他们避购，于是由于战时暴利而得的财
富始终不能转于政府之手。少数掌握土地与资本的人，在战争
中地价高涨了，谷子起价了，工商业利润增加了，然而他们却不
肯多拿钱费出来，坐视政府苦筹战，一般人民困于生计，这实为
今日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有些人因此想到明末流寇蜂起，巨室
大户握粮不放，崇禎帝下诏令富室捐输，而应者寥寥。迨闯贼起
事，所破城池，逼拷财富，结果人财两尽。明末情形，政治腐
败，内外交逼，与今日领袖英明国运中兴相比，情势根本不同。

不过少数人集中财富，结果危害国家，这一点多少可以使人警惕。如何防止财富集中，国父早有垂训，以平均地权制止土地兼并，以节制资本制止私人资本过度膨胀。不过国家现值战时，民生主义的实施需要周密的准备与强制的行动，暂难着手。但是私人过度集中的财富必须转于国家之手，方能减少经济困难，顺利战事进行，则毫无疑问。增税既收功甚缓，举债也是国家将来的负担，增加通货更多流弊，最直接而简易的办法，莫过于有钱人自动以其余财随时献给政府，以充实国库，加强战力。掌握土地与资本的人，既因抗战而增加了收入，则捐献其余财，也是天公地道的事。现在各地民众踊跃献金，一文一钱虽都是爱国心的表现，但为国家财政计，我们不能不希望各地的巨商富宦，绅粮大户，大量捐献，慷慨输将，不独是国家之利，尤其是个人的光荣。假使以此方式：就是由国民自动将其战时的过分利得献给政府，使国家战费有着，不须以增加发行而弥补预算，而解决了我们的战时膨胀问题，消减了国家的一大危机，给战时财政创一光荣的史例，这岂不是一件最荣誉的事！

（原载一九四四年五月五日桂林《大公报》）

寄语前线将士

湘北慰劳团今天出发了。请寄语前线战士：

告诉他们，这慰劳金内，有许多是难民乞丐忍饥挨饿而捐献出来的。

告诉他们，平时生活最艰苦的文化教育人员，都动员献金运动了，他们自己节衣缩食，还向各处唇焦舌敝去劝募。在烈日暴雨下，他们昼夜奔波着。

告诉他们，千千万万正义的同胞，都由衷感激他们，怀念他们，这区区三百万元，不能表达万一的感念。

最后，关于奸商巨贾等准备逃难的情形和市面灯红酒绿的状态，假使战士们不问，还是瞒住他们罢！

（原载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桂林《大公报》）

怒吼吧，中国！

《怒吼吧，桂林》已曲终人散，献金热潮似乎也成陈迹，许多有钱有势的人都悠然走了，不愿走或走不动的人，这几天也给疏散声浪搞混了！看看车站码头的混乱情形和街头行人匆忙的景色，决不会相信前线离桂林还有七八百里。正在这低气压中，英美苏三国都在打煊赫的胜仗，瑟堡占领，东线德军大溃，太平洋美军在赛班的登陆战，使日寇疲于招架。这一切，在我们仿佛都是讽刺的对照。

“太阳出来了，太阳不是我们的！”难道我们真会有这样的悲哀么？国际的大局，已到五更天，眼看着阳光快升起，黑暗要被吞没，这最后五分钟苦难，难道我们熬不过冲不破么？我们要大声怒吼：我们决不许这样！太阳绝对是我们的！

到今天，我们不许再说假话。湘北战局，老实说我们打得并不好。无论敌寇的来势如何凶，企图如何大，仅仅一个多月，就让它长驱深入到衡阳近郊，这不能不使人有意外之感。但我们也要看清，局势没有到不能挽救的地步，正面和左右两翼，还有许多部队在拼命反攻，只要士气高扬，民心稳住，大家有信念，有决心，一定能够挡住敌人，并把它打出去，光辉结束这一个战役，进而乘胜反攻。同时，我们还要承认，这次中原和湘北战事所以

迄今还未能转败为胜，问题不仅在前方，不仅在军事，几年来政治上经济上的不长进，严重影响到军事，把大家的锐气全消磨了！我们的战士，是世界上第一等能打苦仗的；我们的百姓，是世界上最能咬牙奋斗的；要不然，我们在抗战初期怎么能摧毁敌寇“速战速决”的企图？七年来，我们怎么能将战局稳住？就以现在来说，我们在緬的远征军，从胡康流域直下孟拱密芝那，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这种苦仗硬仗，非有充分的斗志和牺牲精神是绝对打不了的；同样是有血有肉的中国战士，为什么在国外打得那么好？配备固然是一个原因，而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营养、训练、纪律等问题。

削弱抗战力量的许多原因，大家早就看得很清楚，如因团结问题牵制了很多兵力，如政治效率及风气问题，如物价的飞涨而影响一般民众的最低生活，如后方社会的奢靡，贪污及国难商人的横行等等，都直接影响到军事。解决这些问题，自然有许多困难，但不能因为困难就永不解决，更不虚骄粉饰，想拖下去，拖到胜利由天而降。现在，事实已证明，非赶快医治这些病，就绝对拖不下去。我们要振作，我们要怒吼，从政府振作起，从后方怒吼起。从上到下，洗心革面，亲密携手，招唤我们已失的热情，恢复并加强我们抗战初期悲壮蓬勃的朝气。我们的战士，都是英勇绝伦的，我们的民众，都能忍苦拼命的，只要政治上有一点开朗的气象，民心士气马上就能一转，冲破难关，完成胜利，都不难立待。

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世界大局尤其充满着乐观因素；我国父创导的民族革命，几十年来经千回百折，现在正应是渐次达成的阶段，决不许我们在最后五分钟松下气来。国际反侵略的战斗，经举世正义人士流血牺牲，现在也已到“结束开始”的时候，也不许我们在这样重要的岗位上一筹莫展。这次敌人在太平洋在緬甸处处溃败之余，想集中力量来打溃我们，想打通大陆交通线；在我们坚强抗战七年后的今日，它还妄图先把我们打碎；

这简直是对我们民族的大侮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我们再不振作，再不怒吼，我们还成什么民族，还配称什么“四强”！

怒吼吧，中国。你是一定要强的，把你已失的魂魄招回来，把你的力量集中，把你的拳头伸出去，给敌寇一个致命的打击。

四面的雄鸡在叫了，太阳快出来了。中国，快快怒吼吧！

（原载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桂林《大公报》）

悼戴安澜师长

军委会发表：戴安澜师长出国远征，不幸为流弹击中，伤及肺部，不治殉职。全国军民看到这个消息，莫不为之悲痛万分。

戴师长此次首先奉命入缅，以一师之众，勇往直前，独卫东瓜，一战而歼敌五千，其智其勇，非常人所能及。尤其不畏危难，不惜牺牲，舍己救人，以解友军之厄，其侠其义，更为国际所称誉。克复棠吉一役，虽不能挽狂澜于既倒，然而扬我威，丧敌胆，其功实不可没。现在戴师长不幸殉职，不但是中国的损失，也是联合国家的共同损失。

我们希望全国军民，为悼念这位民族英雄，要立下一个志愿，就是决心收复缅甸，击溃暴敌，为戴师长报一弹之仇。

（原载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八日桂林《大公报》）

“天时”与“人事”

昔邓禹杖策追光武，及于郾。说光武曰：“历观往古圣人之

兴，天时与人事二科而已。今以天时观之，更始既立，而灾变方兴。以人事观之，帝王大业，非凡夫所任，为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后来光武削平天下，中兴汉室，都没有脱邓禹所说的范畴，可知建国大业，“天时”固然重要，“人事”也更重要。

以现代习用的术语说，“天时”应该属于立国环境，及国际大势，其骨干是外交的，“人事”应该属于政治的隆替，人才的臧否，其性质是内政的。我们现在的国际环境，可说是好到空前。中国与各国订约交往，亘一百余年，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的优异地位，也没有象今天这样的受人重视。所以至此，就是因为奋斗八年，熬尽艰苦，其事决非偶然。但有一点应该自己警惕的，就是现在地位的取得，既由于过去的实干，则今后还是要靠实在工夫，此中一点也含糊不得。我们今日与英美两大民主国，所合无间，三四年以来休戚同患难，成败利钝，完全一致，就是与苏联，关系也非寻常。现在欧洲盟军，在东西南三面，都顺利进展，太平洋方面，更是迭创日寇，轴心国家，前途一片漆黑，而我们则光明在望，胜利在握，所以论国际环境，不能不认为满意。

但是，抗建大业，何等繁重，何等艰巨，单是良好的环境，未必即能成功，这里就要看“人事”如何去配合“天时”，使良好“天时”不因“人事”问题而浪费，其中含义甚广，包罗甚富，非片言可尽。但主要的如政治军事经济几大部门，庙堂决策的良窳，以及各级层执行的忠实程度，都是构成抗建大业隆替的关键。此外如用人的得失，所谓“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虽是一句古语，却属至理名言。还有如何博采民意，洞悉下情，政府措施，是否能做到“务悦民心”，此即政治上最基本的信条。

这几年来，中枢曾一再宣示“宪政”、“民主”，其求治之情甚殷，除弊之心亦切，良堪钦佩。不过除领袖而外，曾经真心诚意，做了实际工作的，并不多见。而在别一方面，则有曾被蒙蔽的下情，若干低级官员，对上级官员养成一种恶劣习惯，滥用粉

饰虚伪的伎俩，谄谀之风盛行，真理几乎泯没，推其结果，政令不能贯彻，贪污由是繁兴，人民未受官爱，人心何从欢悦！以此政治效率不彰，弊窦如毛，官民之间，无形中有一道鸿沟。此而论“人事”，将何以允孚众望？更何以配合“天时”？

旷观当世，求一争先赴义，守正不阿者，竟寥若晨星，而唯利是图，冲破道德藩篱，毁弃国家法律的官员，几乎滔滔者天下皆是。我们的“天时”，直是千载难逢，而“人事”则有焚乱之感。我们若不将各种缺失，一一补救，则将何以把握住胜利？何以完成建国大业？愿朝野上下，珍视此宝贵的时机，勿令坐逝！

（原载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桂林《大公报》）

安人心 稳战局

冷水滩沦陷，东安附近已有敌踪，衡桂间交通线去了一大半，战火已烧到广西眉睫，战事蔓延如此迅速，我们已不能再讳言局势的沉重。

衡阳失陷一月，我们进未能相机反攻，退未能稳定败局，坐令敌寇补充整理，再度深入；此中因素，不只一端，且亦非一朝一夕所致。但今日非根本清算之时，今日的要着，在如何稳定危局，确保桂柳，这个应急处变的工作，我们认为，第一要安定人心，振奋士气。

两月余来，桂柳一带民众，本已如惊弓之鸟，大家盼望我军反攻，或敌寇不来，现在证明敌寇有必来的企图；更因日益逼近前线之故，谣言繁起，每使人不暇冷静考虑，这样下去，不仅影响后方秩序，抑且影响战斗情绪。现在要安定人心，首先应该供给民众正确的消息。过去战报的公布，大都以军委会的公报为标

准，因辗转传播，往往都是隔日的旧新闻；而接近前线的民众，为切身安危，随时需要知道新变化。近月本市军事负责机关，每日综合各方情况，发布消息，甚为翔实，这办法很值得赞扬，可惜第二天见报，还不能满足民众的热望。假使当局能更注意这工作，在市区适当地点，每日公布几次战报，或委托各报按时办理，这样，民众随时知道前线的确实情况，谣言自然便消灭了。其次，关于疏散工作，应该加紧进行，同时也要注意民众的实际困难。当局已宣布开始紧急疏散，时机确很紧急，为便利战斗准备，与战斗无关的民众，自应早日迁往后方。但一则要考虑如何走，其次要考虑是否有些人走不了。这都是实际问题，不能不解决。照常理说，桂柳有火车，其他水陆交通也相当便利，短期内疏散一二十万民众，不致有困难。但这几天来，火车已有挤不上去的现象，汽车船只更难找；主要的原因，还在分配组织不够严密合理。现在既已紧急疏散，交通便应有紧急的措施，如火车增加班次，妇孺老弱登记优先上车等等，都应该实行，以免大家挤，而能走的人反不多。上次疏散，许多人仓促就道，把仅有的钱用光，看局势暂稳，不得已又回来的很不少，也有根本便无力走的。这许多人，平时毫无积蓄，临急也告贷无门；现在要走，实在走不了。这问题，的确很严重，而不能不早解决；否则一旦强迫疏散，难免要发生许多悲剧。我们希望，负责救济的机关，此时应早设法，或请路局免费输送难民，或由振济机关发给凭证，准贫苦民众先免费乘车，此款将来由振委会拨还。此外，并应呼吁各机关尽力救助难民，解除其实际痛苦。大家随时知道正确的消息，而又大家随时能走，则人心必能立刻安定下来。

这次敌寇的来势虽凶，但力量毕竟有限，看军委会发表敌军的番号，都是侵犯长衡的旧番号，足见并未有新部队。我们前线的战士不算少，空军昼夜出动，制空权绝对在握，就情势判断，不难扎定阵脚，固守湘边。这次我军的急速移转阵地，原因不明，统帅部当然有全盘计划，或者拟集中力量，诱敌聚歼，但因

为战事变化快，各部队或有联络欠周，配合不够的情形。假使如此，则不免影响一般士气。为今之计，首应整肃风纪，严明军律，同时对于前线战士的供应，应特别注意。此外，关于指挥之统一，是否应速派大员莅临坐镇，此为军机，相信统帅部已尽筹在握。总之，人心应安定，士气应振作，此为目前应变急务，切望当局严加注意。

（原载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桂林《大公报》）

敬告读者

柳桂保卫战，已进入严重阶段，本报遵令疏散，定明日起暂时休刊，今日是我们的“最后一课”，自不免百感交集；但我们没有悲观，没有悲愤，而只有忏悔的回忆。

我们抗战七余年，当此世界大局一片光明之际，我们还抵抗不住敌寇的进攻，甚至如桂柳那样重要的后方，还不得不疏散，不得不作焦土的准备。这样的局面，决非一朝一夕所致，而政治的原因，更多于军事。我们认为，不仅政府要负责，所有社会各阶层负领导责任的，都应痛愧平日努力的不够。我们站在宣导舆论的岗位上，假使在过去能对贪污作更无情的斥责，对兵役，士兵给养等等问题，能作更率直的建议，虽然文网严密，也许会于国家略多补益。今天我们已不得不暂时离开岗位，只有自责自愧，对于任何负责方面的指责，都已无此余暑，而且也已太迟了。

我们今日所期望的，上自政府当局，下至参加这次保卫战的军政人员，大家振奋精神，阻遏敌寇的攻势。因为这一战，关系国家前途太重要了。就军略地位说，桂柳是一个西南异常重要的

基地，为了我们的反攻，为了盟国的全盘对日总攻计划，都不容轻失。我们抗战七年余，在国际上已建立崇高地位，被人尊为“四强”之一，假使这种重要的后方基地还保卫不住，我们还有什么颜面见人？在即将开幕的三国会议席上，我们有什么可以自解？我们的国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健儿，只因过去政治的不进步，使他们不能充分发挥伟大的力量。但今日局势这样严重，任何人只应自悔，在国族祖先的号召下，大家燃起救国卫家的热情，把敌人打出去，把我们的胜利基础，重新奠立起来。

桂林的山水，是多么秀丽，多么迷人！我们相信，八桂健儿，必能努力保持她的圣洁。广西表里山河，四面足以拒敌；二十八年敌人曾侵至南宁一带，终经我军民之合力苦战，使敌寇不得不狼狈撤退。这个光荣的历史，我们相信必能永久保持，而现在又是重演的时候了。

我们今日虽暂时停刊，但我们全体员工，决不忘了我们应负职责，我们必将始终握住这支秃笔，为国族尽其绵力。一俟战事告一段落，桂林停止疏散，我们必立刻重返岗位。在这暂别的极短时间内，愿与我敬爱之读者诸君，珍重互勉，于此抗战千钧一发的关头，各尽其最大的努力。

（原载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二日桂林《大公报》）

第 四 辑

重来上海

上海是《大公报》的第二故乡。今天我们在上海复刊，自然有说不尽的欣慰，同时也有诉不尽的感喟。

我们原来是天津报，二十五年四月起在津、沪两地发行。抗战军兴，本报天津版首遭牺牲。及淞沪会战结束，南京旋亦沦陷。上海版因严拒敌方检查，亦于是年十二月十四日自动停刊。停刊之日，我们含泪“暂别上海读者”，郑重说明：“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现在环境已不容许中国人办中国报了，我们为上海同胞的服务已到暂时的最后一天。”那时我们坚信：“云翳遮暗了现时的上海，但大时代的狂飙定将吹散这阴影。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一定要重行相见。”这一“暂别”就是八年！几年来，我们在汉口、香港、重庆、桂林先后建立岗位，追随同业之后，为抗战尽其绵力，但除重庆版外，都因战局转移而停刊了。

这八年中，我们无时不关切上海和东南的同胞，我们相信上海和东南的同胞也一定关切我们。当我们告别时，上海已成孤岛，我们曾殷殷期望不得已陷身这孤岛的同胞，大家学持汉节、吞冷雪的苏武，以待祖国的胜利复兴。八年来，上海同胞受尽了磨折苦难，而大家都咬牙苦守，坚贞自持；失节堕落的只是极少数，其他绝大多数的同胞，都不断对敌伪作积极消极的苦斗。上海的地下工作，发动最先，而且也最有轰轰烈烈的战绩。即以我新闻界而论，在上海沦陷最初四年中，前仆后继，与暴力作殊死战，因而流血成仁的同业，屈指难数。今天我们重来上海，和苦别八年的读者见面，不禁无限酸辛，涌上心头。

我们抗战必胜的目标，终于贯彻了。建国能不能必成呢？这

个信念我们绝对不许动摇，但过程之艰苦磨折，必更甚于抗战之时。目前刚刚开始复员，处处已暴露捉襟见肘的窘态，组织松懈，人才贫乏，一切仿佛都没有计划，没有准备。特别令人感觉沉重的是团结问题，表面商谈似有进步，而实际的行动却一天天脱轨。象一个原已残破的缸，好容易补得完整无缺，想不到这里又漏水，那里又有了裂缝，怎不叫人焦急切齿！

但我们焦急尽管焦急，却万万不许悲观。目前是我们建国的黄金时会；数十年国民革命，八整年流血抗战，才挣得这千载一时的机会，如何可以轻轻放过！而且从远极的眼光看，只要我们把握住几个原则，去推动建国的巨轮，相信眼前的任何磨折障碍，都不难克服，不难粉碎。我们对于这原则的看法，有下列几点。

第一，建国必赖团结，而巩固团结之道，首在政治的进步与民主。团结的反面是分裂，是割据。国际的大势，国民的要求，都不容再有分裂割据。今日在朝在野各党派，都有实现团结的愿望，而多年背道而驰的事实，一时不易纠正。如军队的国家化，政令的统一化，多是实现团结民主的先决条件，而事实上非至团结已有基础，难期实现。我们认为，要解脱这个纠结，法律论和政治论必须并受重视。所谓法律论，现在的政府是我们唯一的合法政府，国民党决心结束训政，还政于民，而实现宪政，必须经由合法之国民大会，创制宪法，选举政府。这是最合法的轨道，任何人不应有异议。但国民大会如何召开，如何开得象样，那就必须兼顾政治的现实，谋取妥善的协调。国共谈判的初步记录，已开辟了这协调的途径。今后的问题，根本上，我们希望政治协商会早日召开，对国民大会的日期和代表问题，早作合法合理的决定。在目前，我们希望各地磨擦冲突的事件，赶快停止，勿再逞一时意气，陷国家于万劫不复。

第二，经济建设，是我们立国、建国的根本。我们这国家，能不能冲破存亡荣辱的关头，就看我们会不会在二三十年内实现

工业化，现代化。时机极促，而工作则千头万绪。我们一点都不容松弛，不许浪费。我们常常自称地大物博，事实上地虽大物并不博，许多重要的资源都不够，加以连年战事，元气消耗殆尽。我们要加紧建设，必须握紧重点，先集中力量于重工业的建立，非迫切需要之民生工业，只能量力逐步发展。政府第一期经济计划，早经公布，对于建设之重心，国营、民营之分配，外资之利用，均规划周详，方针正确，我们当以全力拥护，求其实现。我全国同胞，应深体建国期间人力、物力之宝贵，勿放纵生活，勿浪费时间，大家要以临战的精神，刻苦节约，俾建国早日完成，国基永臻巩固。

第三，外交方面，我们的外交政策非常简单，就是全力拥护“联合国”，创建恒久和平进步的国际秩序。对于美、苏、英、法诸盟国的友谊，都要保持和增进，对于力争解放的弱小民族，我们当然同情。总之，世界不容再有战乱，再有战乱就是毁灭。中国更需要长期的和平，没有和平就无由建设。而今日的中国，已不同于抗战以前。过去我们俯仰由人，今日已俨成国际重镇，国际间任何重要的行动，我们都要直接参与。另一方面，过去因为不受重视，所以还可以苟安于国际的均势状态中。今后，我们已有独立的地位，一切都要靠自立自强。我们能够健旺挺立起来，就形成了东方安定的力量。东方的和平能够凝固，世界的未来危机就化除了大半。

最后，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建国风气的建立。现在大家都要求团结，要求民主进步，至少希望不再有内乱。而如何达成此愿望，则一切寄托于政府及政党。我们眼看今日抗战胜利，百废待举，而内乱危机反深刻加重，交通被破坏，复员遭阻碍，团结受打击，一般国民除跳脚着急外，竟不能作有效的防止。这根本因为几千年专制的传统，国家大事“庶民不议”，另一方面，多年来政治的束缚，也使一般国民不能轻于宣达情绪，发挥力量。为什么英、美诸国虽有党争而决无内乱？为什么法国虽有内乱

的危机而终克复了？因为它们人民伟大的抉择，决定了一切。今后的世界大势，是民主潮，人民世纪。一切违反这主潮的国家，都要遭时代无情的淘汰。但民主的基础在民而不在政府，更不在任何势力集团。由上而下的民主，决不能持久，少数操纵伪造的民主，也决不能乱真。这必需每一个国民，发挥其智慧与力量，积极参与政治，监督政治。发动真正的舆论，随时纠正一切不进步、不健全的倾向。譬如，目前的复员，为什么那么凌乱；交通秩序，为什么不能恢复；为什么若干收复区的武装力量，还敢大胆冲突磨擦；为什么所谓团结的商谈，只重在军队的数量和防区，而置建国大计于不顾。这一切，我们民众都要质问。一个人没有力量，大家集合起来就可以形成决定的力量。全国进步向上的民间力量有具体的表现，就可以粉碎一切危机，推进建国的大业。

我们是一张民间报，自十五年改组复刊后，承全国各界的爱护，得有今日。二十年来，饱经忧患，同人等不揣鄙陋，始终固守“不私，不盲”的社训，对建国大业，尽其平凡之努力。现在我们也随着国家复员而复员，上海版今日首先复刊，我们今后当一本过去不畏强权、不媚时尚的传统，继续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对于言论记载，当力求翔实，以副国内外的热望。我们希望全国同胞，上海各界贤达，象过去一样，随时爱护我们，鞭鞑我们。更愿大家充分利用我们这张报纸，宣达民隐，诛恶扬善，以培养建国的风尚，奠定民主的基础。我们复刊之初，一切草创，篇幅有限，但凡关建国大计，特别对于工业建设和促进团结民主的言论记载，我们都尽力介绍。

上海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今日重来上海，和苦别多年的东南读者见面，千言万语，一时诉述不尽，说来也杂乱无章。我们只希望各地的读者，象老朋友一样，时时指导我们，赞助我们，那就感激不尽了！

（原载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上海《大公报》）

放眼观世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胜利，自实现迄今，为时刚及三月。我们为了目前国内的时局，感到了惶惑与沮丧，甚至把抗战期中所有的共信与自信，完全撇到脑后，而陷入了悲观的心境。其实今天过度悲观论的产生，是由于一般对最后的胜利，期待过殷，乐观过甚所致，以至抹煞事实，造成幻想的梦境。我们不否认今天国内时局的严重，但在空间被缩减到极度的今天，国际间的休戚，呼吸相通，感应灵敏，我们试放眼纵观全世界的局势，至少可以发现，感受水深火热的苦痛的，并不只是我们的人民，遭遇分崩离析的厄运的，也不只是我们的国族。在我们只要能坚定地把握住存亡的关键，不失信心，去应付一切险恶的风涛，那么我们就不会履险如夷，稳渡彼岸，而完成革命建国的大业。

近几周来，因为五国外长会议的顿挫，以及远东顾问会的临时休会，很显著地反映出了国际幕景的黯淡。摆在眼前的棘手问题，如欧洲战后各种问题的亟待澄清，管制日本计划的需要妥协，以及原子弹秘密应如何处置，国际经济财政关系应如何解决等等，综合起来，促成了国际间关系的浮动与微妙。因此南非总理史末资元帅有及早召集和平会议的呼吁，更因此而促成了英美两巨头近周将在华盛顿的会晤。过去罗、邱、史三氏的频频会议，获得盟国人民一致的赞许，结果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些会议因为在战时举行，所以步调容易一致，而成果也十分丰盛。现在战争胜利了，但和平胜利的赢得，今后犹须努力。旧金山会议的结果，虽奠定了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可是它所建立的，只是一个和平机构，“联合国”未来的成功，尚待联合国家的忠实拥护与协力。但最近重要国际会议形势所给予我们的昭示，叫我们对

于今后国际合作的圆滑进行，显然还不能放心。

在国际关系以外，去探求各国国内的现势，是否能叫人满意？上次大战后，最可怕的失业与罢工的现象，现在已开始在美国发现了。英国前进学者如拉斯基教授及赫胥黎氏等，认这次战争的本质，就是一次新的革命。邱吉尔首相下台的主要原因，也就是受到这种意识的影响。同样的趋势，在美国却因罗斯福总统的突逝，而蒙受到无形的顿挫。至于杜鲁门总统的工商政策，是否解决得了美国今后的经济财政问题，这还须待事实的证明。总之，笼罩在英美政治社会上的这一层阴影，是值得使人关切的。

在备受战争荼毒的欧陆上，目前最严重的，也是经济问题。大战之后，必有饥馑。数年来被敌人榨取与封锁的欧陆人民，生活水准已迫近到了死亡线上。今冬的生活，尤堪忧虑。他们更受到战时发国难财的奸逆的压迫，思想上不能不趋急进，法国最近选举的结果，就是这现象的一个最雄辩的说明。欧陆的人民现在并没有被战胜的光荣所陶醉，反之，他们却把怨愤集中在过去误国殃民的财阀身上（如控制法兰西银行的四十家财阀）。在法国以外，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民，心理也莫不如此。欧陆是天亮了，但欧洲光明的日子，还没有到来。

倘使我们再把眼光由欧洲转移到亚洲的边沿，从最近荷、印与越南独立运动的勃发，我们更听到十八九世纪以来繁荣滋长的帝国主义已经敲起了丧钟。这不是些寻常的所谓叛乱，他们是在要求着能够得到和菲律宾相同的真正解放。就是僻处一隅的拉丁美洲，最近在委内瑞拉，巴西和阿根廷也发生了富有时代意味的政变，这一切的动乱，造成了战后不安的现象。

最后，苏联可算是这次胜利中的天之骄子了。但苏联在这次光荣抗战中所蒙受到的物质与人力方面的损失，当然十分庞大，不易补偿。在他们新着手的五年计划中，苏联人民于修养生息之外，尤须能吃苦努力，再接再厉，他们的生活是不会松懈的。

我们放眼看世局，综观国际关系，既是如此的错综微妙，使

人腐心焦灼，再看并世各国人民的自身生活，更是喘息不安，创重痛深，那末以我们人民今天所面对到的国运与环境来讲，我们就应该觉悟到我们的忧危艰苦，只是现代人类共同命运的一部。我们在胜利后，又面临一个艰巨的试验，诚然是我们的不幸。不过我们对这一时的现象，却不应当气馁心灰。一切的困难，都应该振作起精神来自己解决。我们苟回忆到战时后方人民过分的享受与陷区都市风气的糜烂，我们实不能不痛自反省，痛自咎责。因为我们耻负强国的虚名，而迄未能实践自强的天职。总之一句话，我们在今天的百千灾难中，必须强调地把建国的新风气建立起来。

（原载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日上海《大公报》）

范旭东的精神

中国科学社等团体，今日开会追悼范旭东先生。

范先生对于我国化工界的贡献，非片纸所能尽述。我们特别要认识的，是范先生的精神。

他的字典里，决没有“灰心”两个字。他毕生尽瘁化工救国，敌人的嫉忌，军阀官僚的破坏，以及环境的一切困难，都未尝挫弱他的勇气。

这样一个斗志，在建国巨业正待开始时就逝世了。这是国家的大损失。假使范先生还健在，看到这几天内战危机的严重，他会不会灰心呢？我们可以断言，他决不会灰心，而且一定更振起精神在岗位上努力。

范先生这种孤臣孽子精神，我们大家应该学习。

（原载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日上海《大公报》）

车 辆 靠 右

明年元旦起，一切车辆都要靠右行驶。有关当局，最近加紧准备各项政变的步骤，而特别注意宣传，因为这种事的本身非常简单，但数十年靠左的习惯已深，非使一般人获得强烈的印象，交通秩序一时难免混乱。

为什么一向靠左，忽然又要改为靠右？理由很简单，就是为着应顺世界的大势，一劳永逸。世界极大多数的国家，车辆行驶是靠右；现在科学越来越发达，空间的距离越来越缩短，天下一家，不容闭关独异，此其一。车辆靠左靠右。设备各有不同，而世界主要生产车辆之国家，其行车均靠右。我们现在正当建国的起点，旧的交通工具，大半要遭淘汰；新的交通工具，急待大量补充；在这时机来改变，牺牲最小，成功最快，此其二。

我们相信，这次的改革，结果一定很好，纵使最初几天有些小麻烦，而很快就会顺利着成习惯。因为无论什么事，只要有决心，有步骤，因应大势，势在必成，就没有不成功的道理。讲到这里，我们要来一句俗套滥调：政治之事，亦如是也。

这话怎么讲？我们的民国已成立了三十多年，而实际还没有民主。制宪也制了几次，训政也训了多年。现在，已到了势在必行的阶段。这次大战以后，整个的大潮流是民主政治，人民世纪，再不容我们风格独异。这个大趋势，等于车辆必须靠右一样。这是一点根本的认识。

政治必需有轨道。不论靠左或靠右，只要有一定的轨道就容易循序渐进，不会混乱。过去我们的政治，毛病不在靠左靠右，而在实际没有轨道，以致彷徨因循，莫知所适。所以，要改革，也只在一一定的决心。决心要民主，民主就可以实现。政治的革

新，当然不象行车政变那么简单，但原理也是一样，每一个操纵交通的人，能够约束传统的习惯，忍耐一时的不便，就一定能达成目标。不要以为人民没有民主的习惯和行宪的能力，实际的学习，就是最好的训练。譬如游泳，训练一定要在水里，大不了得喝几口水自然就学会了。再如行车，不能怕靠左的不会靠右，决心定了，办法有了，一声宣布，就可以马上改变。

我们的政治改变，绝对不容再缓。国民党领导革命，领导抗战，目的就是要排除万难，建立民主的国家。其他在野各政党的要求，以及全国人民的呼喊，都是结束训政，实现民主。大目标相同，问题只在步骤与途径有差异。所以根本上没有困难。现在，政治协商会快要召开了。这一会议，就要决定共同遵守的改革途径。目前的国内情形，虽然处处一团糟，但只要这次协商会能够圆满进行，就不难一举扭转危局。怎样能够圆满？第一，当轴要有改变的决心。第二，任何改变的步骤，要遵循秩序，不许再乱。第三，关系各方，要约束习惯，忍受一时的不便。既决定了共同的方向，就要诚心诚意去贯彻实行，不要再另找蹊径，想走近路。

我们建国的途程非常漫长，而时机则稍纵即逝。大家要赶快决定停车的秩序，整齐步骤集中力量，向这一共同目标，努力前进！

（原载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海《大公报》）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2. The second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3. The third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4. The four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5. The fif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6. The six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7. The seven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8. The eigh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9. The nin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10. The ten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11. The eleven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12. The twelf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13. The thirteen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14. The fourteen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15. The fifteen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16. The sixteen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17. The seventeen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18. The eighteen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19. The nineteen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20. The twentie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21. The twenty-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22. The twenty-second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23. The twenty-third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24. The twenty-four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25. The twenty-fif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26. The twenty-six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27. The twenty-seven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28. The twenty-eigh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29. The twenty-nin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30. The thirtieth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第五辑

我们的自勉

本报今天起增加篇幅，版面也略有变动。报纸应该不断求进步，这样平凡的改革，本来用不着说什么话，但我们想乘机发表一点感想。

新闻检查，内地在胜利后就宣布取消；收复区的检查机关，也于三个月前撤销了。据我们所知，政府并没有变相压迫报馆，干涉言论；但解放后的报界，究竟有多少蓬勃的发展？自由后的言论，究竟和以前有什么不同？说起来非常惭愧，是不是裹惯了的脚，一时竟迈不开大步呢？

美国人说：中国的和平，关键在中国的民意，马歇尔这次的工作，根本要靠中国的民意予以支持，而不靠美国的力量。民意的具体反映在新闻纸，而我们新闻界扪心自问，今日究竟能反映出多少民意？

进一步论，中国的唯一进路是民主，而所谓民主，决不是靠权力阶级的恩惠，而要民众自动觉醒，由下而上，组织争取。报纸应该是人民最有力的武器，而今日的报纸，能不能肩荷这艰巨的责任呢？

胜利后民众怎样痛苦，报纸有没有详细切实的报导？他们如何渴望和平建设，诅咒内战残杀，报纸有没有正确的反映？对于当前危局应如何挽救，报纸有没有提出鲜明而合于民意的主张？对于建国前途，有没有积极的建议？我们细细反省一下，实在汗颜无地。事实上，许多国际的报纸，对于中国现状的报导分析判断，反比我们自己近于真相，健全有力。我们的新闻事业，论规模设备，当然远不及人家，但要向近代化的方向走，应该先严肃自己的立场，树立应有的风格。否则，尽管数量多，销路好，设

备改进，而一味歌功颂德，吞吞吐吐，不敢正视现实，正视真理，那末，我们新闻界不仅永无前途，而且迟早要被民众唾弃，被时代抛落的。

《文汇报》的历史甚短，基础极脆弱，但因为她在抗战期间诞生，曾受上海和各地读者的热烈爱护，得以存立，所以我们决不敢妄自菲薄，忘了我们对社会对国家所负的责任。复刊以来，艰苦支撑，而兢兢业业，牢牢守住民间报的立场；我们的新闻记载不够充实，说话也不免幼稚，但我们的态度是透明的，每一个读者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要求民主，拥护经济建设，扶植民族工业，反对一切独裁、垄断、剥削及违反自由、民主的现象。这些，都是今日中国人民迫切的要求，而决不是任何党派的私见。

今后，我们将追随全国同业之后，加紧努力，为民众的喉舌，作民众的前驱，在这建国的大时代中，尽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们热望读者不断指导，尤望社会不断鞭策我们，呵护我们。

（原载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上海《文汇报》）

一个讣告

西安《秦风工商报》几经苦斗，现在是终于殉职了。

它可说是西北唯一的民间报纸，它不断报道一些真情，它不断为民主呼吁，这就构成了它的死因，这次不再是什么“暴徒”“暴动”，而是直接由大队军警动手了。

报馆被围三日之久，虽然连一张纸也不能送出的时候，该报同人仍然紧守岗位，按日出版，直到最后一秒钟。

这种精神真可说得上是惊天地泣鬼神，然而这事情并不是发生在敌伪包围时代的陷区，而是在胜利以后，尤其是新检制取消，

新闻自由宣布后的火后方！

（原载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上海《文汇报》）

反对所谓“警员警管区制”

上海市警察局最近决定，自下（六）月一日起，推行所谓“警员警管区制”，使每个警员管辖八十到一百二十户，或四百到六百人；警员得在任何时间随意进入管区内的私人住宅或商店，作定期的或不定期的“访问”；目的是在“深入民间，使警民打成一片”，“藉以明了各户详情，俾宵小匪徒无以匿迹”。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奇怪而且荒谬的决定，它使我们很容易地联想到历史上元朝蒙古人统治中国的一套老把戏。据史书记载，当年蒙古人为了严防汉人的“反抗”，把汉人每五家十家割给一个人管辖，而这个蒙古人得以在任何时间（不分昼夜）出入于所管的汉人家庭，进行“友谊”的“访问”。今天的所谓“警员警管区制”，在办法上和四百余年前蒙古人的统治有什么两样？在精神上又有什么不同？如果一定要找出两者之间的异点的话，那就只有管辖户数多少的分别和当年蒙古人对于汉人享有初夜权，而今之警员却还不曾被警察当局授予同样特权而已。

在人民世纪的今天，在号称“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国度里，居然有这种蹂躏人权的决定，这应该不仅仅只令人感到奇怪，而且会惹起全体市民的愤怒！警察当局采用这种办法的目的，据说是在防小偷。是不是把上海五百万中外市民都看成小偷嫌疑犯或者窝藏小偷及其赃物的窝户呢？这种办法的另一目的，据说是在防匪徒，是不是把上海五百万中外市民都看成土匪或窝户呢？为了防少数的小偷和土匪，警察当局竟然把上海五百万中外市民全

体作为防匪和斗争的对象，这能够得到市民的谅解么？再说，这种办法叫外国人看了象什么样子？把中国的国格置于何地？

诚如前日《大美晚报》社论所言，警察当局的这种措施，在战前的柏林罗马和东京三地或者是司空见惯，但是如果在华盛顿或伦敦，那一定立刻会激起群众的狂怒。这段比辱骂还难听的尖锐评论，我们不知道警察当局听了作何感想。

最令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上海这么多报纸杂志，除了本报和另一家同业之外，竟然大家都噤若寒蝉，没有说过一句话，哼过半个字。上海市参议会和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也同样不声不响！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正义感在上海竟不存在么！上海舆论界和民意机关的正义感到哪里去了？

政治学家把人民的自由权利分成三大类：一是人身自由；二是社会生活的自由；三是精神生活的自由。这三种自由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非依法律不得侵犯，居住自由实在是人身自由的一种。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里，非依法律不得侵入人民的住所，甚至检查户口，检查卫生，收缴房租，都要先行出示委任状或书面命令。毫无疑问地，“警员警管区制”的实行，事实上等于破坏、侵犯人民居住的自由权。这，我们人民是不能答应的，是要大家反抗的。

警察当局对于警员的授权，不能构成一种法律行为。因为“训政时期临时约法”第二章第十、十二各条，曾经明白规定“人民的住所，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或封锢”。这个约法，蒋主席最近还认为是现阶段的根本大法，还不惜为拥护这个根本大法而与中共决裂。警察当局有什么理由，有什么权力，来破坏这个约法的规定？违反蒋主席的训示？

我们所以要三番两次地严厉指责警局这种措置，是因为我们觉得这种措置的意义太严重了，问题太根本了，不能不大声号召全体市民来共同反对。在一七六一年美国革命之前，英国在美国的税警也奉有一般的授权，可以在“防止走私犯”的理由之下，

随时随意进入民家去访问，去搜查，结果惹起了一场大骚动。在一七六一年的著名审判当中，奥替斯法官曾痛斥这种授权是违法的，侵犯人民基本权利的，断然要求予以废止。后来这一点还被装订成为美国宪法的一条，直到今天。我们必须严正地指出：元朝的“蒙古人管区制”，结果只获得了“杀鞑子”的后果；英国人对美国的“税吏管区制”，结果只获得了美国的革命。这是历史的教训，任何人都应该切实记取。防止宵小不是没有更好的技术，同“异党”斗争也尽有许多正当的方法，为什么定要把全体市民的基本权利都予以破坏呢？这种玩火的事情千万做不得，我们诚恳地希望警察当局悬崖勒马！

自然，我们要更诚恳地希望全上海的舆论界和民意机关，认识本问题的严重性，克尽本身的神圣责任，大家共同一致，反对这个办法的实施！

（原载一九四六年五月九日上海《文汇报》）

告马歇尔将军

中国全面内战的危机，到今天已经是千钧一发。中国人民含茹茹辛，牺牲性命，牺牲利益，熬了八年，熬得了胜利，满望可以追求应得的幸福了，然而摆在面前的是漆黑一团，灾荒遍野，贪污盈廷，物价飞涨，苛敛不已；生活比抗战期间更苦了千百倍。人民已经命如悬丝，只有挨命的分儿，而好战的英雄们，还要张牙舞爪地掀动全面内战。我们不知道这批好战者跟人民究竟积了什么血海冤仇，一定要人民仅保旦夕的生命。

现在中国千千万万的人民究竟向谁控诉呢？在马歇尔将军第一次来华获得结果的时候，中国人民都以泪眼凝望着这位友邦的

特使，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惭愧呢，还是应该感激。可是自从特使回国以后，曾几何时，一切就面目全非，而且变本加厉。今天特使在我们首都，不知作何感想？我们中国人民颇想向特使进一言，但又从何说起？我们只有自愧。

我们记得，特使来华的任务，第一是要使中国内战立即结束。第二是要使中国政府改组为民主的联合政府。为了达到这任务，政治协商会议是特使全力倾注的目标。因此产生了政协会议的议决案，停战协定以及整军方案。然而今天这许多辉煌的历史文件那里去了呢？这些文件究竟发生了多少效力呢？特使已往努力的成果究竟又是给谁毁弃了的呢？

特使曾一再痛切地提及中国国内的顽固分子，说他们企图阻碍中国的进步。究竟这些顽固分子是谁呢？特使早该看得清楚。远的不说，就近的看，留在南京的一批所谓国大代表，公然叫嚣谩骂，反对与“土匪”谈判，主张“剿匪”。这不是很明明白白么？这批代表本非民选的，而是官选的。他们所反对的，不正是特使所主持的政治谈判；他们所主张的不正是内战么？这批人所代表的主张究竟是什么人的主张？特使应该可以明白的！

马特使曾同意民主同盟调处东北战局的建议，但这建议终被拒绝了。反之，所谓先退出长春的条件，却硬说是马氏的主张。我们人民对此，真感到万分的愧恨，感到万分的羞耻。友邦特使千焦万虑来为我们努力，无非要把我们这国家从毁灭的深渊里挽救出来，扶助我们走上光明的坦途。现在这善意不但被拒绝，反想把这善意的朋友拖到不名誉的泥淖里去，这是什么存心！因此，我们人民必须正告特使和友邦人士：中国内战专家们在处心积虑掀动扩大内战时，一定要把美国友人拉到这泥淖中，事实上，假使不拉住美国友人，中国内战专家们决不敢轻易尝试的。

所以，我们希望特使要眼明手快抓住这毫厘千里的时机，使美国一切足以直接或间接帮助或鼓舞中国内战的因素，立刻脱离内战的场面。我们急迫地要求美国友人站开。这对于中国国内

的和平谈判将有极大的帮助。反之，假使美国友人仍旧不避嫌疑地还要夹在中间，则纵使不以直接行动来助长中国内战，但也决不能不使中国人民怀疑美国友人对于中国内战发生了兴趣。

我们相信，特使一定见到的，特使应该就自己权力所及，把一切足以助长内战的因素首先消灭掉。渤海湾的美国军舰究竟为什么？美军在辽东半岛登陆，究竟为什么？我们可以断言，美军在中国境内，尤其在内战危机严重的地方，任何行动都足以抵消特使在首都几个月的努力。我们人民可以保证，只要友邦人士从内战的场面中完全站开，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是足以制止内战的。

中国全面内战的危机的确万分严重了。我们对于特使的及时努力，既感激又自愧。我们希望特使早获成功，我们愿意努力帮助特使的成功，我们切盼特使多多倾听中国人民的呼声。中国人民现在已经充分能够辨别是非善恶，中国人民已经认清了自己的前途，中国人民已非任何蛮横的武力所能征服，中国人民自己已经具备了力量足以抗拒到任何不合理的违反人民意志的压迫。特使必须倾听这些人民的呼声，使你的努力不致于落空，而中国人民在你协助之下，将断然走上自己所抉择的道路。

（原载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文汇报》）

何谓教育第一？

抗战胜利后，政府当局喊出了一个口号，说今后建国时期，教育第一。

这口号对极了，建国需要大量的人才，不好好培养，哪里来的人才？不注意教育，人才如何培养起来？

但这几个月的现实如何呢？教育的复员计划，只见于纸面，各大学的迁移整顿，收复区中小学的恢复补充，以及社会教育的扩充，师资的培养，进行得都非常迟缓。对于最迫切的教育人员生活问题，也一筹莫展。

最近，我们在上海就看到两件极痛心的事。第一件是交大教授的罢教，第二件就是尊师运动和敬师运动。罢教本来是一件万不得已的事，教授们实在因为生活万难维持，才作这种表示，希望因此引起政府的注意，社会的同情。可是结果呢，社会固然有不少同情，而政府始终拿不出解决的办法，他们罢了几个星期的教，又忍痛自动复课了。教授的罢教，自然不能与工人罢工或电影院罢业等量齐观，但工人一罢工，当局马上注意，条件都尽量采纳；电影院一声罢业，有关方面马上挺身调处，甚至不惜自损“威信”，撤回皇皇的布告。而对于大学教授这种万不得已的举动，好象根本不值得重视，让这风潮自起自落。现在，事实证明这风潮果然已自起自落了，从这件事，看出国家对于这些安贫守道的教育人才，如何的太残酷啊！

尊师运动和敬师运动，结果也是如此；国家养不活教师，要呼吁社会来救济，害得许多天真的学生，沿门托钵，满街化缘，受尽了市侩们的白眼，结果，所得距预期的数字很远，因此不仅绝对解决不了教员的生活问题，第二期的贷款就发不出来了。

这件事，证明用救济方式来维持教员的生活，绝对无济于事，还是要从根本上求解决。

今日的问题，已不是教育第一或教育第二的问题，干脆我们要问一句：国家是不是还要教育？要简单一点说，是不是还要人来从事教育事业？

抗战八年来，已经把教育事业推到破产的地步，由于生活的煎熬，许多优良的教育人员都已转业，原来学教育的学生，毕业后也视教育为畏途，纷纷改行。因之师资水准日低，学生程度日趋退化。目前从事教育事业的老教员，大概多是艰苦卓绝的老斗

士，任何苦难，他们都不肯放弃岗位，要为国家培养一点元气。但是目前的情形，已使这些老斗士也无法再熬下去了，中小学教员每月的收入，已不够买一担米，大学教授的待遇，也远比一个凭苦力工作的人低。安贫乐道，至少要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现在是根本成问题，全陷于饥饿线下去了！

政府自然也有苦衷，国家财政极度困难，又认定教育人员应该和公务人员同样待遇，全盘调整，预算太庞大，支持不了，但我们认为，这要看政府是不是真心注意教育，而表里如一的认为今后是教育第一。为什么技术人员可以受特殊待遇，为什么银行职员也可以受优遇？我们并不是说公务人员可以受苦，教育人员必须特别优待，因为国家对于一般奉公守职的公务员，实在太漠视，只因他们不会“罢职”、“罢公”，就尽让他们饥饿挣扎下去。但因为本文是谈教育，我们要指出一点，就是教育人员的待遇问题，不必一定要和一般公务员混为一谈。换句话说，困难可以分开来一个个解决，不要牵来牵去，最后什么都解决不了。一个最现成的例子，空军和陆海军都是国家的军人，不是因为要特别提倡空军，对于空军人员的待遇，就优厚得多么？

既然认定教育第一，就应该特别注意教育事业。同时，要认清教育也是专门人才，他们的工作，比任何一业都重要。假使教育真破产了，连目前在教育界苦守残垒的老斗士都活不下去，则今后谁还敢问津，真成了“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了！要是这一代的教育脱了节，今后的建国事业，更从哪里谈起？

归结说，假使政府真认为国家还需要教育，就应火速挽救目前濒于破产的教育。先把总预算内教育经费的百分比大大提高，就目前的急切需要，算一算教育经费应该要多少钱。假使国家的财政实在负担不了，不妨指定几种税源专作教育费，再不够可以增加这几种税额。目前人民虽然都很贫苦，但为了国家百年的大计，为了自己子女的切身教育问题，他们一定都愿尽力来担负，只要政府有切实公平的办法，这样，比零零碎碎的募款运动，或

增缴第二期学费等变相的负担要合理得多。

（原载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三日上海《文汇报》）

禁止吃饭！

辽宁省府禁止人民吃饭，所有米谷都由省府收购作军粮。内战对于民生的严重打击，可见一斑。

军队固然要吃饭，为什么老百姓就不准吃饭，只应吃杂粮？

东北民众，在日寇统治下饥饿了十四年，好容易盼到胜利，想不到还要在内战中遭受到残杀和饥饿。现在，索性由政府明白禁止吃饭了！

我们在关内的人民，似乎比关外同胞幸福得多，至少米还可以买得到。但内战再打下去，就是不禁止，究竟有多少人能够长此吃饭呢？

饿死的和仅赖树皮草根果腹的同胞，已经有几千万了！

（原载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上海《文汇报》）

请勿断送航权！

据昨日本市《联合晚报》南京电：昨天国防最高委员会开会，根据行政院的呈请，决定准许外轮在南京、芜湖、九江、汉口四个商港卸货。理由是为“加强复员运输”。我们听到这消息，真如晴天霹雳！想不到抗战中艰苦争回来的航权，又要轻轻断送了！

我们还没有看到这决议案的全文，不知政府对这件事作什么

解释；但无论有任何理由，这种丧权辱国的事都是绝对不许发生的。因为凡是独立国，航权必须完整，内河固不许外轮插足，就是沿海的航线，也绝对不能允许外轮在两个口岸之间装运货物。这是公法的规定，不容含糊曲解。

去年抗战胜利后，政府忽宣布有三十五艘外轮来华协助运输救济物质；后来因为航业界呼吁护权，誓死反对，才只来了八艘，说明是租用，租约到下月十五日即将满期。最近行总又由联总拨来二十万吨的船只，组织所谓“行总水运大队”，将在沿海及内河各口岸开始行驶。昨天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行驶四口岸的“外轮”，究竟是指“行总水运大队”的船只呢，还是以前“租用”而即将期满的八艘外轮？或者竟是指一般的外轮而言？但无论这决议的范围是宽是广，总之都要破坏我航权的完整；尤其严重的，对于艰苦挣扎中的航业界，是一个迎头的致命打击。

政府这样决定，当然有一大套不得已的理由，最现成的，是自己的航运力不够，要加紧复员，或者载运救济品，不能不借重外国的船只。但我们根本要注意一个问题：一个国家，是不是为了一时的困难，就可以不惜牺牲主权，饮鸩止渴？我们翻开历史看看，有多少误国的人，误国的事，是真正出于“不得已”的？

而且我们要研究，为什么胜利以来的航运那么困难？据可靠的统计，从敌伪方面接收的船只有二三十万吨，加上新购的和招商局及民营公司原有的船只，共有四十五万吨，比之战前五十万吨相差无几，这一些船只，假使能好好的运用分配，对于复员工作，实在勉强可以应付了。为什么我们还天天喊船荒，老百姓坐不到船，许多物资都不能畅流呢？最大的原因，就是内战，全国现有的船只，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在国营招商局手里，而招商局的船，又有百分之九十以上调去运兵；试问航运怎么能不困难，复员运输又怎么能够加强？

为了打内战，把整个航运窒息了，把复员工作停滞了；现在又以这个结果，作为原因，不惜丧失主权，引狼入室，打击我们

自己航业界的命脉，破坏航权的完整，这又何从说起！

我们打了八年苦仗，好不容易把敌人打垮了，把不平等条约取消了，是多么难得的建国时会！想不到九个月来，自己不振作，拚命自相残杀，把国家仅有的元气大量消耗，一方面还极力自己走上殖民地的老路，经济上处处依存外国，外货如潮涌进，民族工业，根本无法抬头。即以航运而论，在抗战期内，民航业尽了多大的牺牲，作了多大的贡献，许多船只被政府凿沉在封锁线上，残余的，苦心孤诣随政府西迁，搬运机器人员，协助抗战建设。而一旦胜利后，接收的船只都被政府接收去了，民航业苟延残喘，得不到赔偿，得不到扶植，这已经够惨了；现在政府竟索性明白破坏航权，准许外轮到内河来行驶并装卸货物，试问我们脆弱的航业界，如何能够抵抗，最后只有一条路，就是全部破产。

外商的航业，本来千方百计想在中国恢复他们过去的地盘，他们的策略，一面封锁船只，不允许我们收买；一面用“租用”“救济”等等动听的名词，来诱惑我们。我们一旦入其圈套，以他们雄厚的力量，来和我们气息奄奄的航业界来竞争，我们哪有倖免之理。事实上，这几个月来，那八艘租用的外轮，就以低价扼住了我们航业的生命。而所谓“水运大队”，所定的运费比我们自己的低了十倍，目前我们所得的救济品，每月不过六七万吨，而“水运大队”有二十万吨的船只，以这些剩余的吨位，大量载货，压迫我航业，我们的航业界，岂不是很快就要被扼死！等到我们的航业扼死了，外商轮船就可为所欲为，操纵垄断，到那时，我们再要喊维护航权，恐怕也喊不出来了！

这实在是一个国家兴废的大问题、大危机，不仅航业界不能漠视，我全国民众，也应急起呼吁，要求政府赶快取消这个决议，切勿饮鸩止渴，断送航权！

要加紧复员运输，唯一的办法，是火速停止内战。

（原载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上海《文汇报》）

论当前的民主运动

当前蓬蓬勃勃的民主运动，把中国历史带上了一个新的重大的转捩关头。这个运动如果成功，中国便可从此走上现代化国家的大道；这个运动如果失败，中国便又要重蹈过去三十几年的覆辙，继续在专政、反动的锁链之下过日子。这未来十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关紧要的时期，稍纵即逝。凡是努力于民主运动的人士，都应该特别珍重这时期，努力为实现民主新中国而奋斗。

客观环境和主观条件对于民主运动的实现，都是有利的。就前一点说，当前的世界主潮就是民主主义的压倒胜利与人民力量的普遍昂扬，中国当然不能不受到这个主潮的影响，任何顽固反动的力量也不敢逆着这个主潮行事，就后一点说，在敌伪统治时期，在军事解放时期，全国人民因从事各种抗战工作，而得到了新的力量与新的信心。因此，在战争结束之后，人民对于提高生活的要求；对于社会公平的要求，也就空前澎湃起来。这两大因素是促进中国这次民主运动飞跃发展的动力，也是保证这次民主运动不致失败的力量。

环境和条件虽然如此优越有利，但要民主早日实现，还得我们努力去争取。我们不能等待环境和条件的变化；等待是会延迟民主解放运动的成功。

如何才能争取民主运动的早日成功呢？

第一，所有争取民主的分子应该联合起来。今天中国只有国共两个大党，但这两党的党员为数都并不多。绝大多数的人士还是游离在这两党之外的所谓中间分子，他们包括社会各阶层，自进步的政府官吏，民族企业家，地主，士绅，教育文化界人士，以至工人和农民。他们的觉醒程度虽有不同，他们的认识思想虽

然各有差异，但在现阶段上，他们痛恨当前腐败专制的政治，要求立即实现民主政治，却是大家共同一致的。根据这个共同要求，他们实在应该大家团结在一起，集中力量来为共同的理想与要求奋斗；否则象今天这样一盘散沙似的，意志既不集中，行动又嫌迂缓，是不容易发挥力量的。我们希望第一步，各民主政团，在当前最迫切而又大家意见上无甚参差的问题上（譬如说，反对继续内战，呼吁全国和平），联合起来，共同表示，共同行动；第二步，再把一切民主进步分子团结在一起。这种组织就松懈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能在一个特定的阶段上完成一种特定的任务就行了，任务完成后不妨大家分散，新任务来到时再大家联合起来。

第二，民主运动的基础应该深入到群众间去。目前的民主运动似乎只着重在上层活动，譬如，协商的参加，纠纷的调解等等。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除掉这些上层活动之外，实在更应该加紧展开对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前面说过，要求提高生活，要求社会公平——一句话，要求民主政治是今天全国民众的普遍要求；所以只要我们深入群众中去做，当不难获得一个广大坚实的群众基础。有了群众就有了力量，没有群众的政团是不会有远大的前途的。譬如说，在这十五天的重大关头，没有一个民主政团发动过一次大规模的和平示威运动来表现人民的意志，压迫谈判双方互让互谅，这不能不说是万分遗憾的事。这一点暴露了我们当前民主运动的一个严重弱点，值得我们反省。

第三，民主运动的理论基础应该建立起来。“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这是历史的真理。因此，我们希望民主运动的领袖们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先进国家民主解放运动的经验和我国过去三十几年民主运动失败的教训，抽出科学的结论，构成民主的纲领，以作民主运动的行动指导。否则象目前这样，仅仅由于义愤或正义感，而结合在一起的民主运动，是无法持久的，自然也担负不了中国民主解放运动的历史任务。

总结起来，当前的环境和条件虽都有利于民主运动的进行与推动，但民主政团的努力还嫌不够。她们的力量太分散了，她们的群众基础太薄弱了，她们的理论基础太贫乏了；她们还担负不了民主运动所要求于她们的历史进步的任务。因此，我们希望一切民主的政团和个人联合起来，努力建立民主运动的理论与纲领；并且大家走向群众中去，动员下层工农群众以及一切被压迫人民自己的力量，来争取真正民主的实现。

（原载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三日上海《文汇报》）

对南京暴行的抗议

前天上午，上海民众以十万人的伟大行列，送走了到南京去代表我们呼吁和平，要求停止内战的马叙伦，黄延芳等几位先生。同天下午，当他们一行刚刚到达下关车站的时候，立刻就被一群约千余人的自称“苏北难民”的便衣暴徒所包围，殴打。代表团中有好几位受重伤，其余受伤的也不少；中国新闻记者三人同时挨打，一个失踪；甚至连美国新闻记者艾勃纳女士也未能幸免，被暴徒拔掉了一大把头发才算脱身；各人的行李、衣服、钱袋、手表、自来水笔，一齐被抢劫一空。这种暗无天日的暴行，竟然发生在宪警林立的首都；竟然演出了六七小时（从七时到翌晨二时）之久。这些情形，使我们在上海的中外人士感到深刻的悲愤。

据外籍记者的报导，这次的行动是有组织，有计划，事先深思熟虑，准备得非常周到，“完全重复过去两年中重庆、北平、成都、昆明等地类似的事例”。不过，有一点是这里应该加以补充的：过去的每次暴行，都没有这次卑鄙而下流，因为过去不过

只是打打人，而这次则是打人之外更带抢钱抢东西。这一点证明打手的素质越来越低下了，指挥操纵的也越来越无法控制打手的行动了。这种情形，就是操纵指挥者也应该注意，此风不改，等于玩火一样，结果总有一天会自焚其身。

最使我们感到难以忍受的是，过去每次全武行演出的时候，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蒋主席不在当地的时候；这次呢，蒋主席正坐镇南京，并且亲自在主持和平谈判，而竟然有人敢演出这种暴行，在国内国际造成极不良的印象，使政府在国内外丧失掉威信与尊严。象这样的事情，老实说，实在是首都治安的耻辱，是政府的耻辱，也是全中华民族的耻辱。我们相信，政府为了威信与尊严，一定要严惩凶手，并查究治安的责任。

由较场口以至下关车站，种种暴行的演出，恐怕会产生三个极严重的结果。其一是，象马叙伦、黄延芳等几位任何人都知道，是毫无政治野心的真正无党派中立者，尚且遭这样的侮辱，这样的毒打，足见在这些玩火者的眼里，根本没有人民，甘心自愿与人民为敌。这种自己替自己增加仇人的愚蠢行为，将来是会悔之不及的。其二是，说明在中国做一个无拳无兵的第三者，如何的难做，今后谁还肯轻于放下武力，听凭暴徒来殴辱打骂呢？全国人民本来绝对不赞成党派拥有军队的，然而照今天的情形来看，说句痛心话，全国人民或者倒会反过来同情有军队的党派了。因为对于一个拔掉牙齿的党派，到处都是较场口，到处都是下关车站。这种人民心理的变化，对于未来中国政治的发展，很有重大影响。政府如果真心要求和平统一，这种影响实在应该严密注视，而迅于有效的挽救。最后是，这次暴行正发生在和平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的时候，毫无疑问地，因此必将陡增空气的严重性，使双方原已存在的猜疑与不信任更加深刻化，使谈判蒙受了一层阴影。

自然，中国人民决不会因为这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而放弃对于民主与和平的争取。不，这只有使我们更加坚定为和平民主而

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今天离我们的最后目标的实现，还有许多曲折的路要走，但我们的目标一定会实现，因为任何汹涌的逆流，都阻挡不了时代的狂潮，更阻挡不了历史的必然。

我们谨向马叙伦、雷洁琼诸位先生致最虔诚的慰问和敬意。向无辜受伤的四位南京同业致最虔诚的慰问和敬意，并表示我们对这次暴行的愤怒与抗议。希望上海各界同胞，一致起来给我们光荣负伤的代表作声援，使他们的任务早日达成。

（原载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上海《文汇报》）

追随不是政策

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中国应该有它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基本原则，中国外交自应以维护并促进世界以及远东和平为职志；但要达成这个目的，中国自有其可走当走的路，绝对无须乎追随这个国家或那一个国家。在具体任务上，中国外交应置重点于（一）全世界法西斯残余势力的彻底消灭；（二）使自己成为美苏之间的和平桥梁，而不是战争冲突的火种；（三）特别严防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活与再起。凡足以帮助中国完成这三项任务的，我们都要用尽全力去争取；凡足以破坏这三项的，我们都要用尽全力去反对。这三项任务的完成与失败，关系到中国未来五十年的安危，也影响到未来半世纪的远东的及世界大局。国家的百年利害当前，每个执政者在考虑运用外交政策的时候，必须切实把握住这种现实的利害关系，断不可以一头倒在某一方面的怀里，招致另一方面的误会与恶感，或专门追随某一方面，竟至牺牲了自己应该绝对坚持的神圣原则。

凭着这一立场来看政府当前外交政策的运用，我们认为：追

随的实例太多，独立自主的表现太少；为迁就眼前内外情势而过分倒向美国的地方太多，真正站在国家远大利害的考虑上利用国际矛盾来维护民族利益的作为太少。我们对此不能不深感遗憾。

举例来说，西班牙佛朗哥政权之为野蛮反动的法西斯余孽，以及它过去与德意两个法西斯勾结之深，对世界和平为祸之烈，可说是全世界任何人士都不能否认，也无法否认的事情。倘若联合国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有原则的新世界”，而安全理事会又是执行联合国目的的唯一有效机构，那后者就应该对于制裁佛朗哥的建议作百分之百的支持，并采取有效的行动；即令这个建议是出之于苏联或亲苏国家，也无例外。但这建议竟然遭受到美英两国的反对而被百般阻挠，这种强权政治的作风，很显然地会使联合国的威望遭受严重打击。对于这样一个曲直十分明白的案件，中国如果为了坚持“完全扑灭法西斯余毒”的原则，如果为了维护联合国的威望，便应该投赞成票；如果怕得罪美英，那中国也可以不参加表决。但据今日报载，我国代表郭泰祺氏却是第一个投反对票的，比英美还走前一步。为了取悦于美英而牺牲了正义原则，我们总觉太不值得。

任何人都知道，中国外交最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严防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活与再起。在任何国际问题上，我们都可以退让一步两步，但在对日问题上，我们却一丝一毫也退让不得。目前对日管制业已进入了新的阶段，即由军事管制进到政治管制的阶段，美国特别提出一个管制日本二十五年条约草案，请中英苏三国讨论签订。但综观过去九个月中麦帅管制日本的情形，不仅未能奠定改造日本的初步基础，而且种种措施，如保存天皇，鼓励财阀，利用官僚，支持反动，很有把日本放在美国的培植保护下，逐渐使它强大起来的趋势。在麦帅，也许是想把日本变成反苏防苏的远东前哨；但在中国，则美国这种扶植政策的直接结果绝对有害于中国。因此，对于美国今天提出这个二十五年条约的真正用心和具体办法，我们应该作一彻底详尽的研究，然后再定接受

与否，决不可以因为案是美国提出来的，就无条件加以接受，加以赞同。然而据外电报道，除苏联尚未答复外，中美两国都已表示同意了。

在此美国与苏联对立日趋尖锐的时候，中国介于两大之间，处境固甚困难，但也很明白地只有一条路好走，那就是莫倒在一个方面来刺激另一方面，莫做这一方面对付那一方面的战略基地，而做两个方面之间的和平桥梁。但今天的政府的作为，似乎选择了全国人民所最不希望的一条路。

由以上所举例证，可知中国现行的外交政策决不是以维护国家利益，裨益国际和平，实有改弦更张，彻底考虑的必要。我们深知，外交是内政的延长，在目前内政情形之下，外交政策很少有改变的可能，所以我们一方面希望内政问题能够赶快圆满解决，同时也希望政府尽可能减少内政问题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原载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上海《文汇报》）

召开国大的前提

停战满期后，内战并未全面爆发，但大局的沉重，却绝未丝毫减轻。因为摆在面前的，还是拖的局面。这样拖下去，究竟是拖到战呢，还是拖到和？就目前的种种征象观察，拖出和平来的可能实在很少。国家已绝对不许再这样慢性自杀的拖下去了，何况拖到后来，还难免于一战！

蒋主席接受马歇尔的意见，恢复国共直接商谈，这本来是打开僵局的一个重要步骤，可惜谈了三天，还没有什么进步，而国防最高委员会忽然又决定国民大会于十一月十二日召开，这使复杂的时局，又增加了复杂的因素，共党和民盟方面，都指摘政府

对于这样重大的决定，事前并未与各党派协商，认为违背政协的精神，一般民众，也以政府采取这样坚强的态度，恐怕有什么大的决心。

对于这个国民大会，我们素来不感兴趣，因为我们根本怀疑，十年前草率选出的国大，能不能代表今日的民意。退一步讲，假使认为这个国民大会一定要召集，也必须在政治上获得妥协后才能发生作用。要是政治上没有妥协，中共和其他党派很可能不参加这个国大，根本的问题依然得不着解决。固然，会尽管可以照样堂皇的召开，宪法尽管可以顺利的通过，但事实上还照样是分崩混乱的局面，结果还是要用武力，那又何贵乎有此一会？另一方面，政治没有妥协前，就是各党派都勉强参加了，对于宪草的每一重要问题，还是谈谈吵吵，结果也不可能有什么成就，开会或者比不开还更坏。

要解决时局，要打开和平统一团结民主的大路，唯一的途径，只有彻底实行政协决议。政协的五项决议，是整套的，连环的，决不能单独起来从表面去求贯彻。政协的途径是什么？简单说，就是停战整军，改组政府，实行建国纲领，由改组后的政府，决定召开国大，通过宪法。目前的时局，如一头乱发，打打谈谈，谈谈打打，要挽救这危局，唯一的办法，还只有从政协的五项决议上去探求，看究竟哪一方面是违反了政协决议，停战协定为什么不能真正实行，整军问题的症结何在，大家能够平抑意气，化除猜疑，坦坦白白以诚意来谈商，我们相信，总会谈出结果来的。

据中宣部彭部长表示，此次国防会议决定于十一月召开国民大会，是为政府重申尽速实现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还政于民的决心。政府这样不顾一切，急切的还政于民，我们小百姓自然是感激的，但我们更不能不顾到现实，究竟这个大会开了，能不能真正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更切实些说，能不能真正拨乱反治，步入民主建国的大路？痛苦的经验告诉我们，表里往往不能如一，

希望往往和事实有很大的距离。

今日全国人民最大的要求，就是要解决死亡饥馑的威胁，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换句话说，就是要迅速消除内战的危机，尽速结束拖的局面，据我们观察，目前的局势虽然紧张万状，假使政府能够真正以忍让的精神，坚持政治解决的办法，打开僵局，并没有什么大困难。关于整军和防地问题，纠缠不决，其实，这问题的症结还在政治问题，政府应该放开脚步，打开僵局，一面国共直接商谈军事问题，一面赶快恢复综合小组，将搁置已久的政府改组问题，彻底检讨，求得协议，这样，根本的问题解决了，中共就不会因为怕消灭，怕包围，而斤斤于防区及整军问题的争执。因为这些问题，毕竟都是过渡时期的问题，政府大局的基础打稳了，因猜忌疑虑而发生的争执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我们认为，假使政府能这样放开脚步解决一切问题，停止内战，改组政府，那么，十一月十二日离现在还有四个多月，尽有时间来从容商量关于国大的种种问题，使国大真能开得象样。否则，这样的僵局拖下去，国大可能变成全国人民新的威胁，象停战限期一样，日期愈迫近，大乱的危险愈增加。或者不待国大召集，大局就变得不可收拾，那就可怕极了。

总之，我们认为，要召开国大，必须要先恢复协商，培养和洽的空气，把混乱的局面，拉上安定的轨道；这前提如不确立，召开国大实在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步骤。

（原载一九四六年七月五日上海《文汇报》）

为学费发愁

照学校年度说，现在正是暑假的时候。短短的暑假，转瞬即

过。在这期间，学生与家长所发愁的是学费，办学校的人所发愁的是下学期的经费与师资，而师资其实也还是与经费有关的。据说，本市的私立中等学校下学期每个学生应缴的学膳宿杂费将达四十万元，再加书籍制服零用等费，至少须五十万元。假使一家有二三个子弟同时进入中学，则一次必须支出一二百万元。目前作家长的究竟有几人有此力量。假使无此财力，则除了眼睁睁地看着子弟失学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

就家长的负担说，这样的数额实在惊心动魄。记得几个月以前，本市各私立中小学，为了增加学费的问题，曾遭受到严厉的责难，现在作家长的，无论服务于哪一种行业，都明白了教育子弟的重要，所以只要能力所及，无不把子弟教育经费列为家庭正常开支。可是在目前收入不足一家温饱的情形下，再逢学费的继长增高，眼看自己子弟被拒于学校大门之外，怎不痛心？因此，对学校的责难，也在情理之中！

可是平心静气再想一想，现在各学校的教师们究竟过的是什么日子？以收入的数额与劳心劳力的程度作比例来计算一下，目前各种职业之中，恐怕要以教师为最苦了。公立学校，名为靠国库开支，可是国家教育经费的预算少得可怜，能办得几个学校，养得活几个教师？教育事业大部分还得靠私立学校来维持，而民间办学者有几个能无限牺牲的？（那么，以“开子曰店”自肥者根本算不得办教育的）固然，我们不能否认，有若干私立学校，不乏相当数量的校产可资弥补。但校产大都为不动产，如房地产之类，在正常的经济情形下，所生利润，或可敷足，现在一切反常，此类产业，反成累赘。所以无论什么学校，除了从学生所缴各费各方面打算盘之外，实在毫无维持的善法！所以办学者又何尝不为学费问题而发愁呢？

与学校经费密切相关，约计还有师资问题。现在办学者一致承认，师资已一落千丈。一部分教师早已改行了。一部分为了增加收入起见，或兼课至每周四十小时以上，或兼别的职业，或兼营

商业。总之，教师能耗在每个学生身上的精神已经减至最少限度。在这种情形下，就是圣人来做教师，也无法教出好成绩来。这能怪教师么？当然不能！他们也是人，也须仰事俯蓄；他们必须有足够的收入。那么，为什么不提高教师待遇呢？这不又牵到教育经费与学生缴费的问题了么？教师们亦在为学费问题而发愁！

我们认为，自从中国废除科举，采用西洋教育制度以来，国人倒有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认为国家对教育应该负其全责。这个观念是从西方来的；这个观念是正确的，可贵的。大家无论贫富对子弟教育费用的继长增高而感到痛苦乃至愤愤，便是从这观念来的。柴米加价，大家还可忍受，独有教育费增加，便不能忍受，正如铁路邮电加价，大家不免黯然一样。这就是因为大家明白，国民的教育经费原应由政府负责的。而事实上国家预算中本来的确列有教育经费这一个项目。不过大家忽略了的是，现在中国的教育其实是靠民间热心的办学来撑场面的。现在假使以希望于政府者希望于民间办学，以责备政府者来责备民间办学，那便差以毫厘了。

儿童与青年到了适当年龄应该入学，但教育负担超过了家长能力的时候，家长们却怨不得办学的人，办学的人为了维持事业应该设法增加收入，但因学费的增加而遭受责难时，也怨不得学生的家长。教师们为了维持生活，为了增加教育效率，应该要求增加待遇，但事与愿违时，也怨不得学校当局。（只要学校当局不是藉办学营利的。）大家之间并没有矛盾，并没有冲突。

无论学生的立场，家长的立场，教育者的立场，应该一致认清国家对于教育应负的责任。在政府有这个责任，在人民既纳赋税，便有要求享受教育的权利；在教育者为国家服务，教育人才，便应该要求提高待遇。这个看法是天经地义的。只要政府能完全负起这责任，目前学生，家长，办学人，与教师们所有苦恼便可以完全廓清。政府是否有此力量呢？有的！绰绰有余！只要

把军事费用稍稍节省一点下来，便立刻可以办得通。无论学生们，家长们，办学者们，教师们都应该提出这要求！

（原载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上海《文汇报》）

关于香河事件

前天平津公路上香河附近发生的美军被突袭以致死伤多人的不幸事件，凡是有理智的中美人士，必然都深深引为遗憾！这些死事的美国军人，不死在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的时候，而死在胜利已经获得的一年以后；不流血在敌人的领土之上，而流血在同盟国的一个小小乡村里；不牺牲在日本人的枪弹之下，而牺牲在中国盟友的突袭中。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贡献出宝贵的生命呢？这样死了有些什么光荣的代价呢？对于中美两国邦交又有些什么裨益呢？假如九泉有知，当他们想到这些问题时，一定是“死不瞑目”的！

这次不幸事件的责任问题迄今还未能完全明了。虽然若干通讯社都一口咬定袭击者是中共军，但在没有得到确实的证明之前，我们只能暂时采取保留的态度。不过，无论袭击者是谁，也无论袭击的目的和原因何在，我们却要在此严正地指出，这种行为是很愚笨的损人而不利己的行为，在目前国内外形势之下，制造这样的事件决不能达成任何政治的目的，也决不会得到广大的同情。因此，我们主张关系方面应该加紧努力，从速把这件事情的真相调查明白，早日公布，同时对责任者加以严厉而应得的惩罚。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要求美军反省反省自己对待中国人的态度。中国不是一个战败国，美军之驻在中国，当然决不是为了

维持对中国的征服。然而不幸得很，许多在华美国军人确实是以一种征服者的态度君临于中国人民之上；不，实际上，我们所接触到的许多美国军人，甚至宁愿喜欢日本人，而低估中国人，或根本厌恶中国人，我们说“我们接触到的许多”，当然事实上只占全部驻华美军的一个极微细的比数，其意见自不能代表全部驻华美军；可是，就算只占一个极微细的比例吧，也已足够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把胜利初期敬爱亲近美国军人的心情，冷淡下来，并逐渐变为厌恨而疏远了。由这一点上来看，今日普遍存在于全中国的“反美国军人”情绪，美国军人本身首先需要彻底地自我检讨一番，信口开河地说什么“背后有苏联的指使”或“由中共主持发动”之类的话，不仅无补于事，反而是对中国人民的一种侮辱。

即以这次香河事件而论，合众社三十日电曾指出其可能解释中包括：“（一）美军向共军开枪不止一次，最近一次曾击毙共军数人，故此次或为共军之报复行为；（二）最近某次曾有某美军官驾车驶过共军区域时，被共军喊令停车，该军官竟立即开枪击毙共军一人。”我们在前面说过，这次袭击是否为共军所干，不得而知。倘若真是共军干的，则合众社此电足以证明两点：第一，美军对中国内战不曾采取中立态度，自愿居于对共军的交战国的地位；第二，美军的态度蛮横傲慢，根本不曾把中国人当人，当然也不曾把中共军当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美国军人实有严格反省的必要。

香河事件本身是诚堪遗憾的，可是，造成香河事件的情形却相当复杂。所以，我们认为，要保证今后香河事件不再继续发生，除对这次香河事件的真正负责者加以严惩之外，最根本最重要的是请美军赶紧撤退回国。现在日俘日侨的遣送大体上已告完了，我们不知道美军留在中国究竟还有什么必要？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对美国又有什么帮助？维持交通吧，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何必美国朋友代劳？阻止内战吧，美军驻在中国已经一年了，内

战不仅未被阻止，最近且日益扩大，防止苏联吧，为什么美国不干脆去同苏联打一仗，却要派兵到中国来防止？不错，美国兵是中国政府请来的，但我们想，政府请美国兵来是帮助遣送日俘的，决不是请美国人来蹂躏中国主权，草菅中国人命的。以我们的愚钝，实在不懂得美国军队为什么硬要留在中国这个“又穷又巍峨的国家”。美国兵留下，随时有引起与中国人民冲突的可能；美国兵撤退，美国在调停中国内战上立刻可以很响亮地用真正中立者的地位说话，而更可以维持尚未完全丧失净尽的中国对美亲谊，何去何从，明智的美国政治家们，应该早作抉择。

总之，香河事件本身是不难解决的，但香河事件背后所潜伏的危机却着实严重，不可轻视。我们希望美国朋友赶快考虑这问题，以免时间愈久，愈易陷入于进退两难的困境！

（原载一九四六年八月二日上海《文汇报》）

闻案感言

李、闻两血案，经一个多月的时间，现在闻案先告了一个段落。把顾总司令所发表的审判经过与陆军总部所发表的判决书和梁漱溟先生调查报告对照一下，似乎中间还有许多出入之处。

但是梁先生的报告闪烁其词，没有畅所欲言。当然，我们至少看出，关于此两案的局内人一定另有一番了解与认识，我们局外人无从盲目揣测。我们只有希望民盟的全盘的书面报告能早日公布于世。

在此两案内情未完全公诸世人之前，就现有材料，我们有一点感想。

照汤时亮与李文山所供，杀机系起于闻一多先生的诋毁政府

与侮辱军人。似乎原因非常单纯，且别无主使。揆诸当情，实在未免近于儿戏。纵使闻先生的诋毁与侮辱的言词足以引起听者的愤怒，但亦何致引动杀机。一个人动手，不足，还要两枪齐发；一发不足，还要同放五、六枪；而且闻立鹤以身掩父，便连闻立鹤都挨枪；似乎非置之死地不可。闻先生究竟讲了怎样的了不得不堪的话使这两个现役军人愤怒到这样地步？这两个军人难道不知道“杀人者死”，竟至于不顾自己的生命，甘心情愿把两条命去拚闻先生的一条命。其愤恨之情实在轶出常理之外。我们实在想象不出一篇演说竟会引起这样可怕的愤恨。

其次，顾总司令对记者称，汤李二犯“虽因闻一多辱骂政府，毒诋军人，激于义愤而起，然究竟目无法纪，应处极刑。”假使我们揣测得不过分苛刻的话，其意若曰，闻某本有取死之道，不过二犯杀人未经合法手续而已。好象闻某是自取其祸，而汤李二犯虽法无可遁而情有可原了。那么，汤李二犯的判决书不是反变成了闻一多的判决书了么？这种看法实在无异对人民的一个警告，对言论自由的一个讽刺。因为按照法治精神，一切诋毁侮辱的行为，只有依法加以制裁。假使一个听众听得不顺耳时便可以枪杀说话的人，则言论自由何在？现在汤李二犯所得的罪名却只是“持枪杀人”，“目无法纪”，对于保障言论自由，却只字不提，怎不令人寒心！因此我们认为，照闻案审判经过，原因既起于演说，则二犯依法判罪之后，政府对保障言论自由，应有严正表示；否则不免要怀疑，二犯虽处极刑，以后谁能担保没有类于闻案的事件发生。

最后，闻先生虽蒙了“诋毁政府，侮辱军人”的罪名而死，但总算还有汤李二犯抵了命；冤虽未白，案总算告一段落了。李公朴先生的血案呢？我们亦希望早一点听到审判的经过。我们看到，政府对于处理两案，特派了大员，可见十分慎重。因此我们相信，李案亦必然有个结果。结果如何？虽难逆料，但我们人民的最低限度的希望是：政府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应该使人

民认识，政府对于保障人民的身体、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的确尽了最大的努力。假使能如此，则李闻两先生虽死，亦可以瞑目地下；否则，纵使把审判经过如何详细周到地公布出来，在人民看来，李闻两先生不过做了“示众”的牺牲，而所谓凶犯也不过是一出戏里的角色而已。

（原载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上海《文汇报》）

历史的交代

抗战结束已经一年多，惩治汉奸的工作还没有办得清清楚楚。固然，象陈公博褚民谊等几个巨奸已经正法了，其他也很多已分别判罪；但与陈公博等同样罪大恶极的周佛海、丁默邨等究竟哪里去了？人民急切要知道他们的下落，而政府迄今没有交代。也有交代明白的，如任援道，听说政府因为他“深明大义”，已经撤销通缉了！不仅撤销通缉，最近他还被邀参加苏州的“绥靖座谈会”，公然以军政要员的姿态出现了！收复区民众早有一句沉痛万分的话：“再要抗战，王八旦不当汉奸！”

伪江苏教育厅长章赋浏，日前向高院呈辩诉状（原文见今日本报第五版）说他一向在任援道手下当汉奸，任援道既无罪，他当然也可以“共沐国家的恩施”，还引了孟子“尹公满人也，其取友必端矣”一套话来为他自己开释罪状。看了不仅叫人啼笑皆非，而且要发生人间何世之感。照章逆的说法，不仅任援道所援用的小汉奸都是“端人”，而援用任援道这种“端人”的梁鸿志、汪精卫、陈公博等更是“端人”了。甚至曾青睐任援道的日本军阀如烟俊六影佐之流也是巨眼识“端人”的英雄了！我们不怪这种无耻的汉奸说这种无耻的话，我们要问的，究竟政府根据什么法

律理由，轻轻下这道“撤销通缉”的命令？

周佛海等的延不法办和任援道的“撤销通缉”，或者都是一个理由，就是在胜利之初，曾“接受中央明令，就任先遣军总司令，维护京沪一带治安”。但究竟那时的治安是靠他们维持的呢，还是靠表示降伏后的敌后维持呢？退一步说，就算他们维持有功，短短数十天的投机取巧，能不能抵过七八年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罪恶？收复区的民众，都深切知道周佛海等过去几年凭藉贼势渔肉人民的罪恶，只有过于陈公博等；为什么对陈公博等的法这样严，对周佛海等又这样宽纵呢？我们认为，不管周佛海任援道等曾受过什么命，立过什么功，老百姓都一概不知道，而千真万确的事实，他们直到日本投降的前夕，还在伪政府内担任极重要的职务，始终没有中断他们对“友邦”日本的效忠，也没有放松对人民的鞭挞。根据政府颁布的法律，这些人当然应该立即逮捕，交法院审讯，假使政府认为他们确有“立功”的事实，或者过去曾奉命做过什么“地下工作”，那也应该于移解法院后，提出理由，提出证据，请法院依法减轻判罪。而决不可这样胡里胡涂，一道命令就把庄严的法律抹煞了。抗战惩奸的大事，历史上要有明白的交代，民众更要看政府是否真能公平守法。要是没有一个清楚的交代，对于政府的威望，国法的尊严，实在是一个重大无比的打击。

从惩奸工作开始以来，法庭的空气，社会的空气，就令人不寒而慄。差不多每一个汉奸，都说曾做过地下工作，而且有些汉奸，竟敢抗不出庭受讯；有些汉奸，不仅他们自己恬不知耻说过去怎么“效忠党国，软性抗战”，竟还有许多社会闻人出席作证，满口“先生”，说他们怎么为国为民。甚至有些已判罪的汉奸，还有人制造民意，企图为他们脱罪。照他们那种慷慨激昂的说法，这些汉奸不仅无罪，而且有功，不仅不应判罪，而且似乎都应该发给一枚胜利勋章，或者把他们“软性抗战”的事实，宣付史馆立传才好。照这逻辑推论，八年来抗战牺牲的军民，热血

真是白流的了！而数万万坚贞自持的善良民众，苦都是白吃的了！

为什么这些人敢于这样说，敢于这样做？就因为政府对于周佛海等这样罪大恶极的巨奸，还没有置之以法，因之他们认为国法尽有商量宽纵的余地，只要投机取巧，运用人事关系，侈谈地下工作，就可以“邀国家的宽典”，而一切豺狼狐鼠，更可以侃侃陈诉，请求“一人作佛，鸡犬登仙”了！

（原载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上海《文汇报》）

战局剖析

目前的全国内战，正在四个地区中激烈进行。其一是苏北：南线正胶着在海安——黄桥——邵伯之线，北线胶着在天长——宿迁——睢宁之线，但政府军正在重新调整部署，集中兵力，准备展开第三次，据说也是含有决定性的总攻击。其二是豫鲁地区，包括豫中，豫东，鲁西南等处；政府军集中兵力达四十万，企图至为远大，不仅希望占领共军刘伯承总部所在地的曹州府，而且还含有肃清山东，打通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线的目的；战事此刻尚在初期阶段，详细情况暂时难于了解。其三是冀热察晋区；陈诚将军曾说：“自历史观点言之，承德——张家口——大同为一个战场”，足见这一区域的重要性；政府军自本月初占领承德后，即加紧布置，集中最精锐的兵力，谋求在此地寻觅共军主力作一决战；其在热河方面者由郑洞国指挥有名的新六军及新一军之一部担任攻击，其在察晋及冀省者则由傅作义、孙连仲分别主持进攻，这三位都是政府军的名将，而共方的聂荣臻、贺龙等也是风云叱咤的人物，所以这场争夺战一定是非常惨烈而富于戏剧性和决定性的。最后是东北：将以哈尔滨的争夺为顶点，现在战事刚刚

发动，正面虽然愿战，但右翼沿拉法——哈尔滨之线的攻势却是值得注意的，关于这一方面的战报比较稀少，暂难作任何判断。

这四处的战事是息息相关的。当然，冀晋热察区是最主要的。原来作为政局主要症结的苏北，其在全盘内战中的重要性显已大见减低，似已降到一个支战场的地位去了。政府军对哈尔滨的进攻，一方面固然是要执行蒋主席五个要求，另一方面恐怕更主要还是在牵制东北民主联军，阻止其向关内增援。豫鲁地区的重要性仅次于冀晋热察区，因为这一处的战事发展，左可牵制华北，右可威胁苏皖，当政府军在晋察冀热发动攻势之际，八路军强大兵团忽然在豫东政府军的后方出现，就可证明共军正继续采用“围魏救赵”的运动战。

但无论张垣得失如何，可以断言，国共问题是不会彻底解决的。如果政府军占了张垣，那并不就等于说中共已经失败，因为在战略运用上，中共每每十分着重“有生力量”的保存，甚于城地的得失；中共一定会为了张垣而向政府军索取最高可能的代价，但中共却不一定非与张垣共存亡不可。所以只要中共以有生力量保存一天，国共问题就谈不上根本解决，何况张垣之失，碰顶也不过恢复对日抗战时代共区的态势呢？反过来说，如果中共军打垮了政府军的企图，那也未必等于说政府军一定会放弃军事解决的基本方针，因为政府军的力量还相当强大，再加上美国明暗暗暗直接间接的支持，最多藉谈判协商的掩饰来整理补充一个时候，终久还是要卷土重来的。今天中国的国共问题，可以总结一句话：打是主体，谈是陪衬；战争是实际，谈判只是战役与战役之间的间歇而已。

内政局势如此，美国怎么样呢？这要看马歇尔元帅这两天在牯岭所召集的高级美军官会议的结果。我们预计，马帅在中国正受到最严重的考验，恐怕已到“山穷水尽，无计可施”的时候了。他只有两条路好走，一是留在中国观战，一是回国再说。但如果只是要观察战争发展的话，那实在无须马帅本人留此。因此

牯岭会议将决定马帅的去留，但牯岭会议不仅不会改变美国帮助政府军的政策，甚至可能会更使美国在军事上直接参与内战。美国海军陆战队之在冀东战争万分紧张之际，增强北宁路的守卫力量，不就是很确切的证明吗？这样我们在估计内战局势的时候，还须把美国的因素估计在内。这就不是这里所能评论的了。

冀晋察热区争夺战的中心在张家口。热河省会承德的被国军攻占，不过揭开了这场精彩节目的序幕，重大的阶段还没有开始。目前双方正在积极做着准备会战的工作。就政府军来说，首先希望打通热平交通线，解除冀东共军对政府军的侧面威胁；其次必须守住大同，切断延安向张家口的增援，以孤立张垣。基于这两点，所以政府军在攻占承德之后，立即挥兵南向，进攻长城各口，希图切断冀热共军联系，并包围冀东共军；同时胡宗南部亦调集八个师的兵力开始同蒲南段的进攻，傅作义部由绥东出动，以解大同之围，并形成对张垣的钳形攻势。再就中共军来说，张家口是解放区的联络中心，又是赤色首都延安的前卫，有着相当重大的军事政治意义，非守不可。但这守并不是死守。为了有效地保卫张垣，中共宁愿忍痛放弃承德，以求缩短防线，节约兵力，同时则力攻大同，图肃清侧背的威胁，俾便抽调兵力作出奇制胜之计。现在大同之围已到最后阶段，共军的第二步是值得注意的。以北宁路时被切断来推测政府军的冀东攻势，可见包围的企图也并不容易达成。从形势上看去，张家口的争夺战将需要经过一番相当激烈而费时的战斗，才能打出一个眉目来。

无庸讳言，今天是政治服务于军事。张垣争夺战的结果，将决定中国政局，也就是国共关系的前途。可以这样预测：如果政府军胜利，政府必然在十一月十二日如期召开国民大会，在政治上决心不惜与中共分裂，而在军事上将积极布置进攻延安；反之，如果政府军失败，美国一定立刻出面调停，停战令会再颁布，国民大会也可能延期，今年一二月间的政协局面可能重现。自然，军事上也还有第三个可能的前途，那就是打成一个胜负不

分的相持局面；假如真是相持，那美国的态度就更重要，它可能加一点压力使两党的军事比赛停止，也可能更加帮助政府的方面，也可能一事不做静观成败。究竟走哪一条路，要看这两个月的国际形势，尤其美苏关系的发展。在张垣争夺战未获眉目之前，政治将是一个拖局，沉闷一如今日。

（原载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上海《文汇报》）

为美国设想

美国人士所发起的“退出中国周”运动，凡属自尊自重，爱中国也爱美国的中国人土，没有不热烈赞助，诚挚响应的。只有那许久以来就一直高喊“反美国即反祖国”的论客，和妄想把美国深深拖进中国内战泥淖的野心阴谋家，才会妄言美国人士的这个运动是受了中共和美共的欺骗与煽惑，才会公然腆颜要求美军继续在中国留驻。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尽管感谢美国在这次战争中对于中国的伟大支持，却不能承认用牺牲中国主权的方式来作为酬报；尽管欢喜钦佩美国民族的年青活泼，却极端厌恶代表美国国格的美国军人的种种暴行和罪恶；尽管十分珍惜中美之间百年的深厚友谊，却不愿把自己放在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的地位去博取美国的欢心。美国政府如果还有一丝一毫的诚意，希望保持中美友好的话，那就应该重视中国国家的国格，重视中国人民的意志，把美军立即撤回回国，同时从中国内战中洗手。假如不这样做，我们深怕中美百年的友谊，将会毁诸一旦，那就不仅不是中美两大民族之福，也是整个东亚和世界的大大不幸！

为什么美国政府一定要把美军驻在中国，不肯撤退呢？为什么美国政府一定要在调解的烟幕下进行援助中国内战扩大的两面

政策呢？真的，为什么美国政府一定要抹煞中美两国人民的愿望，而如此固执地一意孤行呢？

据说是为了保证中国和平与秩序的恢复。天知道，中国这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和平与秩序，却要美国派兵来保证。究竟美国把中国当作一个什么东西呢？退一步说，这句话也仅仅是一句饰辞而已。揭穿了讲，美国之不肯退出中国，主要是因为美国要防苏，尽可能限制苏联势力的可能扩张。

许多美国人士深怕美国一退出中国，中国共产党就坐大了，苏联就跟着进来了。这完全是一种不必要的顾虑。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革命不是随意可以输出输入的商品，任何一个国家发生革命，必有其内在的所以然的因素。如果不在这些因素上想办法，革命运动是消灭不了的，不管你用多大的压力。以中国的情形而论，中共之所以能存在，生根，壮大，当然也有其社会的历史根源，决非武力所可以轻易解决。至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则迄今为止，就是美国官方和私人都不能不承认，中共始终没有得过苏联一点点物资的接济。而以苏联现在全世界范围内所采取的守势政策来说，它既然因为怕开罪美国而于今年春间退出东北，表示不干预中国内战，又如何会在今天美苏关系如此尖锐紧张的情形下，重新把自己卷进中国内战的漩涡，来重加刺激那已经够恶化了的美苏关系！所以，拿“怕苏联进来”为理由来解释驻兵，是根本不通的。

还有许多美国人士深怕美国一旦退出现在调处的地位，中国政府就有转过来与苏联亲近的可能。这一派人士并且举出几个不大不小的事情来说明这种恐惧之不为无因：如八月十日马司联合申明发表后不久，蒋主席就邀请苏大使共餐，如政府始终对苏仍然保持密切关系等等。其实，这种恐惧也是一种过分的顾虑。蒋主席是一贯讲求诚信外交的，如何会玩弄这种手腕？再说，中国政府在本质上是除了亲美以外就别无出路的，即令对苏表示若干友好姿态，那也仍然无损于其亲美路线。美国所顾虑的万一退

出中国，则国共两党会合作反美亲苏的假定，应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为美国着想，还是以立刻退出中国为上策。目前驻兵和片面支持内战的政策，只有使中国的内战扩大并且延续下去。以中国今天这样的情形，如果再打十年八年（说少些，就算三年五年吧）的内战，那国家会残破得象个什么样子？这样长期内战的结果，胜负之数实在难于逆料。即使说，共产党被完全消灭了，中国被美国所完全同情绝对支持的国民党所武力统一了，那时美国所面对着的中国恐怕只剩下无数的灾民和大块荒芜的田园，作为美国的市场嫌太狭小贫乏了，作为美国反苏攻苏的友军或基地，恐怕也嫌太软弱危险了吧。那时的中国对于美国恐怕不是一笔资产，反而是很可怕的一笔负债吧。反过来说，假如美国能撤兵，撤去一切片面援助，再通过政治的压力迫使中国内战立刻停止，迫使中国走上团结统一合作建设的局面，则在四五年之后，中国将不仅是美国一个最有希望的市场，而且还有可能成为远东美苏关系中间的一个安定因素，间接也可以有助于全盘美苏关系的缓和与调整，这对中国对美国，对世界，岂不是更有益些吗？

从华莱士被迫去职一事来看，退出中国恐怕是美国政府所绝对办不到的。但我们决不因此而稍感气馁或灰心，因为在美国政治的这种大逆流中，还有很多人来举行“退出中国周”运动，这就证明中国人民在美国国内还有一支强大的友军存在着，活动着，中国人民不是孤独的；这一点将增加我们无限的勇气和信心。

让我们响应我们在美国的弟兄，让我们三呼：“Leave Us Alone! Please Leave Us Alone!”

（原载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上海《文汇报》）

战 略

中共声明除张家口、哈尔滨须竭力守卫外，将在全国其余地方实行大规模的运动战游击战，国军某军事家认为共军今后所采的战术将为“你攻我走，你走我攻，你去我进，你静我动”十六个大字。对着共军这新的战略方针，国军统帅部正感到苦恼。

国军当然不放弃攻击共军心脏部分的战略，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希望击溃共军的主力。但据外国记者报告，张家口本身共军兵力不多，看情形共军是不会上阵地战的当，来死守张垣的，他们大概会牺牲若干兵力在张垣外围打几仗，如果胜，当然没有话说，如果不能胜，他们可能放弃张垣。这就是说，张垣之战当决定于外围，而国军还是没有歼灭共军的希望。

无法歼灭共军主力，是国军大大的苦闷。因此，国军似乎更会加紧实行所谓“进攻心脏”的战略，以图吸引诱致共军作主力决战。这样，进攻延安的可能性就不是没有的。

这是两套战略思想的斗争，其结果不决定于军事方面的火力、装备等等因素，而决定于政治方面的民心士气等的向背与高低。

（原载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上海《文汇报》）

真能和平解决么？

蒋主席于十六日发表了关于处理目前局势的声明，“重申政

府和平解决之诚意”，并提出了八项具体实施的办法。在目前全国人民都慄于大祸将发于旦夕的时候，这一声明在簸扬和平空气，松弛紧张神经的一点上确实发挥了极大作用。不过，空气的簸扬与神经的松弛是否即说明了今天时局的发展方向已经有了极大的转变呢？我们绝对不敢如此说。

国内时局的发展，自去年双十会谈到政协决议的成立，是一局；东北冲突的扩大到张垣攻下，又是一局。第一局是和局，第二局是半和半战之局，现在是半和之门也完全关闭了，我们面前只剩两个局势的前途：非和即战，半和半战之局已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了。

在我们人民看来，假使真正择定和局的话，那末，立刻恢复第一局，接续第一局，把第一局已决定的立刻实行，未决定的继续商谈。当然第一个先决条件必须是大家立刻把武器搁置一边，真正恢复政治协商的精神。因为政协的精神正在于不以武力胁迫对方勉强接受任何自己不愿接受的条件，而以互尊互信的态度共求意见的一致，假使一面陈兵，一面提条件，便有背于政协的精神，便不是恢复第一局，接续第一局。而现在真要“和平解决”的话，除了放下武器，恢复政治协商，继续政治协商以外，实在没有第二条路，因为我们相信，而且可以断言，真正能实现和平团结的意见或建议又能为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派人士所能接受的，决不会超出政协决议的范围，现在抛弃了现成的已经达成协议的决定，另提新的办法，简直是舍近就远，徒自纷扰而已。

因此我们对于蒋主席所发表的声明，觉得虽给时局发展以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但这力量会把时局向更逆转的方向推动呢，还是推向顺转的方向，还是一个疑问。

第一，先提了条件，等中共接受后再停战，是含着强制性，而且又用了文告的方式。用这种方式来恢复和谈，不管中共是否会接受，我们总觉得与政协的互尊互信的精神是不符合的。

第二，蒋主席所提八项办法，大多以半和半战一段期间的商

谈作基础的，对于政协决议似已搁开，譬如第七条所谓“宪法草案”就极含糊是指五五宪草呢；还是指政协所讨论的宪草。又照政协决定，须俟国府改组后再商召开国大，现在却两事前后倒置。

老实说，政协决议的确是各党各派以及全国人民所一致拥护，自从这些决议被搁置，而换了一个边打边谈的局面以后，人民已被打局搅拨得心烦意乱，在这段时间所有问题，讨论，建议，驳覆等等来来往往的文章，实在使人越听越糊涂，所以最好干脆把这段文章搁开不要续做下去了，还是接续政协决议，走向光明平坦的正道吧！

所以政府既有“和平解决之诚意”，那么事情的简单再莫过于此了：停战与恢复政协。因为非停战，不足示“和平解决之诚意”，除政协无另辟和平解决途径之可能。政协本是现成的和局，不过被中途搁置了，现在只须坠绪重拾，使这未了之局圆满完成。这真是蒋主席所谓五分钟即可以解决的事！

我们相信，政协确具和平之诚意。但我们同时又不免怀疑，既具诚意，为什么不先停战，为什么取用文告方式，限制商谈的范围，为什么以八项办法来减削第三方面斡旋的余地，硬要把对方与第三方面限制在划定的圈子里。这是不是恢复和局的妥当办法呢？假使不是的话，岂不明明指出，这是使时局更逆转的一个开端么？

（原载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八日上海《文汇报》）

周佛海受审

周逆佛海昨在京首次受审，在供辞中，照例是一大套汉奸理

论，也照例有什么证人来表白他的“地下工作”。

他说了许多关于伪钞的话，说明他并没有害人。这一点，收复区儿万万切身受过痛苦的人会起来反证。同时，我们还记得，当伪钞发行之初，有许多政府银行的职员，被集团惨杀，至今中行别业的鲜血未干。请问这个“地下工作”者，何以自解于这许多地下的英灵！

（原载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上海《文汇报》）

倾听人民的意见

天津自驻军就地征兵以来，命案接踵以起。因为征兵，士兵路见不平，一拳打死保长之后，曾不多时，合众社又报道一乡妇因独子被征，悬梁自尽，另一保长因无法凑足征额，亦已自杀。这种情形，不只天津一处如此，尤其从十月十日政府发布征兵令之后，各地都可能此类惨剧发生。此与九月恢复征实的事实连起来看，全国人民，今天又已实际复原到八年抗战时期的凄凉景况了。

局势如斯，我们的好话早已说尽，今天实在再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只是，当前的风暴如此紧张，情势如此严重，可怜的中国人民，面临着一场无可避免难以解脱的大苦难，却反而缄口不言，听凭“运命”的安排摆布，这在外国人看来，一定要引为奇谈的。

只有两种原因可以解释上列现象，一个是麻木，另一个是容忍。中国这个民族，本是一个能忍辱负重的民族，他们背负着几千年的历史重担，面对着近百年来来的世界新形势，在长期的奴役与骤然的侵袭下，它一方面不能及时换骨脱胎，迎头赶上历史的发

展，而在另一方面，它又目迷五色，颇想一步追踪西方的富强。由于前者，它迷恋骸骨，由于后者，它为人所用，而不自觉。我们试数辛亥以前的外患，辛亥以后的内争，再加上日寇相侵，导成八年的抗战，前前后后，有多大的混乱，多大的变迁，经过这些混乱与变迁，而人民今天还要被牵着鼻子去自相残杀，以大部分是农民的简单想法，教他们如何不糊涂，又教他们如何不麻木？

然而我们必须提出一点，几十年的国家教育，虽然至今无所成就，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至今虽仍然是文盲，一点也沾不到人类文明的恩惠，可是如果仔细查考一下今天人民的思想能力，就不难发觉，在时代的推移中，中国人民今天已有了很大的进步，这进步不是得之于任何教育，而完全是由于事实的教训与切身的经验。

一个士兵因为看不过保长强迫征丁，一拳把他打死，是忿怒，是义愤，是对于当前的时局的最响亮的抗议。同样，另一个保长与一个母亲之自尽，也是忿怒，是抗议，虽然这抗议是无声的。

无声的忿怒，无声的抗议，实在说，这就是今天中国人民缄口不言的内容，这就是他们超常情以上的容忍。我们很有理由可以说，这是容忍，而不是麻木。

这是处置当前局势的人所必须仔细研究，并慎重从事的。在一个大变局之前，每一个人必须记清中国的历史走向，认识眼前的民心背顺，多多倾听人民无声的意见，以为抉择的根据。

真是忍心不顾国家的支离破碎，不顾人民的生死存亡，不顾以一切造成千百年历史的遗憾，则其后果，当然人民是第一个吃亏，国家的地位，民族的元气，要无可避免蒙受巨大的损害，而跨在人民头上的，恐也无所逃于历史的清算罢！

（原载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文汇报》）

勸第三方面

在国共双方目前各自坚持其立场的情形之下，谁都可以预料到第三方面一定会感到非常苦闷。

其实，第三方面也不是绝对走投无路的。首先，第三方面必须无论如何团结一致，不要自己内部起分化，其次，第三方面必须坚持政协路线，决不妥协。最后，第三方面应该随时将谈判经过的情形公开报告，让民众明白谁有诚意，谁无诚意，谁应负破裂的责任。

做到了一二两点，第三方面才能受到国人的尊重；做到了最后一点，国人将会以行动反对那破坏和平的人，强迫他们走向政协的道路上去。

（原载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文汇报》）

怎样纪念陶行知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氏的逝世，已经两个多月了。这一个巨星的陨落，无疑是我国人民精神解放和政治解放事业上的一个难以补偿的损失。

陶氏一生所倡导的创造的学说与事业，是指引新中国教育建设的一盏明灯。今天，我们来追悼陶氏，固然为了对死者表示崇敬与哀思。更迫切而重要的，是要大家立下一个宏愿，来继续并扩展他未完成的事业。

陶氏的事业，是伟大的人民教育的事业。在创办晓庄学校时代，他就向国人宣布他的志愿，是要“为中国三万万四千万农人服务，设立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为我们中等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以后他根据着他的坚定一贯的立场，适应着时代的要求，发展为六大运动，那就是：

- 第一，乡村教育运动；
- 第二，普及教育运动；
- 第三，国难教育运动；
- 第四，战时教育运动；
- 第五，全面教育运动；
- 第六，民主教育运动。

他所直接创造，领导带实验性的教育事业，有：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新安旅行团，育才学校，晓庄研究所，社会大学等等。

他建立了“生活教育”的中心学说，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命题。他的学说，事业，和方法，都是凭着他卓越的智慧，前无古人地创造出来的，他的思想和事业，不断进步，不断发展，到最后，终于走上了最进步正确的人民思想的路线，并与当前的我国以至世界的民主运动密切相联系。他解释“民主教育”，说：

“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把林肯总统的话引伸到教育方面来，说‘民主教育是民治民有民享之教育’。说得通俗些，民主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

怎样来继续并扩大陶氏的事业呢？这一个问题，有待大家的共同详密商讨规划，来作解决。我们在这里，愿意列举若干要点出来：

一，向国内及国外，大规模筹募陶氏事业基金，数额自然多多益善，但为进行方便计，不妨先定一个总额，然后分期来使之

实现。陶先生的友人，已经有“陶氏事业基金会”的组织，此项组织；宜加扩大，在国内外各重要地点，设立分支机构，经常担负筹募的工作。

二，加强并扩大“生活教育社”的组织，以团结全国教育界人士，来担负生活教育理论探讨与生活教育事业实践的任务。

三，编印陶行知全集，以便利研究。此项工作，应由生活教育社负责主持进行，期于半年之内完成。

四，维持恢复并发展育才学校，晓庄学校，山海工学团，社会大学等机构。

五，展开生活教育运动，把生活教育广泛应用到全国一切教育文化机关里去。

最后尚有一点要特别指出来的，教育决不是可以脱离政治及社会而孤立的事项，教育要获得成功，非与政治相配合不可。这个道理，可以用陶氏自己的话来说明：

“民主教育一方面是教人民争取民主，一方面是教人民发展民主。在反民主的时代，或民主不够的时代，民主教育的任务是教人民争取民主；到了政治走上民主之路，民主教育是配合整个国家的创造计划，依着民主的原则，发挥个人及集体的创造力量，以为全民造幸福。”

所以每一个陶氏思想的崇拜者，必须象陶氏一样，一方面是教育工作者，同时必须是一个民主战士。如果只是在教育的小圈子内作孤军奋斗，恰如在船肚子里划桨，效果是极其微弱的。

（原载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上海《文汇报》）

这是一个信号

一年不见，黄浦江上的太阳旗，悄然地来，又悄然地去了。这一来去，为时虽暂，可是颇刺痛了一般国民的自尊心。虽然在刺痛之后，也不过发发牢骚，有的则向有关当局责问责问。自然，因为来头太大，责问也不会有下文。

据熟悉内情者称，太阳旗在战后闯进黄浦江，这已经是第二次，第一次来时，并没有被大家发觉。这次虽然被发觉了，结果也没有任何留难。如果说，日本船之非法闯进来，是有意试探，照情形看，这试探是成功了。如此，第三次、第四次以至无穷无尽的来，怕也是可能甚至是必然的了。

本来，有什么奇怪呢。中国需要日本的生丝来救丝织业的原料恐慌，我们自己没有海外运输的力量，就不得不求助于人；求助于麦克阿瑟总部。在今天美国人的眼光中，老实说，日本的比重早已甚于中国。用日本船只运送日本生丝到中国来，在麦帅总部看，根本无所谓合法不合法，如果引起中国人民的不满，以为是对中国是侮辱，东京的占领军当局是不会重视的，因为他们知道，为了这样的事件，相信中国断不会提出抗议。

为了这一事件，我们的政府会不会抗议呢？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为了交换日本的生丝（并非作为赔偿），政府当局曾费了多少手续向麦帅总部请求过，最后才获得一部分的核准。如果因为这次日船的非法进口，我们据理提出抗议，自然也可义正词严，并无小题大做之处，不过，为了保证今后日丝之继续进口，政府会不会这样做呢？

看到太阳旗，我们是被激动、被刺起了历史的仇恨的。我们正同全国每一个有血有肉的同胞一样，这一件看来是微细不足道

的小事，但勾起了我们多少旧仇新忧！我们马上记及南京的大屠杀，记起了八年中千百万军民的死亡与奴役，那些为民族受难的先烈，他们至今尸骨未寒，被敌骑蹂躏的土地，至今疮痍未复；在一年之前，强敌虽倒，而环视大地，迄今内争不休。行见十年二十年之内，战败的敌人，在强权国家的扶植下，又可能雄视阔步于远东，而我们，可能仍在刀枪水火，凋零残破之中，受到再一次的杀戮与奴役。

这是多么可怕的形势。而作为敌人重返大陆的信号，太阳旗今天已经出现于中国的海口了。

我们不愿危言耸听，今天中日两国的形势，实在是一个太鲜明的对比，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受尽煎熬，吃尽艰苦，总算战胜了，但这一战胜，并没有为这个古老的民族带来新生，相反的，踏着八年抗战的废墟，我们今天正把最后残余下来的国力民生，毁之于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至今没有和平，没有民主，没有自由，人民生息于恐怖与饥饿之中，如水益深，如火益热。这种情形，与日本相比，是如何叫人警惕。他们虽则战败，但仅仅一年，出口贸易已开始恢复，新宪法已经产生，他们已经从战败的屈辱中站起，而且正力争上流想一步步回复其远东强国的地位。

在日本战败之际，我们总以为战后填满日本在远东的空隙的，主要的应该是新生的中国，而不是其他。但时隔一年，我们今天发觉，形势已经远离想象，完全是另外一个面目了。日本的旧统治势力今天在美国的一手扶持下，已经把战败的法西斯日本，糊上了一层“民主”的纸衣。扶植这样一个日本政权，美国想用以看守它在西太平洋海岸的经济利益与军事利益，是完全可能的发展。

这说起来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事，然而事实就已经摆在眼前了。黄浦江上的太阳旗，是否会使得衮衮诸公有所彻悟呢？

（原载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上海《文汇报》）

民社党的决定

民社党到底决定了提出名单，参加国大。昨天我们一个同业拿着白乐天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两句诗，来作为该党这次决定经过的写照，可以说是再恰当也没有。

这次国大问题的斗争，在中国政治史上真是一幕再精彩也没有的好戏。它简直象一座探照灯一样，一切政党和人物，是正是邪，是真是假，被照得毫毛毕现，无所遁其原形。

（原载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海《文汇报》）

饥饿的教师

上海的小学教师，月薪还不过二十万元，而且市立各校，欠薪达两三个月，在这样的高物价下，请问他们怎么生活下去。

今年上海增加了许多税收，对于学校，学生还特别纳了一笔尊师金，怎么到现在连教育人员的生活还维持不住？

养一师军队，每月要花二十亿，开一次国大，要浪费二百多亿，国库的力量似乎很雄厚，为什么偏偏对于公教人员，不肯稍为顾念一点？

（原载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九日上海《文汇报》）

烟雨太平洋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五周年纪念日已经过去了。从去年八月大战结束到今天，我们又经历了一年又四个月的和平时期。然而略一回首，就不禁百感交集，慨然于太平洋问题今天依然很严重。

谁也可以看出，这次战争，如果说在太平洋的国际形势上起了决定性的变化，那么第一就在于美国代替日本，掌握了这一个横亘东西两半球的大洋。在一九四一年战争之前，我们还不能说，日本是全部的控制了太平洋，那时虽然在英美日三个强国之中，日本的地位是显然地优势，但始终不是绝对的，而这次战后，北美不但已在中西太平洋接收了日本的地位，且已在西南太平洋削弱了英国的势力，它一面控制了日本，一面与苏联平分了朝鲜，而在另一面，比当年日本更有力、更周密地控制了中国的经济、政治甚至一切。这一种形势，直使整个的太平洋，已成了北美的内湖。我们知道，这样优越的地位，在战前的日本实在并不曾有过的。

其次，由于战争末期的军事形势，使美苏两大势力在西北太平洋边缘发生正面的接触，在日本本土附近，苏联根据“波茨坦协定”，取得了千岛群岛及南库页岛的领土权，而在朝鲜，以北纬三十八度与美军分据南北，且由于中苏条约的订定，苏联确立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及其在远东的新的商品吐纳港及海军基地。在这一个地区，由于美国的力量完全控制了中日两国，致使美苏两强之间没有任何缓冲的余地。

此外，在东南亚（亦即西南太平洋）这一个殖民地世界内，由于这次战争的召唤，弱小民族的独立运动，本已风起云涌，但菲律宾人民的解放，在麦克阿瑟的刺刀下，第一个变了质，

成为罗哈斯的统治，所谓独立，已空有其名；此在印度，尼赫鲁已被伦敦所软化，正从事进一步建立非印度人民的“独立”政府；缅甸仍在英国的直接奴役下；印度尼西亚及越南人民已建立了自己的武装，从事解放战争，但荷、法的军队尚未撤出，两个宗主国的统治显然一时还无意终止。

这些基本情势，连同中国的内战在内，很明显告诉我们，经过这次太平洋战争之后，不但太平洋问题没有解决，不但太平洋没有出现一个风平浪静的局面，也许正相反，问题已更见加深，更见严重，而且更见尖锐。从任何一个因素的发展看，今后各有关国家如果不能有明智远见的决策，以挽救业已潜伏的危机，则不到数十年，太平洋的恶浪，终将再一次掀起。

日本战败，美国西进，从华府国务院的决策，最近杜鲁门要求全权托管太平洋岛屿的声明，又看出美国统治集团的用心，是要使太平洋成为美国的内海。这一企图如不力加阻止，美苏在西北太平洋边缘的磨擦，将永无终了之日。这就是说，参加中、西太平洋各岛屿的托管的，必须不是单独的美国，而是包括美苏中英这几个有关国家的混合国际集团，甚至就是包括法国在内的五强共同托管，也较之北美单独托管为妥。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等国际机构，在这一问题上，必须仔细考虑，慎重抉择。

太平洋各岛如不获由国际共同托管，这就意味着东方战机的潜伏。而象今天日本在美国一手掌握之下，其所包含的危机也是同样甚至更见明显的。

日本在远东倒下去，本应该由中国来填补这一个国际上的真空地带，但一年多来，日本已经倒台，而中国并未站起。这一个因素，使战后日本的地位，格外增加了分量。日本今天在美军占领下，在麦克阿瑟掌握之下，旧的军事势力，既未崩溃，也未被清算，很明显的，麦克阿瑟的用心，华盛顿的政策，除了使日本的经济在美国金融企业巨头的操纵之下以外，他们不过在重建一个可以听命于美国主人的落后的日本政治机构，他们也叫这个是

“民主”，但谁也知道那与日本人民并无任何关联。这一情势如不中止，联合国机构对日本现象如不加以有力的纠正，象今天这样发展下去，其结果将使美苏两强在远东没有任何缓冲余地，危机的显然存在，是无可置疑的。

象日本同类的情形，也存在于中国。战后中国并未自主，并未民主，并未因胜利而强大，中国至今仅仅只换了一个控制者，从前是日本，现在是美国。中国不但没有能作为一个远东的安定力量出现，以接受日本所遗下的空间，相反的，由于这一年多来过分倾倒在美国怀抱里，扩大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裂痕，加剧了国共两方的内战，因而也就间接深化了美苏间未来磨擦的可能性。

强国之间不能安全，宗主国与殖民地人民间的冲突又永远无法调和，这是今天与今后太平洋及远东区域的阴暗所在。由于殖民地人民的空前觉醒，美英法荷这些国家一天不放弃其帝国主义政策，远东人民的解放作战今后就一天不会终止，东方世界就一天不会和平。这一次的太平洋战争，就其召唤人民觉醒与磨炼的一点上说，几百万人的血也许没有白流，但五年前各国人民被迫应战时，当时所想望的成就，显然不是今天这一幅图景。

战争打出了一个民主新生的欧洲，而它带给亚洲的依然是黑暗与欺诈。想到五年前的今天使人兴奋的情形，我们就愈觉得今后责任的沉重。

（原载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上海《文汇报》）

张学良问题

昨天是张学良“严加管束”的十周年，留沪东北人士都希望他能早日恢复自由。

张学良从“西安事变”后，就一直成为谜中的人物，究竟他在那里，为什么现在还不能自由露面，实在是举世关心的问题。

说是政治问题么，政府已经说在积极实行民主了，对人民的基本自由决心尊重，为什么张学良的自由还不能恢复？

说是法律问题么，他究竟犯的什么罪？无论如何，他决不是汉奸，决不是贪污犯，那末，根据大赦令，也应该把他放出来了。

（原载一九四七年一月四日上海《文汇报》）

两个声明

美国驻华大使馆宣布退出“调处”的声明和“国民政府对于中共拒绝和平谈判之声明”，不差毫刻地同在前日下午六时发表了。

这使我们回忆到国大闭幕以后的一阵和平攻势。当时我们早已指出，和平攻势的目的并不真想达到真正和谈的目的，而是在推卸内战的责任，观乎今天政府的声明，已昭然若揭。前些日子的和平攻势只是一段起承转合的文章，现在的声明才把题目点出来了。

这更不能不使我们回想到美国共和党范登堡的主张。他早就明白地要求把中国共产党撇开。同时，我们再引证以马歇尔声明中所一再提到的自由分子，便可以见出，今天美国退出调处与政府声明中所谓唯一可循之途径，只有范登堡与马歇尔所主张的“民主化之既定方针与步骤”了。

今天美国的退出调处，决非自承失败以后的退出，更非对华政策有所改变的征象，而是手法的巧妙变换。

第一，美国已往以调处的方式来援助内战中的一方，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反招致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恨，今天不妨高呼撤退，甚至可以在表面上从华北若干较不重要的地点撤出，而改头换面用别种名目如协助中国训练海军之类把秦皇岛青岛等重要军略基地仍掌握在自己手里。避去了援助之名，而无损乎援助之实。

第二，两个声明既已明白地把中共撇开去了，把内战的责任完全推在中共身上了，今后便“一心一德”地使国民政府“民主化”，把门面粉饰一番以后，企图以“民主”招牌蒙过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三外长会议，蒙过美国国内的人民，蒙过中国人民的眼，然后可以冠冕堂皇地放手援助这个“民主”政府进行更大规模更残酷的内战。

所以今天美国的退出调处，绝非自承失败而退出，更非洗手退出中国，不再干涉中国内政，而是干脆脱去了“调处”的外衣，打算进一步地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想彻底镇压中国的民主运动。

可是美国这种企图是否能实现呢？这关键就在国民政府的改组是否能尽如范登堡、马歇尔所画出的图案。今天的中国政局，无疑地已取决于战场。而战局的发展是否尽能称心如意，却是绝大疑问。如果要称心如意的话，应该在这一两个月以内，政府能在战场上打一两个较大规模的漂亮的胜仗，然后趁势多拉几个“自由分子”，把政府改组起来；那时美国的五亿借款立刻过付，或者美国将更慷慨地给国民政府以更多的援助。这将意味着内战的更形扩大，更形延长，更形残酷。

所以我们以为，美国的退出调处，假使不是真正退出中国，不是真正不再干涉中国内政的话，那必须更进一步实行范登堡的主张，那必然使中国的人民遭受更大的灾难。假使美国政府真愿协助中国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那么，仅仅象征的退出是蒙蔽不了谁的。

从现在起，“调处”、“和谈”一类名词已成过去了。今后如何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这责任完全在全国人民的肩上。美国政府的“调处”的幌子已被中国人民的力量所揭破而自动抛弃了。但是以武力求统一的迷梦，以民主作幌子以维持现状的企图，是民主运动的魔障，依然未退，这还待全国人民的努力。

（原载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上海《文汇报》）

悼梁仁达君

梁仁达君惨遭毒手，凡有血气者，无不悲悼！

但那些血染的手，还要在他纯洁的灵魂上抹黑，硬把他拉为“同志”，而把其他受伤未死的职工，都指为“别有作用”。

梁烈士九泉有灵，对于这种恩宠，当然比受污蔑还难过。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决不会被歪曲，请长眠吧！

（原载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一日上海《文汇报》）

人民不应该问政治吗？

“二·九”劝工大楼惨案已经过了三四天，我们没有听到如何严缉凶犯，抚慰受难者，也没有听到如何保障人权，惩罚一切侵害人民自由权利的暴徒。然而却拜读了种种“强盗有功，事主有罪”的高论，说是要把此次召集会议的负责人找出来，在法律上道义上要他负梁仁达死的责任，说是此次集会“显系别有用心”

“含有政治作用”。在他们心目中，好象千错万错，错在宣传爱用国货，就不应该开会，不应该“含有政治作用”。要想借“政治作用”四个大字，轻轻把打人杀人的滔天罪行，一笔抹杀。这未免太欺人了，太不把人民放在眼睛里了！

我们倒要问问这些含血喷人的先生们：“政治”究竟是什么东西？“政治作用”究竟是什么作用？作为一个中国的人民，难道没有权利与问政治吗？难道以“政治作用”四个大字，便能吓退他们的爱国热情吗？先生们，你们完全想错了！

请翻开“三民主义”，读读国父孙先生的遗教吧：“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谁来管理众人的事呢？照国父民权主义的主张，应该是人民自己。“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民权”。他再解释民权的作用：“简单的说，就是要来维持人类的生存”。（民权主义第一讲）就是说，人民为了自身的生存，便有权来管理众人的事，便有权来与问政治。政治是那么简单明了的东西，人民之必须与问政治，简直和人民必须吃饭穿衣一样的平常。如果说，人民与问政治有罪，难道吃饭穿衣也有罪吗？

上海百货业职工，看到美货泛滥市场，而他们所服务的国货厂商，都在风雨飘摇中挣扎，每个人都有失业、破产、毁灭的危险。他们为了不愿沦落在这悲惨的命运里，他们也为了自身的生存，集合起来，组织团体，倡用国货，并有条件的抵制美货，（他们在《告各界人士书》中明白说明：“要抵制的美货，仅限于奢侈品以及一部分本国已能生产的日用品，而对于美国真正帮助中国建设和复兴的一切机器及生产品，则仍表欢迎。”）能说他们超过了中山先生所谓“民权”的运用范围吗？能说他们开会有罪吗？试问：找出此次召集会议的负责人来，能叫他们在法律上道义上负什么责任吗？我们想，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的筹备会全体负责人，必然不待当局之找，会堂堂皇皇站出来的。不但会堂堂皇皇站出来，而且会继续不断为爱用国货保障人权运动而奋斗到底。全国

人民，必然为他们的后盾。

要知道，爱用国货运动关联到整个民族工商的前途，也关联到整个民族独立的前途，这不仅是少数职工生存的问题，这是全国人民生存的问题，这是“众人的事”，不但各业职工应该与问，全国各界人士都应该与问，这是一个爱国运动，也是一个政治运动。我们要求生存，要求民族独立，就不应讳言政治。

只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想一手把“政治”据为己有，充分发挥他们的“政治作用”，玩弄他们的“政治手腕”，“把国家当作惨酷屠场，以人民受罪为得意，以民族遭难为享乐。”而“还要把造成国内一切灾难的责任全部推在人民头上，于是爱国有罪，和平有罪，民主有罪，爱用国货有罪”。这究竟是什么逻辑？

“三民主义”里还有几句话说道：“科学一天发达一天，人类的聪明也一天进步一天，于是生出了一种大觉悟。知道君主总揽大权，把国家和人民做他的一个人的私产，供他一个人的快乐，人民受苦他总不理睬，人民到不能忍受的时候，便一天觉悟一天，知道君主专制是无道，人民应该要反抗。”

人民是不可欺的。他们受骗了一次，便会进步一次，也便会觉悟一次，最后必然会发出无比的力量。今天的当权者如能将国父中山先生的话，用历史的眼光，多读几遍，应该会有所觉悟吧！

（原载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三日上海《文汇报》）

台湾大惨案的教训

台湾大惨案发生于上月二十八日，由于电讯阻隔，最初的情

况不甚明了。最近几天根据台湾旅沪同乡会等团体所得报道，真相已经逐渐明白了。

惨案的近因，是起于台湾省专卖局以卡车一辆，装载大批警察，出动取缔贩卖香烟的摊贩，曾拘捕两小贩，并没收其香烟，小贩的家属到专卖局去请求释放，专卖局的卫队竟开枪击毙两小贩。民众激于公愤，群向长官公署请愿，公署卫队用机枪向民众扫射，全市军警出动，作“紧急措施”，于是造成“二·二八”台湾空前大流血惨案。死伤人数，虽尚无确切报道，但据台湾同乡会的报告，无辜惨死者竟有百余人，受伤者达三千左右。在这种武装高压政策之下，民众情绪更为激动，于是发生骚动，将专卖局所存香烟，付诸一炬，且事态扩大至基隆、台中各城市，甚至贪污的县长被民众殴毙，外籍公务人员纷纷逃避，惶惶然不可终日，社会秩序大乱。现在省会所在地的台北，虽然秩序大致恢复，商店亦已开门，惟台中各地的纷扰，仍时有发生，从这次大惨案中，统治台省的政府当局，应该得到些什么教训呢？

据台湾旅沪同乡会理事长李伟光氏称：“自台省接收以来，长官公署实行种种统治虐政，处处与民争利，致物价高涨，失业增多，台胞多不聊生。‘二·二八’事件，实为台湾省民众对于当局不满之总爆发。”这几句话，的确道出了此次台湾事件的症结所在。如果台省统治当局，不能反省过去种种虐政之不当，而还要用恐怖、镇压、甚至屠杀的手段，将民众的骚动压服下去，那就太对不起台湾同胞了，可怜他们在日寇残酷统治下历半个世纪之久，而回到祖国怀抱，还只一年多呢！

关于台省统治当局的根本错误，在于长官公署一切方针，仍继承了日寇统治台湾时所施行的殖民地统治政策。在名义上，台湾民众从日本帝国主义者手里解放出来了，但在政治、经济上，还处处受桎梏，一切还是统制，甚至统制得更严。

在省行政长官制度之下，一切大权属于一人之手，在政治上固然谈不到有一点民主，而在经济强力统治政策之下，更使台胞

无以聊生。日寇统治台湾的时候，利用专卖局垄断台湾的贸易，收效是非常大的。省公署接收了台湾，除了袭用专卖制度以外，还成立了一个贸易局。专卖局统制了省内食盐、烟、酒、火柴，及其他生活用品的卖买，贸易局垄断了进出口贸易，这完全是与民争利的措施。而由豪门资本与长官公署合作组成的台糖公司，以极低廉的价格大批收购台糖，以高价转销内地的事实，更是尽人皆知的。内地糖价曾亦因之而暴涨。

其次，我们必须特别指出：台湾还是一个农业社会，而大部分的农民都在日本人长期统治下失去掉土地。日人从台湾农民手中劫夺去的所谓“公有地”，占了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二，农民私有地的三分之一中，还有三分之一又作为“日本移民的私有地”。省公署在接收时，不但接收了三分之二的“公有地”，同时还接收了“日本移民的私有地”。现在几乎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耕地，都掌握在省公署手里。省公署不但统治了台湾的商业，而且垄断了全省的土地，成为一个最大的大地主。农民在这样的大地主之下讨生活，怎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呢？

至于日人投降后省公署所接收的工厂，则将原料出售，甚至一部分机器出售，以致工厂十九停顿，在去年十月的时候，失业工人已达七八十万。生产停顿，社会元气大伤，民生自然更不堪言了。

台湾币制虽然表面特殊，但一则“台币”本身在不断膨胀，二则法币与台币维持一定比率（最近台行挂牌为一比三十五，而市面汇率只有一比二十六），法币膨胀之影响，亦无法避免。所以台湾物价之高涨，与上海等地初无二致。例如二月初，米价由十四元跳到二十元台币一斤，不到两日，又跳到三十元，省公署出来抑平的结果，市上看不到米，而黑市竟涨到四十元一斤（合法币一千四百元）。

总之：台湾是中国的一环，全国性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在台湾固是不能避免的；但如果是一个比较贤明的地方当局，则

危机或许可以和缓一些。现在台湾的统治当局，反变本加厉，要想彻底地贯彻专制统治的政策，要想以屠杀来镇压民众的不满情绪，其后果究竟如何呢？这次“二·二八”大惨案的教训，应该是他们觉悟的契机吧？

（原载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上海《文汇报》）

由延安易手说起

国军已于十九日进驻延安。因为这个荒僻的山城一向被中外视为“赤都”，现在一旦易手，自不能不视为刺激视听的事件。不过今天国内的政局既已完全取决于战场，则延安之役似不能不从军事观点上去衡量。

进攻延安的消息早已传播了数月之久，事实上，国军确曾有过几次进攻的行动。此次国军正式宣布进攻，而且慎重估计须有一周的时间可以攻下，而结果只化了一天的时间。这一天，照途程计算，仅够走路，所以事实上恐怕并未经什么战斗，而长驱直入了延安。这种形势使我们联想到长春、张家口乃至淮阴、临沂等战役。假使中共还把延安作为政治中枢的话，那么应该化若干实力作保卫的打算，然而国军进攻的实力并不较数月前为强，而中共的放弃延安，反比放弃淮阴、临沂等地来得更坚决，更爽快。则可见中共仍坚持着已往不打呆仗的原则。在这原则下，放弃延安正和放弃淮阴、临沂等地毫无二致。

当然，一向被认为“赤都”的易手，在一般观听上是有若干影响的，至少在美国，那些早已跃跃欲出手干涉中国内政的人，是会更提早更坚决更露骨地“援助”了的。最现成的自然是五亿借款。

而在国内呢，必然会更鼓舞起武力统一的信念，也是很自然的。

然而战争是最现实的，决非言词所能改变，决非想象所能扭转的。一年以来，美国的援助早已超过了四十亿，结果如何呢？现在多加了五亿，又将如何呢？过去张家口，长春，淮阴，临沂都易手了，结果如何呢？现在多加了一个延安，又将如何呢？

一切的桥梁今天都撤尽了，一切的门户今天都关死了。今后除作战到底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因此，我们对于延安的易手，除了看到这是内战的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更加继续延长与扩大的阶段之外，实在看不出其他的什么重大结果。在这样一个沉痛的时候，回想这一年来，由于美国对外政策的错误方向与我国主战政策互相激荡，到今天可算到了顶点，这便使我们不能不沉痛地怀念到两个历史巨人——孙中山与罗斯福。这两个巨人都怀着拯救人类的宏愿，都深切了解广大人民的要求；但都可惜事业未竟而中道崩殒了；更可惜的是，继承他们的人都没有能切实依循他们的正确方向前进，因此浪费了他们毕生累积下来的政治资本。试看罗斯福总统所标揭的四大自由，的确道出了人类的基本要求，但今天他的继承人却利用了金元，利用了物资，支持了全世界为镇压变革而不惜内战的政府，加深了人民恐怖与匮乏，使“美国成为全世界到处被憎恶的国家”（华莱士语）。孙中山先生毕生与专制政治与武力主义奋斗，而这么多年来，国内依然是武力统一主义盛行的局面。今天“政治解决”更已完全被抛弃，兵连祸结，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脱离苦海。缅怀过去，瞻望将来，真不能不令人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中国，感慨万端。

衡量今日美国在国际上的措置，以及我们国内形势，可知全世界乃至中国恐怕都会陷在一个相当长期的逆流中。因此不能不使我们沉痛地怀念到这两个民主的巨人。但正因为从这两位巨人所指给我们的方向，以及他们半生精力所缔造的民主事业，我们相信今后的国际与国内的局面，必然会走上这两位巨人所指出的道

路的。因为他们所指出的道路，正是广大人民所要求的道路。而放眼看欧洲亚洲以及全世界各地民主事业的发展，已超过了这两位巨人所亲眼看到的程度了。

唯武力论者假使不及时回头，必然会遭受到严重的后果；致力和平民主事业者，只要继续努力，终会得到预期的收获的。

（原载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上海《文汇报》）

袭人出嫁

民、青两党参加政府问题，昨天已经告一段落了。

他们的参加，事实上早已成定论，开会复开会，讨论复讨论，本来只是一种姿态。

参加国大时，说不一定参加政府；等到参加四机构时，又说非恢复和平不再进一步。现在呢，终究还是踏进去了。

《红楼梦》上袭人的出嫁，也是经过这一段过程的。

（原载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上海《文汇报》）

论政治道德

现在政府改组，正在进行中，到目前为止，眉目尚在显晦不定，遽加检论，尚非其时，可是这期间参加改组若干人士的言行，却使我们能感到中国固有的政治道德问题。

中国自汉唐以来，从政者大都不出儒家的范围，所谓“学而优则仕”，原是儒家的本色。孔子就是热心从政的，所以，“君命召，不俟驾”。机会一到，连车子都来不及准备，那种急急忙忙的样子，每为后世讥为官迷。其实他心目中的确抱着一个行道的宏愿，他有着一个坚定的政治主张。有机会实行他的主张，他毫无踌躇，毫不扭扭捏捏，装腔作势。而且他一定坚持自己的主张，“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他并不恋恋于“禄在其中”的。所谓讲出处，重气节，都是儒家的宝贵遗产。

至于如何实现其政治主张呢？儒家是始终等着“君命召”的机会的。就是说，承认统治者的原有权力，而自处于佐辅的地位。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便是始终希望有一个“王者”给以召用的机会。后人每每取了“民为贵”的一句话，作为民主政治的口实。殊不知儒家一向只是劝统治者多发一点恻隐之心，对人民的死活，有一个分寸，所谓“先王有不忍人之心，然后有不忍人之政。”处处为人民求饶，其实处处为统治者打算。假使真以民为主的话，为什么还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呢？由此可见，儒家是一贯地只求一个“王佐”的地位，从来没有打算代表人民说话的。

可是儒家只以佐辅的地位来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总是道未行，反被统治者玩弄了去。玩弄的结果，便分出了两条道路。一条是专讲儒道的，被安置在清闲的地位，高而不实，虽有主张，只是发发高论，写写文章，替皇朝鼓吹休明，装点场面。一条是专攻儒术的，十足做了王者的臣仆，以意逆旨地照主子的主意，替主子办事。这时已经“无王圣明，逆罪当诛”，自己没有主张的了。总之，儒家从政原本不脱一个“帮”字，演变所及，终于分成了帮闲与帮忙的两类。自汉唐以降，一直如此。

到了这地步，本来已经谈不上什么出处，什么气节了。不过帮闲一类里的言行不符的伪君子，帮忙一类里的热中利禄的真小人，也仍为儒林所不齿。在政治上虽失去了自己的独立主张，但

在为人的道德上却还保留着一定的标准。纵使不能保存官格，也至少应该保存自己的人格。

因此，我们感觉到，在这次政府改组的过程中，参加的人士假使明白表示依然循着儒家的道路，我们毫无闲言。“君命召，不俟驾”，毫不可耻。而且照孙院长的解释，所谓“多党训政”，本是多召几个人来帮一下的。我们认为这个解释极为坦白，那么参加改组的两党人士亦尽可坦白一点。那些表面文章的话头便不必再提，因为儒家的帮闲、帮忙的道理，根本与民主不相干的。假使实际上是帮闲、帮忙，而偏要摆出民主的面目，则从中国固有政治道德观点说，便不免要被目为伪君子与真小人了，而历史家也不禁要慨叹地说：“民主！民主！天下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原载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二日上海《文汇报》）

一个笑话

听说政府改组，分配给民社党的是邮电和卫生两部，民社党因此向政府建议，卫生、邮电不必设部，以免耗费国币。

这使我们想起了一个古老的笑话：

从前有一个人到朋友那里去作客，主人只备饭不备菜肴，客人一直对着饭碗不举箸，主人不好意思了，便卷袖攘臂说：“我去打几个麻雀来炒着下饭吧。”客人向窗外一看，庭中正有一群肥大的母鸡在吱吱喳喳，于是就义正辞严的说：“何必残害生灵呢，把我的马杀掉好了。”“那老兄如何回去？”“那只好借你的鸡骑回去了。”

（原载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二日上海《文汇报》）

怕伤感情

梁秋水、张东荪给伍宪子、胡海门一封公开信，希望他们公开答复。

伍宪子已表明不愿参加政府，事实上答复了。胡海门呢，昨天对人一再摇头，说不准备答复，以免伤感情。

其实，梁张二人，正是为了重感情，“君子爱人以德”，才有此一问，否则，同一民社党，对蒋匀田等的参加，他们为什么连问都不问？

假使胡海门无言可答，依然我行我素，也就算了；假使以为这类重大的出处问题，可以不谈，那才真伤感情呢！

（原载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二日上海《文汇报》）

汤也没有换

政府改组了，五院院长依然是国民党的老人；行政院改组也发表了，旧的部长一榜蝉联，只添了若干新部和政务委员，安插民、青两党和几个所谓社会贤达。

有人说，这是换汤不换药。其实，是连汤都没有换，只加上一瓢未曾消毒的冷水而已。

（原载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上海《文汇报》）

悲 哀

埃及政府也在研究脱离英镑集团而加入美元集团了，而且金元与枪炮一齐来。这是继美军接防印度以后又一惊人消息。

我们现在倒要替大英帝国盘查一下家产，现在究竟还剩多少了？要是照这样把英镑集团账簿上的户头一个一个接二连三地转到美元集团里去，究竟还经得起几转？

英国国内进步人士早就喊着不要再跟美国跑了，可是到现在为止，工党政府还不能掉头自拔，难道真要等到有这么一天，什么都搞进了金元集团以后，贝文向美国拱拱手说，“费心，连三岛亦交给你们代管了吧；反正咱们是同文同种呀！”

这真是尾巴的悲哀！

（原载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上海《文汇报》）

调 皮

民社党北方元老梁秋水到沪后对记者谈的话中间提到政党争取政权的路，说本只有两条——用刀枪与用口笔。可是现在民、青两党却走了另一条便宜的路——作说客。

这恐怕还是梁氏为民、青两党解嘲的话！府会中的交椅是争到几把了，即如在报纸上所列出的第一次新府会的照片，不是齐齐整整地坐在一堂么？可是“权”呢？

假使谈笑之间可以争取到政权，那在朝党亦脆弱得很了。可

见梁氏的话倒是够“调皮”的！

（原载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上海《文汇报》）

碰 僵

莫斯科会议的议程未能一一得到归结，便暂先结束了。虽然在开会之始，杜鲁门先替马歇尔放了几炮助威，希望马歇尔将军第一次出马打硬仗旗开得胜，结果是碰到对方的阵脚用强弓硬弩射住了，动都没有动。于是，不能不偃旗息鼓而回。

马歇尔的确是军人本色，说硬便硬得毫无折扣。四强公约提出了，连修正都不答应，用这样的硬手段，要不碰壁，倒是奇迹了。

这样碰僵了以后如何呢？战争的调子虽在此伏彼起，可是谁能相信今天的美国能掀得起来呢？那么除了装一番剑拔弩张的腔势以外，恐怕最后仍不能不考虑换一个手法吧！

（原载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上海《文汇报》）

善处当前的学潮

物价狂涨，激起了一片增加薪资，调整待遇的呼声。米价狂涨，更激起了弥漫各地的米风潮。现在经济上的严重问题既已激得人心浮动，在未能获得根本解决以前，这种不安现象，恐一时不易平息。来日如何，令人惴惴。在这时会中，只有尽一切可

能，消除可以刺激人心，制造动乱的因素，免使事态愈趋扩大，愈趋复杂，而增加解决问题的困难。

正当这个时候，学校方面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许多事件。上法学生因贴标语和警察冲突的事件，高中学生反对会考的事件，交通大学的护校事件，更有英大学生的请愿事件，尤为严重。这一连串的事件适逢其时，对惶惶不安的人心，更增加了新的刺激。而当局应付之苦，自然可想而知的。

可是细按这类事件的内蕴，可议之处，确实很多。学生与警察的冲突，原是琐尾小事，假使在发生之初，能了解学生当时的情绪，予以适当处理，早可以小化为无的。

至于会考、护校、请愿等事件的发生，则完全是教育当局一手激起的。天下本无事，偏要弄点事情出来。这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即以会考而论，自从恢复会考通令发布以后，不仅学生自始坚决反对，即学校当局、教师、家长，以及教育专家们都不赞成。因为在理论上并不能找出什么有力的根据，而在事实上，只有增加学校的困难，戕害学生的身心，可谓有百弊而无一利。然而当局还是坚持。现在虽有改为会考与大学入学考试合并举行的办法，那只是变相的会考，而且以此代替大学入学考试，更绝对行不通。这办法除了取消会考之名，保存会考之实，以诱致学生入彀，来勉强维持政府的面子以外，还有什么意义？

交通大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中国建设事业贡献之大，是尽人皆知的，只要看国内各种建设人才中，交大毕业生所占的数量，便可了然。在中国急需建国人才的时候，在中国技术教育异常落后，急待扩大充实的时候，却对这样一个有名的学校加以缩编。究竟用意何在？更令人不解。

至于英大事件，学生对校务上提出意见与要求，原属情理之常。教部所派大员，究竟如何调处，暂不置论。即使调处无效，学生要迳自晋京请愿，就让他们来，又有何妨。学生们手无寸

铁，并无可怕之处，而且所请者只是有关校务的问题，更无丝毫越轨之处。为什么要相惊伯有，竟至动了教育、交通、社会三部的公文，阻止学生晋京？电阻不足，还要由两路局动手拆去路轨。小题大做，至于如此！人民常常看到政府一再声言，恢复交通为当务之急，甚至不惜劳师动众，借债征兵，来打通交通线。现在却自己拆毁铁路，阻塞交通。问起来，只是为了几个徒手的学生要晋京请愿而已。对这种举措，又作如何解说？

这三件事发生以后，政府并没有拿出什么办法来。所有的办法只是单顾自己的威信，坚持原来的主张。那除了促使事态更趋扩大，结果更加损害政府威信以外，不见得会有更好的后果的。

为政者最忌的是犯“悖”与“悞”的毛病。每一设施，事先必求合乎情理，有所未合，而贸然施行，便是悖。既行之后，发觉行不通，还偏要硬干，便是悞。既悖且悞，无有不悞事的。

而况现在是什么时候？物价如泛滥的洪水，米风潮如燎原的野火，正使人民惶惶不安。然而当政者似乎惟恐这场面不热闹，还要多弄些事情出来。结果固然学生牺牲了光阴与心力，社会人心多受了新的刺激，而政府只有增加本身的困难，更未必有什么好处。政府对于现在混乱的局面与浮动的人心，正以全力澄清安定之不遑，难道还要火上加油，自找麻烦，自增困难么？多事之秋，还是省点事，把悖乎情理的举措及早收敛起来吧！

（原载一九四七年五月十日上海《文汇报》）

第 六 辑

敬告读者

本报今天在港出版了。香港有些读者，也许对《文汇报》还生疏，要问：文汇究竟是怎样一张报纸？而许多本来是文汇的老读者，也许也有一个问题：《文汇报》在港出版，是不是和上海时一样？

论历史，《文汇报》不算太短了。它于二十七年一月创刊，到现在已整整十年。但在这十年中，首先因为它坚决号召抗战，敌仇恨如切骨，三次抛掷炸弹，两度投寄特种“礼物”；最后终于二十八年五月被其暴力摧毁。三十四年年秋，抗战胜利了，文汇首先复刊，为国家服务，想不到因为坚决主张和平，反对内战，到去年五月，又不能继续出版。十年岁月，实际只有三年生命，而三年中也无时不在风风雨雨中，受诱胁，受迫害。所余一身傲骨，遍体鳞伤，民间报遭遇之惨烈，《文汇报》可说是一个典型。

当然，这样的遭遇，也正是“咎由自取”。因为今日的时代，只许有宣传，不许有舆论；只许说假话，不许说真话。这情形，远在抗战前就已如此，抗战时和胜利后，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我们并不是不认识环境，横逆之来，也并非不能趋避。而正因为认识太清楚了，才愈感自身职责之重大。报纸既是人民之喉舌，社会的公器，就不容许投机取巧，看风使舵。中国之有现代报业，虽仅七八十年，但一贯的传统是明是非，辨黑白，刀锯在前，斧钺在后，决不歪曲事实，改变一字的褒贬。我们虽是中国报业的后起，但决不敢妄自菲薄，随波逐流，而愿始终守住新闻界应守的岗位，对真理无愧作，对历史有交代，成败利钝，在所不计。

我们在沪复刊之初，曾公开宣示我们几点基本立场：（一）

我们是独立的而不是中立的报纸。所谓独立，就是对问题有一贯的看法，对新闻有一贯的尺度，决不与政治发生任何关系，也不在党派中间作伪装中立的乡愿。（二）我们是向下看而不是向上看的报纸。作为一张民间报，就应该诚心诚意代人民说话，为人民服务。因此我们决不考虑权力者对于我们什么态度，党派对于我们什么反响。我们只问所说的话，是不是老百姓所要说的？有没有偏见？对一般社会的影响又怎样？（三）我们是一张说真话而不是说假话的报纸。在是非之间，我们决不含糊，在真理面前，我们决不固执主观。

简单说，我们的目的，只是想办一张平凡而朴实的报纸，把握中国报业固有的传统，遵循现代先进国新闻自由的信条，不骛高远，不炫新奇，希望在平淡的努力中，为中国民间报摸索出一条应走的道路。我们过去承读者热烈爱护，在国际间亦薄负声誉，或者就因为这一些平凡的信条和平淡的努力。

今天，我们在港出版，决不因为自己又站起来了而感觉轻松，我们的心头，实在是很沉重的。因为今天的局面，是黑暗的，也是光明的；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结束；是混乱的，但也有明显的历史轨迹。在这样一个存亡绝续的大时代，一个团体或一个事业的荣辱恩怨，实在太渺小了，为世界的和平，为国家的进步，为流血牺牲的先驱，为水深火热中的同胞，我们都不容逞意气，求痛快，而应沉着努力，负起庄严的责任。在这时代，宣传是容易致力的，但一个平实可靠明辨是非的舆论，则非旦夕可以养成；但这无疑是推动时局走向光明轨道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汇报》基础脆弱，而又遍体鳞伤，面对这样一个重要的任务，实不胜战慄危惧；幸而香港有足够的空气，而香港的同业，也都有优良的传统，足为我们的范式。今后我们将追随中外同业之后，尽其绵力，期望各界贤达，各地同胞，时予赐教，不胜幸甚。

（原载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香港《文汇报》）

小 雨 点

立法院检讨所谓财经紧急方案，据说已经告一段落。除了照例对豪门攻击一通，向王云五放一支冷箭以外，并没有什么热闹的局面，大概因为投鼠忌器，这次的“经改”是出于总统亲裁的。

立委诸公提出的意见，更不值得重视，如巩固币值应说疏导游资，平衡收支，配合生产及消费等等，简直连八股都说不上。所以，翁相国和王财长轻轻的表示以书面答复，就交卷了。

早知如此，翁、王等事先大可不必那样紧张了。

（原载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四日香港《文汇报》）

释 豪 门

连日上海和北平举行“打虎游行”，口号是“打倒官僚资本家”，“枪决奸商”，游行队伍连呼“打打，打死他！”上海的化装游行，有一个证券商，背插死刑纸标。在“凡商必奸”的逻辑下，京沪平津的商人，看到这疯狂的队伍，当不寒而慄。

游行的队伍，都是青年军，而同日的新闻“政府登记豪门国外资产”，“行庄公司行号外汇移存央行”，则无形中点出了轰轰烈烈运动的底盘。

“豪门资本”、“官僚资本家”，据宋美龄氏说，这是共产党造的名词。而共产党的解释，豪门是屈指可数的当权政要家族，

它的打击面缩小到中国社会金字塔中最上的最小的一层。这次由政府的行动看来，豪门却是中小商人，基础最广的中间阶层。相形之下，政府的打击面显然比中共的打击面为大。

上海前次被押游街的纱布商，便是一个小掮客，家无隔夜之粮。游街之日，南京路上部分关店，表示了沉默的抗议，民众实不忍同类相残。因此仇恨之火是不易煽动的。政府的目的，也不过玩玩火，作为一种神经战。

政府收入了三千万美金的行庄外汇，这是有形的收入，凡有所得必有所失，其所失的份量，恐怕要多得多吧！

（原载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四日香港《文汇报》）

换 位

正在锣鼓喧天之际，南京盛传国防部人事将有大变动，何应钦仍出国，陈诚将复任参谋总长。

这个消息，我们认为并不奇怪。因为何这次上台，本来很勉强，几次表示，对内战并无信心，着实泼了些冷水。陈诚虽然从东北铩羽而归，受了申斥，但他毕竟“内战内行”，一声“得令”是蛮神气的。

（原载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香港《文汇报》）

日 俘

北平讯：大批日人由太原抵平，并谓尚有二千五百名日本

人，将由太原运来，准备遣送归国，这批人走后，太原是不是还有日人呢，没有交代。总之，这数目已比阎锡山所说的五百人多了许多倍了。

据说，这批日人，经济情形甚佳，到手后即大批购买东西。那真要羡慕煞北平人了！

太原不是说天天有人饿死吗？原来日本人却那么肥！

（原载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香港《文汇报》）

人 质

上海维持金圆券的办法，是人质政策。抓杜维屏，以平息金钞黑市，抓荣鸿元拘郭棣活以压制纱作，处死王春哲，以威吓汇兑黑市。商人宁可要命不要钱，故物价一时稳住。

蚀本的生意谁做？因此商人厂家都考虑到停工关门。蒋督导员发了警告：谁关厂政府就要接办。另一方面叫刘攻芸赶速研究原料供应问题。这一步便难多了；输入限额已减了四分之一，工业原料无以为继，棉花虽已登场，然而产区大半已经为共军占领。这个任务的完成，警察已无能为力。

通货膨胀已趋过八一九的一倍，物资不但没有增加，因人质政策，而趋减少。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正在加强，单单减低囤积与投机的附带因素，济得了事么？

（原载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八日香港《文汇报》）

残棋一局

蒋先生昨天又飞到北平去了。这可见北方局势的紧张。

以象棋为喻，“将”棋是不应该轻易搬出的，动“将”棋就证明棋局的严重。

以围棋为喻，北方的一大片地方，实际已成了残棋，长春、沈阳、承德、太原都是死子。以前北方还能支撑的原因，是察绥有一个“眼”，平津一个“眼”，锦州也勉强算一个“眼”。这三个眼能连成一片，还可算是一盘活棋，彼此孤立，就是死棋了。照目前的情形看，这三处的联络都割断了，而且辽西和绥察这两个“眼”，都有被挤掉的可能。

所以，在北平的外国记者，已感觉到平津有被围的可能了。

（原载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香港《文汇报》）

论“右手行左策”

最近一个多月来，国内的军事政治，都在剧烈的变化中。军事上由于济南的失守，辽西绥东的紧张，浪涛固然比过去益见惊险，而政治的变化，更是波谲云幻，使人头昏目眩。中共的做法，一向是被人目为过激的，但这次攻入济南，立刻发表安民布告，声明绝对保护各阶层人民的财产和民主自由，保护私人资本和民族工商业，保护公用事业，军队公买公卖，不取民间一针一线。究竟做得怎么样，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据外国通讯社的报道，说中共的作风的确变了，不再采用剧烈的斗争方式，因此，许多

地主们也纷纷回去了。而在政府这一方面呢，币制改革和特别刑庭的设立，也发挥了新作风，到处抓学生，抓工人商人。蒋经国的打虎运动，以善良工商界为最大对象，结果是工厂关门，商人无法作正常的生意，其他如农民和学生，更逼得走投无路。口号是要打倒万恶的资本家，实行社会革命，实行社会主义。这两方面的对比，使人看得越看越糊涂，究竟谁是稳重的，谁是激烈的实行共产主义？一般对中国情形隔膜的外国人，恐怕更是莫名其妙了。

有些靠近官方的论客说，这叫做“左手行右政”，“右手行左策”。但什么叫左政，什么叫右政！左手右手又凭什么来分别？照一般的解释，当然是，左政就是激烈的革命，右政就是温和的改良。右手是保守的，左手是强暴的。中共目前所实行的，是不是右政，自有事实证明；假使果如济南所表现的，那末，连手段也不是左手的了。值得我们研究的，倒是政府最近所实行的，究竟是不是左政，而又是不是用的右手？

“八一九”以来的一大串措施，是强力禁止物价上涨，大规模的拘捕工商界和学生，强迫商业银行交纳外汇资金，限期要人民交纳金钞，搜查仓库，没收货物。这一切，是不是社会主义呢？世界上任何一种社会主义，总不外合理的生产，合理的分配，消除剥削的社会关系，而今日上海所实行的呢，生产都窒息了，货物都断流了，一般人民，不仅没有得着丝毫好处，反而在生活上更感受到恐怖，一面是实际的收入减少了，一面是日用品都有行无市，买不到东西，连吃的蔬菜都买不到。把许多正当的工商界都弄得走投无路，动辄犯法，献出了所有的财富，还要抓到特刑庭去当罪犯惩办。到今天，可以说每一个安分守己的人都无法生活了，只有少数的豪门显宦还逍遥法外，明明私套了大批外汇，却可以说是“为公”而不犯“法”；明明查出了大批囤货，却说这并非投机图利，而不予追问。总之，特权阶级不仅没有损着一根毫毛，反而乘此机会大获巨利。从许多“苍蝇”身

上搜刮去的财富，决没有丝毫用之于民，而大部用为内战的资本，少数落入私人的中饱。这些措施，说得上什么左政，什么社会主义？

至于所用的手段，更是骇人听闻，无缘无故可以搜查商店，没有任何证件可以拘捕人民，善良人民，动辄就被送到特刑庭，轻则徒刑，重则处死。象王春哲，即使所宣布的罪状千真万确，也只是在“八一九”以前曾私套外汇，既非抢劫，又未杀人，而竟处以极刑。王孝和的“罪状”，充其量也只是未遂犯，既不准其请律师辩护，又不许其上诉伸冤，马马虎虎也枪毙了。其他捕风捉影，以莫须有之罪而被拘办的，更举不胜举。到最近，恐怖空气发展到极度，人民行动都要经“核准”，出版物不仅任意封闭，而且明令要所有报纸杂志“作一定之记载”。这就是说，不仅不许你说什么话，而且一定要你说什么话，这比“防民之口”又更进一层了。这种彻底的恐怖手段，还说得上什么“右手”么？口口声声要老百姓守法，而自己是想怎么做就造什么“法”，结果是造一个法毁一个法，把老百姓治得哭笑不得、生死两难。

“戡乱”的主要口号，是反对中共的暴力革命，而要实行温和改良，追求英美式的民主，实行宪治。今天一切的一切，从政策到手段，请问：有一点和上述的口号符合，而不是背道而驰么？

（原载一九四八年十月五日香港《文汇报》）

一篇绝望的演词

每年双十节，蒋先生照例要发一篇洋洋文告——告全国同胞书。今年却没有，而只是在纪念会中发表了一篇演说。我们以

为，时局发展到这样严重，军事、政治、经济都弄得一团糟，他的演词，应该有一番沉痛的检讨，从而反省，谴责，以求国人的谅解。但我们细读全文，不仅没有这样的气氛，反而把一切责任归之于人民，归之于文武官员，说大家“意志不能集中”，“精神趋于散漫”，“而又为共匪的虚伪宣传所迷惑”。在历史上，每逢变乱严重的时候，专制皇帝总还下“罪己诏”以平民愤，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现在蒋总统这篇演词，却十足的是“罪民诏”了。

这篇演词，除了文字上不能自圆其说外，在情绪上，也充满着悲观与失望，可以说，在蒋先生二十年来所有的文告中，这是最低沉的一篇了！

首先，他对于军事已不再表示有多自信。他承认过去的支票没有兑现，“政府曾经预计在十一月以前，要肃清黄河以南的股匪，可是现在已经是十月，不但黄河以南的股匪没有肃清，而且最近济南又被匪攻陷”。原因何在呢？是因为全国同胞“大家心理上有了—种错觉，以致力量不能集中发挥，剿匪军事不能收到军民一致协同配合的效果，受到不少挫折，这是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这是说，支票所以不能兑现，不是银行没有信用，而是人民太不信任银行了。至于将来怎么样呢？他一则说：“以后的剿匪局势，将要比现在更困难更严重”。再则说：“今后戡平共匪的军事，当然不是几个月或一两年短期间所能完成”。这等于把过去所有的支票全撕毁了，而开—张无定期兑换的支票，条件是要人民“完全信任”，这样的方法，正和以金圆券来收回庞大的法币—样，要人民“只许成功”，献其所有，而自己却不负丝毫责任。我们从另一角度看，这情调也实在忧郁极了！

其次，关于政治方面，他也表示不准备作任何改良，他说：“我们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莫过于完成民族主义”，“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实现，则民权就不能发达，民生就无从策进”。另一方面，他又很满意的说：“中华民国，从此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民国”，

“我们终于已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他明白告诉我们，今天虽然是封闭言论，检查邮电，设特刑庭，任意拘捕搜查，并禁止人民自由行动，但已是名副其实的民国了！再要改进一点就是妄想，因为今天必须先实行民族主义。

他把中共斥为国际组织的第五纵队，是我们民族“最阴毒险狠的敌人”。证据在哪里呢？他又不拿出任何的事实来，而只是空口的谩骂。我们知道，中国是二千多年的古国，一般民众的民族观念极强烈，假使中共真是民族主义的罪人，民众当然会扬弃它的。但在另一方面，以实行民族主义为标榜的政府，事实又在哪样？关于国内民族问题，国父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有哪一条实行了？至于对外，那更使一般民族观念强烈的人民寒心。中美商约的桎梏，是人所共知的，内政被干涉，海军基地被占用，经济命脉受控制，政府不仅不加抵抗，反笑脸欢迎，惟恐其控制之不严，侵入之不深。甚至对甫经战败的日本，也一意主张宽大，对美国之极力扶植日本，且欣然表示同意，对人民反对扶植日本的呼吁，则以强力压迫。这种前门迎虎，后门喂狼的办法，请问：哪一点是符合民族主义的？

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这一篇演词实在失体极了。对过去的一切，既推诿敷衍，不负丝毫责任；对以后如何做，又只是空言搪塞，没有明确的表示。全篇只有一句话流露了真意：“时间就是我们胜利的因素”。那是说，只要能拖下去，就可以“苦撑待变”。但杜威上台后怎样，第三次大战果真就会爆发么？爆发了又怎样？这些问题，现在已经可以看清了。一个负这样重任的人，把一切寄托于渺不可知的国际变化，幸灾乐祸，实在太不应该了！

今天，就是最能忍耐的人，读了这一篇演词，恐怕也会惊奇而失望罢！它告诉我们，今天的一切，已是“名副其实”的宪政了。又说“今后的戡乱军事，当然不是几个月或一两年短期所能完成”。把过去“长痛不如短痛”的说法全推翻了。一句话，就

是要大家牺牲一切自由和生命，绝对信任他去作无限期的赌博。不谈责任是非，不顾人民死活，用尽一切办法去“拖”，只求能维持政权的存在。以一个政府的元首，而发出这样直率的口吻，真可说是前所未闻的了！

（原载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二日香港《文汇报》）

精神不死

慕尼黑战犯法庭，对希特勒作“缺席审判”，被告席上，设了两个空座，作为希特勒和他情人的位置。审判长宣判说，希特勒已确定死亡了，全部财产没收。

希特勒已死了么？实在使人怀疑。今日的世界，希特勒的声音，显然还响彻在每一个角落。

东条又成为日本的英雄，佛朗哥已成国际的红人，其他各地，从欧洲到亚洲，小希特勒何啻车载斗量！希特勒真死了么？

我们闭目一想，在慕尼黑法庭的空座上，希特勒的幽灵，正在得意地狞笑呢！

（原载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七日香港《文汇报》）

人心与大势

今日的局势，谁都看出，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论军事，简直已无法支持，城市是一个接一个的失守，军队是十万又十万的

溃灭。东北不必说，华北也大势已去，只剩傅作义在维持残局。最近汴郑驻军自动撤出，似乎要想退保襄阳、信阳、徐州一线，以控制长江，保卫南京。然而所有的军队，已经是士无斗志，将无战意，象王耀武、范汉杰这样的嫡系大将，都未到“最后一人”就化妆逃走，而中途被俘了，吴化文、曾泽生等，则在战机紧迫时就投共了。这样的军心士气，如何还能死拼下去？而且实际上大势已去，死拼也绝无用处。战局的重心，一旦移到江淮流域，尽管集结重兵，想背城一战，但共军主将刘伯承的十几个纵队，早在大别山区扎紧了阵，而苏北皖中及江汉区，国军也处处有漏洞。这一线，能够支持多少时候，实在是问题。论经济，则最近金圆券的狂泻，已把暂时稳定几个月的幻想也破灭了。伴之而来的，是人民生活的朝不保夕，工商各界的整个破产，京沪平津穗等几个大都市，甚至食用品都断了市，商店十室十空，工厂亦几乎全陷停歇。这种人心惶惶岌岌不可终日的情形，在敌伪末日，也没有演变到这样。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政权到了日暮途穷的征象。

局势演变到这样，肇因当然不自今日始，在三年以前，当局就选择了这一条路。那时，举国要和平，当政者偏要打仗，人民要团结、进步，要安居乐业，当局偏要分裂、后退，要百业破产。政协的破坏，是自己决定了今天的结果。从那时起，人心就失尽了。这三年以来，强征、强借、强拉，再加上最近的普遍设立特刑庭，任意拘捕枪杀，并以改币为名，大量搜刮民间财物，破坏仅有的民营企业，使最能忍耐最富于妥协性的民众，也普遍发出毒恨的呼声，而有“时日曷丧”之叹。

人心大势，到了这个地步，在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再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为什么今天这个残局还在支撑着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外来势力的干涉。所谓美援，虽然绝对无法改变中国历史的车轮，但对于一个倒下去的力量，正象吗啡针一样，时时给以鼓励和幻想。三年以来，中国内战这样残酷，人民牺牲这样惨重，这一笔账，主要的当然要写在美国统治者的头上。

本来，中国的内战，一向是和国际侵略势力分不开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加强中国的分裂，阻碍中国的进步，以援助为名，一步步控制中国一切政治经济的命脉。抗战以前，二十多年的内战，大都是由外来势力所导演。但当时的执政者，等到大势已去，挣扎无望时，也就罢手了。今日的情势，只有民国五年和民国十七年时差可比拟。袁世凯在帝制失败全国鼎沸时，他要“背城借一”，也未始不可一试，但毕竟他因“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抑郁而死了。十七年的张作霖呢，直到最后，日本帝国主义还竭力支持他，鼓励他，要他支撑到底，但他看到人心已去，大势全非，就仆仆出关，洗手不干了。象袁世凯、张作霖，都是著名的野心家、大军阀，但他们无望的挣扎，也有一个限度，到了大势已去，非完全变成外国势力的傀儡就无法苟延残喘时，最后的良心，使他们“悬崖勒马”了，因为历史的裁判，毕竟是可怕的。今天的情形，比以前更为严重，所谓外援的代价，甚至军队都要派人直接指挥，政治要派人监督；一面则听任日本的复兴强大，最后把国家变成美日的双重殖民地。到了这个关头，还不能唤起最后的反省，国家存亡，人民死活，一切在所不顾，而一意要苦撑下去，天怒人怨，也充耳不闻。这样的情形，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创例。

但大势如此，人心如此，这样的苦撑，又能撑多少时候？

（原载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日香港《大公报》）

抗议杀害学生

在学生运动中，学生被杀死的事固然已不新鲜。民国十四年，请愿学生在段祺瑞政府门前遭受屠杀，当时鲁迅称之为民国以

来最黑暗的一天。然而这样的事在近二十年来的却已屡见不鲜，象最近在七月五日，东北学生在北平一次被杀死者达十七人之多，其规模实远非段祺瑞时代之所能及了。然而过去每一次发生这样的惨剧时，手上沾着青年的血的人也还觉得这是说不过去的事。尽管是明目张胆地杀了，还要想尽方法来掩饰。或说是死者自行“失足落水”，或说是死者自己“饮弹而亡”，或者甚至说不是被杀，而是自杀，或者还要撤换一两个小官员敷衍一下为死亡惨剧而形成的群众中的愤慨。不管这一切都无非是欺骗与掩饰，但终究是没有公然宣布，“不安本分”的学生“依法”是应该处死的。在善心者看来，或者会觉得杀人者也还未混绝羞恶之心，但在杀人者看来，恐怕终究因不能有为所欲为而不满足吧。现在好了，有了特种刑庭之设置，有了“匪谍”罪的发明，南京与北平已有学生公然被“依法”处死刑。这不能不算是空前破纪录的举措。

且不论全国各地大捕学生所据的无非是莫须有的罪名，也不提给青年学生以五年十年的徒刑是何等残忍的事，无论如何，没有人能够想象，青年学生会有被处极刑的罪名。上海被拘传的学生家属近曾发表“告各界人士书”，其中痛切地说：“我们自以为光荣地把他们送进了大学了，哪里知道这却是把他们送进了牢房……。是我们害了他们，是我们错了！……我们没有地方哭诉，周围没有一支援助的手，我们唯有希望获得你们，全国的父母亲子女们的珍贵的同情，来安慰我们创伤的心！”然而这种代表天下父母心的呼吁，当局所给的答复又是什么呢？

今日的法律，几乎已被一个杀字塞满了。商人可以被杀，王春哲充其量只是豪门鹰犬，罪不至死，他的死，是用来威胁一切正当的商人。工人可以被杀，王孝和已做了前例。现在学生也被公然认为可以杀的对象了。南京学生董剑萍与北平学生曹章扬已处了死刑。看当局的意思，似乎以为他们手中握着制造法律的权力，只要用白纸写出一条什么特种法律，就可以有任意杀人的充分理由了。但法律真有这样的效力么？如果事情真这样简单，“治

“国平天下”实在太容易了。中国近代学生运动以五四运动为开始。五四运动中，学生火烧赵家楼，殴打政府大员，按照当时普通刑法，未尝不可以处学生以扰乱治安，破坏国家的罪名，然而北洋军阀政府究竟不敢以刑罚加于五四运动的学生身上。为什么？因为法律的威权可以是假的，人心的向背才是最真实的。近来北平有几位教授，因学生被捕事而想到五四当年，觉得北洋军阀政府居然还不敢滥用法律以违抗人心，几乎令人有怀古之思了。这诚然是慨乎言之的话。今日的当局，实已发展到“以杀治天下”的程度，人心向背并不是他们不知道，实在是已经顾不到了。

“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是专制时代的人已经懂得的道理。不要以为这是“乱世”，以为中国的青年，中国的人民的性命反正不值钱，随便杀几个学生无所谓。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是大乱之世，但孟夫子就在那时候指出：“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凡是成天制造杀人的法律，以刀斧手做统治手段的统治者的下场如何，历史上写得清清楚楚。

（原载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香港《文汇报》）

迁都闲话

由于军事形势的急转直下，京沪人心惶惶，迁都的空气乃日见浓厚。据美联社广州电，政府可能将广州改称陪都，作为在国内苦守的“最后城市”。另据广州某一报纸消息，则将来的首都，可能迁至台湾，而不是广州。从这些消息看来，广州市民对于可能加上的“陪都”荣衔，显然并不表示热烈的欢迎。

迁都之说，今天当然还嫌太早，因为东北华北尚在挣扎，徐州武汉还没有受到严重的威胁，南京还没有演变到不可终日的情

态。但照目前的发展，谁能预料到三个月后，一个月后，甚至半个月后是什么样子呢？在这十几年的动乱中，大家对搬家已有了经验了。尤其是那些豪门显宦们，子女玉帛，必需早策万全，他们的感觉最灵，算盘最精，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使他们坐立不安。头一等的要人，早在美国或南美奠定了安身立命的基础；次一等的，逃难的本钱也早筹足了。只有三四等的要人最难自处，将来能走不能走，走到哪里，都是未知数。这些人大概心里最慌，能跑前一步，都想赶早，所以这半月来，由京开出的轮船，十分拥挤，连黑票多不易买到；另一方面，各机关也要预先布置退路，在可能去的地方，抢些房子，以便安插眷属，搬移档案。这些现象，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于是迁都的流言，也就哄传起来了！

照我们观察，这政府什么时候搬，现在推断固嫌太早，就是搬到哪里的问题，任何人也不敢断言，恐怕连政府的首要们也无法预定决策。因为今天的情势，真可说是瞬息万变，现在认为最安全的地方，也许将来并不安全，今日以为毫无问题的，也许明天竟有问题了，谁敢保险！所以，广州或台湾设“陪都”之议，恐怕也只是传闻而已！

其实，“都”不“都”的问题，本没有什么了不得。只有封建的王朝，才那么重视。当年国父中山先生开府广州，直到十五年北伐，广州并没有加上什么“都”的荣衔，然而谁都知道，广州是革命的策源地，人心归附，光耀全国。后来政治中心迁到武汉，也没有什么“都”的名称，而并不减轻它在政治上的号召力。直到十七年北伐完成，才正式提出“迁都”之议，把北平改称了“故都”。从此以后，革命是退潮了，国运也一步步走下坡路，而“都”的名称，也就层出不穷。十七年起打了三年激烈的内战，招致了日寇的侵略，“九·一八”“一·二八”以后，有迁都之议，于是西安改称西京，而洛阳改称“行都”。抗战以后，又把重庆改称“陪都”。在惨胜以前，重庆对于建“都”问题，曾引起激烈的辩论，有的主张武汉，有的主张北平，而长春、济南、洛阳也都有

人提议，现在，看看这些地方，还有几个在政府手里？想想当时的辩论，已不堪回首了！

今日的政府，可以说是“政由四姓，令出一人”。这最高一人在哪里，“都”就在哪里，所以，这一人到庐山避暑，庐山便被称为“夏都”，到了莫干山，也就变成什么“都”了！今天他在北平，于是一切公事都要向北平请示，“责任内阁”的院长，也仆仆飞行，席不暇暖。既然事实是这样，“都”不“都”又有什么关系？今天还有谁对这封建的名称，发生敬意？

作为一个政治中心，它必须有完整的主权，周密的组织，尤其要有全国人心的拥护，历史上所说的“东面而征西面怨，奚为后我，后来其苏”，这样的民心，虽居在西歧这样偏荒的地方，大家还一样把它当作庄严的中心。虽无“都”之名，而在人民的心目中，早建了“都”了！

广州，在明末的流亡皇帝，曾建了一次“都”，但不旋踵便被消灭了。今天，连“绍武”朝的遗迹都找不到了。

（原载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九日香港《文汇报》）

哀金圆券

最近蒋经国在上海各大报上用“一市民”的假名登了两次广告，第一次题目是“一市民告众市民”，第二次是“一市民再告众市民”。这两个文件先后转载于本报前昨两日，读者可以查阅。这两个文件不惟在中国货币史上是旷古未闻的“杰作”，即在世界货币史上，也开空前未有的滑稽剧的先例。广告的大意是呼吁大家要信任金圆券，不要抢购东西。在第一个文件中说：

“请问大家把金圆券挤倒了，有什么好处？我们要金圆好，金圆

就会好，我们要金圆坏，金圆就会坏。”“请问我们把金圆挤成法币，我们有什么好处？”这已经够悲切的哀鸣了！哪知第二个文件更坦白而有趣，它说：“我们大家近一个月来，疯狂的压迫金圆，什么都要，就是不要金圆，什么都藏，就是不藏金圆，连《水浒》也比金圆好，就是棺材也比金圆好，我们大家都不要金圆，金圆怎能不垮台”这所说的倒句句是真话，中国人民什么都要，就是不要金圆，他们宁愿要《水浒》，要棺材，要大粪（各地有囤购大粪者），就是不要金圆。但这话居然出之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统管大员之口，而且还用“一市民”的化名以广告的方式出之，这却不能不令我们惊诧了。我们实在颇为佩服蒋氏的坦白与面对现实的勇气。当金圆券发行之初，当局不是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决心来推行金圆吗？俞鸿钧不是打电报给王云五：“恭喜恭喜，金圆券成功了”来祝贺吗？各官方报纸杂志不是奉命一致为金圆券捧场，认为这是南京经济战线空前未有的成功吗？然而为时还不过两个月，“恭喜”之声，还回绕在我们的耳际，而蒋经国先生居然为金圆券发出这样的讣告，现实真太冷酷无情了！前此不久，上海统管处还通令各报不许对金圆券讽刺，上海有一个朱姓棉花商人不过在品茗时轻轻说了一句：“金圆券将来要和法币同一命运”，便被戡建大队捉了进去，送到特种刑庭去坐监牢，至今尚未释出。然而今天蒋经国却用一市民名义化了广告费大登其广告，公开承认“我们大家都不要金圆，金圆怎能不垮台。”如此公开，如此坦白，我们怎能不佩服蒋经国的粗线作风呢？

但蒋经国化名登这个广告的用意，却是要叫大家信任金圆券，“我们要叫金圆券好，金圆就会好！”这就令我们不解了！金圆券的好坏，原来决定于我们的一念。在蒋经国看来，金圆所以垮台，就是我们叫它坏，换句话说，这都是老百姓不好，它与通货膨胀无关，也与军事溃败无关，更与经营政策不相干。但人民为什么都不信任金圆券呢？为什么大家宁愿要棺材，要《红楼

梦》、《水浒》，而偏偏不要金圆券呢？稍稍懂得经济学ABC的人，谁都知道，大家所以不信任金圆券，是因为金圆券原本不过是张“纸”，它既不能兑换黄金，也无实在的价值可言，而政府拼命的印刷钞票，金圆券越发越多，通货数量增加而物资却日益减少，金圆之贬值原因即在于此。但这种经济学的初步理论，对蒋经国说是不会了解的，我们自不敢期望一个只迷信“戡建大队”“飞行堡垒”的人对经济规律有所理解。

令我们感到兴趣的毋宁是蒋经国想用一张化名广告来挽救人民对金圆券已经失去了的信心，蒋氏今天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经营大权在握，予取予夺，操生杀之大权，以如此重要的“最后王牌”，竟出之于用匿名广告来呼吁人民“不要把金圆券挤倒”，这也可见黔驴之技已穷，正如一个病人，临到众医束手，而只有祈祷上苍来救命时，这个病人也就快要寿终正寝了！

时间是无情的，现实是冷酷的，金圆券的失败，不过是迷信暴力者失败的一个现世报而已。

（原载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香港《文汇报》）

老 生 常 谈

沈阳失守，美国震动。国务部又发表声明，说美国对华政策，决不因此而变化。

这几句话，三年来不知已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建议美国国务部，不妨灌一张留声机片，遇机会就播放一次，岂不省事？

以后，恐怕这类的事还多着呢！

（原载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香港《文汇报》）

和 谣 又 起

京沪人心惶惶，和谣又应时而起。据我们所知，这是张君勱和政学系在策动的，其不能成为事实，一望可知。

今天，谁不希望和平，但大家要的是真正的和平，永久的和平，而不是姑息的和平。否则，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反而把祸害延长下去，以后再不断打内战，民何以堪！

看他们所列的条件，除第一条外，哪一条符合人民的希望！

最荒谬的，还要保持这“三党政府”而予以扩大，这不是张君勱、张群等一厢情愿的梦想么？

这一群无耻的政客，全国的人民还能容许他们存在么！

（原载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香港《文汇报》）

廖耀湘被俘

廖耀湘又在锦西查明被俘了！

四天以前，蒋总统的演说中，还郑重的说：“沈阳、锦州的失守，诚然是革命过程所遭遇的严重挫折。但廖耀湘司令官终于壮烈殉职，慷慨成仁，这实在充分表现了我们革命军人的天职。”

在这次秋季大战中，蒋统帅是希望每一个将领战至“最后一人”的，济南之战，他要王耀武死；锦州之战，要范汉杰死；长春之战，要郑洞国死；但不幸都一个个投降了。好容易找到一个

“下落不明”的廖耀湘，就大事宣传，作为“革命军人天职”的标本。想不到廖也没有死，而且被俘了！

我们相信，时至今日，恐怕没有一个将领肯为蒋统帅而死了！前天，守徐州的刘峙发表谈话，说他已具必死决心，率军应战。话虽然说得那么硬，但我们可以肯定作一个预测，一旦徐州失守，刘峙除了逃亡就是投降，决不会死的。

今天的国军高级将领，大多已脑满肠肥，饶有资财，谁肯转死的念头？刘峙是著名的贪污健将，他会壮烈的死才怪呢！

（原载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香港《文汇报》）

陈布雷之死

陈布雷之死，已证明为自杀，他的遗书和“杂记”，由中央社全文发表，官方大事宣传，以刻划其“耿耿之忠”。

从这些遗书和“杂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蓄意自杀，不外三个原因：第一，他看到大局已绝望了，所谓“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来，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支持”，就是说明大局已到山穷水尽之境，深叹“书生无用”，了此残身。第二，他看到蒋的威望已完全倒了，从一个“民族英雄”变成“国民公敌”，不仅人民反对他，连多年追随他的死党也已分崩离析，遗书所谓“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根据“主辱臣死”之义，遂以一死以明志。第三，可能是受了蒋的责骂侮辱。蒋氏这一阵的冲动易怒，是可以想象的，骂太太，杀爱犬，一切都是反常的表演。但这样的喜怒失常，对于“一介书生”的陈布雷，毕竟还是受不了的。在遗书中，就充满着这种如

泣如诉的情绪。

有人以陈氏之自杀为“尸谏”，其实完全是比拟不伦的。因为“尸谏”是规君之过，而他的自杀，只是为了“此身已非自效危艰之身”，他对于蒋氏近年的所作所为，不仅认为毫无过错，而且希望“惟公善葆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的成功”。他始终认为“天子圣明，臣罪当诛”，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臣下”不能仰体“圣主”的至德，蚩蚩小民，尤好乱成性，“有圣主而不知爱戴”。这些心情，在他的遗书内是处处流露无遗的。

我们固然不能承认陈布雷是“千古完人”，但说他是一个诚心作恶的坏人，也有失怨道。平心而论，他只是一个轻轻的“读书人”，一旦受了“特达之知”，就一心想感恩图报，遗书所谓“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念”，也实在是老实话。他的心目中，只有一个蒋氏，以蒋氏之喜怒为喜怒，他固然看不见人民，就是所谓党的利益，对他也无所容心。蒋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蒋不喜欢的，他就用一切方法不让他知道。千百万人民的宛转哀啼，求生无路，他决不会有动于中。而蒋氏要受到一点刺激，或者地位受到影响，他就彷徨无措，最后且不惜一死以明志。这样的孤臣孽子，假使历史倒退到一百年以前，也许竟是流传青史的“忠臣”了。而今天他所贡献的是什么呢？尽管动机并不如CC政学系等的自私自利，结党作恶，而其祸国的影响，其实无分轩輊的。

象陈布雷这样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中国数千年封建专制下的一个典型，那就是“臣妾”的典型。为什么历史上不叫“臣妻”而叫“臣妾”？因为“妻”毕竟还是一个嫡体，象唐太宗的长孙皇后，遇事还能切谏。“臣妾”就是广东话所谓“妾侍”，自己就不再有思想、个性，乃至个人的存在。一切得以“主上”的欢心为唯一目标，“象忧亦忧，象喜亦喜”，“主上”要有什么疾病，就“衣不解带，割股侍药”，假使天下大乱，也决不会直言切谏，而只是默默通神，祝告上苍，希望“天佑中国，转危

为安，唯公善保政躬”。我们试把陈氏的遗书细细阅读，有哪一个字说到人民的痛苦和国家的前途？他耳中目中，只有一个“主子”，而时至今日，看到主子已穷途末路，他既回天乏力，“衰病之身，不能分公忧劳，反贻公之刺激”，于是最后不得不以一死以答“圣主”之知遇。他的死，可以说是为蒋氏个人殉节。为国为民，固然谈不上，就是对于这个政权，也没有任何尽“忠”到底的意念。他的全部遗书的气氛，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对已死的人还要深文周内，而是因为在他的死事中，看到了一个封建人物的影子，一个没落知识分子的悲剧。整个的世界，已向人民世纪迈进，而我们的政治圈中，还有这类“臣妾”的典型存在，实在是我们的耻辱。

一切的知识分子，假使到今天还不能觉悟而努力从封建的关系中解放自己，以全心全力贡献其聪明才智，为人民服务，则道路将越走越狭，最后免不了走上“臣妾”之路，那就无可救药了！

（原载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香港《文汇报》）

不搬家 不逃难

天津各大学，决定不搬家，上海的一般民众，决定不逃难，许多工厂，也决定不作迁移的准备。这不仅可见人心的向背，而且可以证明，大家对于大局已有明确的展望。

平津京沪这几个大都市，今天都已面临暴风雨的前夕，为什么大家这样镇定呢？当然决不是象胡适之流的想法，相信国军能守得住，也决不是因为搬不起，跑不动。象抗战初期，学生徒步

都把学校往后方搬，实业界在敌机疯狂轰炸下，也不顾一切把机器设备尽量运往后方；至于人民逃难的行列，更是历史上空前的“大移民”。大家认为要逃，要搬，要与这政府共生死，同命运，就任何困难危险都不顾，以后怎么样，也就毫不考虑了。

今天的情形，恰恰相反，政府既不要人民，人民也已绝对厌恶这个政府，这是从事实的教训，一桩桩，一件件，让大家彻底觉悟了的。在半年以前，战区的学生还纷纷逃难，象东北的学生，曾大批流亡到平津，而结果怎样呢，不仅学业不能继续，生活无法维持，而且遭到残酷的屠杀。开封的学生，烟台的学生，也有逃亡出来的，结果都受到非人的待遇，风餐雨宿，无以为生。至于一批批的难民，更到处流浪，到处遭驱逐虐待。因此，大家都觉悟逃亡是多此一举了。

这两年来，政府岂仅不要民众，简直可说是仇视民众。学生都视同“匪谍”，一批批拘捕，工人、商人，也动辄犯“法”，架入“特刑庭”，而工厂和一切正当商业，重重的苛捐杂税以外，再加上原料受控制，买卖不自由，甚至赖以保本的一些金钞，也都被强迫换成废纸，一切正常事业，都逼得走投无路，一切安分良民，都逼得无法生活。这许许多多的事实，证明这个政府所代表的，只是极少数的豪门巨族，此外都视同牛马，视如仇敌。所以上海人说：“只有孔家的人要逃难。”这句话，何等深刻，何等沉痛！

是真正代表人民权利和政府，就一定能得着热烈的拥护。过去，从东北，从山东河南逃出来的人，现在都反悔了，觉悟以前是受了片面宣传的麻醉，上了当。为什么？事实告诉他们，不逃的人，反而生活都安定而改善了。不仅是个人的生活，工厂一一开工，商店照常营业，而且得着协助，一切社会秩序和公用事业，都很快恢复常态，学校都开课，而且在东北华北，都新建立了规模宏大的大学，整个的气象都改变了。这一切，以前还有人怀疑是宣传，现在则证明是事实。因为只要是事实，是终究掩盖

不了的，京沪平津等都市，常常有从“那边”来往的人，最后终于使大多数的人明白了。

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今天的情形已经很明显，逃是一条死路，不逃是一条生路。新中国的建设，需要每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民，努力奋斗，各在各自的岗位，发展生产，积极建设。国家上了轨道，不仅个人的生活再不受任何威胁，而且每一个人前程似锦，有做不完的事业可做。今天，大局虽尚未完全底定，而大势所趋，是谁都看清了，一旦战乱停止，许多建设的工作就要开始，真是疮痍满目，百废待举。在这光明在望的时候，我们不仅精神上要准备，实际的工作也应早作准备。今天在京沪平津不逃的人，自然不必再逃，应尽可能保护已有的基业，学校、工厂、商店，都应竭力保存元气，爱护设备，作将来复兴的基础，并以集体的力量，消弭战祸，阻止破坏。就是不得已已逃出来的人，也应积极准备，一旦局势安定，就立即回去恢复岗位，重振事业。流亡的滋味不是好受的，逃到天涯海角，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只有国家强盛建设起来，我们才能真正抬起头来。

我们的国家，今天正届临大时代的前夕，历史已展开崭新的一页，除腐更新，这工作已完成了一半。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群策群力，建设起一个真正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这样，我们国家的生存，固将永不受任何外来的威胁，而世界恒久的和平，也必因此获得一有力的保障。我们的前途，真是任重道远呢！

（原载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香港《文汇报》）